



中共20大與區域安全

《學術研討會》

**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on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Regional Security”**

論 文 集



編輯說明

Editorial Notice

中國大陸近年的勢力發展已在區域內深具影響力，在世界格局中也成為與美國爭鋒的重要角色；因此，中共20大的召開，特別受到全球關注，尤其在俄烏戰事爆發後，兩岸關係及區域安全更成為國際矚目焦點。

為深入了解中共20大重要議題、黨政發展及對周邊區域安全情勢影響，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國家圖書館、中共研究雜誌社及展望與探索雜誌社，特於中共20大召開前，共同舉辦「中共20大與區域安全」學術研討會。

本研討會於今(2022)年10月7日在國家圖書館三樓國際會議廳舉辦，與會人員包括政府官員、外國駐臺代表、智庫學者、媒體及社會人士約三百人，研討現場氣氛熱絡，內容精闢，經洽得論文發表人、與談人及共同主辦單位同意，印行會後論文集。

論文集依研討會場次規劃為三大主題，分別為「大陸情勢」、「區域安全」及「兩岸關係」，除刊載研討會發表之論文及學者與談內容外，同時蒐錄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名譽教授邱坤玄專題演講稿，以及展望與探索雜誌社輯錄之「兩岸關係大事紀(2021年11月至2022年10月)」，期能充實論文集內容，以饗讀者。

編輯出版資料校對如有疏漏、舛誤，尚請不吝批評指教。若有引用，請恪遵著作權之相關規定。

「中共 20 大與區域安全」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on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Regional Security”

目 錄
Table of Contents

編輯說明.....		I
Editorial Notice		
專題演講：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國特色大國外交.....	邱坤玄	1
Transcript of Keynote Speech Great Power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der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i>Chiu, Kun-Shuan</i>	
壹、大陸情勢		
Situation in Mainland China		
一、中共20大前黨政情勢與官媒主題分析.....	邵軒磊	7
Political Situation Befor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opics Analytics of the Official Media	<i>Shao, Hsuan-Lei</i>	
「中共20大前黨政情勢與官媒主題分析」與談稿.....	張登及	25
A Response to “Political Situation Befor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opics Analytics of the Official Media”	<i>Chang, Teng-chi</i> <i>邱佑寧</i> <i>Chiou, You-ning</i>	

二、中共20大的預演：習近平的造神運動與集權化.....	蔡文軒	28
The Rehearsal of 20 th Party Congress: Xi Jinping's Apotheosis and Centralization	<i>Tsai, Wen-Hsuan</i>	
「中共20大的預演：習近平的造神運動與集權化」與談稿.....	林瑞華	40
A Response to "The Rehearsal of 20 th Party Congress: Xi Jinping's Apotheosis and Centralization"	<i>Lin, Ruihua</i>	
三、從訊息傳遞節點探究認知作戰防制.....	劉文斌	45
Cognitive Warfare Prevention from Message Delivery Nodes	<i>Liu, Wen-Pin</i>	
	鄭惠應	
	<i>Cheng, Te-Ying</i>	
「從訊息傳遞節點探究認知作戰防制」與談稿.....	傅文成	75
A Response to "Cognitive Warfare Prevention from Message Delivery Nodes"	<i>Fu, Wen-Cheng</i>	
貳、區域安全		
Regional Security		
一、印太戰略發展與美「中」競爭關係分析.....	徐筱琦	81
An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US Indo-Pacific Strategy and the US-China Competition	<i>Hsu, Hsiao-Chi</i>	
「印太戰略發展與美『中』競爭關係分析」與談稿.....	王尊彥	99
A Response to "An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US Indo-Pacific Strategy and the US-China Competition"	<i>Wang, Tsun-yen</i>	
二、「中」印在尼泊爾競逐下的美國因素.....	郭偉山	102
The U.S. factor in China-India rivalry in Nepal	<i>Kuo, Wei-Shan</i>	
「『中』印在尼泊爾競逐下的美國因素」與談稿.....	方天賜	119
A Response to "The U.S. factor in China-India rivalry in Nepal"	<i>Fang, Tien-sze</i>	
三、解構中國大陸「次國家級外交」與亞太非傳統安全利益關係.....	黃秋龍	123
To deconstruc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na's "Subnational diplomacy" and Asia Pacific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i>Huang, Chiu-Lung</i>	
「解構中國大陸『次國家級外交』與亞太非傳統安全利益關係」與談稿.....	連弘宜	139
A Response to "To deconstruc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na's "Subnational diplomacy" and Asia Pacific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i>Lien, Hong-yi</i>	

參、兩岸關係

Cross - Strait Relations

- 一、從臺灣民意檢視中共對臺「一代一線」政策之成效..... 關弘昌 145
Examin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CP's "One Generation, One Line" Policy towards Taiwan from the View of Taiwan's Public Opinion
「從臺灣民意檢視中共對臺『一代一線』政策之成效」..... 薛健吾 166
與談稿 Hsueh, Chienwu
A Response to "Examin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CP's "One Generation, One Line" Policy towards Taiwan from the View of Taiwan's Public Opinion "
- 二、China-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20th Bruno Magno 169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 Response to "China-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the Context Guermantes 187
of the 20th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ailari
- 三、Investment in R&D by Taiwan SMEs as a Covid-19 business Buwule, Robert 197
survival strategy: Initial Results
A Response to "Investment in R&D by Taiwan SMEs as a Rup Narayan Das 216
Covid-19 business survival strategy: Initial Results"

肆、附錄

Appendixes

- 兩岸關係大事紀（2021年11月至2022年10月）..... 鄭光傑 編輯 223
Major Episodes Involving Cross-Strait Relations from Cheng, Kuang-Chieh
November 2021 through October 2022
- 「中共20大與區域安全」學術研討會議程表..... 262
Agenda of the Symposium on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Regional Security"

專題演講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國特色大國外交」 “Great Power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der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邱坤玄 (Chiu, Kun-Shuan)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名譽教授

Emeritus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習近平於2017年末在駐外使節工作會議上，提出了放眼世界，中國正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判斷，自此以後此一命題成為大陸學界熱門的議題，但是對於百年、未有、大變局等方面的理解與分析並不完全一致，個人以為大陸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袁鵬的論點，¹最具有政策分析的參考價值。

首先，百年不是專指中國的「百年屈辱」，而是更多從世界的層次觀察，根本上是數百年來西方與非西方關係的改變，隱含力量對比的轉變導致西方主導的式微。「未有之」，變局是在沒有戰爭條件下發生，更重要的是中國是在「沒有對外殖民與發動戰爭前提下崛起」。稱其為大是因為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社會資訊化、文化多樣化、威脅多元化同時發生。

總結而言，當前國際體系處於行將解體，新的國際秩序尚未建立的過渡時期，充滿了不確定性與焦慮感。而中國的獨特崛起方式，讓西方國家無以適從，美國無論以何種形式都無法阻止中國的崛起，同時中國要實現民族復興也必須在美國體系內進行，正是在此大變局下，更需要推動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

1 袁鵬，「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我見」，*現代國際關係*，2020年第1期，頁1-2。

二、中國特色大國外交

中國特色強調在擷取西方長處之時，仍然要以中國國情為重，也可彰顯尊重各國發展模式的主張。此特色的大國外交包含三個主要成分，首先是發展中大國是中國的基本定位，中國雖然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人均所得以及其他發展指標，仍在發展中國家之列，中國強調永遠是發展國家的一員，永遠是發展中國家的朋友，這是中國外交最主要的支撐來源。

其次，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念，摒棄叢林法則，堅持國家平等，反對霸權主義，推進國際關係民主化，反對干涉別國內政。最後是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以和而不同的和諧理念，尊重文明的多樣性以及各國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同時從這些傳統經驗，增加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

此種特色的大國外交，強調崛起後的中國應當要有機會參與國際規則的建立，但是西方的解讀則傾向於中國就是要挑戰、甚至取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秩序，兩者之間相互猜忌，一方強烈壓制，另一方則是自信與堅決鬥爭，形成惡意上升的螺旋。2017年，中共「十九大」政治報告評估國際力量對比更趨平衡，隱含「東升西降」的趨勢不可逆轉，之後川普政府的美國白宮國家安全戰略，將中國定位為「修正主義」(revisionist)的國家，雙方對立更為公開與激烈。

三、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平臺

「一帶一路」是習近平新時代統籌中國內外發展方向的世紀工程，它是張騫與鄭和的綜合體，強大的海軍成為重要的支撐。中共強調此工程是開放性的區域主義國際新制度，從經濟特區、引進外資、加入WTO的「引進來」的改革2.0版，轉向「走出去」的改革3.0版，完善與建立上海合作組織、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亞投行、人民幣國際化，加上密集的首腦外交與多邊外交。這些措施同樣地受到西方的質疑，批評中共以國家資本主義投資發展中國家，造成這些國家對中國的依賴與債務。

新冠疫情之前，大國外交的功效確實較為明顯，但是香港國安法實施、新冠疫情爆發，尤其是俄烏戰爭之後，為「大變局」增添更大的變數，內外政策的互動與全球治理更為複雜，大國外交面臨多面向與多層次的壓力。

在美國為首的西方強力制衡壓力下，大國外交走向與俄羅斯、發展中國家關係更為密切，社會主義色彩更為鮮明，更加「敢於鬥爭、善於鬥爭」。

四、修習底德陷阱？

根據世界貨幣基金會的統計，2021年中國大陸的GDP是美國的76%，估計到了2023年中國大陸的GDP將達到美國的80%，依據權力移轉論的觀點，此時是崛起強權最可能挑戰現有霸權的時刻，過去500年來，16次的權力移轉，12次發生戰爭。關鍵在中共的意圖：如何引導或是形塑中共的意圖，是當前國際政治最主要的課題。

美中衝突的原因基本上是結構性的，它是現狀霸權與崛起強權關係的行為模式，批評政權與領導者的本質，只是作為結構下對立的薪火，不是衝突的根本原因。毛澤東時期的政權與領導特質，世人皆知，但仍可作為美國聯合的對象，以制衡蘇聯，因為中國的經濟尚不是世界第二。

霸權與崛起國的競爭關係，逐漸進入國際政治無政府狀態的世界，過去賴以合作的經濟互賴關係，在激烈的競爭下彼此疑慮與脆弱性逐漸加深，霸權希望「脫鉤」（decoupling），崛起國會尋求自主，可能形成兩個世界、兩套規則。

五、結語：競爭性的共存

中國爭取的並非真正的全球力量，也不是想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霸權；在中短期內，這不是可實現的目標。但中國肯定是在追求反霸權：追求有能力阻止美國將其意志和模式強加於中國之上。

美國學者Stephen Walt曾言世界也可能選擇中國規則（The World Might Want China's Rules），這些規則比較特出的有主權原則與聯合國中心主義、限制跨國資本主義，提倡混合制所有權制度、給予發展中國家在政治體制和文明多樣性的選擇權。現實主義大師Graham Allison主張美國與中國交往政策的目標，是以地緣政治戰略保障美國國家利益，而不是推展美國價值，企圖改變中共政權的本質。這些都是值得進一步思考的議題。

拜登政府的「亞太沙皇」Kurt Campbell在一篇名為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可以理解為鬥而不破）文章中主張，儘管兩國之間存在著許多分歧，但雙方都需要做好準備，把另外一個國家當成主要大國來共存……美國必須加強自身的威懾能力，同時與盟友合作，以形塑有利於中國以及世界的政策選擇。一個競爭性共存的世界，值得努力追求。

壹

大陸情勢

Situation in Mainland China

中共 20 大前黨政情勢與官媒主題分析^{*}

Political Situation Befor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opics Analytics of the Official Media

邵軒磊 (Shao, Hsuan-Lei)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副教授

摘要

中國共產黨第20次全國代表大會將於2022年下半年召開。在黨政議題中，本次會議將關注習近平權力以及中共對於黨政策的重要報告。本研究嘗試使用「計算中國研究」(Computational China Studies)，結合程式設計與中國黨政相關知識，來設計一套研究流程，用以分析此一議題。具體而言，本研究蒐集官媒《人民日報》在2022年1月至6月之所有新聞12,345則，並整理「發布時間、內容」做為基本語料，使用兩種方式回答黨政相關議題。其一、使用文字探勘(text-mining)方式找出中共政要在半年新聞中之出現頻率，本方法發現「習近平」的頻率遠高於其他政要，也能探索一些在公眾視野出現頻率較高的政治新星。其二、使用主題模型演算法(LDA)來歸納《人民日報》的新聞分類，藉此探索中共近期的政策或宣傳重點，期能偵測其黨大會報告可能的方向。「計算中國研究」能使用計算機強化對於資訊的理解效率，也能輔助既有的中國研究或相關大陸工作。

關鍵詞：人民日報、中共 20 大、計算中國研究、習近平、文字探勘、主題模型分析

^{*} 通訊作者與通訊方式：邵軒磊，hlshao2@gmail.com。本研究致謝科技部計畫「中國研究的知識圖譜：知識萃取、圖譜資料庫、知識生成(110-2628-H-003 -002 -MY4)」以及臺灣大學林泉苗助理參與研究。

壹、研究背景：2022 中共黨政情勢簡述

近期中共黨政之核心議題，即是習近平個人的權力基礎與其展現。20大的籌備，從習近平於廣西壯族自治區全票當選廣西黨代表開始。當時廣西黨機關更宣告「緊跟偉大復興領航人踔厲篤行」，¹黨機關並同時宣示「永遠擁戴領袖、捍衛領袖、追隨領袖」，²大量印製《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大家學系列》（不過事後下令回收銷毀上開書籍）。³可見習近平「個人領導風格」與前任領導人大相逕庭，這自然牽動了中共20大的主要發展氣氛。

在政治與政策上之要點之一在於對「防疫清零」的堅持，一般咸認此政策為習近平個人意志的重要體現。因此，自今(2022)年初的西安社會面清零令，⁴及河南禹州的全市居家隔離伊始，⁵其後封鎖深圳、⁶上海等大城市。⁷追求防疫清零，至今仍有間歇性封城封村封區之舉。雖有其他政治事件（如RCEP、美日臺高層互訪、冬奧會、俄烏戰爭、地方財政等），但疫情管理仍是習近平當今最核心的要務，也是黨政情勢與幹部考核最重要之核心要素。因此執行「清零」政策的目的不只是防疫，亦含有社會控制、樹立權威，與幹部政策執行忠誠度檢視，而使相關措施必須延續且加強執行，往往在越是基層的區域，執行力度越大；而執行力度越大，往往在個人黨政地位上會得到更相應的獎勵。如在上海市第12屆委員會的選舉中，強硬封城的上海市委書記便在日前通過了的政策檢核，順利連任職務。⁸

因此，相較於往年「保」經濟的呼聲與期望，今年黨政情勢的核心訴求更多轉向「穩定與忠誠」。其中原因在於，在習近平連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前提下，政績考核並非以經濟成長為基準，而是以執行與習近平有關之政策為準。從各地中國共產黨第20次

- 1 「《緊跟偉大復興領航人踔厲篤行》電視專題片在區直機關引發熱烈反響」（2022年4月28日），2022年7月21日訪問，〈廣西機關黨建〉，<http://www.gxjgdj.gov.cn/xcsxgzx/llwz/20220428-1308394.shtml>。
- 2 「《緊跟偉大復興領航人踔厲篤行 凝心聚力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2022年4月28日），2022年7月21日訪問，〈廣西北部灣經濟區規劃建設管理辦公室網站〉，<http://bbwb.gxzf.gov.cn/ywdt/t11825751.shtml>。
- 3 紀曉華，「《中國觀察》廣西「紅寶書」傳遭叫停」（2022年5月20日），2022年7月21日訪問，〈星島日報〉，<https://std.sheadline.com/kol/article/6717/政商KOL-中國觀察-廣西-紅寶書-傳遭叫停>。
- 4 「【西安】集中發力推進社會面清零」（2022年3月17日），2022年7月21日瀏覽，〈陝西省人民政府〉，http://www.shaanxi.gov.cn/xw/ldx/ds/202203/t20220317_2214134_wap.html。
- 5 「關於禹州市新冠肺炎疫情社區防控方案的通知」（2022年1月14日），2022年7月21日瀏覽，〈禹州市人民政府〉，<http://www.yuzhou.gov.cn/jryz/004004/20220115/21f61661-aed4-4032-a2d9-b2f5d8f22658.html>。
- 6 「深圳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通告〔2022〕3號」（2022年3月20日），2022年7月21日瀏覽，〈深圳市人民政府〉，http://www.sz.gov.cn/szzt2010/yqfk2020/szzxd/zcyy/zcwj/fkzc/content/post_9625215.html。
- 7 「上海按照三區劃分要求實施從嚴管控 防範區市民活動範圍分四種情況」（2022年5月1日），2022年7月21日瀏覽，〈河北省衛生健康委員會〉，<http://wsjkw.hebei.gov.cn/wbcz/388048.jhtml>。
- 8 「李強當選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新華網」（2022年6月28日），2022年7月21日瀏覽，〈新華網〉，http://www.news.cn/politics/2022-06/28/c_1128785609.htm。

全國代表大會也逐漸進入籌備時期，而肺炎疫情此起彼落看來，是否堅持維持「動態清零」政策？則是黨政風向球，6月28日於習近平於武漢市考察，⁹發表了「寧可暫時影響一點經濟發展，也不能讓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受到傷害。」¹⁰等動態清零宣言，可說是當前定調中共20大政策與黨建設的基礎方向。

但若堅持動態清零政策，其代價會很難同時要求促進經濟成長。¹¹自從2021年中共宣布房地產、科技業及補教等行業的監管政策之後。¹²經濟成長確實放緩，因此於今年宣傳系統中對於共同富裕的提及次數降低，如從去年《第三個歷史決議》中提及8次共同富裕，¹³而在今年國務院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僅提及1次共同富裕。¹⁴這也若干暗示習李不同調的狀況，如黨內與國務院總理的環境認識差異，同時在中共中央宣示希望達成經濟成長率5.5%的目標之下，¹⁵外界評估（摩根史坦利公司）今年「中國」之經濟成長率預測為4.2%。¹⁶

除此之外，新疆問題亦為黨政重點項目。¹⁷特別是對於外國宣傳上（如支持/抵制新疆棉花事件），新疆人權問題是特別重要的爭點。中共拘禁異議人士，始終是外國政府或非政府組織對於「中國」人權的疑慮之處。因此在黨政情勢上也是至關重要的政策或宣傳重點，如習近平在新疆考察工作結束時的講話中亦特別強調。¹⁸因此，諸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馬興瑞則是因為治理有功，未來或有更為重用跡象。

以此延伸，中共20大會前人事變動或揭示了黨內的政治鬥爭跡象，習派個別人物

9 張雅媛、顧文瑋、林志陵等，「COVID-19 全球流行時的契機：感染管制之轉變與創新」，*北市醫學雜誌*（臺北），第17卷第4期（2020年12月），第390-401頁。

10 「習近平在湖北武漢考察時強調：把科技的命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不斷提升我國發展獨立性自主性安全性」（2022年6月29日），2022年7月21日瀏覽，〈《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xinwen/2022-06/29/content_5698391.htm。

11 康義，「康義：堅持以習近平經濟思想為引領推動我國經濟高品質發展」（2022年7月6日），2022年7月22日瀏覽，〈《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xinwen/2022-07/06/content_5699485.htm。

12 「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2021年7月24日），2022年7月22日瀏覽，〈《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zhengce/2021-07/24/content_5627132.htm。

13 「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全文）」（2021年11月16日），2022年7月22日瀏覽，〈《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zhengce/2021-11/16/content_5651269.htm。

14 「2022年李克強總理作政府工作報告」（2022年3月12日），2022年7月22日瀏覽，〈《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zhuanli/2022/11/22/content_5699485.htm。

15 「“5.5%左右”！有條件、有能力、有信心」（2022年3月6日），2022年7月22日瀏覽，〈《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zhengce/2022-03/06/content_5677534.htm。

16 Teletrade, “Morgan Stanley Slashes Its China 2022 GDP Growth Forecast to 4.2%: Analytics and Market News from 26 April 2022 02:58” (April 26, 2022), visited date: July, 22, 2022, 〈《Teletrade》〉，<https://www.teletrade.org/analytics/market-analysis/market-news/3749303>。

17 Debasish Chaudhuri, “A Hundred Years of Entanglement: The Chinese Party-State and Ethnic Minorities.” *China Report*, Vol. 58, No. 1 (2022), pp. 75-89.

18 「習近平在新疆考察時強調 完整準確貫徹新時代黨的治疆方略 建設團結和諧繁榮富裕文明進步安居樂業生態良好的美好新疆 -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政府門戶網站」（2022年7月15日），2022年7月21日瀏覽，〈《教育部》〉，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2207/t20220715_646401.html。

也有遭受挑戰的可能。比如原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兼中共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的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辦公室之成員王滬寧，同時亦為習近平之重要幫手。王滬寧以擔任「中央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之事務繁忙為由，將前述職務由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兼國家發展改和改革委員會主任何立鋒接掌。¹⁹此舉可能不符合「七上八下」原則，因此有論者視為一個對於習近平權威的觀察風向球。換言之，除習近平以外之中常委，皆可能發生變化。

而其他高層動向方面，如中共湖北前省委書記亦轉任為大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²⁰及調任海關總署署長、中共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和退役軍人事務部長分別出任河北省委書記、四川省委書記和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以取代前任派系。²¹而亦有經中共中央紀律委員會國家監察委員之監察已經有14名銀行管理階層受到以反腐為名義的權力剝奪。²²因此可見派系間亦有若干動作。

在俄烏戰爭時期，俄「中」關係之間亦有若干變化。在戰爭發生前中共曾經宣示「中俄關係上不封頂」，大陸外交部副部長更表示「中俄關係這列快車永遠在路上，沒有終點站，只有加油站。」²³而在俄烏戰爭發生後，習近平並未依循外交禮儀回訪俄羅斯，外國媒體報導習近平因肺炎疫情為由推辭日程。²⁴但可見俄烏戰爭後，俄「中」關係可能處於另一個交叉點。

中共全國黨代表大會每5年召開1次，近期江澤民及胡錦濤皆為連任一次，已成為若干潛例。至今雖然習近平尚未公開宣示其欲尋求三連任，但透過4年前的的憲法修正案中，已經將大陸國家主席的連任期限廢除，在法理上已可無限期連任。²⁵在2018年憲法修正案的前提下，目前習近平連任第三屆之意圖已然明顯。但今年以降，上述社會問題，如移動控制、防疫清零、少數民族政策、黨政人事、國際情勢、及經濟成長趨緩之外，習近平個人在權威上雖有若干雜音，但總體而言是否有明顯挑戰者為中共20大帶來變數？因此，本文試圖關心兩個核心問題：習近平的權力是否穩固？如果穩固，20大將

19 孫嘉業，「中國評論：王滬寧交權何立峰？」（2022年3月31日），2022年7月21日瀏覽，《明報》，<https://news.mingpao.com/pns/中國/article/20220331/s00013/1648663949665/>。

20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任命名單」（2022年4月20日），2022年7月22日瀏覽，《中國人大網》，<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204/035b083c2c21486fbd5a49a5f9550aa5.shtml>。

21 「河北、四川省委主要負責同志職務調整」（2022年4月23日），2022年7月22日瀏覽，《四川省政府網》，<https://sctcm.sc.gov.cn/sctcm/szxw/2022/4/23/67e01a91dd42411baec4fc47d0c134f8.shtml>。

22 「一日3位銀行高管落馬、年內14位被查，金融反腐持續推進」（2022年4月23日），2022年7月22日瀏覽，《新浪網》，<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220423/41671724.html>。

23 「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中俄關係上不封頂，不斷攀登新高」（2022年2月5日），2022年7月22日瀏覽，《外交部》，https://www.fmprc.gov.cn/wjbxw_new/202202/t20220205_10639185.shtml。

24 比嘉清太，「プーチン氏が訪露要請、習近平氏は「近い将来は困難」…ウクライナ侵略長期化で温度差」（2022年7月4日），2022年7月22日瀏覽，《読売新聞》，<https://www.yomiuri.co.jp/world/20220704-OYT1T50027/>。

25 「解讀：關於憲法修改的意義」（2018年6月13日），2022年7月22日瀏覽，《安陽人大資訊網》，<http://www.anyangrenda.gov.cn/2018/06-13/20721.html>。

會有什麼樣的政策與討論？

相對於本節的總體政情羅列，本文亦試圖導入計算中國研究（Computational China Studies）之方法，使用《人民日報》之語料庫。以文字探勘（text mining）與程式語言（programming）對現今政情做出比較與分析。本方法可能輔助既有的中共研究者，減少原有大量文獻與資訊閱讀的時間，同時使用程式可得到若干量化和預測的可能發展。

貳、文獻回顧

綜上所述，近期關於中共黨政議題，本文就兩個核心議題來討論：

一、習近平是否有權力下降跡象？

（一）贊成說：

有學者指出，「日本《產經新聞》臺北支局長矢板明夫觀察大陸政治局勢，指出中共20大即將來臨之際，已有股『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認為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權力已被架空，喪失政局主導權，其觀察切入點值得參考。從觀察中共傳媒對領導人報導現象改變，指出近期官媒對集黨權政權軍權於一身習近平報導，似乎有大幅減少跡象；而對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版面反而增加，例如5月14日《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同時刊登李克強先前講話。在中共20大召開前的關鍵時期，突出李克強政策話語權；同月17日《人民日報》頭版中，沒有報導習近平相關新聞，卻有李克強與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兩篇報導，此種報導排版方式實屬罕見。」²⁶

其研究方法是使用《人民日報》是否刊登習近平，而且其以「數量」或是否刊登在頭版方面。以往亦有日本學者村田忠禧使用類似方式討論《人民日報》社論的文字，並以此描述其「中國」政策發展的主要趨勢。

（二）反對說：

由近年人事安排看來「習近平上臺後，即不避諱提拔任用自己人，因此近十年來出身福建、浙江、上海及中央黨校者屢獲提拔。目前在地方的代表人物有北京市委書記蔡奇、重慶市委書記陳敏爾、廣東省委書記李希、上海市委書記李強、河南省委書記樓陽生、安徽省委書記鄭柵潔、雲南省委書記王寧、甘肅省委書記尹弘、海南省委書記沈曉明、河北省委書記倪嶽峰、湖北省委書記王蒙徽、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書記梁言順；以及上海市長龔正、陝西省長趙一德、甘肅省長任振鶴、黑龍江省長胡昌升、江蘇省長

26 柳金財，「中共實施動態清零政策與黨內權力競逐」，*展望與探索月刊*，第20卷第7期（2022年7月），頁110。

許昆林、海南省長馮飛、福建省長趙龍等。」²⁷因此，這些人的人事占據高位，習近平的黨政實力就不容質疑。另一位專家也指出「中央部委領導以平調居多，省級黨政領導晉升則隱已形成『省級黨委常委→省級黨委副書記→省(市)長→省級黨委書記』的升遷管道。在此前提下有多位習近平舊屬或廣義『之江新軍或東南軍』成員平調或調升正省部級要職，有助進一步厚植其權力基礎。」能佐證習近平地位穩固。²⁸

二、20大可能的報告議題？

而從2022年兩會的進行來看，也有專家認為習近平的權力是較為穩固的，比如說兩會主題是「圍繞中國共產黨20大勝利召開凝心聚力。可見兩會是為2022年底即將到來的中共20大做預演與準備，主軸放在凝聚大陸民眾與幹部的政治共識，擁護習近平續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²⁹甚至指出「維穩，全過程民主，產業創新」等主要議程，並預判「習近平會將社會改革、經濟發展及科技創新等議題列為中共20大主要的議程重點。」³⁰

因此，本文立基這樣中共20大所關心兩個核心議題來做出考證：

- (一) 能否從官媒新聞《人民日報》習近平出現的頻率，觀察到其近期出現頻率下降的趨勢。從而理解其權力是否穩固？
- (二) 是否從官媒新聞的主題分析中，能驗證官媒所出現的主題趨勢。從而預測20大可能的主要議題？

做為研究前提，本文認為《人民日報》做為政策傳聲筒，除前述柳金財/矢板明夫的論點：名字出現之頻率能反映權力消長之外。有學者研究「人民日報影像」也是黨政關係的風向球：「受到黨性原則的影響，黨報的辦報理念、編輯方針必須與中共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保持一致。這使得黨報刊載的政治新聞，無論是在新聞文字或是新聞照片上，都會反映出領導人對重要政策的態度，也能透露領導人權力消長的蛛絲馬跡。因此，黨報刊登的領導人照片可以幫助外界了解中共高層互動的情形，減輕資訊不足的困擾。」³¹更進一步，不同媒體也可能藉由此一方法來觀察高層，甚至媒體間不同立場：「分析《人民日報》與《解放軍報》兩報在1978年真理標準論戰、1989年天安門事件、1992年鄧小平南巡三次事件中的版面變化，證實領導人權力消長與他們在新聞版面

27 郭瑞華，「中共20大前省級黨政領導人調整分析」，*展望與探索月刊*，第20卷第5期(2022年5月)，頁18-27。

28 吳仁傑，「2020年年中以來中共中央和地方黨政主要領導更替分析」，*展望與探索月刊*，第19卷第5期(2021年5月)，頁60-73。

29 蔡文軒，「2022年中國大陸兩會評析」，*展望與探索月刊*，第20卷第4期(2022年4月)，頁10-15。

30 蔡文軒，「2022年中國大陸兩會評析」，*展望與探索月刊*，第20卷第4期(2022年4月)，頁10-15。

31 寇健文、梁書瑗，「中共領導人權力消長在黨報新聞照片上的呈現」，*政治科學論叢*，38期(2008年12月)，頁35-70。

位置好壞、出現頻率高低之間的高度相關。這顯示黨報的版面語言隱藏寶貴線索，提供分析中共高層菁英互動的另一條管道。」³²從更宏觀來看，亦有學者認為「《人民日報》能反應出黨政政體的體系」，如：「人民日報（微博）創造出了一種以象徵性的正義表達為核心、以情感激發為訴求，以民粹話語的表達為出口的策略性傳播模式。…從而暫時化解民眾訴求與黨國訴求之間的內在矛盾。…執政黨得以構築一個雙層化的傳播體系，這一傳播調適因而也構成了增進中國彈性威權政體的因素」³³

因此本研究將考察大量的《人民日報》語料，因時間軸關係，擬將使用2022年上半年之《人民日報》所有新聞，來觀察前述兩者主題：一、習近平的權力消長傾向；二、中共20大的可能政策。需要補充的是，以近幾屆為例，黨代表大會議程往往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為「工作報告」（聽取和審查18屆中央委員會的報告；審查18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工作報告。第二部分章程與法案（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第三部分為人事（選舉19屆中央委員會；選舉19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因此本文不擬回答章程與法案或較為具體人事相關的問題，期望就「工作報告」為核心，並兼論習近平(習派)權力消長的傾向。

參、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

對於中共黨政之研究方法，除傳統之長期觀察與深入「體會」之外³⁴，亦逐漸引入制度研究³⁵，量化分析³⁶，時序分析³⁷等實證工具。因此，近期在方法論上亦多有變遷，也隨著研究者個人的特殊學術取徑，引進新方法。

針對本議題，本研究主要使用文字探勘與機器學習中之主題分析（topic-modeling of Machine Learning）之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以下稱LDA演算法）作為核心演算法。在之前加上「語料蒐集，資料前處理」，之後加入可視化與主體知識詮釋（domain knowledge）。

32 寇健文、鄭兆祐，「黨報版面語言和中共高層互動：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為例」，*政治學報*，42期(2006年12月)，頁37-78。

33 李艷紅、龍強，「新媒體語境下黨媒的傳播調適與文化領導權重建：對《人民日報》微博的研究(2012-2014)」，*傳播與社會學刊*，39期(2017年1月)，頁157-1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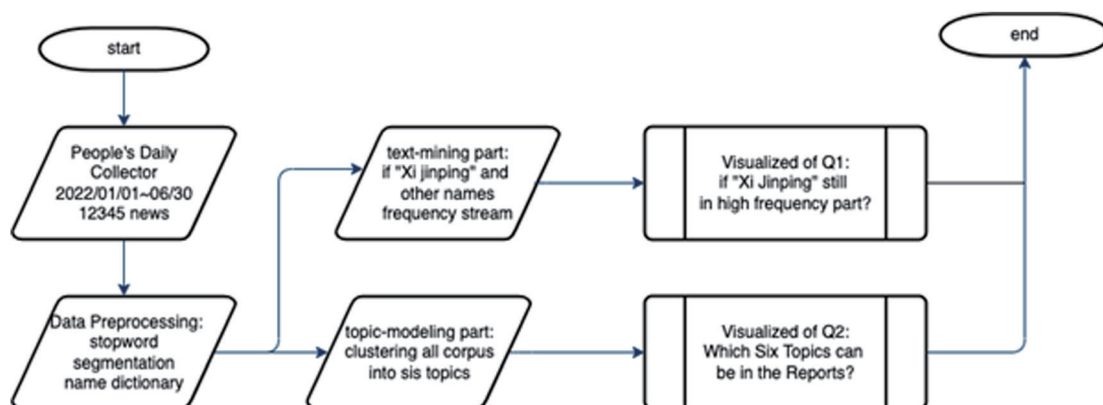
34 許志嘉，「鄧小平主政下參與中共外交決策的黨政組織探討」，*中國大陸研究*，第41卷第5期(1998年5月)，頁21-48。

35 趙建民、張淳翔，「中共全國人大黨政關係與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前景」，*中國大陸研究*，第43卷第2期(2000年2月)，頁1-13。趙建民，「黨國體制下黨與立法機構關係的若干思考—中國大陸個案分析」，*中國大陸研究*，第42卷第9期(1999年9月)，頁13-25。

36 陳德昇，「中共十八大黨政菁英甄補：預測、評估與反思」，*遠景基金會季刊*，第15卷第1期(2014年1月)，頁1-43。

37 黃信豪，「有限活化的中共菁英循環：黨政領導菁英組成的跨時考察」，*中國大陸研究*，第53卷第4期(2010年12月)，頁1-33。

圖 1 本文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對應於本文的兩個需求：「中共政要名字出現在樣本語料中」（圖上路徑），是使用文字探勘；「將樣本語料主題分析」（圖下路徑），是使用機器學習。詳情將於下節中詳述。

肆、資料運算成果

一、蒐集資料

依照前述流程圖。首先在2022年1月至6月蒐集《人民日報》新聞所有版面，所有「新聞」共12,345篇，依照月份分配如下表，每月共約二千則新聞，每日約六十則至七十則新聞：

表 1 《人民日報》每月新聞以及每日平均新聞數

month	NewsCount	NewsAver
1	2060	66.4516129
2	1760	62.8571429
3	2097	67.6451613
4	2111	70.3666667
5	2141	69.0645161
6	2176	72.5333333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若某一新聞跨版面，資料集將分成兩個新聞紀錄，這樣的新聞約佔1%~2%左右，而且既然已經跨版面，表示篇幅較長，稍稍給予「重要性」（視為兩篇）應該可能接受。所以中期並未著意去更動。同時在蒐集過程中，我們一併記錄了「版面，標題，副標題」，本次並未使用上述欄位，期望未來有適當的研究議題，或有研究者願意合作更深入研究之用。

在「前處理」（pre-proceeding）過程中，由於兩議題的處理方式有所不同。因此將於下兩節分別闡述。

二、各政要之姓名出現頻率與黨政判斷方向

本節使用文字探勘。文字探勘一般而言會有指定的詞語，因此可以用來遍歷（iterate）所有的文本。在本文的例子中，我們使用「中國政要」的名單，包括中央與地方幹部。

首先就前述論點「習近平未出現頭版，因此可能權力下降」此一論述，從1月到6月來看是比較難證實這樣的說法的。毋寧說，5月並不特別高或低，因此，可能偶有不是頭版，但其名字依然長居主要位置，如下表所示。

表 2 《人民日報》有任何名字的新聞中習出現頻率

習是否名字出現\月份	1	2	3	4	5	6	total
否（次數）	17	18	27	26	33	32	153
是（次數）	200	155	248	153	183	212	1151
否（百分比）	11.1%	11.8%	17.6%	17.0%	21.6%	20.9%	
是（百分比）	17.4%	13.5%	21.5%	13.3%	15.9%	18.4%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更進一步，若與其他領導人比起來，習近平確實是有其「過人之處」。如下表所示。其名字出現的頻率，相對於其他政要可說是「斷崖式增量」。不僅是相對於其他尚有重要職務的其他中常委，就連歷任的領導人，也都差距甚大。所以若以官媒中習近平的領導地位來看，可以說毋庸置疑的穩居第一。

表 3 《人民日報》各高頻出現政要

rank	Name00	Freq	Name10	Freq	Name20	Freq	Name30	Freq	Name40	Freq
1	習近平	1151	王晨	74	趙樂際	42	王偉	24	王立	15
2	毛澤東	175	楊潔篪	67	蔡奇	38	楊曉渡	23	凌雲	13
3	李克強	155	沈躍躍	65	高雲龍	33	李強	22	李剛	12
4	汪洋	119	李斌	59	蘇和	33	胡錦濤	21	張升民	12
5	栗戰書	116	王滬寧	53	尤權	33	江澤民	21	李希	12
6	韓正	103	郝明金	53	陳希	30	張又俠	20	陳敏	12
7	丁薛祥	83	恩格斯	52	黃坤明	29	許其亮	19	略	11次以下
8	鄧小平	78	孫春蘭	52	王浩	28	林鄭月娥	17		
9	胡春華	77	王東明	51	方正	27	李鴻忠	16		
10	王勇	77	劉鶴	48	郭聲琨	27	李春	15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穩居第一」的原因，當然包含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等專有「名詞」的影響。不過，因為差距太大，不影響其遠遠超過其他人的現況，本文就不為此特別開展討論了。

另一個值得思考的方向：官媒是否常提到的名字會代表其權力（或未來的權力）？比如說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們明顯較多，如李克強（155次）、汪洋（119次）、栗戰書（116次）、韓正（103次），而相對的王滬寧（53次）與趙樂際（42次）明顯少，可以觀察後兩者是否會在20大時調整職務。

再進一步，中央政治局委員有丁薛祥、胡春華、王晨、楊潔篪、孫春蘭、劉鶴、蔡奇、黃坤明、陳希、郭聲琨、楊曉渡、李強、王勇等，其中不乏傳言為「習派」人選。關於此一梯隊，是否順利接班或如何安排。可以視為本次20大的看點。有一些官職不高，但這半年常常出現的人物，如方正（池州市委書記）、王浩（浙江省長）、王立（宜昌市委書記）、李春（三明市市長）等在本次中共20大的表現或成果也值得注意。最後，林鄭月娥常常上版面當然是因為香港問題，其後是否在政協或其他去向也值得觀察。

三、《人民日報》主題分析預測中共20大黨政報告方向

第二部分，本文使用主題分析的研究方法。在前處理中使用python程式語言之jieba套件，加入停用字詞進行分詞，此後使用LDA的分群演算法（clustering）。將所有新聞非監督式分為6群。筆者參考各分類關鍵字詞之取向給予名稱，便於稱呼。

表 4 《人民日報》新聞 6 大主題

擬題	三農問題	疫情相關	社會主義制度	黨建	經濟發展	外交與國際事務
id	topic1	topic2	topic3	topic4	topic5	topic6
numbers	2136	2701	1282	1366	2498	2362
1	鄉村	文化	問題	習近平	企業	中國
2	生態	疫情	制度	中國	經濟	北京
3	農業	社區	香港	總書記	政策	國家
4	農村	學生	群眾	人民	科技	世界
5	產業	孩子	社會	時代	市場	全球
6	村民	學校	會議	歷史	產業	國際
7	城市	傳統	代表	社會主義	技術	冰雪
8	農民	團隊	國家	思想	國家	美國
9	群眾	時間	規定	特色	領域	運動員
10	綠色	中心	部門	精神	數字	主席
11	國家	社會	法治	全面	數據	經濟
12	全國	技術	情況	中華民族	高品質	疫情
13	資源	人員	法律	國家	項目	金磚
14	項目	藝術	機構	政治	產品	和平
15	糧食	醫院	地方	中國共產黨	體系	滑雪
16	地區	上海	基層	社會	能源	習近平
17	工程	北京	依法	同志	公司	項目
18	村裡	記者	報告	領導	重點	關係
19	規劃	人們	機制	民族	工業	人民
20	新區	故事	全國	世界	綠色	疫苗
21	環境	家庭	委員會	黨中央	人才	人權
22	重點	居民	國務院	文化	疫情	人類
23	當地	城市	政府	核心	中國	地區
24	公園	專業	委員	事業	行業	領域
25	設施	作品	意見	馬克思主義	全國	社會
26	總書記	志願者	單位	問題	國際	倡議
27	技術	職業	案件	理論	金融	雙方
28	文明	方式	民主	文明	環境	聯合國
29	面積	兒童	領導	戰略	能力	場館
30	利用	醫療	建議	制度	產業鏈	交流
31	全面	文物	責任	群眾	基礎	一帶一路
32	基地	觀眾	政治	力量	數位化	問題
33	問題	體驗	幹部	征程	物流	殘疾人
34	長江	社區	機關	任務	機制	理念
35	城鄉	博物館	規範	道路	轉型	奧林匹克
36	土地	群眾	全面	全國	智能	貢獻
37	政策	項目	司法	科學	政府	可持續發展
38	體系	現場	人民	體系	資金	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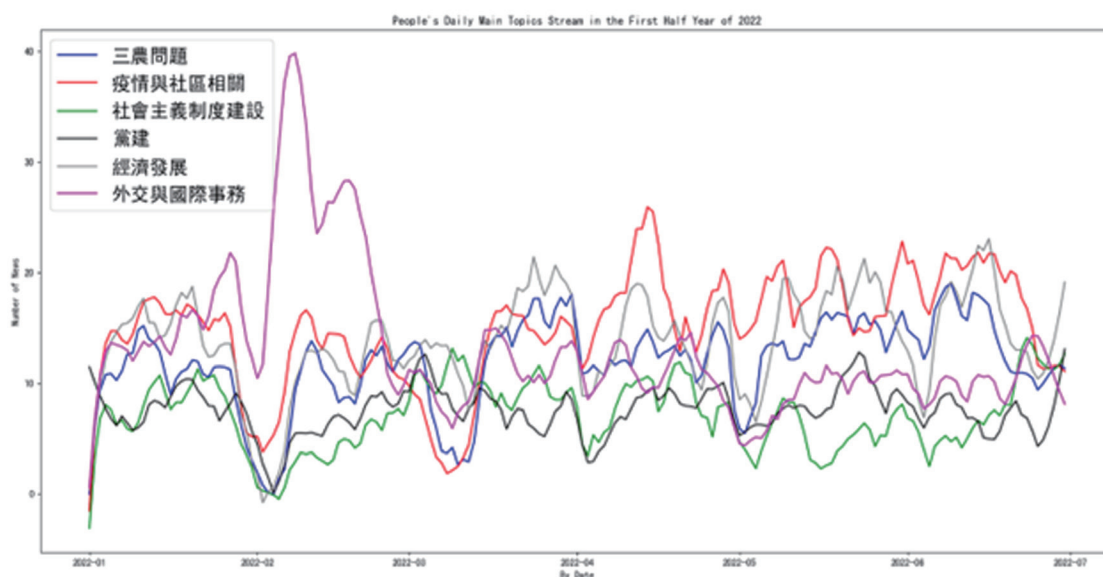
擬題	三農問題	疫情相關	社會主義制度	黨建	經濟發展	外交與國際事務
39	記者	老人	部署	黨和國家	力度	賽場
40	農產品	小時	網路	經濟	地區	非洲
41	區域	青少年	黨組織	理念	全球	歷史
42	高品質	教師	黨中央	黨史	集團	記者
43	耕地	過程	體系	弘揚	有限公司	開幕式
44	養老	老年人	人員	經驗	國內	兩國
45	新疆	核酸	重點	能力	製造業	論壇
46	全省	技能	行政	成就	水準	總統
47	品質	高校	辦理	中華	規模	賽事
48	森林	全國	方式	青春	區域	新華社
49	特色	力量	風險	高品質	風險	民眾
50	公共服務	情況	草案	歷史性	戰略	領導人
51	生物	患者	協商	幹部	市場主體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52	貴州	科學	法規	意義	全面	全面
53	能力	中國	領域	成果	優勢	精彩
54	農戶	問題	北京	目標	社會	目標
55	人口	內容	期貨	人類	資源	綠色
56	中心	主題	事項	傳統	系統	力量
57	遊客	當地	措施	共同富裕	供應鏈	盛會
58	小麥	視頻	專項	牢記	部門	金牌
59	基礎	資源	指導	強國	目標	對話
60	水準	信息	人民政府	貢獻	中心	友誼
61	海南	歷史	信息	代表	貸款	政治
62	鄉親們	崗位	決策	祖國	基礎設施	戰略
63	黃河	人才	黨員	風險	消費者	烏克蘭
64	成果	精神	全國政協	方向	新能源	王毅
65	品種	老師	能力	規律	模式	亞洲
66	情況	專家	條例	時期	經濟社會	時代
67	縣城	北京市	全國人大常委會	關係	工程	大國
68	氣象	志願	法院	價值	汽車	氣候變化
69	機制	文化遺產	人民代表大會	基礎	助力	俄羅斯
70	書記	利用	職責	優勢	信息	利益
71	種子	形式	原則	現實	鐵路	阿富汗
72	老區	建築	政策	主席	品牌	危機
73	社區	學院	環境	政黨	關鍵	原則
74	美麗	單位	憲法	黨和人民	協同	中國隊
75	方式	教學	糾紛	全黨	問題	命運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在6大主題中，新聞數量大致為「疫情相關、經濟發展、外交與國際事務、三農問題、社會主義制度、黨建」。在疫情上訴諸群體、社群、教育等軟性訴求。外交與國際事務上有較多的新名詞。黨建與社會主義制度上則是有許多令人注目的用語，需要若干質化研究來評析。較諸鄧江胡時期，三農問題的力度與數量下降，更多朝向環境治理、糧食安全；這點與經濟發展相同，近期轉為提升科技經濟。

更進一步，吾人可將「主題分析」的新聞數量依照時序作圖如下所示：

圖 2 《人民日報》6 大主題時序分布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若由時序分析可以看出，在2月上旬由於「冬奧會」加上「俄烏戰爭」，出現了國際事務的高峰期；另在幾次紅線的高峰（4、5、6月），皆為若干疫情嚴重甚至封城的相關報導。「經濟發展」的討論往往穿插在疫情新聞的間隙中，可看出疫情清零派與經濟發展派的方向選擇。3月兩會時比較多社會主義建設的討論。而在其餘的時間各種主題就比較混合多元。

伍、結論：初探「計算中國研究」研究法

一、分析與討論

本論文使用了文字探勘與主題分析法，演算2022上半年人民日報的新聞，以此分析黨政的兩個核心主題。政治人物的實力判斷以及政策報告的可能發展。針對兩個主要的議題：1.習近平（及其他中共政要）權力是否穩固？2.使用近期《人民日報》的各篇新聞來偵測甚至預估報告主題。

在第一項議題，「習近平」本人的權力遙遙領先其他政要，在12,345則新聞中，出現了1,151次，大約是9%的機率。比起李克強（155次）大約有7倍之多。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的派系如浦江新軍（丁薛祥、楊曉渡）、之江集團（李強）、新西北軍（張又俠）等，都能看出近期占有重要版面，可能在未來有晉升空間。若20大人事變動如同預料，可能證明文字探勘能取得不錯的效果。

第二項議題中，若依照《人民日報》新聞之主題推測黨大報告的話，在中共20大報告中，防疫（確實防疫、清零防疫）與經濟發展將會是兩項主軸，防疫可能稍稍重要於經濟，相較於19大強調共同富裕與小康社會，本次因為疫情治理應該會減少宣揚經濟。而改以「制度自信」與外交成就次之，並結合黨建成果與制度建設的宣示。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最核心的研究限制就是「時間範圍」，本研究之演算法必須要有固定的時序範圍，而政治效果的長短尚難確定。比如說，是否應該使用習近平第二任期（2017~）的全部資料？或是僅使用北戴河會議之後的資料？這個必須連帶考慮某些「政治行為」的效果持續性，目前尚缺乏比較穩定的流程設計。

其次，黨報告主題是否會直接反映在《人民日報》？因為讀者或受眾的關係可能未必會完全一致。不過，至少是可靠而客觀的線索，筆者也期待可能經過幾次嘗試錯誤修正其模型。

最後，也是文字探勘或主題分析常出現的問題，某些主題詞只出現一次甚至不出現，但相當重要，比如說「北戴河會議」是鮮少甚至沒有報導，但眾所周知對於中共之重要性；或是某些歷史事件，如高調紀念「某些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就是一個特殊指標，甚至政治信號，這樣的信號若僅有一次出現，是否能順利解讀，可能需要更多的研究者之操作與經驗。

三、未來展望

因此由上述論述可知，計算中國研究並不意指直接取代傳統研究。計算機能強化對於資訊的理解效率，也能快速模組化（替換資料、替換演算法），但也有許多未知或需要與專家合作的地方，也有很多需要詮釋之處。這種研究法正在崛起階段，亦有很多可能應用的場域，本研究能輔助既有的中國研究或相關大陸工作，也期待更多同儕與相關工作者的投入。

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

期刊論文

- 吳仁傑。2021/5。「2020 年年中以來中共中央和地方黨政主要領導更替分析」，**展望與探索**(新北)，第19卷第5期，頁60-73。
- 李艷紅、龍強。2017/1。「新媒體語境下黨媒的傳播調適與文化領導權重建: 對《人民日報》微博的研究(2012-2014)」，**傳播與社會學刊**(香港)，39期，頁157-187。
- 柳金財。2022/7。「中共實施動態清零政策與黨內權力競逐」，**展望與探索**(新北)，第20卷第7期，頁110。
- 徐若杰。2021/12。「北約布魯塞爾峰會折射美歐安全合作新動向」，**世界知識**(北京)，2021年12月下半月刊，頁13~15。
- 寇健文、梁書瑗。2008/12。「中共領導人權力消長在黨報新聞照片上的呈現」，**政治科學論叢**(臺北)，38期，頁35-70。
- 寇健文、鄭兆祐。2006/12。「黨報版面語言和中共高層互動: 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為例」，**政治學報**(臺北)，42期，頁37-78。
- 張雅媛、顧文瑋、林志陵等。2020/12。「COVID-19 全球流行時的契機：感染管制之轉變與創新」，**北市醫學雜誌**(臺北)，第17卷第4期，頁390-401。
- 許志嘉。1998/5。「鄧小平主政下參與中共外交決策的黨政組織探討」，**中國大陸研究**(臺北)，第41卷第5期，頁21-48。
- 郭瑞華。2022/5。「中共 20 大前省級黨政領導人調整分析」，**展望與探索**(新北)，第20卷第5期，頁18-27。
- 陳德昇。2014/1。「中共十八大黨政菁英甄補: 預測, 評估與反思」，**遠景基金會季刊**(臺北)，第15卷第1期，頁1-43。
- 黃信豪。「有限活化的中共菁英循環: 黨政領導菁英組成的跨時考察」，**中國大陸研究**(臺北)，第53卷第4期，頁1-33。
- 趙建民、張淳翔。2000/2。「中共全國人大黨政關係與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前景」，**中國大陸研究**(臺北)，第43卷第2期，頁1-13。
- 趙建民。1999/9。「黨國體制下黨與立法機構關係的若干思考— 中國大陸個案分析」，**中國大陸研究**(臺北)，第42卷第9期，頁13-25。
- 蔡文軒。2022/4。「2022 年中國大陸兩會評析」，**展望與探索**(新北)，第20卷第4期，頁 10-15。
- 鄭家慶。2020/1。「從北約70週年峰會聲明看中國大陸在歐洲的影響力擴張」，**展望與探索**(新北)，第18卷第1期，頁29-35。

網際網路

- 2018/6/13。「解讀：關於憲法修改的意義」，《安陽人大資訊網》，<http://www.anyangrenda.gov.cn/2018/06-13/20721.html>。
- 2021/11/16。「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全文）」，《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zhengce/2021-11/16/content_5651269.htm。
- 2022/1/14。「關於禹州市新冠肺炎疫情社區防控方案的通知」，《禹州市人民政府》，<http://www.yuzhou.gov.cn/jryz/004004/20220115/21f61661-aed4-4032-a2d9-b2f5d8f22658.html>。
- 2022/2/5。「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中俄關係上不封頂，不斷攀登新高」，《外交部》，https://www.fmprc.gov.cn/wjbxw_new/202202/t20220205_10639185.shtml。
- 2022/3/6。「“5.5%左右”！有條件、有能力、有信心」，《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zhengce/2022-03/06/content_5677534.htm。
- 2022/3/17。「【西安】集中發力推進社會面清零」，《陝西省人民政府》，http://www.shaanxi.gov.cn/xw/ldx/ds/202203/t20220317_2214134_wap.html。
- 2022/3/20。「深圳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通告〔2022〕3號」，《深圳市人民政府》，http://www.sz.gov.cn/szzt2010/yqfk2020/szzxd/zczy/zcwj/fkzc/content/post_9625215.html。
- 孫嘉業。2022/3/31。「中國評論：王滬寧交權何立峰？」，《明報》，<https://news.mingpao.com/pns/中國/article/20220331/s00013/1648663949665/>。
- 2022/4/20。「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任命名單」，《中國人大網》，<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204/035b083c2c21486fbd5a49a5f9550aa5.shtml>。
- 2022/4/23。「河北、四川省委主要負責同志職務調整」，《四川省政府網》，<https://sctcm.sc.gov.cn/sctcm/szxw/2022/4/23/67e01a91dd42411baec4fc47d0c134f8.shtml>。
- 2022/4/28。「《緊跟偉大復興領航人踔厲篤行》電視專題片在區直機關引發熱烈反響」，《廣西機關黨建》，<http://www.gxjgdj.gov.cn/xcsxgzx/llwz/20220428-1308394.shtml>。
- 2022/4/28。「《緊跟偉大復興領航人踔厲篤行 凝心聚力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廣西北部灣經濟區規劃建設管理辦公室網站》，<http://bbwb.gxzf.gov.cn/ywdt/t11825751.shtml>。
- 2022/5/1。「上海按照三區劃分要求實施從嚴管控 防範區市民活動範圍分四種情況」，《河北省衛生健康委員會》，<http://wsjkw.hebei.gov.cn/wbcz/388048.jhtml>。
- 紀曉華。2022/5/20。「《中國觀察 | 廣西「紅寶書」傳遭叫停》」，《星島日報》，<https://std.stheadline.com/kol/article/6717/政商KOL-中國觀察-廣西-紅寶書-傳遭叫停>。
- 2022/6/28。「李強當選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新華網」，《新華網》，http://www.news.cn/politics/2022-06/28/c_1128785609.htm。
- 2022/6/29。「習近平在湖北武漢考察時強調：把科技的命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不斷提升我國發展獨立性自主性安全性」，《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xinwen/2022-06/29/content_5698391.htm。

2022/7/6。「康義：堅持以習近平經濟思想為引領推動我國經濟高品質發展」，《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xinwen/2022-07/06/content_5699485.htm>。

2022/7/15。「習近平在新疆考察時強調 完整準確貫徹新時代黨的治疆方略 建設團結和諧繁榮富裕文明進步安居樂業生態良好的美好新疆 -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政府門戶網站」，《教育部》，<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2207/t20220715_646401.html>。

2022/7/22。「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zhengce/2021-07/24/content_5627132.htm>。

編輯部。2022/7/22。「2022年李克強總理作政府工作報告」，《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zhuanti/2022lhzfgzbg/index.htm>>。

2022/7/22。「一日3位銀行高管落馬、年內14位被查，金融反腐持續推進」，《新浪網》，<<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220423/41671724.html>>。

外文部分

期刊論文

Debasish Chaudhuri. 2022/01. “A Hundred Years of Entanglement: The Chinese Party-State and Ethnic Minorities.” *China Report*, Vol. 58, No. 1, pp. 75-89.

網際網路

Teletrade. 2022/4/6. “Morgan Stanley Slashes Its China 2022 GDP Growth Forecast to 4.2%: Analytics and Market News”, *Teletrade* , <<https://www.teletrade.org/analytics/market-analysis/market-news/3749303>>。

比嘉清太。2022/7/4。「プーチン氏が訪露要請、習近平氏は「近い将来は困難」…ウクライナ侵略長期化で温度差」，《読売新聞》，<<https://www.yomiuri.co.jp/world/20220704-OYT1T50027/>>。

與談稿

「中共 20 大前黨政情勢與官媒主題分析」 與談稿

A Response to "Political Situation Befor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opics Analytics of the Official Media"

張登及 (Chang, Simon Teng-chi)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邱佑寧 (Chiou, You-ning)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科技部計畫助理

本篇評論是針對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邵軒磊教授，也是該系中國大陸研究中心主任所提出〈中共20大前黨政情勢與官方媒體主題分析〉一文的評論。該篇文章的特點是邵教授所提出以「計算中國研究法」（Computational China Studies）為主的特殊研究設計，並且提出一套有系統的研究流程，針對《人民日報》的內容進行文字探勘和主題模型演算，在固定的時間範圍，也就是以在2022年1月到6月所抓取的12,000一萬二千多則新聞為基礎，經由系統性的爬梳，企圖分析中共上層領導人在新聞中的出現頻率，以進一步以了解個別領導人在下一次黨政菁英改組、特別是在20大中其可能的政治前景。

實際上此研究的前提，乃是建立在《人民日報》是中共執政得以構築雙層化傳播體系，進而鞏固了中共的統治正當性。同時，該文也利用「主題模型演算法」（LDA）來瞭解下一次黨代表大會，也就是中共「20大」政治報告和重要文件中，可能出現的政策宣傳重點。這也是預先假設了《人民日報》的內容，其實是中共20大政治報告重要主題之預先展示。

筆者認為，「計算中國研究法」係從事具悠久歷史的中國研究和區域研究，是一個非常有前途、並且值得推廣的嶄新研究方法。不過，也如同邵教授在文章中坦率表明，所謂「計算中國研究法」並不能直接取代傳統研究的方法。因為計算機的演算，雖然具備快速處理資料的效率，或也能快速模組化、適應新的研究主題和資料，但是詞彙的設定和實際政治權勢的發展，仍然需要研究者本身對區域研究、中國研究、歷史脈絡和意識形態的細膩掌握。所以，適切的研究前景應該是傳統研究結合和數位化的計算中國研究。

發表人邵教授對這一點有非常清晰的自覺，例如在本報告和分析中，尚可加強的部分如文獻回顧中所提到，需要注意評估和了解政治菁英，特別是習近平的權力是否有升降的跡象。並且使用在《人民日報》中其與其他精菁英姓名的出現頻率，進行排序加以探討，不過文獻回顧的部分，有再加強的空間。即目前所使用的文獻分析可能不夠深入，故有必要再探討和考察國內外近期所發表之中國精菁英政治相關分析成果。其次，也是在文獻回顧的部分，本文討論了中共20大可能的報告議題。不過，此部分的文獻似乎又更加單薄一點，可能是因為作者囿於有限的寫作時間，故尚未也無法完整表達。如果本文日後將投稿期刊，希望未來在此部分能夠繼續予以加強。

最後，有關如何運用計算中國研究，探討中國黨政上層政治菁英出位現的機率，或者以重要文件中的詞語出現頻率，探討其重要性的可能，在詮釋的層次尚需多加著墨並仔細探問。比如作者也注意到，雖然可以明確根據菁英姓名的出現頻率進行排序，但是出現頻率少，未必代表未來的權力期望值比較低。因為若干政治菁英所主管的工作和領域，本來在媒體上就不容易頻繁地露出，譬如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滬寧和主管組織紀律的趙樂際出現的頻率並不高，但此是否能夠進一步被用以判斷其未來的政治前景？或者實際上，其並無法在下一次會議中進入常委會，其實是因為年屆已高，而與在媒體出現的頻率無關？而習近平之名相對於其他政要出現頻率的「斷崖式增量」，亦無法完全代表其已完全掌握中國大陸內部的政治發展，甚至是其近來針對烏俄戰爭的應變是否妥善或產生巨變。因為作做為政權領導者，其名的曝光量自然多於他者，卻不一定保證黨政未來局勢的預測性。

另外一個頻率分析法無法反映的問題是，作者在文章當中提到了一個重要的變數為「派系」，但實際上其並沒有對派系的分界與人選進行劃分，所以很難從頻率出現的結果論斷特定派系的權力升降。更何況，或許吾人需問的是，在當前的中國政局中是否有所謂習近平派以外的「派別」存在？或者，即便有相關的集團，其是否足以形成派別？此點乃不無疑問者。實際上，倒是所謂習近平「派別」中可能有福建派、浙江派、貴州派、陝西派與上海派等不同時期任職的人馬，但是這些人之間是否有競爭，亦難以從其在媒體上出現的頻率加以判定。

最後，一個未來可以深化與考究的方向是，以主題分析《人民日報》的報導方向，是否能與未來黨代表大會的報告相連？關於此點的限制，筆者於上述也已提出過，但值得注意的是，比如作者針對《人民日報》新聞的六六大主題，乃採用所有新聞非監督式的分群；不過若詳細考察這些主題，便會發現有許多重複的情況，如疫情與經濟和外交發展間亦具關聯性，甚至外交與國際事務或也與社會主義制度與黨建相關，而且個別概念在不同的分群中所出現的頻率和位階，也可能具有很大的落差。但是，並不能因為個別概念出現的頻率低，就認為黨政影響不重要。這一點在作者的研究限制裡面亦被提

到；有這樣的認識和自知之明，筆者也予以肯定，所以所謂《人民日報》的主題分析，可能也僅能做作為重要黨政報告主題預測的一種輔助性參考，並不能夠完全作為指引。

言而總之，邵教授的官媒主題分析，仍為目前中國共研究領域的一項突破；其過去在這方面做了非常多的努力，也累積了不少成果而廣受學界肯定。本文突破性的嘗試亦為中共黨史作為一門學科的未來發展具有極大貢獻，故筆者仍對其此次在短時間之內，迅速運用新科技與新模型運算所得到的成果表示讚賞，並且認為未來尚有很好的發展前景與空間。

中共 20 大的預演： 習近平的造神運動與集權化

The Rehearsal of 20th Party Congress: Xi Jinping's Apotheosis and Centralization

蔡文軒 (Tsai, Wen-Hsuan)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

摘 要

這一年來，透過一系列的部署，習近平彷彿在實踐中共「20大的預演」。習近平透過宣傳與造神運動，來強化自身權力。我們可以看到幹部競相表態支持習近平的連任，民間對於習近平形象的大力稱頌，以及官方媒體對於習思想的大力宣揚與美化，事實上都希望能塑造出一種萬民擁戴的氛圍。或許習近平能在中共20大順利繼續掌握權力，但留在政治上的問題，例如接班人繼承機制的建立，以及領導體制的制度化，可能才是考驗後習時期，中國是否維持穩定，以及亞太區域安全與否的重要關鍵之一。

關鍵字：中共 20 大、造神運動、宣傳、政治繼承、社會維穩

壹、前言

習近平於2012年上臺後，透過許多集權的方式，來鞏固自己的權力。¹這似乎是一種新權威主義的再現。中央政策研究室前主任王滬寧在2016年5月的座談會中，重新提及「新權威主義」的概念。²新權威主義是中共在1980年代中末期之後，提出的執政理念。³如今中共重新提出這項概念，頗值得關注。事實上，習近平透過制度性的集權來強化自身權力。舉例來說，領導小組就是一個重要機制。習近平透過設置大規模的領導小組，例如深改委、國安委，來統攝大量的相關機構，增加控制幅度。在這些領導小組的會議上，習近平進行了決策，無異使得相關領導幹部也必須認同習近平的主張。複次，習透過讓親信接任辦公室主任，來處理相關文祕工作，來具體的蒐集相關資訊、落實政策推行，以及文件擬定。這些作法強化了領導小組的功能，並有助於習近平體現個人權力的集中。⁴

本文討論習近平在這一年來，如何透過宣傳等方式來進行造神運動（apotheosis）。這當中，透過對幹部與群眾的宣傳是一個很重要的手段。確實，這些手法有助於習近平的集權化與政治穩固。此外，在環扣「習核心」的脈絡下，本文也將對即將到來的中共20大，做一些政治上的觀察與預期。

貳、造神與中共 20 大的「預演」

對於習近平個人權力的強化，以中共20大的徵詢意見工作可以看出。《新華社》於今(2022)年4月14日的報導指出，為落實習近平指示，將於4月15日至5月16日進行為期一個月的中共20大工作意見徵求。民眾可透過《新華社》、《人民日報》及《中央廣播電視》總臺臺官網開設的專欄，提出意見與建議，內容包含「關於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推進全面從嚴治黨」、「關於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

1 劉夢熊，「習近平為何要集權於一身？」(2016年8月26日)，2022年7月2日下載，《明報新聞網》，http://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51204/s00012/1449164000631。

2 文仲卿，「王滬寧提新權威主義，或為習總統制鋪路」(2016年8月26日)，2022年7月2日下載，《大紀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6/6/12/n7988836.htm>。

3 對於新權威主義的學術討論，參見Ting Gong and Feng Chen, “Neo-Authoritarian Theory in Mainland China.” *Issue and Studies*, vol. 27, no. 1 (January 1991), pp. 84-98; 蕭功秦，「中國後全能型的權威政治」，*戰略與管理*(北京市)，第6期(2002年)，頁82-88; 吳稼祥，「新權威主義評述」，在齊墨編，*新權威主義：對中國大陸未來命運的論爭*(臺北市：唐山出版社，1991年)，頁4-8。

4 學者楊開煌則指出，中共領導人傾向於「集權」，但習近平只是「改革型強人」，與毛澤東的「革命型強人」，在政治權力的掌握上，仍有落差。楊開煌，「習近平出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小組長之政治意涵」，*展望與探索*(新北市)，第12卷第2期(2014年2月)，頁11-12。

「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關於全面深化改革開放」、「關於積極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關於推進全面依法治國」、「關於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關於保障和改善民生」及「關於加強生態文明建設」8個方面。⁵這是中共首次利用網路向社會大眾徵求關於黨代表大會的工作意見。如此問計於民，頗有營造「民主」的意味。透過嚴厲的網路監管，習近平廣納民意的作法不僅能獲得執政正當性，更能以民意為包裝的政治籌碼要脅黨內政敵。

4月18日，《新華社》於官網架設「近鏡頭·溫暖的瞬間」專欄，以圖文回顧習近平的執政。⁶例如，6月6日刊出的第35期圖文，即記錄了2019年全國自強模範範暨助殘先進表彰大會上，習近平叮嚀一名雙目失明的年輕士兵「把身體養好」。或如6月1日刊出的第33期，講述2014年六一國際兒童節活動，習近平向孩子們親繫上紅領巾，並向其囑託「中國夢」和「兩個一百年」等期許。在這些圖文當中，除了記錄接見賓客及至各地視察等政績外，更多的是關於其親民形象的描述。

5月23日起，《新華社》陸續推出50集關於習近平的網路短片《足跡》。⁷影片內容自15歲在梁家河的生活開始講起，細數習近平曾經歷的艱困歲月、苦讀時光與入黨歷程，描述其不忘初心的意志，並聲稱將帶領民眾認識「一路走來的習近平」。此外，《新華社》於6月5日報導，由中央宣傳部統籌指導，河北、福建、浙江及上海4省（市）黨委宣傳部編寫的《讓群眾過上好日子—習近平正定足跡》、《閩山閩水物華新—習近平福建足跡》、《幹在實處 勇立潮頭—習近平浙江足跡》及《當好改革開放的排頭兵—習近平上海足跡》等即將出版。⁸這些圖書記錄了習近平於1982年至2007年間的工作經歷。中共不遺餘力地打造個人傳記，意在鋪陳習近平在中共20大的連任之路。

除了中央層級的官媒以外，地方與重要活動的代表人物也對習近平的地位大肆讚揚。例如北京冬奧的表彰大會上，代表團倪會忠將成績歸功於「英明的領袖」。4月19日的領導幹部會議上，深圳市委書記王偉中以五個「始終感恩」讚頌習近平。4月22日，廣西壯族自治區黨代表會議於南寧召開，習近平以全票當選為中共20大代表。根據《新華社》報導，廣西代表稱習近平的當選是「5,700萬廣西各族幹部群眾的衷心愛戴」，該表述即承載了習於中共20大的願景。廣西黨委書記劉寧也曾高調表述「永遠擁

5 「黨的二十大相關工作開展網絡徵求意見」（2022年4月14日），2022年4月20日下載，《新華網》，<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22/0414/c64387-32399468.html>。

6 「近鏡頭：溫暖的『撞肩』」（2022年5月18日），2022年5月19日下載，《新華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1/2022/0518/c1001-32424632.html>。

7 「重磅預告：新華社系列報導，帶你追尋習近平的足跡」（2022年5月23日），2022年5月25日下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http://www.moj.gov.cn/gwxw/ttxw/202205/t20220523_455624.html。

8 「《讓群眾過上好日子—習近平正定足跡》出版座談會在石家莊召開」（2022年7月30日），2022年8月1日下載，《新華網》，http://www.he.xinhuanet.com/xinwen/2022-07/30/c_1128877055.htm。

戴領袖、捍衛領袖、追隨領袖」。4月起，劉寧也以廣西黨委的名義推出6集電視專題片—「緊跟偉大復興領航人」。⁹此外，5月22日召開的廣東省委全體會議，提出地方改革成果均是仰賴於總書記習近平。中央層級媒體積極打造習近平的親切形象，地方官員則讚美習近平的領導能力。

參、宣傳的側重點

中共20大日程漸近，但近期的防疫成果與隨之而來的經濟問題對習近平的「英明形象」造成負面影響。儘管不至於構成政治危機，但其領導形象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損傷。疫情的反覆，成為「維穩」的最大阻礙。因此，習近平亟需的是足以維穩的政治權威與個人形象。中共20大的宣傳因而側重於兩個層面，一為過往治國理政的成績，二為自身形象的提升。

針對中共20大的開展，首先引起關注的，便是透過網路徵求工作意見的手法。¹⁰中共認為此舉體現所謂「以人民為中心」的主張。在內外局勢不穩的態勢下達到穩定民心的效果，習近平也藉此獲得以民意為基礎的正當政治舞臺。透過《新華社》的政績專欄，中共塑造習近平強勢執政但柔軟待人的形象，再藉由網路短片強化其刻苦性格。除此之外，中共將習於正定、福建、浙江及上海的經歷整理成冊，表述其從政成果與領導風範，如完善地區現代化建設、推動兩岸交流及從嚴治黨等事蹟。地方及重要活動的推崇，則成為推波助瀾的角色。

儘管內有疫情肆虐與經濟不振等問題，美「中」中衝突亦未見緩。但透過官媒不斷宣傳，民族主義得成為維穩的一道力量，助共同對抗西方、助中共20大順利召開、助習近平順利連任，也助其地位鞏固。

習近平在宣傳上，再次重申破除「歷史虛無主義」的錯誤觀點。為凸顯出「兩個一百年」等民族復興的概念。從2021年開始，習近平就開展一連串的政治學習與愛國教育。習近平在2021年7月1日的講話中，多次提到「以史為鑒、開創未來」。習近平提到的「史」，是以他的理念與意識形態，所詮釋的黨史，或許可以稱為「習主義的黨史」。習近平在七一講話中，認為要以「以史為鑒」來處理內政與對外關係。習近平透過「習主義的黨史」建構，來為當代的政策方針規劃方向，以強化習近平對於未來整體布局的主導權。

9 「緊跟偉大復興領航人踔厲篤行：走好新的長征路」（2022年4月20日），2022年4月21日下載，《欽州市人民政府》，http://www.qinzhou.gov.cn/xwdt_239/zwyw/202204/t20220420_3758450.html。

10 「黨的二十大相關工作開展網路徵求意見，社會各界獻智獻力」（2022年5月18日），2022年7月1日下載，《人民網》，<http://leaders.people.com.cn/n1/2022/0518/c58278-32424029.html>。

為了強化對傳媒的控制，中共做了相當多的監管與宣傳工作。202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黨校下屬機關報《學習時報》刊登國家網信辦莊榮文署名文章「順應信息革命時代潮流，奮力推進網絡強國建設」，呼籲「敢於亮劍、敢於鬥爭，有力批駁歷史虛無主義等錯誤思想觀點，堅決清理造謠污衊言論」，標誌著中共新一輪社群平臺肅清行動的開始。在4月25-26日期間，中國網絡主要社群及內容平臺如「豆瓣」、「新浪微博」、「知乎」、「今日頭條」與「抖音」皆發布公告指將處理平臺上涉及歷史虛無主義的內容，並鼓勵用戶主動舉報相關內容。《豆瓣》發布《關於開展網上歷史虛無主義有害信息舉報工作的公告》，宣稱將對歷史虛無主義有害信息加強舉報受理工作。¹¹ 微博稱「極個別用戶借社會熱點、歷史人物事件等發布涉歷史虛無主義的違規內容」，宣布關閉了違規帳號76個、涉及內容3368條，並歡迎用戶舉報。知乎也公布該平臺19日至24日期間，接到涉及歷史虛無主義內容的舉報284條、核查查處置有效67條，宣布將「繼續加大對有害內容的深入排查和全面清理力度，進一步暢通站內涉歷史虛無主義違法違規信息的舉報通道」。

透過掌握歷史敘事權來解釋統治合理性是中共一直以來的做法，歷史敘事是中共意識形態控制的重要一環。尤其是在習近平的時期，中共對官方歷史和歷史觀念的強調和維護更是達到前所未有的地步。近年來，中共積極推動「正確」歷史及史觀的樹立。如在2021年2月因應建黨百年中共中央在全黨開展「黨史學習教育」、11月發布《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即《第三個歷史決議》），¹² 要求中共黨員及大陸民眾學習中共最新的官方歷史敘事。此外，中共亦加強從江澤民時期開始反對的所謂「歷史虛無主義」觀點，壓制一切懷疑官方敘事的聲音，不容許有別於官方版本的歷史敘事和想法在社會發揮影響，並把那些惡搞、詆毀、醜化中共烈士和國家領導人的行為稱為受「歷史虛無主義」影響的結果。如中共利用2018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英雄烈士保護法》，¹³ 打擊質疑或其視為「詆毀」官方歷史敘事的輿論。具體案例如，2021年10月擁有兩百萬微博粉絲的媒體人羅昌平，在觀看宣傳韓戰的「主旋律」電影《長津湖》後，撰文質疑當時高層出兵決策的「正義性」、戲謔因天氣寒冷缺少保暖設備慘遭凍死的「冰雕連」，遭法院判刑七個月。¹⁴ 因此可以說，一方面提供「正確」歷史觀，另一方面壓制對歷史觀點的不同看法。這是中共意識形態控制手法的一體兩面。

11 「關於加強涉網上歷史虛無主義有害資訊舉報的公告」（2022年3月30日），2022年4月1日下載，《搜狐網》，https://www.sohu.com/a/533851092_556618。

12 「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2021年11月16日），2021年11月17日下載，《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xinwen/2021-11/16/content_5651269.htm。

13 「中華人民共和國英雄烈士保護法」（2021年8月18日），2021年8月20日下載，《惠州市惠陽區退役軍人事務局》，http://www.huiyang.gov.cn/hzhytyjrj/gkmlpt/content/4/4369/post_4369602.html#8203。

14 「被控侮辱烈士入獄7月 羅昌平出獄：瘦了9公斤」（2022年5月8日），2022年5月9日下載，《中央通訊社》，<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2205080225.aspx>。

肆、強化維穩與執政合法性

近期，大陸中國的外交和內政皆屢屢受挫，可以說是習近平執政以來最大的危機：首先是中國大陸的外交局勢面臨瓶頸。美「中」中美關係無法突破自2021年美「中」中美高層阿拉斯加會談以來設定的框架，兩國關係繼續維持「鬥而不破」的緊繃狀態。今年以來，為了順利舉辦北京冬奧，大陸中國官方嚴防「境外輸入」，加強外國人進入中國大陸的門檻，進一步深化中國大陸與外國之間因人員來往隔斷造成的隔閡。此外，疫情以來主打的「疫苗外交」又因中國大陸疫苗的有效度不足而無以為繼，在人權問題和俄烏戰爭上中國大陸又持續面臨國際的孤立和壓力，使得近來大陸外交逐漸陷入無牌可打的困境。目前正透過加強對太平洋島國的合作來尋求外交成績上的突破；。

在內政方面，中國大陸政府與民眾關係持續緊張。從今年1月在網絡路發酵的「徐州八孩鐵鍊女」事件、¹⁵到3月底的東航墜機事件，以及2月以來各地在疫情防控上執行嚴格的「清零政策」，引發民眾對地方政府處理態度的不滿。尤其是各地「清零」的「一刀切」政策所引發的次生災難，衝擊了中國大陸民眾對政府執行力、法治、未來經濟形勢和習近平個人政治權威的信心。儘管習近平繼續連任在技術上已經是毫無懸念，但是在距離中共20大召開不到半年的時間內，中共大陸有關部門仍需要防備各地民怨擴大。因此，宣傳部門特意透過營造宣傳氛圍提升習近平形象、營造良好輿論氛圍，製造一種習近平被全體人民所擁護的假象，為他在中共20大尋求連任造勢。

為了強化對社會穩定的推動，習近平強化了黨委的功能。最為明顯的例子，就是各級黨委書記成為該轄區，所有重要事務的「第一責任人」，來強化各級黨委書記的角色與功能。中共在2016年頒布的《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第15條規定，各級黨委書記是「第一責任人」。¹⁶舉例來說，如果某縣的地方幹部出現不法情事，或是工作的成績不佳，則其縣委書記必須連帶受到懲處。換言之，各級領導幹部，特別是黨委書記，必須為該地區所有的施政與幹部表現來負責。此外，各級黨委書記必須嚴格聽從上級黨委書記的指揮，而總書記習近平是最頂層的黨務領導。這讓中國在習時期的央地關係，成為了垂直領導體系，強化了黨中央對於地方政策的貫徹能力。

此外，中共也透過形塑大陸社會和諧穩固的氛圍，將宣傳與內政結合，頌揚歷任領導人與習近平的諸多偉大事蹟。在2021年6月，習近平帶頭參加許多慶典與儀式，看出他在領導階層的核心地位。6月28日晚間，習近平率領中共中央政治局多名常委以及

15 「『鎖鏈女』到底是誰？徐州八孩案出現新轉折卻疑點重重」（2022年2月16日），2022年3月1日下載，《聯合新聞網》，<https://udn.com/news/story/7332/6102503>。

16 「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2018年12月3日），2018年12月4日下載，《旗幟網》，<http://www.qizhiwang.org.cn/BIG5/n1/2018/1203/c422545-30438951.html>。

國家副主席，包括王岐山、李克強、汪洋、栗戰書等人，前往北京鳥巢體育館觀賞名為「偉大長征」的大型文藝演出。¹⁷這個演出場地安排兩萬名觀眾，劇本總共分為四個篇章，包括長征與抗日戰爭、抗美援朝與毛澤東時代、改革開放以及香港澳門回歸，以及習近平上任後的改革與中國對抗新冠肺炎。這些看似輝煌的劇情背後，中共卻沒有提到很多外界好奇，但中國官方不准提及的歷史。例如60年代的大飢荒，文化大革命的國內動亂、六四天安門事件，以及「反送中事件」等。這也再度說明了「習主義的黨史」，是一種帶有政治意識的歷史詮釋。

伍、建立「群臣擁戴」的景象

為了強化幹部對習近平的絕對忠誠，香港媒體《明報》引述消息人士指出，習近平有可能在中共20大進一步加冕為「領袖」。¹⁸這是繼習近平在19大獲得中共「核心」（領導核心）後的另一個稱號。在19大，習近平成為黨的領導核心並寫進黨章。如果再被封為「領袖」，取得幾乎與毛澤東相似的地位。回顧中共歷史，公認的「偉大領袖」只有毛澤東一人，他逝世後，繼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華國鋒，曾一度被官方稱作「英明領袖」，但時間不長。鄧小平從未被真正稱為領袖，但「核心」則是鄧小平獨創。

各地對習近平幾近「群臣擁戴」的景象，可以從近期各地方幹部的表態中看出。在4月初的「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總結表彰大會」上，冬奧會體育代表團代表、國家體育總局冬季運動管理中心主任倪會忠在發言時表示，「全體冰雪健兒的共同心聲是，世人矚目的成績，歸功於英明的領袖、偉大的黨、強大的祖國！」；《新華社》4月11日發表文章《習近平的人民情懷》，形容習近平是「人民領袖」，文章指「從小村莊到黨中央，從農村大隊黨支部書記到黨的總書記，習近平始終心懷家國、躬身為民。來自人民、為了人民、依靠人民。人民賦予了人民領袖寬廣的視野、博大的胸懷、奮進的力量，人民領袖團結帶領人民開創新時代歷史偉業」；4月17日，習近平在廣西壯族自治區全票當選中共20大代表，自治區黨委書記劉寧表態指出，「要盡職盡責，以高度的政治自覺錘煉黨性、忠誠核心，永遠擁戴領袖、捍衛領袖、追隨領袖」；4月23日廣西當地黨委機關報《廣西日報》刊登了劉寧在會議上的講話，全文以「領袖、統帥、領航

17 「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文藝演出《偉大征程》今晚播出」(2021年7月1日)，2021年7月2日下載，《揚子晚報》，<https://www.yangtse.com/zncontent/1444848.html>。

18 「核心領袖縱退官職，仍擁拍板權」(2022年7月12日)，2022年7月15日下載，《明報》，<https://news.mingpao.com/pns/%E4%B8%AD%E5%9C%8B/article/20220712/s00013/1657563414818/%E3%80%8C%E6%A0%B8%E5%BF%83%E9%A0%98%E8%A2%96%E7%B8%B1%E9%80%80%E5%AE%98%E8%81%B7-%E4%BB%8D%E6%93%81%E6%8B%8D%E6%9D%BF%E6%AC%8A%E3%80%8D>。

人」尊稱習近平；¹⁹5月20日，中央企業團工委、中央企業青年聯合會向500萬中央企業團員青年倡議：「擁戴領袖、維護核心」。

地方幹部的「擁戴」、勸進與頌揚等作法，似乎回到了文革時期的場景。廣西黨委在4月28日該地製播6集電視系列報導「緊跟偉大復興領航人踔厲篤行」描述十八大以來廣西的巨大變化，展示習思想如何在廣西深入人心。此外，廣西南寧市委宣傳部還模仿「毛語錄」的形式，一度將去年4月習近平視察廣西的講話、對廣西的工作指示等編印成「習近平思想大家學」系列的「口袋書」，派發予宣講團、中共基層黨組織及民眾學習，甚至出現民眾手持「口袋書」擺拍的宣傳照片。²⁰過去中共黨內對習近平的個人崇拜也是在黨代會召開前夕，以為之後巨大的政策變動造勢。「習核心」的表述和「兩個維護」的說法，即是在2016年10月中共18屆6中全會後開始出現。另外也有分析指出，對習近平的個人崇拜是地方官員向上表忠的形式。在廣西之前，近半年內各省領導班子在也表態對習近平的個人崇拜：包括浙江省委書記袁家軍去年12月高呼「擁戴核心、維護核心、緊跟核心的鮮明政治態度」、深圳市委書記王偉中於4月19日在領導幹部會議上以五個「始終感恩感懷」讚頌習近平。²¹

陸、中共 20 大的預期

中共20大在即，但近期內外情勢變動劇烈，習近平能否如願連任引發高度關注。首先，清零政策致使民怨沸騰。強制清零和封控防疫等政策，除了造成人道問題以外，更對經濟造成嚴重傷害。第二，黨內派系與「習李」之間屢傳內鬥。至今習近平依然強調清零政策，甚至表示寧可影響經濟，也不能讓人民的健康受到傷害；而李克強則於5月25日召開的「全國穩住經濟大盤電視電話會議」中，直言不諱地表達了當前嚴峻的經濟形勢，並呼籲振興經濟。第三，海外不斷傳出「倒習」聲浪，甚至形成「翡翠運動」，直指習近平上任以來政治逆行、經濟崩壞、民生艱困和人權狀況惡化等問題。對此，一些觀察認為習近平可能於中共20大，以文件形式恢復黨主席制度，或如同中共18大接班時，針對政治局常委人數進行調整以鞏固自身權力。

近期而言，在疫情嚴峻且經濟疲弱的情勢之下，中共以「穩定」為20大布局的首要目標。官媒以習近平過往的政績及親民形象為中共20大的宣傳主軸，並透過網路專欄

19 「核心、領袖、統帥與領航人」(2022年6月2日)，2022年6月4日下載，《聯合早報》，<https://www.zaobao.com.sg/forum/views/story20220602-1278755>。

20 「廣西捧習不間斷，習近平思想口袋書廣發基層學習」(2022年4月26日)，2022年4月27日下載，《經濟日報》，<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03/6268695>。

21 「五年彈指一揮間，終生難忘深圳情！市委書記離任感言提『五個始終感恩』」(2022年4月22日)，2022年4月25日下載，《當代廣西》，<https://www.ddgx.cn/show/55560.html>。

向社會大眾徵求關於中共20大的工作意見，營造問計於民、廣納民意的氛圍。但在黨內，5月中旬，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布的《關於加強新時代離退休幹部黨的建設工作的意見》，要求離退休幹部黨員堅定立場、對黨忠誠且不得傳播政治性的負面言論。²²此舉形同堵塞發洩異議的管道，不僅反映出習近平對維持政權的擔憂，也彰顯了黨內確有非議習的聲浪出現。依此邏輯，習近平可能意識到危機與挑戰。

事實上，習近平執政後即透過黨政軍的機構改革和強化監管等一系列手段，達成任用親信、管控社會並樹立個人權威的目的。在政治上，2018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公布《中共中央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增設「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中央審計委員會」與「中央教育工作小組」，並將「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國領導小組」等組織，分別改為委員會。這樣的頂層設計，削弱了國務院和政治局常委的決策權，強化了習近平作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總攬最高領導權力的體制。2021年中共的第3份歷史決議，更嵌入「習核心、習思想的領導地位」的「兩個確立」。

在軍事上，槍桿子出政權一向是中共執政的重要基礎。習近平親任中央軍委深改組組長及軍委聯指總指揮，顯示其軍政和軍令大權集於一身。自2017年至2022年6月，習近平已經晉升上將44人，不僅大幅超越以往人數，更多有破格晉升的情況。²³顯然，習近平是透過提拔忠誠將領方式，在組織中布局，並確保軍方的支持。

在集黨軍政大權於一身的同時，社會監管也被布下綿密的控制網絡。中共透過資訊與通訊科技對民間進行管理與控制，諸如「網路監管」、「社會信用體系」、和「天網工程」等，利用科技搜取個人隱私，藉此建立監控大眾的管道。針對海外的敏感訊息，則大規模地透過中央宣傳部、國家安全和軍警機構，於臉書和推特等社群平臺蒐集批評中共當局的言論與情資。另一方面，對於政府官員的監控也相當全面。以中央網信辦主任魯煒為例，2017年被指控「欺騙中央、收錢斂財、大搞特權」等13項罪名，一夕自「網絡沙皇」淪為階下囚。從這角度來看，大陸的政治集團或社會群體，要形成一股具有力量的「反習」勢力幾乎是不可能的。

依此角度而言，無論內外挑戰為何，當前習近平的地位定於一尊，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依然是決策的核心。換言之，在緊密的社會監管下，反對輿論亦無實際擴散空間。依據目前的情勢觀察，習近平的權力已高度集中。儘管情勢嚴峻，但並不存在明顯

22 「加強新時代離退休幹部黨的建設工作」（2022年5月16日），2022年5月16日下載，《人民網》，<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22/0516/c64387-32422144.html>。

23 「習近平二十大連任關鍵：中共硬道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2022年6月15日），2022年7月5日下載，《美國之音》，<https://www.voacantonese.com/a/xi-s-3rd-term-key-is-still-the-military-20220615/6618215.html>。

挑戰者，於中共20大開展第3任期應是毫無懸念，恢復黨主席制或調整政治局常委人數等作法，可能並沒有急迫的需要。

柒、結論

整體而言，習近平可能面臨一些挑戰，但對他的權力並不會有太多影響。習近平透過造神運動與宣傳，確實使得他在黨內地位相當穩固。即便政治菁英或社會有個別「反習」的聲音，可能無法對其造成根本性的挑戰。報導指出，當前中共黨委書記做為最高領導人的省市自治區共計31個，截至2022年7月日，至少已有28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公開稱習近平為「領袖」，並大肆讚揚習的政績。²⁴如浙江省委書記袁家軍稱習近平為「偉大領袖」，並指習近平的講話是「指引黨、國家、民族開創千秋偉業的行動綱領」，或如河北省委書記王東峰稱「習近平總書記是全黨擁護、人民愛戴、當之無愧的傑出領袖」。以當前的報導看來，對習近平頌揚最多者，分別是陳敏爾、李強、李鴻忠和蔡奇。他們四人均是習近平的舊部與政治局委員，也是最有可能晉升政治局常委的人選。顯然，這些官員競相高調地對習近平表達個人崇拜，意在仕途扶搖直上。但此情況也反映在中共20大召開時，習近平的權力地位並不會受到太大的威脅。

這一年來，透過一系列的部署，習近平彷彿在實踐「中共20大的預演」。幹部表態支持，民間對於習的稱頌，以及官方媒體對於習思想的大力宣揚與美化，事實上都希望能塑造出一種萬民擁戴的氛圍。或許習近平能在中共20大順利繼續掌握權力，但留在中國政治上的問題，例如接班人繼承機制的建立，以及領導體制的制度化，可能才是考驗後習時期，大陸是否維持穩定，以及亞太區域安全與否的重要關鍵之一。

24 「中共各路諸侯爭相頌讚習近平，二十大前上演『國王新衣』為哪樁？」(2022年7月8日)，2022年7月9日下載，《風傳媒》，<https://www.storm.mg/article/4415037?mode=whole>。

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

專書

吳稼祥。1991/10。「新權威主義評述」，**新權威主義：對中國大陸未來命運的論爭**。臺北：唐山出版社，頁4-8。

期刊論文

楊開煌。2014/2。「習近平出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小組長之政治意涵」，**展望與探索**(新北市)，第12卷第2期，頁11-12。

蕭功秦。2002/12。「中國後全能型的權威政治」，**戰略與管理**(北京)，第6期，頁82-88。

網際網路

文仲卿。2016/8/26。「王滬寧提新權威主義，或為習總統制鋪路」，**《大紀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6/6/12/n7988836.htm>>。

劉夢熊。2106/8/26。「習近平為何要集權於一身？」，**《明報新聞網》**，<http://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51204/s00012/1449164000631>。

2018/12/3。「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旗幟網》**，<<http://www.qizhiwang.org.cn/BIG5/n1/2018/1203/c422545-30438951.html>>。

2021/7/1。「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文藝演出《偉大征程》今晚播出」，**《揚子晚報》**，<<https://www.yangtse.com/zncontent/1444848.html>>。

2021/8/18。「中華人民共和國英雄烈士保護法」，**《惠州市惠陽區退役軍人事務局》**，<http://www.huiyang.gov.cn/hzhytyjrj/gkmlpt/content/4/4369/post_4369602.html#8203>。

2021/11/16。「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xinwen/2021-11/16/content_5651269.htm>。

2022/2/16。「『鎖鏈女』到底是誰？徐州八孩案出現新轉折卻疑點重重」，**《聯合新聞網》**，<<https://udn.com/news/story/7332/6102503>>。

2022/3/30。「關於加強涉網上歷史虛無主義有害資訊舉報的公告」，**《搜狐網》**，<https://www.sohu.com/a/533851092_556618>。

2022/4/14。「黨的二十大相關工作開展網絡徵求意見」，**《新華網》**，<<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22/0414/c64387-32399468.html>>。

2022/4/20。「緊跟偉大復興領航人踔厲篤行：走好新的長征路」，**《欽州市人民政府》**，<http://www.qinzhou.gov.cn/xwdt_239/zwyw/202204/t20220420_3758450.html>。

2022/4/22。「五年彈指一揮間，終生難忘深圳情！市委書記離任感言提『五個始終感恩』」，**《當代廣西》**，<<https://www.ddgx.cn/show/55560.html>>。

2022/4/26。「廣西捧習不間斷，習近平思想口袋書廣發基層學習」，**《經濟日報》**，<<https://>>。

money.udn.com/money/story/5603/6268695>。

2022/5/8。「被控侮辱烈士入獄7月 羅昌平出獄：瘦了9公斤」，《中央通訊社》，<<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2205080225.aspx>>。

2022/5/16。「加強新時代離退休幹部黨的建設工作」，《人民網》，<<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22/0516/c64387-32422144.html>>。

2022/5/18。「黨的二十大相關工作開展網路徵求意見，社會各界獻智獻力」，《人民網》，<http://leaders.people.com.cn/n1/2022/0518/c58278-32424029.html>。

2022/5/18。「近鏡頭：溫暖的『撞肩』」，《新華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1/2022/0518/c1001-32424632.html>>。

2022/5/23。「重磅預告：新華社系列報導，帶你追尋習近平的足跡」，《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http://www.moj.gov.cn/gwxw/ttxw/202205/t20220523_455624.html>。

2022/6/2。「核心、領袖、統帥與領航人」，《聯合早報》，<<https://www.zaobao.com.sg/forum/views/story20220602-1278755>>。

2022/6/15。「習近平二十大連任關鍵：中共硬道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美國之音》，<<https://www.voacantonese.com/a/xi-s-3rd-term-key-is-still-the-military-20220615/6618215.html>>。

2022/7/8。「中共各路諸侯爭相頌讚習近平，二十大前上演『國王新衣』為哪樁？」，《風傳媒》，<<https://www.storm.mg/article/4415037?mode=whole>>。

2022/7/12。「核心領袖縱退官職，仍擁拍板權」，《明報》，<<https://news.mingpao.com/pns/%E4%B8%AD%E5%9C%8B/article/20220712/s00013/1657563414818/%E3%80%8C%E6%A0%B8%E5%BF%83%E9%A0%98%E8%A2%96%E7%B8%B1%E9%80%80%E5%AE%98%E8%81%B7-%E4%BB%8D%E6%93%81%E6%8B%8D%E6%9D%BF%E6%AC%8A%E3%80%8D>>。

2022/7/30。「《讓群眾過上好日子—習近平正定足跡》出版座談會在石家莊召開」，《新華網》，<http://www.he.xinhuanet.com/xinwen/2022-07/30/c_1128877055.htm>。

英文部分

期刊論文

Ting Gong and Feng Chen, “Neo-Authoritarian Theory in Mainland China.” *Issue and Studies*, vol. 27, no. 1 (January 1991), pp. 84-98

與談稿

「中共 20 大的預演：習近平的造神運動與集權化」與談稿

A Response to "The Rehearsal of 20th Party Congress: Xi Jinping's Apotheosis and Centralization"

林瑞華 (Lin, Ruihua)

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習近平執政後，進一步強化對社會的控制力，並從各項政策執行上，展現了強大的國家能力。有學者認為，習近平於2012年上任後，透過許多集權的方式，來鞏固自己的權力，並為大陸建立了更具韌性（resilient）的政權。而為了順利接掌中共20大政權，習近平近期更是頻頻透過對幹部與群眾的宣傳，進一步達到政治穩固。從各方的判斷來看，習近平在中共20大繼續連任應不成問題，但他目前所面臨的各項內部與國際問題，對於其未來執政的正當性，將產生嚴峻的挑戰。其中，內部問題主要是民眾對政府的疫情管控措施，尤其是對科技管控的反彈；國際問題則是美「中」關係的摩擦。

壹、大陸內部問題：民眾對科技疫情管控之反彈

新冠疫情期間，大陸政府為了防堵疫情擴散與維持社會穩定，強化了以大數據與新科技來監控民眾的力度，其中「健康碼」和「社會信用體系」是主要的監控工具。民眾雖然能夠理解政府以科技監管進行疫情防控的必要性，但對於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以及監管範圍的持續擴張，產生了強烈反彈。

一、健康碼

大陸政府為了掌握每個人的行蹤與健康情況，希望透過大數據來監測每個人的行動軌跡與染疫風險。其中，應用最廣也最成功的系統，就是「健康碼」。健康碼是一種電子通行憑證，用以鑑別民眾的染疫風險。這套系統在推廣之初，由「市」一級政府承接，主要由市的大數據局協助相關部門（主要是公安局與衛健委）設立。每個市都有自己的健康碼，如廣州的「穗康碼」、深圳的「深i您」、上海「隨申碼」、廈門的「i廈

門」等。「省」級隨後也設立了健康碼，如福建「八閩健康碼」、江蘇「蘇康碼」，但數據主要是由市級政府往上传送。

各地大數據局與科技公司合作，根據個人的旅行史、核酸檢測結果、疫苗接種紀錄和其他健康數據，生成用戶的檔案。此外，中央與各地的大數據局也有權調用三大電信運營商（大陸移動、大陸電信、大陸聯通）的數據，透過每個人手機信號所連結到的基地臺，查看個人過去兩週的出行軌跡。健康碼的顏色分為綠色、黃色或紅色，以及針對從境外返「中」人員，增加了橘色，這些顏色決定了持有者的行動自由。

大陸民眾雖然多能接受政府以健康碼對個人數據做有限度的監控，但對於政府的數據處理能力以及數據計算方法，仍有很大的擔憂。以2021年底西安疫情為例，該地自2021年12月爆發疫情以來，超過二千人染疫，是自武漢在2019年底疫情傳開之後，出現最多本土病例的地區。西安市政府嚴格要求民眾出行需出示「一碼通」（西安市健康碼），不料該系統卻在兩週內當機了兩次。

「一碼通」崩潰，導致醫療單位無法上傳個人的核酸檢測結果，個人也因無法出示行蹤與核酸證明，而難以搭乘交通工具、進入居住小區或工作單位，甚至無法進入醫院就醫，引發大量批評。當地政府發布微博稱，當機是因為「全市核酸檢測應急平臺因當前流量過大，導致網路繁忙無法登錄」。不過大陸媒體《東方網》卻發現，西安「一碼通」的問題，是由於承接廠商大陸電信西安分公司將業務層層外包，轉包給西安東軟系統集成有限公司、中譯語通科技（陝西）有限公司與美林數據技術股份有限公司，且政府監督不力所導致。

此外，民眾對於政府擴大健康碼的使用範圍也有所顧忌。健康碼是針對疫情防控而設，但已有部分地區將健康碼的功能擴大。2022年4月，河南有多家村鎮銀行因遇到資金危機，無法提供取款服務，一些儲戶前往省會鄭州維權，但他們的健康碼卻被突然賦「紅碼」，被強制隔離或限制出行。鄭州紀委監委表示，有1,317名村鎮銀行儲戶被賦紅碼。對此，大陸有媒體解讀稱，此措施似乎是為了防止維權事件發生。

杭州市衛健委也提出，該市計劃推出常態化的健康碼，隨時監控人們的健康狀況，並透過基於該指標建立個人健康指數排行榜。據BBC報導，這種健康碼根據個人的醫療記錄、體檢結果、生活方式管理數據等內容進行健康評分，滿分為100分。影響評分的因素包括運動、飲酒、吸煙和睡眠等。例如，飲酒200毫升導致會使評分下降1.5分，吸煙5支導致健康評分下降3分。相對的，如果步行達到1萬5,000步，評分則會大幅度上升5分。個人的評分透過不同的顏色呈現，當分數很低時，會顯示為紫色或紅色，而分數越高則會越綠。當地官媒報導稱，個人的健康評分還將與不同的市民、社區和企業進行對比和排名，從而得出整體的健康評分。對此，個人曾對大陸民眾進行訪談，多數人都不

贊同這種把健康碼作用擴張的作法。

二、社會信用體系

社會信用體系是中共維穩治理的一項「頂層設計」。這套體系鼓勵民眾要盡力「當好人」，而其善惡的指標則由政府來界定。疫情爆發之後，各地政府為了管理民眾，對社會信用體系的積分指標與評分標準做了修定，納入「抗疫」分數。舉例來說，福州對於參加抗疫的醫護人員，加30分到50分不等、對於企業主願意主動捐款或捐物資，也有相應的加分；相對於此，若有人隱瞞旅遊史，或者在網路上散布關於疫情的不實謠言，將被嚴重扣分。以溫州為例，當地政府在2020年2月公布一批包含186人的「黑名單」，這些人或因隱瞞病情及旅遊史、或不配合防控措施，而被大幅扣信用分。

信用分的多寡，將影響個人在許多方面的權益。分數較高的民眾，在交通、教育、圖書借閱、旅遊等方面，可享受優惠，如乘坐地鐵打折、圖書館借書免押金、學費可以延遲繳納等。而分數低於某個標準的民眾，將被大數據局列入「黑名單」，並由該局將名單發送到相關部門。當這些民眾到政府機關辦事時，部門承辦人員一旦輸入「黑名單」中的名字，大數據局馬上發出線上警告，告知此人曾經有過「不良紀錄」。這些「黑名單」成員面臨被交通部門限制其搭乘飛機和高鐵；金融部門不給予貸款；或教育部門不允許其子女就讀較好的私立學校。

這套評分機制引發民眾對於公平性以及個人隱私被濫用的疑慮，因而遭到強烈反彈。個人曾訪談某市發改委官員，他們也深知這些問題，「將人民分為不同等級，一定會引起抗議的，強推這些政策的風險太大了」。蘇州曾在2020年9月推出了個人信用評分機制：蘇州文明碼，但是施行三天後，因遭到民眾抗議與媒體撻伐，被迫取消。

貳、國際因素：美「中」摩擦升高

由於大陸國力不斷壯大，也逐漸不甘心於雌伏，美國的對華政策逐漸發生變化。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在兩岸關係中的角色，正逐漸從昔日的兩岸「平衡者」變為台灣「同盟者」。在布希、歐巴馬時期，美國與大陸、台灣同時保持關係，也會對任一方過於激進的做法，進行選擇性的壓制，因此著扮演兩岸之間的平衡者。但隨著中美關係的變化，美方做法也逐步發生了轉變。

以歐巴馬為例，鑑於大陸在國際政治經濟的崛起，他上任之後便提出要「轉向亞洲」（pivot to Asia）並進行「再交往」（reengage）戰略，其目的便在軟性地制衡大陸。但與此同時，美國也持續與大陸穩定推進關係，其策略是「既制衡又拉攏」。歐巴

馬不但在訪「中」時說出「美中關係是21世紀最重要的雙邊關係」，還與「中國」簽訂了「美中共同聲明」(U.S.- China Joint Statement)。而在對台的部分，歐巴馬與台灣維持良好與穩定的關係，其任內予台灣人民入境美國免簽證。美國在此階段的兩岸政策，尤其在最核心的安全議題上，採取了「戰略性的模糊」，對於倘若兩岸發生軍事衝突時，美國會怎麼做，始終拒不表態。美方認為這是對穩定兩岸關係最有利的設計。

這種情況近年已經有所轉變。中國的經濟崛起與向外擴張，讓美國備感威脅。川普上台後，對中國的政策改變就全面浮出。美國從2018年起便發起美中貿易戰、對中國科技企業進行制裁——例如針對華為、中興的禁止採購與停止購買、不允許中芯國際採購晶片生產設備、甚至將無人機巨頭大疆創新、AI新創曠視科技等八家科技企業，都列入禁止投資黑名；還將34家中企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等。至此美「中」關係全面惡化。

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也調整了其兩岸角色。例如川普及開始更積極地「打台灣牌」，通過採取拉攏台灣來節制中國。美方具體做法包括，2016年，川普上任時與台灣總統蔡英文通話。這是台美斷交後，雙邊領導人的首次直接對話。此外，美國還主動提出將台灣外交部的「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更名「台灣美國事務委員會」(Taiwan Council for U.S. Affairs)等做法。更為明確的是，美國國防部在2019年發布的《印太戰略報告》中提到，新加坡、台灣、紐西蘭和蒙古四個「民主國家」是美國在印太地區中可信任、有能力和當然的夥伴。2022年9月，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更是高票通過《2022年台灣政策法案》(Taiwan Policy Act of 2022)，這是1979年美台斷交及《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生效以來，美國對台政策最全面的調整。該法案指出，若大陸對台「大規模升級侵略行徑，包括公開或隱蔽的軍事行動」，將採取制裁行動。計劃還提到，未來4年將提供台灣45億美元無償的外國軍事融資資金，並加碼第5年提供20億美元。這些做法均顯示，美國「拉台抗『中』」的意圖相當明顯。美國的兩岸戰略也從過去的「戰略模糊」走向「戰略清晰」——更加明確地承諾保障台灣安全，更為積極地協助台灣抗拒中共。

參、結論

就近期的人事布局看來，習近平於中共20大的政治局部署大致抵定。但國內外對於習近平的一些政策，例如疫情管控、科技監管與美「中」摩擦升高，始終有一些反對的聲音。可以說，習近平的政治權力是大致穩固的，但國內外有一些不利於「習核心」專政的事件，始終不斷。

首先，即便疫情防控的措施導致民怨沸騰，但在嚴密的社會監管之下，反習近平聲浪並不會形成一股真正有作用的勢力。總體而言，習近平的合法性不會受到根本性的威脅。

其次，美國的兩岸策略正在從「戰略模糊」走向「戰略清晰」，但中國大陸的對台策略，也從「戰略清晰」（和統優先）走向「戰略模糊」（和武並進），以回應美國的行動。

從訊息傳遞節點探究認知作戰防制^{*}

Cognitive Warfare Prevention from Message Delivery Nodes

劉文斌 (Liu, Wen-Pin)

展望與探索雜誌社社長

鄭惠應 (Cheng, Te-Ying)

天主教輔仁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摘 要

美國務院2022年5月3日報告明確界定俄烏戰事之認知作戰係前哨戰。網路時代之認知作戰業已成為繼陸、海、空、太空及電腦空間後的第6個衝突場域，更成為當前全球各國國家安全的重要挑戰。臺灣面對大陸的認知作戰攻擊尤甚，致使瞭解與防制認知作戰成為重要課程。

目前國際社會對於認知作戰的研究與防制作為，大部分集中於訊息溯源，並部分涉及對訊息傳播節點的監控，但卻鮮少觸及節點與訊息傳播網絡議題，本研究藉由「六度分離」理論證明資訊流之傳播「節點」，在訊息傳播網絡扮演相當重要角色，甚至直接影響訊息對閱聽受眾之信效度，將有利於數位治理成效，深化對認知作戰的理解與防制。

關鍵字：認知作戰、小世界、節點、貝肯數、六度分離理論、數位治理

^{*} 本文由天主教輔仁大學兼任助理教授鄭惠應，提供相關資料改寫收錄於兩岸情勢與區域安全前瞻2022(臺北：展望雜誌社，2022)論文集之劉文斌著作，「認知作戰與防制—以訊息傳遞模式為視角」一文後共同發表。

壹、前言

以訊息(information)影響對手決策，使事件發展對己有利，在人類發展史並不罕見，這種發展若由個人事務提升至國家安全攻防，則是當前各國無法忽視的問題，而個人攜帶式智慧型通訊裝置盛行的現代，更使訊息力量被發揮到極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下稱：北約組織)近期更將現代戰爭衝突分為陸、海、空、太空及電腦空間5個場域，¹而隨著時空環境與電腦網際網路及通訊器材普及，其後第6個場域已逐漸被認證是認知作戰，且在電腦及網路技術發達後，更邁向人工智慧、虛擬實境等攻擊方式，²致使問題更為複雜。2020年8月，美國國務院的全球參與中心(Global Engagement Center at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GEC)分析報告，更直指由俄羅斯政府負責的扭曲訊息生態系統包括5個主要支柱：政府官方通信、國家資助的全球資訊傳遞、培養代理消息來源、社交媒體的武器化和代理消息來源，克里姆林宮已將訊息武器化。³將訊息武器化，凸顯認知作戰是為「戰場」之一。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俄、烏、美、北約多方在認知作戰中的角力，更體現以認知戰的操作，將人的思想變成了戰場，改變目標的感知，以獲取優勢。⁴

而美國智庫「蘭德公司」專欄作家穆斯塔法加(Nathan Beauchamp-Mustafaga)專文〈認知領域作戰：解放軍對於「影響力作戰」之新整體概念Cognitive Domain Operations：The PLA's New Holistic Concept for Influence Operations〉報告，認為共軍越來越重視資訊在戰爭中之重要性，在此資訊時代，共軍正在發展一種新心理戰概念，稱之為「認知領域作戰」(下稱認知作戰)，此新一代之心理戰試圖利用資訊，影響對手之認知功能，其範圍包括從平時之輿論，到戰時之決策。⁵

1 Lea Kristina Bjørgul, "Cognitive warfare and the use of force," (2021/9/3), last visited 2022/3/31, 《STRATAGEM》, <https://www.stratagem.no/cognitive-warfare-and-the-use-of-force/>。NATO currently recognizes five warfighting domains: land, sea, air, space, and cyberspace.

2 Dean S. Hartley III and Kenneth O. Hobson, *Cognitive Superiority* (Switzerland: Springer, 2021), pp. 12, 15.

3 GEC, "GEC Special Report: Pillars of Russia's Disinformation and Propaganda Ecosystem," (2020/8), last visited 2022/8/1,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20/08/Pillars-of-Russia%E2%80%99s-Disinformation-and-Propaganda-Ecosystem_08-04-20.pdf. The ecosystem consists of five main pillars: official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state-funded global messaging, cultivation of proxy sources, weaponization of social media, and cyber-enabled disinformation.

4 SD Pradhan, "Role of cognitive warfare in Russia-Ukraine conflict: Potential for achieving strategic victory bypassing traditional battlefield," (2022/5/8), last visited 2022/8/3, 《The Times of India》,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blogs/ChanakyaCode/role-of-cognitive-warfare-in-russia-ukraine-conflict-potential-for-achieving-strategic-victory-bypassing-traditional-battlefield/>.

5 Nathan Beauchamp-Mustafaga, "Cognitive Domain Operations:The PLA's New Holistic Concept for Influence Operations," (2021/5/14), last visited 2022/7/27, 《RAND》, https://www.rand.org/pubs/external_publications/EP68632.html。

大陸與俄羅斯的扭曲訊息(dis-information)攻擊令世界各國恐懼，⁶臺灣自2013年以來，甚至被認為遭受扭曲訊息攻擊連續蟬聯全球第一名，⁷而扭曲訊息的訊息攻擊只是認知作戰(cognitive warfare)一環，或說，認知作戰才足以涵蓋各種以訊息為武器的影響對手方式，⁸在當前對認知作戰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扭曲訊息的傳播及溯源，但對於訊息傳播的網絡與發動節點(node)的掌握卻鮮少觸及，致使各方對於認知作戰的防制事倍功半且備多力分。如何進一步理解訊息傳播網絡與節點，以提升對認知作戰的理解與防制效能，是當務之急。

貳、認知作戰定義

認知作戰不是甚麼新鮮事例，舉如：三國演義的空城計，就是孔明讓司馬懿陷入認知錯誤而錯失攻城機會，二戰時的諾曼第登陸成功，也是佯攻作為讓德軍認知錯誤所致。

北約組織評估認為，當前衝突領域面臨一系列新的挑戰。這些領域可能源於新的顛覆性技術，例如：太空和網際網路領域源於火箭、衛星、計算、電信和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社交媒體、社交網絡、社交消息傳遞和移動設備技術的日益廣泛使用，終於催生了一個新領域：認知作戰。⁹

擴大一點說，由義大利共產主義思想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所提「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就是闡釋認知影響行動的學術性詮釋，依據文化霸權要義稱：「統治群體藉著創造及散播一種其實是有利於他們的世界觀，來得到及維持從屬群體的共識與支持」。¹⁰簡言之，就是統治(資本家)階層，塑造群眾服從於統治階層各種作為的認

6 Samyak Raileekha, "The future of the battle for minds," (2022/1/15), last visited 2022/5/10, 《ORF》, <https://www.orfonline.org/expert-speak/the-future-of-the-battle-for-minds/>.

7 瑞典哥德堡大學近期發布 2021 年 V-Dem (VARIETIES OF DEMOCRACY) 報告，研究顯示，臺灣是接受境外假訊息侵擾最頻繁的國家，並且從 2013 年開始，就持續奪冠，已經蟬聯9年冠軍。釋放假訊息影響境外的最嚴重的國家前三名是土庫曼、北韓、緬甸，大陸排名第 6，俄羅斯名列第 12 名。陳政嘉，「這個全球第1...境外假訊息攻擊 臺灣最頻繁、連續9年蟬聯冠軍」(2022年3月20日)，2022年3月31日下載，《新頭殼》，<https://tw.stock.yahoo.com/news/%E9%80%99%E5%80%8B%E5%85%A8%E7%90%83%E7%AC%AC1-%E5%A2%83%E5%A4%96%E5%81%87%E8%A8%A%E6%81%AF%E6%94%BB%E6%93%8A-%E5%8F%B0%E7%81%A3%E6%9C%80%E9%A0%BB%E7%B9%81-%E9%80%A3%E7%BA%8C9%E5%B9%B4%E8%9F%AC%E8%81%AF%E5%86%A0%E8%BB%8D-041315836.html>。

8 Kimberly Orinx and Tanguy Struye de Swielande, "Cognitive warfare and the vulnerabilities of democracies," p.1, (2021/5/12), last visited 2022/5/11, 《CECRI》, <http://cecrilouvain.be/wp-content/uploads/2021/05/cognitive-warfare-.pd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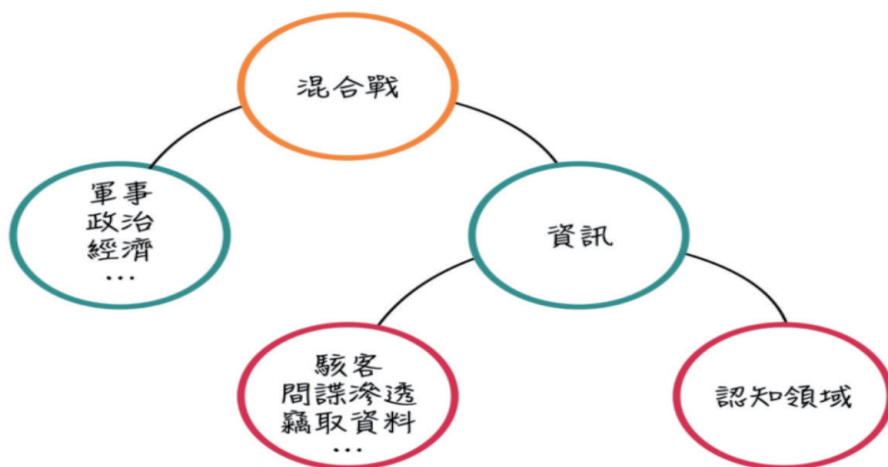
9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Countering cognitive warfare: awareness and resilience," (2021/5/20), last visited 2022/3/31, 《NATO Review》, <https://www.nato.int/docu/review/articles/2021/05/20/countering-cognitive-warfare-awareness-and-resilience/index.html>.

10 邱振中、蔡佳惠、黃靖真、鍾惠萍，「東方主義與文化霸權：全球性閱讀」，2022年4月15日下載，《南華出版所》，<https://www.nhu.edu.tw/~society/e-j/20/20/20-13.htm>。

知，使統治階層得以從中獲利的舉措，將此思維放入認知作戰脈絡中，認知作戰就是：結合正規的心理戰、輿論戰，加上透過社群媒體發動的訊息戰、宣傳戰……等方式的一種綜合型戰術，敵方透過網路、社群媒體的操作，形塑發動方群眾對政治、經濟、軍事等重要事項的看法，並同時讓對手方「改變行為」，做出對發動方有利的行為，例如不抵抗及投降，就是不戰而屈人之兵，¹¹甚或是令對手決策錯誤而遭致失敗。

認知領域作戰是現代戰爭理論的一環。理論的第一層是混合戰，其下第二層除傳統的軍事作戰外，還有政治、經濟、公民運動……等，以及資訊戰，而在資訊作戰範疇下的第三層，則包含網路間諜、竊取技術、數位極權輸出，當然也包含認知領域作戰，¹²其關係位置如下圖：

圖 1 現代戰爭理論中的認知作戰關係位置



資料來源：林艾德，「何謂認知作戰？」(2021年5月25日)，2022年4月17日下載，《方格子》，<https://vocus.cc/article/60aca03afd897800019f3b1a>。

若將中共認知作戰與相關類型作戰相比，則呈現如下關係：

11 戰略風格編輯部，「認識『認知戰』：一個既『傳統』又『創新』的作戰方式 中共對台重要打法！」(2021年5月25日)，2022年4月15日下載，《戰略風格》，<https://strategy.style/archives/cognitive-warfare-china-taiwan>。

12 林艾德，「何謂認知作戰？」(2021年5月25日)，2022年4月17日下載，《方格子》，<https://vocus.cc/article/60aca03afd897800019f3b1a>。

圖 2 中共認知作戰與相關類型作戰關係位置



資料來源：張玲玲，「洞悉中共認知戰 鞏固全民心防」（2021年6月8日），2022年4月5日下載，《青年日報》，<https://www.ydn.com.tw/news/newsInsidePage?chapterID=1380128&type=forum>。

由上圖可明顯看出，中共「認知作戰」與其心理、軍事欺騙與網路攻擊有高度重疊，但亦有不同的部分。而與共軍政治工作條例所標榜的「三戰」¹³中的心理戰及輿論戰不易劃分，此種狀況也折射出各方迄今對「認知作戰」不易界定範圍之特性。¹⁴

眾所周知，所謂「戰爭」之傳統定義，無法擺脫兩個國家或團體的武力爭鬥，但如今又演化出經濟戰(economic warfare)、電腦戰(cyber warfare)、法統戰(political-legal warfare)等對抗形態，¹⁵戰爭定義已由單純的武力衝突為判準，轉變成「無限制的武力衝突」與「全球完全和平相處」間的光譜落點，甚至可理解為一個團體(國家或非國家)利用一切可用的手段，如外交、經濟、資訊、社會和教育及軍事力量，以鼓勵對手遵行他們的意願。¹⁶致使認知(訊息)作戰沒有平戰之分，¹⁷如以俄羅斯為例，平時置重在影響社會心理，戰時則重在擾亂對手資訊。¹⁸因此，認知「作戰」(warfare)並非如一般認

13 所謂三戰，是指自2003年起納入「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第14條第18項「戰時政治工作……進行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全民國防】抵禦中共『三戰』威脅 捍衛民主」（2020年3月5日），2022年4月18日下載，《青年日報》，<https://www.ydn.com.tw/news/newsInsidePage?chapterID=1216263>。

14 Paul Ottewell, "Defining the Cognitive Domain," (2020/12/7), last visited 2022/5/9, 《OTH》, <https://othjournal.com/2020/12/07/defining-the-cognitive-domain/>.

15 Diana Mackiewicz, "Cognitive Warfare," (2019/11), last visited 2022/5/5, 《ResearchGate》,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37228818_Cognitive_Warfare_-_Mackiewicz-Diana_2018.

16 Jill Long, "What is War? A New Point of View," (2012/5/12), last visited 2022/4/21, 《Small Wars Journal》, <https://smallwarsjournal.com/jrnl/art/what-is-war-a-new-point-of-vie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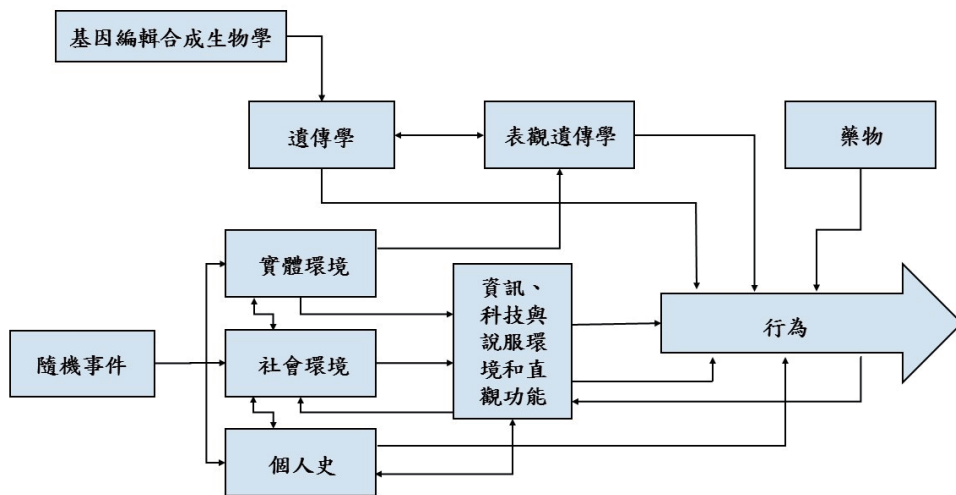
17 Orinx and Swielande, "Cognitive warfare and the vulnerabilities of democracies," p. 2.

18 Keir Giles, "Russia Information Warfare," in Timothy Clack and Robert Johnson ed(s), *The World Information War* (Y.N.: Routledge, 2021), pp. 139, 143-144.

知，有明顯特徵的作戰態勢，惟對認知的影響已任何時刻均在進行中，且其對象不僅是針對敵方，更涵蓋友方，因此，如「軟實力」觀點所稱，以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引誘(attraction)、組織結構(institutions)、價值(values)、文化(culture)、政策(policies)為手段之拉攏吸收(co-opt)，¹⁹就不斷進行，且平時都要固定從事訊息的對抗(information confrontation is waged constantly in peacetime)，²⁰甚至被視為是軟實力運作的場域，²¹換言之，平時亦要對不論敵友的對手進行認知觀念改變，其目標當然是希望友我者更加友我，敵對者較不敵對，或甚至轉變成友我；因此，認知作戰幾乎涵蓋一切折衝事物，不能侷限於傳統的必須以武力相向為判準的「作戰」概念。認知的攻防更應該理解為如同作戰，但絕不是僅侷限於傳統戰爭的時空而已。

認知作戰旨在改變人的行為，而造成人的行為改變，可綜整如下圖：

圖 3 改變人類行為的原因



資料來源：Dean S. Hartley III and Kenneth O. Hobson, *Cognitive Superiority* (Switzerland: Springer, 2021), p. 104.

由上圖可看出，上一排的基因編輯合成生物學(Gene Editing Synthetic Biology)、遺傳學(Genetics)、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及藥物(Pharmaceuticals)，雖可以影響個人行為，但顯非本文所探討的認知作戰重點，本文的重點是隨機事件經由與實體環境、社會環境、個人史、資訊、科技與說服環境和直觀功能(Information Technology & Persuasion

19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4), p. 8.

20 Giles, "Russia Information Warfare," p. 139.

21 Ottewell, "Defining the Cognitive Domain".

Environment and Affordances)互動後的行為改變。進一步說，資訊當然可以改變個人行為，縱使無法直接影響個人行為，但個人在特殊的環境中，亦有被影響的可能，因此，眾口鑠金、有口皆碑、曾參殺人等認知心理學之錨定效應²²下，以環境影響特定對象行為的改變就可以被完全理解。而美斯特恩商學院商業與人權中心副主任保羅·M·巴雷特(Paul M. Barrett)於2019年9月12日發布「虛假信息如何影響 2020 年大選-人們在網上閱讀的內容可能會真正擾亂社會和政治」報告，即指出雖然外國選舉干預主導虛假信息的討論，但大多數針對美國社交媒體的故意虛假內容是由國內來源生成的。²³更顯示，認知作戰不一定起於外部攻擊，內部受影響的氛圍亦是重要因素的特性。

因此，對於認知作戰的反制，不僅在反制訊息對特定人員的針對性，也不可偏廢對不特定大眾影響的廣泛性。

認知作戰當然寄望於其傳遞的訊息可以被全盤接受，以達成發動者所設定目的，而有研究者提出達成認知作戰目的之方法，如：「熟悉科技，取得先機」等多種。²⁴

更有研究者認為認知領域攻擊的要素有二：一為利用扭曲訊息做為管道，二為混淆或破壞敵方的認知，並造成對立。²⁵其意即以扭曲訊息混淆或破壞對方的認知。

這些觀點與方法其實僅是指利用訊息改變對手的認知而已，並未觸及訊息如何傳遞。這種不觸及訊息傳遞網絡的研究，是當前認知作戰研究的主要模式，²⁶而，為因應近期俄羅斯、烏克蘭戰爭所引發外界極為關注的認知作戰效能，行政院發言人羅秉成公開表示，面對假訊息攻擊，已經摸清其4項手法：一、大外宣，二、小粉紅，三、內容

22 屬心理學概念，認為在進行決策時，人類傾向於利用片斷資訊對事件屬性錨點，並一具對事件屬性的定錨做出決定，而知後的決定，再以第一個決定為基準，逐步修正。

23 Paul M. Barrett, "How disinformation could sway the 2020 election," (2019/9/12), last visited 2022/7/27, 《Salon》, https://www.salon.com/2019/09/12/how-disinformation-could-sway-the-2020-election_partner/.

24 戰略風格編輯部，「認識『認知戰』：一個既『傳統』又『創新』的作戰方式 中共對台重要打法！」：一、熟悉科技，取得先機：例如利用網路與新媒體，打贏輿論戰。二、找好說法，先入為主：理由最好是淺顯易懂，爭取支持。三、反復造勢，威懾對手：輿論就是造勢，洗腦速度更快。四、實行管制，創同溫層：除了攻擊還要防守，管制得當，輿論才能為自己服務，如演算法運用。五、加強滲透，影響公眾：輿論先影響一批人後，在策動開始協助輿論戰左右和引導公眾認知。六、輿論欺騙，蠱惑人心：以真假混合的假訊息，使人無法快速判斷真偽，是輿論戰中常見的武器。七、輪番轟炸，分化敵人：主動出擊前往別的輿論場，重點打擊相反輿論的組織，瓦解其公信力。假訊息還能分化對立輿論的支持群眾。八、澄清部分，忽略全部：如遭遇到對手的輿論攻擊，只針對其中對自己有利的部分大肆澄清與還擊，對己不利的部分，就算是真相也冷處理，使不利己部分被忘記，或是被新的資訊蓋過。九、溝通友軍，爭取同盟：削弱敵人的力量，壯大自己的陣營，是輿論作戰的重要戰法。十、全力壓制，阻斷信息：如抹黑、人格毀滅對方等。

25 沈伯洋，「中國認知領域作戰模型初探：以 2020 臺灣選舉為例」，遠景基金會季刊(臺北)，第二十二卷第一期(2021年1月)，頁5，2022年5月1日下載，<https://www.pf.org.tw/files/6931/CF88D276-7F56-42D0-8E51-ABF84D29FEAD>。

26 如 Li-wen Tung, "Taiwan and the CCP's 'Public Opinion Warfare'," last visited 2022/4/24, <https://www.pf.org.tw/files/6510/91DA9418-BA3D-4677-A123-BEA9870F5114>. "China's Role in the Russia-Ukraine War and Its Cognitive Warfare Operations," (2022/4/11), last visited 2022/4/24, 《遠景基金會》，<https://www.pf.org.tw/article-pfch-2168-8020>.

農場，四、在地協力者。²⁷才稍稍觸及訊息的傳遞態樣，但卻未深入解釋。為解決此問題，就是本文之重點。

而認知作戰中利用訊息的各種傳播方法，將訊息傳抵設定對象，以達成侷限對象行動，甚至遵循指示做出反應是最重要的目的，致使訊息如何傳遞，就是值得理解的議題。

參、訊息傳遞模式

認知作戰的核心當然是訊息，尤其是假訊息(fake news)，但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e Organization)，對假訊息的定義，卻包含有扭曲訊息(disinformation)、誤傳(misinformation)及誇訊息(mal-information)三大類，扭曲訊息：為傷害個人、社會團體、組織或國家而故意製造的虛假訊息，誤傳：是虛假訊息，但並非以造成傷害為目的而創造，誇訊息：是基於現實的訊息，用於對個人、社會團體、組織或國家造成傷害。²⁸其中扭曲訊息是真假混合，難以釐清，危害最大；誤傳雖不以傷害他人為目標，如將某位男性誤傳為女性，但若不幸在關鍵時間點誤傳訊息，卻可能造成極大傷害，如將動物飼料工廠的污染誤傳成嬰兒食品廠的污染，必將引發動盪；而誇訊息即是將真的訊息惡意誇大化，以攻擊特定對象，如在回教國家不斷擴大宣傳某政治人物為同性戀者，必將毀其政治前途。至於訊息的傳播模式，除一般所熟悉的由發動者向受眾直接傳播外，還可有偏離來源模式(defective source model，將欲發散的訊息隱藏於他處發出)、正當來源模式(legitimizing source model，將欲發散的訊息出口轉內銷式的發出)，²⁹更發展出利用對方內部勢力協力或營造吸收內部民意為訊息基礎等模式，³⁰目的就在混淆訊息來源，以提升影響能力。

不論是扭曲訊息、誤傳或誇訊息，或為遮掩其目的的各種模式，其傳播方式都絕非大水漫灌，而必須經由特殊網絡完成，如特別信賴某些個人或節點所傳送，³¹而研究更顯示訊息或流行病學上的病毒傳播相似，必須依賴節點方可廣傳。³²在實際生活上，

27 侯俐安，「烏俄戰爭認知作戰 政院：摸通假訊息四大手法」(2022年3月24日)，2022年3月31日下載，《聯合報》，<https://udn.com/news/story/6656/6188231>。

28 “Journalism, ‘Fake News’ and Disinformation: A Handbook for Journalism Education and Training,” visited date 2019/5/13, 《UNESCO》, <https://en.unesco.org/fightfakenews>.

29 Garths Jowett and Victoria O’ Donnel, 陳彥希等譯，《宣傳與說服》(propaganda and Persuasion) (臺北：韋伯文化，2003)，頁20-21。

30 劉文斌，「大陸對臺假訊息作為蠱測與防制」，發表於前瞻2020中國大陸與臺海情勢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等，2019年10月4日)，頁139-141。

31 Hartley III and Hobson, *Cognitive Superiority*, pp. 106, 149 table 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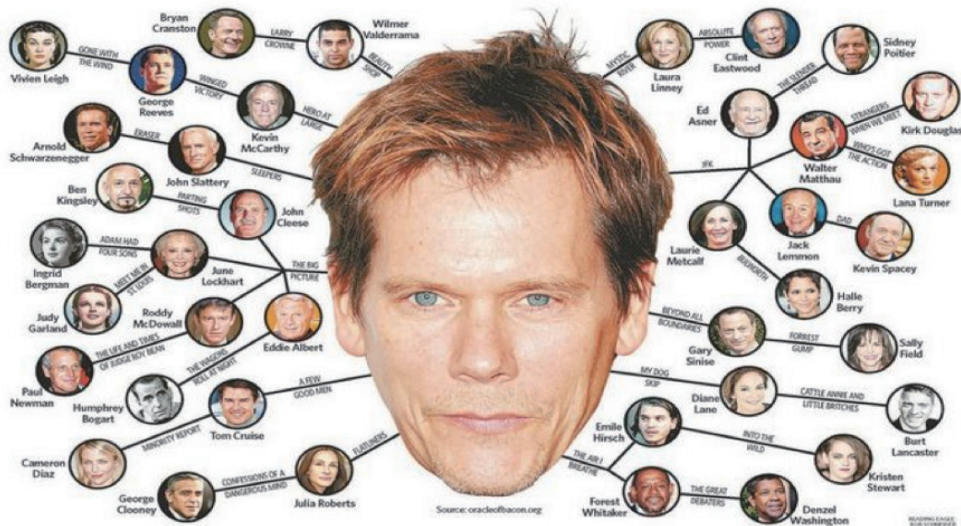
32 Alonso Bernal, Cameron Carter, Ishpreet Singh, Cathy Cao, Olivia Madreperla, “Cognitive Warfare : An Attack on truth and

吾人訊息來源除少數例外，絕大部分經由特定資訊來源獲得即為佐證。

若將認知作戰理解為硬體與軟體兩領域，則訊息內容顯然屬於軟體傳遞，屬當前研究者所著重部分，而傳送的路線或網絡則可視為硬體，故必須瞭解「軟體」與「硬體」的運作方式，方可使認知作戰研究更為全面。那麼訊息傳遞的「硬體」--網絡到底又呈現何種態樣？

對於此議題的研究，有著名的Kevin Bacon Game可為基礎，簡單說，就是若任何電影明星與電影明星貝肯(Kevin Bacon)同演過一部電影算距離1步，若不曾與Kevin Bacon同一部電影演出，但卻與其他曾與Kevin Bacon演過同部電影的明星共同演出電影，則算與Kevin Bacon距離2步遠，如此類推，發現任何電影明星與Kevin Bacon的距離竟然最多只有8步遠，這個數字被稱為貝肯數(Bacon Number)，而最終在精密的數學計算下，全球任何兩個人的距離僅有6步遠，在實際經驗也發現，任何人進入完全陌生的聚會場所，很快就會發現其中有人與他有共同朋友。³³貝肯數以圖形表示如下：

圖 4 貝肯數圖



資料來源：Tom Hansen, “Six Degrees of Kevin Bacon CLI Application” (2019/5/2), last visited 2022/4/6, 《Stay curious》, <https://medium.com/@ctrhansen/six-degrees-of-kevin-bacon-cli-application-2b3f8e48c105>.

這種關係模式被學術界稱為6度分離理論(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原指經過6個人，就可以把訊息傳給任何想傳遞的人，其發展過程是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斯坦利·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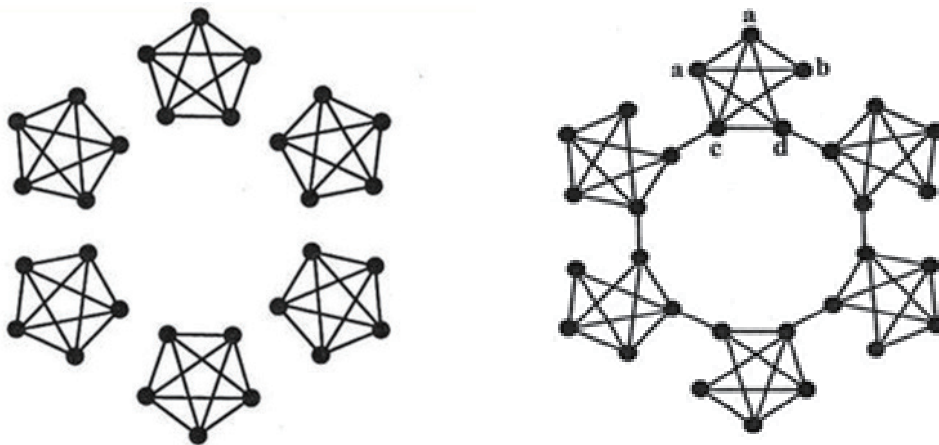
though,” last visited 2022/5/6, 《NATO》, p. 29. <https://www.innovationhub-act.org/sites/default/files/2021-03/Cognitive%20Warfare.pdf>.

33 Duncan J. Watts, *Small World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3-4.

爾格拉姆(Stanley Milgram)於1967年，根據1929 Frigyes Karinthy 及1950s年代 Ithiel de Sola Pool、Manfred Kochen (IBM)所提概念，意圖以數學方式解決訊息傳遞問題而做的連鎖信實驗，嘗試證明平均只需要6步就可以聯繫任何兩個互不相識的人。³⁴但近年研究卻發現，因為社交媒體等的發達，使中間人數越來越少。³⁵

而據學者沃斯(Duncan J. Watts)的研究，假設原始人居住洞穴中，與其他居住於洞穴的團體不相互往來，將成為下圖的社會關係各自獨立(如下圖左)，但只要其中一個成員與其他洞穴人員連接，則複雜的關係將逐步蔓延(如下圖右)，³⁶更傳神演繹人類社會網絡由簡單到複雜的過程。

圖 5 洞穴人關係的蛻變



資料來源：Duncan J. Watts, *Small World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02-104.

這種連結與人類的神經元連結極為類似，因此，有以人類神經元為類比模型的出現：(如下圖)

神經元形成了小世界網絡-高度連接的節點有許多短連接，而節點不一定彼此靠近，但大多數節點可以經由少量步驟與所有其他節點連結。³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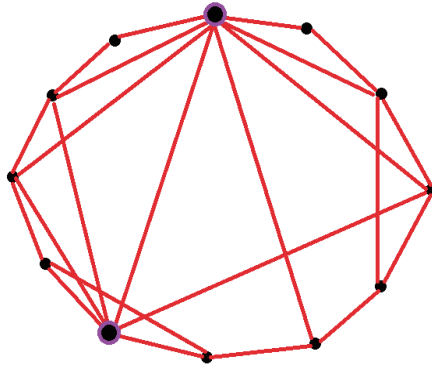
34 “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 (2017/2), last visited 2022/4/21, 《WhatIs.com》, <https://www.techtarget.com/whatis/definition/six-degrees-of-separation>.

35 Scott Christley, “The World Is Shrinking: 6 Degrees of Separation Is Now 2!,” (2017/8/9), last visited 2022/4/21, 《Digital Doughnut》, <https://www.digitaldoughnut.com/articles/2017/august/6-degrees-of-separation-is-now-2>.

36 Watts, *Small Worlds*, pp. 102-104.

37 Jon Lieff, “Neuron Networks in Healthy and Diseased Brains,” (2014/11/30), last visited 2022/4/7, <https://jonlieffmd.com/tag/most-brain-circuits-are-small-world-network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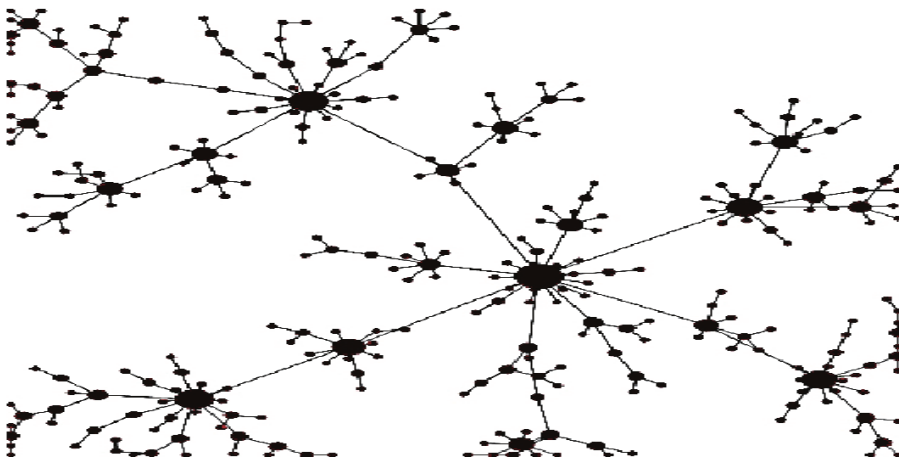
圖 6 神經元連結



資料來源：Jon Lieff, “Neuron Networks in Healthy and Diseased Brains,” (2014/11/30), last visited 2022/4/7, <https://jonlieffmd.com/tag/most-brain-circuits-are-small-world-networks>.

這個神經元的網絡基本圖形，就形成人類社會關係的攀比基礎，甚至屬於同溫層之理論依據。若將此基礎進一步擴大，就如下圖顯示的連接典型網絡。在圖中，節點的大小與鏈接數量成正比，愈大的節點，聯繫越多的小節點或個人。在此網絡中，存在大量大小節點，³⁸各自聯絡其中的影響群體。節點大小也代表其影響群眾的多寡，且屬於大節點帶小節點結構，代表著訊息傳遞由大節點傳給小節點，甚至在小小節點，最終傳至一般受眾的階層特性。

圖 7 社會網絡節點與聯繫



資料來源：Martin Buoncristiani and Patricia Buoncristiani, “A Network Model of Knowledge Acquisition,” last visited 2022/4/6, 《ResearchGate》 [file:///C:/Users/m22205/Downloads/A_Network_Model_of_Knowledge_Acquisition%20\(3\).pdf](file:///C:/Users/m22205/Downloads/A_Network_Model_of_Knowledge_Acquisition%20(3).pdf).

³⁸ Martin Buoncristiani and Patricia Buoncristiani, “A Network Model of Knowledge Acquisition,” last visited 2022/4/6, [file:///C:/Users/m22205/Downloads/A_Network_Model_of_Knowledge_Acquisition%20\(3\).pdf](file:///C:/Users/m22205/Downloads/A_Network_Model_of_Knowledge_Acquisition%20(3).pdf).

這些網絡係由所謂鏈接或弧的線連接網絡中的每個「節點」所構成。由下圖顯示的網絡，從左到右變得更加複雜，³⁹代表不僅各自節點的影響力有別而大小不同，在網絡上亦有疏密之別。節點猶如流行病學上的超級傳播者(super spreader)概念，在各方不注意或特定環境等主客因素協助下，將病毒(有害訊息)大面積的傳播，⁴⁰影響極為深遠。

圖 8 疏密不同的社會網絡分布



資料來源：Martin Buoncrisiani and Patricia Buoncrisiani, “A Network Model of Knowledge Acquisition,” last visited 2022/4/6, 《ResearchGate》[file:///C:/Users/m22205/Downloads/A_Network_Model_of_Knowledge_Acquisition%20\(3\).pdf](file:///C:/Users/m22205/Downloads/A_Network_Model_of_Knowledge_Acquisition%20(3).pdf).

綜觀上揭各圖，其中節點就是各種意見領袖，而在當前網際網路盛行及各種社交媒體運用普遍的狀況下，節點自然是指網紅、特定團體、特定媒體、特定網站等不一而足，只要符合足以對其跟隨者發送訊息者即是節點，其差別僅在跟隨者眾其影響力大，相對跟隨者少其影響力相對小而已，而綿密或稀疏的社會網絡，如圖8，則代表的是訊息傳播的緊密、繁複差別。

《華盛頓郵報》2021年2月4日發表一個網路分析報告，該報告係由網路分析公司 Graphika的調查主管本·尼莫（Ben Nimmo）對外宣布，揭示一個活躍在各大社交媒體平臺的親大陸的視頻宣傳網絡，如何利用衝擊美國國會、彈劾川普總統等事件，製作傳播幸災樂禍的視頻唱衰「美式民主」，尤強調這些視頻製作者最大資本就是美國的分化，亦即「美國的壞消息就是他們的好消息」。這個大陸網絡視頻宣傳機器被稱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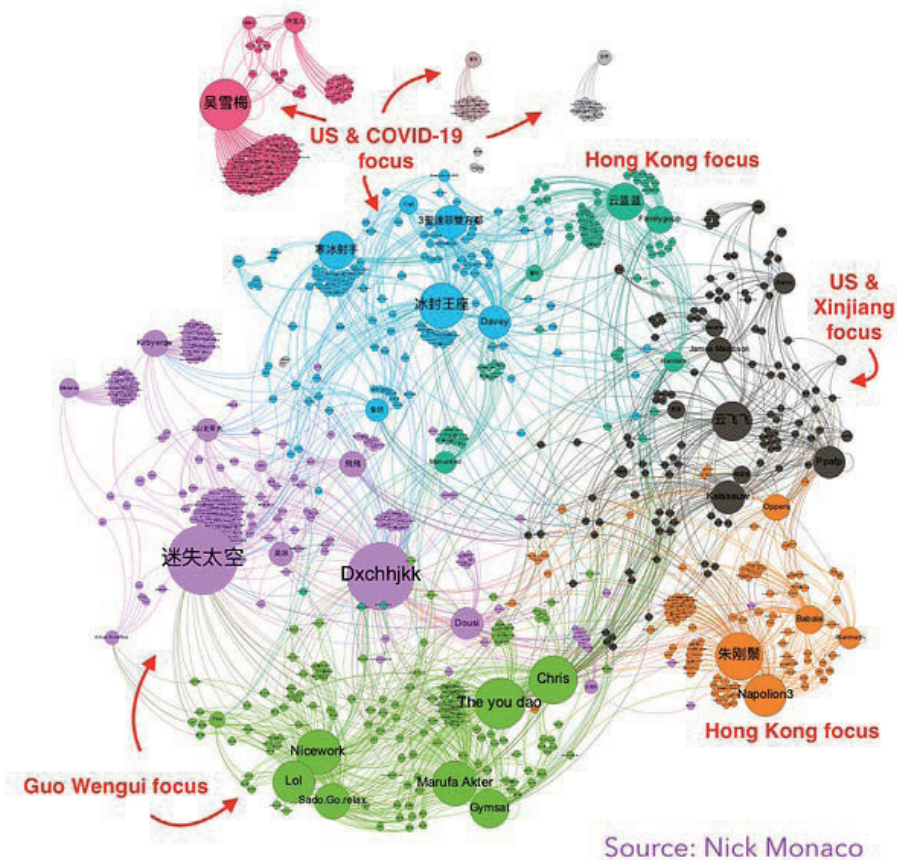
39 Buoncrisiani and Buoncrisiani, “A Network Model of Knowledge Acquisition”.

40 Michelle Edelstein, “What Is a Superspreader?” (2020/10/9), last visited 2022/4/29, 《Rutgers》, <https://www.rutgers.edu/news/what-superspreader>.

“Spamouflage”，意為「垃圾偽裝」，是英文詞「垃圾郵件或貼文」（Spam）和「偽裝」（Camouflage）的組合。這個名稱即反映出其類似網路垃圾郵件的傳播技巧，而其背後目的、組織性與指揮鏈，殊值重視。⁴¹

而關注虛假信息的獨立研究組織「米布羅」（Miburo）中國研究主任尼克·莫納科（Nick Monaco）2021年12月22日在推特發表報告表示，該組織發現逾兩千個配合大陸擴散虛假信息與宣傳的帳號，這些帳號以專一的訊息群組方式運作，在新疆、臺灣和新冠疫情等議題，製作和放大與大陸相配合的虛假信息。審視上揭帳號在訊息傳播網絡扮演傳播「節點」之重要角色，亦可驗證與大陸刻正運用節點對外遂行認知作戰，如下圖：⁴²

圖 9 大陸假帳號散發扭曲訊息圖



資料來源：Nick Monaco, (2021/12/12)，last visited 2022/7/27, 《twitter》，https://twitter.com/_NickMonaco/status/1473679321529262094?t=cEBzg_xh0vdfZsUDVm2JpA&s=06。

41 「報告：親中視頻宣傳網路利用衝擊國會事件唱衰美國」（2022年7月22日），2022年7月27日下載，《VOA》，<https://www.voachinese.com/a/pro-china-propaganda-campaign-exploit-us-devisions-/5767774.html>。

42 Nick Monaco, (2021/12/12)，last visited 2022/7/27, 《twitter》，https://twitter.com/_NickMonaco/status/1473679321529262094?t=cEBzg_xh0vdfZsUDVm2JpA&s=06。

肆、防制想定

由前述認知作戰的「軟體」與「硬體」的區別，認知作戰的攻防顯然包含訊息內容與傳播管道兩種領域，因此認知作戰的防制自然可以分為此兩種領域討論。

一、溯源無可避免

在訊息內容方面，幾乎所有對認知作戰效果研究者都認為，對於認知作戰效果的評估，是以對象的行為改變為評估標準(反應)，絕不是以宣傳的內容為標準(投入)，⁴³就如學者傑維斯(Robert Jervis)研究國際關係的論點，認為決策不僅是對對手的認知(perception)，更涉及領導者對內、外情勢的認知才能做出最後的決斷，⁴⁴當然對對手言行的判斷錯誤(misperception)做出超出對手意圖的反應所在多有，而著名例證，即令對手威懾(deterrence)，意圖使對手屈服，但對手的認知卻認定必須強化自衛力量，反更加強硬以對，甚至持續武備，而形成敵意螺旋(spiral)，致達不成「威懾—降伏」目的。⁴⁵因此，對於是否可以達成認知作戰之目的，端賴被攻擊方的反應是否符合設定目標決定。

若認知作戰的效果必須以對象的行為反應是否改變，並對發動方有利，那麼很自然的，在認知作戰中，所發送的訊息內容就可大致分為「有效果」與「無效果」，甚至「反效果」區別對待。以反效果為例，若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殺人盈野之際，認知作戰者發出俄羅斯總統普丁是偉大領袖的訊息，或在全球大部分人，不認為中共具有民主特質的氛圍中，中共卻宣稱具有「全過程民主」，⁴⁶縱使有部分人認為普丁確實是偉大領袖，或認為中共敢與西方爭奪民主話語權，但引發絕大部分人的揶揄卻是不爭的事實，這種認知作戰素材是否具有效果，理當懷疑，這種素材應被認為具有反效果或無效果，才與經驗上的認知相符。因此，面對「無效果」與「反效果」的訊息內容，防守方該如何回應？理性的推斷，該是面對「無效果」內容置之不理，面對「反效果」內容應該協助散播才是合理選擇，只有對防守方有殺傷效果者，才必須反應制止。

然而認知作戰所涉及的知識或訊息傳達(propaganda)，與教育或訊息探索經常混雜，被外界認為難以劃分，事實上其界線明顯如下：

43 Robert Johnson and Timothy Clack, "Introduction," in Timothy Clack and Robert Johnson ed(s), *The World Information War* (Y.N.: Routledge, 2021), P. 5.

44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2017), p. Xi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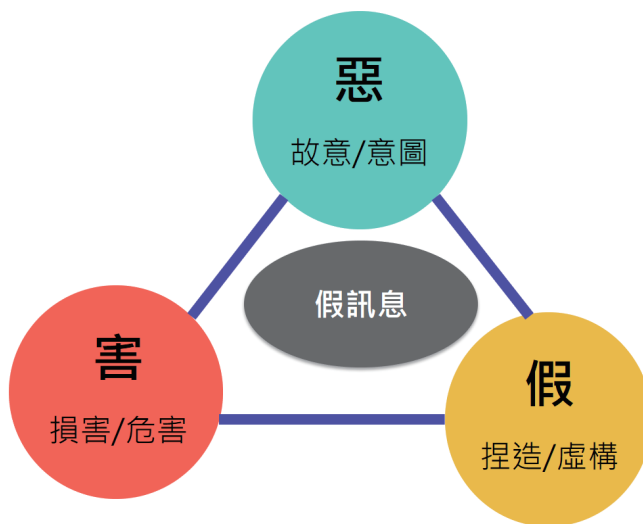
45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84.

46 「習近平首提『全過程民主』 新詞匯引發新質疑」(2019年11月4日)，2022年4月8日下載，〈BBC中文網〉，<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0285833>。

- (一)教育與訊息是在擴張對象的視野與心智(怎麼思維與行動由自己決定)。
- (二)宣傳在窄化對象的心智與視野(依據宣傳者指示思維與行動)。
- (三)兩者最大的區別在「目的」。⁴⁷

行政院就是秉持訊息虛假有害(不是提供民眾進行教育或判斷是非之用)才查緝的原則，⁴⁸對於這種必須查辦的訊息定義如下圖：

圖 10 必須查辦訊息特性



資料來源：「防制假訊息危害因應作為」(2018年12月13日)，2022年4月23日下載，《行政院》，<https://www.ey.gov.tw/Page/448DE008087A1971/c38a3843-aaf7-45dd-aa4a-91f913c91559>。

而對於有危害性假訊息防制的策略與目標，則如下表：

47 David Welch, “A Brief History of Propaganda,” in Timothy Clack and Robert Johnson ed(s), *The World Information War* (Y. N.: Routledge, 2021), p. 22.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are concern to broaden the audience’ s perspective and open their minds.” “propaganda normally tries to tell people what to think” .

48 「防制假訊息危害專案報告」(2018年12月13日)，2022年4月23日下載，《行政院》，<https://www.ey.gov.tw/Page/448DE008087A1971/c38a3843-aaf7-45dd-aa4a-91f913c91559>。

表 1 防制有害訊息的策略與目標

	識假 識別 / 辨認 (警覺揪害)	破假 查核 / 釐清 (澄清污染)	抑假 抑制 / 移除 (阻卻散播)	懲假 規管 / 究責 (溯源清理)
目標	提升公民識讀素養、 養成獨立判斷能力	提升澄清機制效率、 推廣第三方查核機制	強化媒體平台協力、 有效抑制危害擴散	追究違法責任、 公正獨立司法審查
原則	透明、公開、信賴	即時、正確、有效	法制與科技並重	安全與人權兼顧

資料來源：「防制假訊息危害因應作為」(2018年12月13日)，2022年4月23日下載，《行政院》，<https://www.ey.gov.tw/Page/448DE008087A1971/c38a3843-aaf7-45dd-aa4a-91f913c91559>。

在此政策下，當前臺灣對於認知作戰的反制，基本就以發掘有害虛假訊息(不是無效果或反效果的訊息)，再溯源為基本查緝方式。以法務部調查局所公布查緝案例，佐證如下：

案例一，經調查發現「朱○卉、王○藍、於○意、丁○風...」等近20個假帳號，利用境外手機門號及電子郵件，在具網路聲量的卡提諾論壇註冊後，頻繁發布有關疫情及政治相關扭曲訊息，甚至利用網頁瀏覽器開發者模式，編輯竄改PTT既有的文章內容，藉由大陸、柬埔寨背景人士管理的「茯苓有點兒甜」等數個臉書粉絲專頁，進行第一層散布，再利用「郝○茹、喬○雲、悅○汪、琬○曹...」等近400個臉書假帳號，進行第二層分享，廣泛散布到臺灣地方社團、宗教、生活娛樂等各類不特定公開臉書社群，由社群成員進行第三層之分享，這些假訊息透過計畫性分工層層轉傳散布，深入臺灣社會各階層，以營造錯誤認知及挑起人民對立，嚴重危害臺灣社會秩序及國家安全。⁴⁹(如下圖)

49 「假帳號入侵卡提諾論壇！竄改PTT文章散布假訊息 調查局發動約談」(2022年1月21日)，2022年4月1日下載，《蘋果新聞網》，<https://tw.appledaily.com/local/20220121/3EPD6MUNGRGVZE4WUOEXXUD6CQ/>。

圖 11 調查局查獲扭曲訊息流程



資料來源：「認知作戰入侵卡提諾論壇 調查局揪400個中國網軍假帳號」（2022年1月21日），2022年4月1日下載，
《關鍵評論網媒體集團》，<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19475-fake-post-apologize-who-tedros>。

案例二，世界衛生組織(WHO)秘書長譚德塞於2020年4月8日指控，臺灣政府及民眾自三個月前起，對其進行言語誹謗攻擊，甚至有死亡威脅及種族歧視等辱罵情事；此已引發臺灣民眾反彈，然爭議未平之際，推特(Twitter)等網路社群竟出現大量發文及留言，如：「我是臺灣人，我為臺灣人這樣惡毒攻擊譚德塞而感到無比羞恥，我代表臺灣人向譚德塞道歉，乞求他的原諒。」、「我是臺灣人，我為臺灣人這樣種族歧視惡毒攻擊譚德塞而感到無比羞恥，我願意代表臺灣人向譚德塞和所有黑人群體道歉，乞求他的原諒。」前揭貼文發布數在短時間內迅速暴增，調查局發動溯源調查，調查結果如下：

- (一) 某廣播網Twitter帳號首度出現假道歉留言：某歐美廣播中文網Twitter帳號，於4月9日上午發表有關「譚德塞稱臺灣進行人身攻擊」相關文章，當日下午該則貼文即出現一名用戶「以臺灣人之名發表道歉留言」，經溯源調查，該用戶應來自大陸。
- (二) 某大陸地區電臺Twitter帳號製作模板大量轉貼散布：某大陸地區電臺Twitter帳號藉前揭留言內容製成假道歉文「模板」，號召其他用戶利用模板「偽裝成臺灣網民發布假道歉文」，爰開始出現大量境外網民發布或轉貼假道歉文之狀況，同時為求擬真，竟配合發布臺灣證件照片之截圖以取信他人。⁵⁰

由此兩則案例，明顯發現調查局的偵辦模式是在偵知有害訊息流竄後，再以溯源

50 「查獲大量中國網軍假冒台灣網友道歉『攻訐譚德塞』調查局火速溯源！」(2020年4月10日)，2022年4月1日下載，
《關鍵評論網媒體集團》，<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19475-fake-post-apologize-who-tedros>。

方式追擊查辦，這種做法當然有其必要，但當前通訊環境，是遊戲寶可夢APP僅用19天可達到5千萬人使用的驚人傳播速度(過去同樣五千萬人使用的各媒體所花時間：收音機38年、電視13年、網際網路4年、臉書10個月)，⁵¹ 依靠偵知再溯源，群眾認知可能早已被有害訊息影響，而形成眾口鑠金、有口皆碑、曾參殺人等而難以防制了。

經由發現有害訊息為發動起點，再層層轉折溯源，所消耗的人力物力可想而知，更何況，認知作戰的成效不能由散布的內容斷定，在反制資源有限及認知作戰必須以最終效果為是否有效判準的特性，在任何訊息流行之初，並無法判定是否為有效、無效或反效果，但在發現其具有傷害性，尤其已經造成眾口鑠金或曾參殺人效果時，已然輪掉認知作戰，因此對於認知作戰的防制將形成判斷有效、無效或反效果訊息的時間壓力。而臺灣國安單位也發現，大陸近期調整對臺認知作戰，鑒於網紅文化與電商產業蓬勃發展，復以疫情影響兩岸交流，大陸官方轉而擴大籌辦網紅、電商直播主培訓活動，並積極運用新媒體作為宣傳管道，調整「代理人」扶植對象以臺商、臺胞、臺青及陸配為重點受眾，在策略上則強調「在陸」為先，以降低政治敏感度，爭取臺人對大陸認同，藉以突破疫情衝擊下的對臺工作困境，並以臉書、抖音、YouTube、Podcast等新媒體等影音型平臺作為主要宣傳管道。⁵² 證明認知做戰攻防，除訊息內容外，更必須在於訊息傳播「硬體」的掌握。

二、打擊節點為捷徑

用於認知作戰中的假訊息組成與散發，依據俄羅斯的相關經驗調查顯示，包含4個環節：

(一)、扭曲訊息(disinformation)編寫；(二)、喂圖(cartoon)；(三)、假冒身分評論；(四)、以眾多，尤其是看似女性帳號發送至所能接觸到的所有社交媒體上。⁵³

扭曲訊息(disinformation)編寫，是負責則將真假訊息混合致難辨真假；喂圖(cartoon)目的在簡化事件讓受眾產生刻板印象，尤其用畫面操縱群眾情緒並對特定對象施加壓力的「CNN效應」，⁵⁴ 就足以影響國家的政治、經濟等政策，⁵⁵ 當然也可以影響

51 Timothy Clack and Louise Selisny, "From Beijing Bloggers to Whitehall Writers," in Timothy Clack and Robert Johnson ed(s), *The World Information War* (Y.N.: Routledge, 2021), P. 263.

52 「中國調整對台認知作戰 培養台籍主播網紅」(2021年2月20日)，2022年4月25日下載，《中央通訊社》，<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102200211.aspx>。

53 David Patrikarakos, "Homo Digitalis Enters the Battle," in Clack and Johnson ed(s), *The World Information War*, pp. 35-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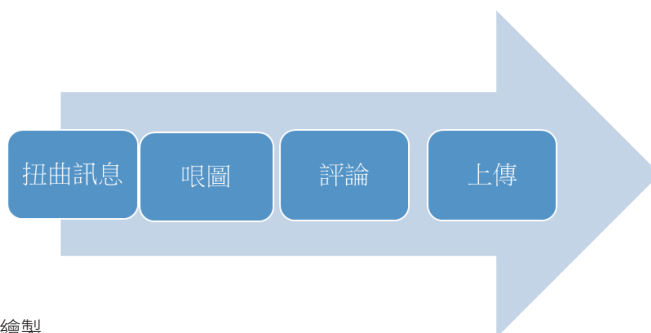
54 Alexander Kott, "introduction," in Alexander Kott ed., *Battle of Cognition* (Westport: Prager, 2007), p. 5.

55 Jason Gordon, "CNN Effect – Explained," (2022/4/24), last visited 2022/4/27, *The Business Professor*, https://thebusinessprofessor.com/en_US/economic-analysis-monetary-policy/cnn-effect-definition.

全世界；假身分評論，將扭曲訊息進一步以無辜第三者身分用詮釋的方式帶風向；假帳號在不斷推出相關訊息，而看來像女性的帳號更容易令人放鬆戒心獲得信任，擴大傳播效果。顯然此4個環節在近期流行的認知作戰短片中完全包含。

此4個環節相互結合，才能依據如下過程發揮認知作戰應有效果：

圖 12 俄羅斯扭曲訊息製作散布 4 個環節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俄羅斯發動認知作戰的4個環結，都係由統一的組織所籌辦，其運作模式仍不脫「硬體」網絡與「節點」運用。而依據此4個環節的分進合擊特性，以認知作戰防制角度看，顯然可將此4個環節視為發動認知作戰者的位置標定。

認知作戰有無效果，除傳播內容是否引發受眾行為的改變為驗證標準外，不可忽視的是傳播過程的結構，當然傳播的效果與過程更涉及節點、節點運作能力、運用的媒介、科技運用、受眾群體特性……等，因此對於認知作戰的作為特性，可推論出各方考慮因素如下：

(一) 群聚特性：同質性結成小群(homophily)，有時亦稱Similarity groups，看法或意見相同者經常互動現象早經研究證實，⁵⁶而且經由社交媒體獲得相同資訊，在物以類聚的環境中彼此互動更強化相似的認同，⁵⁷使每個小群體的邊界(boundary)明顯，在電腦演算法(algorithm)提供類似內容於特定閱聽大眾的推波助瀾下更是如此。⁵⁸讓

56 Haim Assa, “Influencing Public Opinion,” in Yossi Kuperwasser and David Siman-Tov (eds), *The Cognitive Campaign: Strategic and Intelligence Perspectives* (Israel: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2019), pp. 29-30. Last visited 2022/5/3, 《INSS》, https://www.inss.org.il/wp-content/uploads/2019/10/Memo197_e_compressed.pdf.

57 “Homophily in social networks,” last visited 2022/4/12, 《Future Learn》, <https://www.futurelearn.com/info/courses/social-media/0/steps/16055>.

58 Hartley III and Hobson, *Cognitive Superiority*, pp. 102-103.

意識形態相同者所獲知的訊息相似而強化其認知，難以接受不同觀點，最終造成分歧且極化(polarizing)、⁵⁹摩擦化(friction)、激進化(radicalization)的脆弱社會。⁶⁰

- (二) 節點特性：小團體有節點，亦即意見領袖的存在，訊息由節點向下傳播。節點包含個人、特定網頁、網站、媒體……等等，而在社交媒體盛行的當前，「網紅」(influencer)更成為各方關注的新焦點。
- (三) 媒介特性：溝通載具相同有利於傳播，因此兩岸同文同種、思維相同有利於傳播，依此脈絡在兩岸認知作戰的攻防中，拉幫結派建立在地協力團體不難想像。
- (四) 不斷精進特性：運用人工智慧(AI)分析與鎖定特定目標，不斷餵給特定(假)新聞，讓其傳播，還可不斷檢查評估更換。⁶¹

當前傳遞訊息的節點，可能已經由特定的人員、網紅、組織或其他渠道，甚至擴大成國家，如美國紐約時報一篇名為《中國的烏克蘭戰爭宣傳：放大並強化俄方虛假訊息》報導稱：「自從戰爭開始以來，中國外交官和官媒記者一直在重複克里姆林宮的辯護之詞，包括俄羅斯總統普丁的說法--他是在與基輔的新納粹政府作戰」、「俄羅斯和中國的官媒也已在越來越多地使用同一群網路名人、專家和網紅的觀點，在官媒節目和YouTube影片中兜售他們的觀點，其中包括本傑明·諾頓(Ben Norton)的記者，他聲稱，2014年烏克蘭發生一場由美國政府支持的政變，美國官員把現任烏克蘭政府的領導人扶植上臺」，雖然這個陰謀論是諾頓最早在俄官媒《今日俄羅斯》提出，但後來被大陸官方媒體轉載，並被Frontline等帳號在Twitter上轉發。2022年3月，大陸中央電視臺宣稱對諾頓進行獨家採訪，諾頓在受訪中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罪魁禍首是美國，不是俄羅斯。⁶²而相同訊息不斷被俄羅斯及大陸以各種形式轉發，這不僅透露出國家與國家間聯合的認知作戰，更暴露出對於節點--「使用同一群網路名人、專家和網紅的觀點」、「本傑明·諾頓」的運用。美國國務院全球參與中心對俄羅斯扭曲訊息的傳播研究亦有相似的發現。⁶³足證本文前述訊息網絡、節點及訊息內容是認知作戰的重要元素。

然而前述「米布羅」組織公布逾兩千個配合大陸擴散虛假訊息與宣傳帳戶的研究也發現，雖然這些帳戶數量眾多，而且海量發帖，但其內容總的來說只是在自我點讚、

59 Hartley III and Hobson, *Cognitive Superiority*, pp. 63-64.

60 "Defending Canada against cognitive warfare," (2021/11/21), last visited 2022/5/10, *Government of Canada*, <https://www.canada.ca/en/department-national-defence/maple-leaf/defence/2021/11/defending-canada-cognitive-warfare.html>.

61 Keith Dea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ecurity, and Society," in Timothy Clack and Robert Johnson ed(s), *The World Information War* (Y.N.: Routledge, 2021), p. 243.

62 孟建國, Steven Lee Myers, John Liu, 「中國的烏克蘭戰爭宣傳：放大並強化俄方虛假信息」(2022年4月12日), 2022年4月13日下載, 《紐約時報中文網》,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220412/china-russia-propaganda/zh-hant/>。

63 GEC, "GEC Special Report: Pillars of Russia's Disinformation and Propaganda Ecosystem".

自我放大，接觸到的受眾似乎甚少，只有個別貼文例外，取得了更大一些的曝光度。所有平臺上的互動數字有可能包括相當一部分的機器人和「點擊農場」(click farm)的操作。形成「吠叫聲大但咬力不足」現象，機器人不接地氣，宣傳效果不佳，只能透過節點，因此「在地協力者」的重要性就被凸顯。⁶⁴尤其，在宣傳效果的研究中顯示，能被記住的故事才能傳揚，才能進一步影響群眾，因此，能被記住的故事才是好故事，不被記住的故事，難以打動人心，而人們最關心的故事卻又是否足以反映與關心自身的痛苦？⁶⁵

管理學「故事行銷」之「說故事」近期已經進化成敘述學(narratology)或是敘事戰爭(narrative warfare)，而所述說的故事不在乎真假，更在乎引發聽眾的共鳴，⁶⁶因此，要把故事說好、打動人心、讓人記住，顯難由機器人完成，只有依賴熟知受眾「風土民情」的「在地協力者」，又具有「節點」功能，方能完成。

在中共對臺認知作戰中，「在地協力者」或是「網紅」這類訊息節點，即是訊息傳播依賴的重要關鍵，且相關研究中也證明此種現象的存在。⁶⁷

進一步言，在任何推動認知作戰的訊息，在未經證實其效果前，都有可能是反效果或無效果，以受攻擊的一方而言，顯然不需花費有限的精力查處防制對手的訊息傳播，而應該集中精力於查處防制對己方確實有害的訊息傳播方為上策，但在攻擊訊息未產生結果時，又如何能認定是有效或無效的認知作戰攻擊？因此，對於認知作戰的防制，就成為時機拿捏、效果評估、反制能力的多重評估，難以抉擇成為必然。基此，除積極溯源認定有害的訊息傳播外，若另外依據本文所論述的訊息網絡節點著手，即是由查處扭曲訊息職權單位，主動鎖定經常散發扭曲訊息的節點(如意見領袖、網紅、網站、團體等)，在發現扭曲訊息大量經由節點散發後，迅速援引相關法令查處節點，縱使仍需面對所散發訊息效果仍待評估的難題，但卻可縮小有害訊息危害的擴散層面，縮短查處溯源時間，而達成節省人力物力，卻可反制的最佳效果。

「揭露」、「打擊節點」不僅是政府權責單位的重要任務，更在教育民眾提升媒體識讀及數位公民意識重要內容，標定特定節點讓民眾知悉，進而協助受眾過濾由該節點散發出訊息的真實性，將非常有助於約制與導正節點的訊息散播，而平時讓特定節點透明，如政治傾向、幕後金主、與黑道關係等等供受眾檢視，是當前認知作戰防制的重

64 美國之音，「中國大外宣九頭蛇！最新研究揭露網軍Spamouflage：砍掉它一個帳號，會再冒出兩個」(2021年12月25日)，2022年3月31日下載，《新新聞》，<https://www.storm.mg/article/4117870?mode=whole>。

65 Oliver Lewis and Chris DeFaria, "Does My Suffering Matter?" in Timothy and Robert ed(s), *The World Information War*, p. 93.

66 Hartley III and Hobson, *Cognitive Superiority*, p. 121.

67 沈伯洋，「中國認知領域作戰模型初探：以 2020 臺灣選舉為例」，頁46。

要作為及手段。

三、透明是防制之本

當前行銷領域之「精準行銷」、「病毒行銷」，中共已體現在對臺認知作戰，此等策略作為有可能分裂整個社會。其做法是整合網絡、訊息、心理和社交工程能力，利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在一個社會中選擇性地或連續地鎖定有影響力的個人、特定群體和大量公民進行影響，最終達成其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認知作戰並不一定需要虛假訊息或假新聞，將令人尷尬的政府文件，洩漏到社交媒體共享網站，或有選擇地傳播給社交網絡中的反對派團體，就足以引起爭議。⁶⁸

因此，可以確認不僅是政府的威信不足，將促成對手認知作戰的成功機率，而當民眾喪失對主流媒體或政府訊息的信心，也容易讓認知作戰獲得操作的空間，舉如俄羅斯「假旗行動」就是以大量訊息混亂對手的正確辨識能力，而不以說服對象為攻擊的手段，⁶⁹同樣可以達成認知作戰的目的；反觀美國在俄烏戰前，即多次公開示警俄羅斯將藉「假旗行動」製造動武事端，⁷⁰即成功提高國際警覺，有效化解俄國奇襲效果，另美國2022年5月2日亦再度示警俄國將在「頓內次克人民共和國」、「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等地舉行「假公投」，操弄民意以合法化對烏之併吞行動，⁷¹顯示美國藉由「揭露」俄國動向，助烏成功機先防範俄國之認知作戰攻勢。

而幾乎所有研究認知作戰者，都會認為認知作戰的核心是信任(trust)，只有獲得信任才足以發揮影響力(Trust is central and offers a target of influence)，⁷²因此，在認知作戰攻防中，不僅要受眾可以聽懂、看懂攻擊方的訊息，更完全信任其所言，才有具體效果。⁷³若被攻擊方的機構與發出的訊息都可以被信任，則攻擊方就相對減少取得操作認知作戰的空間，相反地，若被攻擊方的機構與訊息都不足以信任，則攻擊方就容易取得認知作戰操作空間，若將此思維脈絡以圖表表示，可形成如下表排列組合：

68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Countering cognitive warfare: awareness and resilience”.

69 Dea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ecurity, and Society,” p. 244.

70 「五角大廈示警 俄恐以『假旗行動』侵略烏國」(2022年1月16日)，2022年6月23日下載，《青年日報》，<https://www.ydn.com.tw/news/newsInsidePage?chapterID=1477508&type=universal>。

71 「美官員：俄計劃5月在烏東兩區行假公投 真吞併」(2022年5月3日)，2022年6月23日下載，《中央通訊社》，<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205030102.aspx>。

72 Hartley III and Hobson, *Cognitive Superiority*, p. 43.

73 Mackiewicz, “Cognitive Warfare”.

表 2 認知作戰操作空間

可信		攻方	
		不可信任	不可信任
守方	可信	1	2
	不可信任	3	4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若攻守雙方發出的訊息都足以被目標群眾或個人所信任，則雙方的認知作戰自然不易施展，如表格編號1的區域，相對的，不獲信任的一方就易被可信任的一方攻破防守，如表格編號2或3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實。若攻守雙方都是不足以被信任的第4區，則認知作戰的勝負難料。

而信任來自於何處？當然是訊息不斷被證實為真。依此延伸，在西方民主國家，包含臺灣在內，因是開放社會，所有訊息包含政府單位發出者，都必須在公開透明的環境中經歷檢驗，其真實的成分相對高，但如俄羅斯與大陸的威權體制，封閉管制訊息是其常態，而封閉與統治者政策不契合的訊息更是其所必須，若然，則其民眾是否可以經得起任何訊息的裂漏，突然獲知外界真相而不逆轉認知作戰中的攻守地位，其結果顯然不樂觀。基於此，在認知作戰中的守方顯然必須具備相關單位即時澄清能力，不僅如此，愈透明的社會，愈不隱瞞真相，將更能壓縮造謠空間，相對關係如下表：

表 3 公開透明關係

	你知	你不知
我知		
我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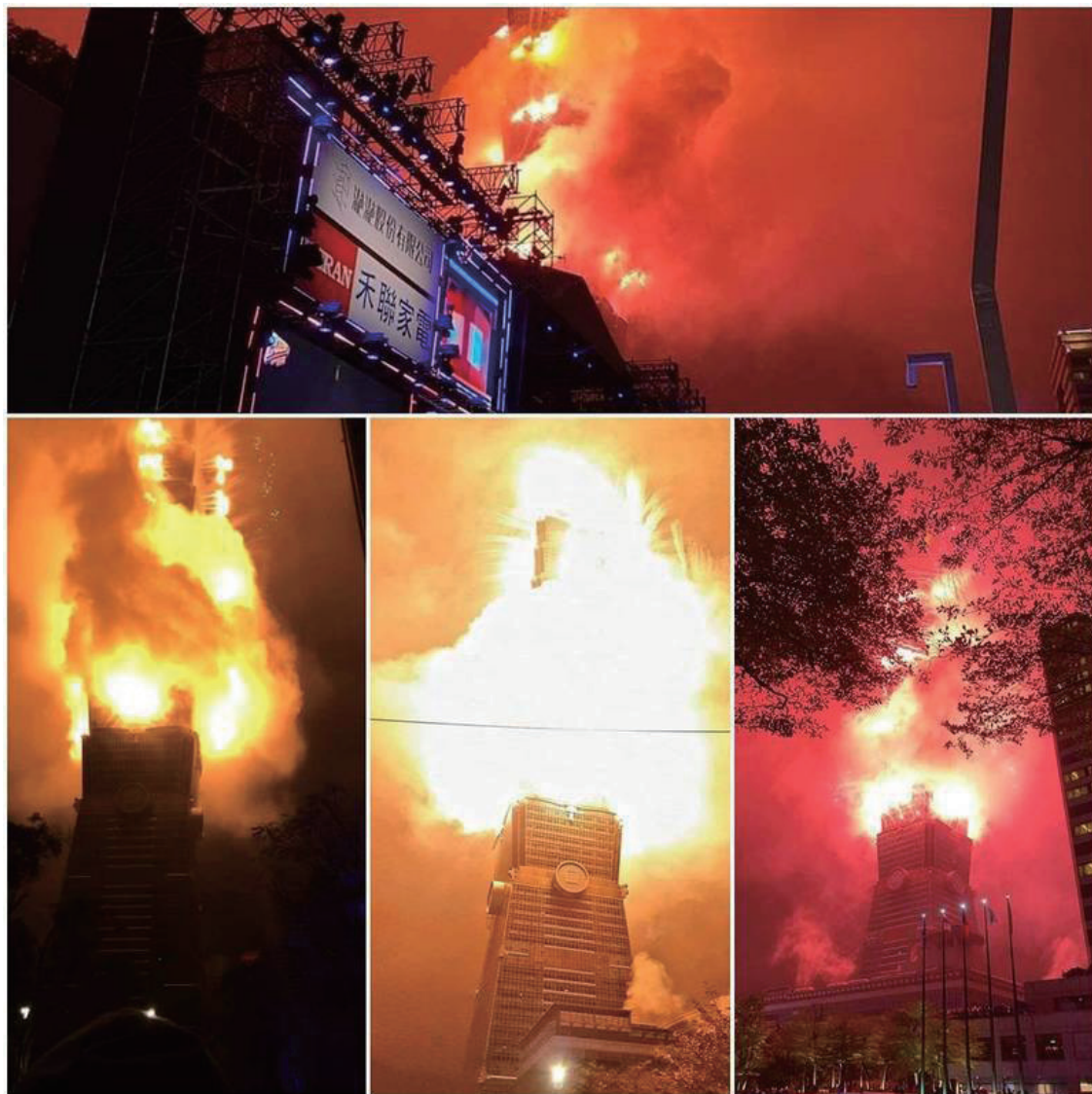
	你知	你不知
我知		
我不知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唯有真知始能卓見，故「揭露」使之公開透明，使你知、我知、天下知，如此藉由假訊息或以動搖社會信任發動認知作戰的空間自然下降，甚至藉此反制認知作戰發動的有害虛假訊息，破壞發動認知作戰單位的被信任度，以制止其攻勢。如2022年臺北101大樓煙火，若被製作成共軍炸毀101大樓，（如下圖），但因眾所周知101大樓完好

如初。因此，這種眼圖只能是笑話一則，難有認知作戰的效果，無須浪費有限資源查處，反之，若守方善加運用，則對散發此訊息的節點信效(用)度，將構成嚴重損傷，而達成反認知作戰的效果。

圖 12 網路流傳 2022 年 101 大樓元旦煙火照片



資料來源：「拍照技術太差！101跨年煙火被拍成『火災』網笑翻」（2022年1月3日），2022年4月26日下載，《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787960>。

更細緻的區分，卻必須理解認知作戰的攻防，猶如病毒與防疫概念引用。視認知作戰之扭曲訊息為病毒，病毒攻擊特定器官，我方必須瞭解各「器官」特性，並製作防疫疫苗。⁷⁴因此，依據各可能被攻擊受眾，依需要分別進行教育以提升「免疫力」，則是未來認知作戰所必須解決的問題。

不可忽略的是攻、守雙方都有對各自友善的節點與訊息傳播網絡存在，因此，在認知作戰的防制上，以防制訊息內容及打擊節點兩個攻擊箭頭外，防守方是否亦可釋出相對應訊息，並利用對防守方友善的節點與網絡，散播對手陣營受眾對防守方之好感與對攻擊方的惡感，漸由本文所述著重描述的守勢認知作戰，轉變成攻勢認知作戰作為，尤其是資訊開放的民主國家，面對訊息管制的威權國家時更應如此，⁷⁵是頗值得深思的課題。

伍、結語

當前認知作戰已綜合電腦、資訊、心理學等知識與能力，在網路與社交媒體上，對個人、特殊團體、一般民眾等進行工作，以達成其目標。⁷⁶

認知作戰已成大陸利用社交媒體製造假訊息之關鍵運用觀念，大陸之資訊戰與心理戰(西方亦稱「影響力戰」)由來已久，刻正採用最新、最有效之大眾傳播工具，亦時有所聞。運用人工智慧與大數據分析，加上「六度分離」理論證明資訊流之傳播「節點」，在訊息傳播網絡扮演相當重要角色，甚至直接影響訊息對閱聽受眾之信效度，即可大幅提高運用社交媒體，針對特定對象，製造訊息之能力。綜觀大陸運用上揭功能之成效仍有待驗證，然而從大陸對臺灣、香港遂行認知作戰，以及近期俄「中」戰略協作對國際進行假訊息戰之相關報導，均顯示大陸在認知作戰的努力已如火如荼，值得關注。

下一步如何統合資訊流之傳播「節點」發動認知作戰。認知作戰沒有平時與戰時之分，「戰爭」目前正全面開打中，在中共20大前後更是如此；而對認知作戰必須警惕，所傳遞的各類訊息不一定可以打動人心，提供正確或錯誤的資訊也不一定能「扭轉」人心，縱使提供的訊息足以打動人心也不一定會以行動表露，⁷⁷更進一步說，認知

74 Corneliu Bjola and Krysianna Papadakis, "Digital Propaganda, counterpublics, and the Disrup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in Timothy and Robert ed(s), *The World Information War*, p. 191.

75 Orinx and Swielande, "Cognitive warfare and the vulnerabilities of democracies," p.4.

76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Countering cognitive warfare: awareness and resilience".

77 Timothy Clack and Louise Selisny, "From Beijing Bloggers to Whitehall Writers," in Timothy and Johnson ed(s), *The World*

作戰正悄悄的進行、悄悄地潛移默化，只有及早防備才足以防範於未然。當前認知作戰甚至被形容為著名小說《魔戒》中的那只魔戒，可以操弄所有與其有關事務，⁷⁸而中共認知作戰的訊息內容無所不在，端看攻守雙方如何詮釋，如2021年初，大陸深圳中學公開聘任教師66名，其中有碩士39人、博士21人、博士後6人(北大畢業17人、清華16人，更不乏劍橋、牛津、倫敦大學、賓州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世界頂尖學府畢業者)，⁷⁹這種現象，是碩博士沒有出路，還是學校提高教學品質？不同的詮釋可以有不同的認知，端看受眾如何識讀。

筆者曾被某國駐臺外交官探詢，何以臺灣民眾對扭曲訊息的攻擊免疫力比他國強，筆者答以可能係因臺灣民眾常年受電話詐欺的教訓，因此對於扭曲訊息的辨識能力比其他國家高，如此簡單的問答，卻凸顯教育民眾，使具有強大的媒體識讀及數位公民意識，將是反制扭曲有害訊息與抵擋認知作戰的重要一環。

隨著科技的進步，「精準行銷」因人工智慧更加得以對特定對象散播特定訊息，有效溝通說服訊息受眾增加購買商品，⁸⁰同理，隨著科技(technium)的發展，訊息(noosphere)的傳播方式亦將改變，而當前發展AI技術及早鎖定對手可能發出的訊息、方式、對象、時機、可能效果、發送節點等，加以快速研判訊息之影響效應，亦將是未來有效對抗認知作戰攻勢的趨勢。

認知作戰因手段、工具及載體之多元性，誠屬複合式之迫切威脅，對當前國際社會激烈於網路空間爭奪的環境來說，如何理解、掌握並應對，是未來人類所必須面對的嚴肅課題，仍有待各界的持續努力研究。

Information War, p. 273.

78 Hartley III and Hobson, *Cognitive Superiority*, pp. 16-17.

79 中國新聞組，「深圳中學新進教師 博士超過4成」(2021年2月26日)，2022年4月26日下載，《世界日報》，<https://www.worldjournal.com/wj/story/121344/5279658>。

80 Hartley III and Hobson, *Cognitive Superiority*, pp. 147-148.

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

網際網路

- 2018/12/13。「防制假訊息危害專案報告」，《行政院》，〈<https://www.ey.gov.tw/Page/448DE008087A1971/c38a3843-aaf7-45dd-aa4a-91f913c91559>〉。
- 2019/11/4。「習近平首提『全過程民主』 新詞匯引發新質疑」，《BBC中文網》，〈<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0285833>〉。
- 2020/3/5。「【全民國防】抵禦中共『三戰』威脅 捍衛民主」，《青年日報》，〈<https://www.ydn.com.tw/news/newsInsidePage?chapterID=1216263>〉。
- 2020/4/10。「查獲大量中國網軍假冒台灣網友道歉『攻訐譚德塞』調查局火速溯源！」，《關鍵評論媒體集團》，〈<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19475-fake-post-apologize-whotetros>〉。
- 2021/12/25。/美國之音，「中國大外宣九頭蛇！最新研究揭露網軍Spamouflage：砍掉它一個帳號，會再冒出兩個」，《新新聞》，〈<https://www.storm.mg/article/4117870?mode=whole>〉。
- 2021/2/20。「中國調整對台認知作戰 培養台籍主播網紅」，《中央通訊社》，〈<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102200211.aspx>〉。
- 2021/2/26。中國新聞組，「深圳中學新進教師 博士超過4成」，《世界日報》，〈<https://www.worldjournal.com/wj/story/121344/5279658>〉。
- 2021/5/25。林艾德，「何謂認知作戰？」，《方格子》，〈<https://vocus.cc/article/60aca03afd897800019f3b1a>〉。
- 2021/5/25。戰略風格編輯部，「認識『認知戰』：一個既『傳統』又『創新』的作戰方式 中共對台重要打法！」，《戰略風格》，〈<https://strategy.style/archives/cognitive-warfare-china-taiwan>〉。
- 2022/1/16日。「五角大廈示警 俄恐以『假旗行動』侵略烏國」，《青年日報》，〈<https://www.ydn.com.tw/news/newsInsidePage?chapterID=1477508&type=universal>〉。
- 2022/1/21。「假帳號入侵卡提諾論壇！竄改PTT文章散布假訊息 調查局發動約談」，《蘋果新聞網》，〈<https://tw.appledaily.com/local/20220121/3EPD6MUNGRGVZE4WUOEXXUD6CQ/>〉。
- 2022/3/20。陳政嘉，「這個全球第1…境外假訊息攻擊 臺灣最頻繁、連續9年蟬聯冠軍」，《新頭殼》，〈<https://tw.stock.yahoo.com/news/%E9%80%99%E5%80%8B%E5%85%A8%E7%90%83%E7%AC%AC1-%E5%A2%83%E5%A4%96%E5%81%87%E8%A8%8A%E6%81%AF%E6%94%BB%E6%93%8A-%E5%8F%B0%E7%81%A3%E6%9C%80%E-9%A0%BB%E7%B9%81-%E9%80%A3%E7%BA%8C9%E5%B9%B4%E8%9F%AC%E8%81%>〉。

AF%E5%86%A0%E8%BB%8D-041315836.html〉。

2022/5/3。「美官員：俄計劃5月在烏東兩區行假公投 真吞併」，《中央通訊社》，〈<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205030102.aspx>〉。

2022/7/22。「報告：親中視頻宣傳網路利用衝擊國會事件唱衰美國」，《VOA》，〈<https://www.voachinese.com/a/pro-china-propaganda-campaign-exploit-us-devisions-/5767774.html>〉。

沈伯洋，「中國認知領域作戰模型初探：以2020臺灣選舉為例」，《遠景基金會季刊(臺北)》，第二十二卷第一期(2021年1月)，頁5，〈<https://www.pf.org.tw/files/6931/CF88D276-7F56-42D0-8E51-ABF84D29FEAD>〉。

孟建國，2022/4/12。Steven Lee Myers, John Liu, 「中國的烏克蘭戰爭宣傳：放大並強化俄方虛假訊息」，《紐約時報中文網》，〈<https://cn.nytimes.com/china/20220412/china-russia-propaganda/zh-hant/>〉。

邱振中、蔡佳惠、黃靖真、鍾惠萍，2022/4/15。「東方主義與文化霸權：全球性閱讀」，《南華出版社》，〈<https://www.nhu.edu.tw/~society/e-j/20/20/20-13.htm>〉

侯俐安，2022/3/24。「烏俄戰爭認知作戰 政院：摸通假訊息四大手法」，《聯合報》，〈<https://udn.com/news/story/6656/6188231>〉。

專書

Garths Jowett and Victoria O' Donnel, 陳彥希等譯，《宣傳與說服》(propaganda and Persuasion) (臺北：韋伯文化，2003)，頁20-21。

論文

劉文斌，「大陸對臺假訊息作為蠱測與防制」，發表於前瞻2020中國大陸與臺海情勢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等，2019年10月4日)，頁131-153。

英文部分

專書

Bjola, Corneliu and Krysianna Papadakis, 2021. "Digital Propaganda, counterpublics, and the Disrup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in Timothy and Robert ed(s), *The World Information War*. Y.N.: Routledge, pp. 186-213.

Clack, Timothy and Louise Selisny, "From Beijing Bloggers to Whitehall Writers," in Timothy Clack and Robert Johnson ed(s). *The World Information War*. Y.N.: Routledge. pp. 259-280.

David, Welch, 2021. "A Brief History of Propaganda," in Timothy Clack and Robert Johnson ed(s), *The World Information War*. Y.N.: Routledge, pp. 21-33.

Dear, Keith, 2021.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ecurity, and Society," in Timothy Clack and Robert Johnson ed(s), *The World Information War*. Y.N.: Routledge. pp. 231-256.

Giles, Keir, 2021. "Russia Information Warfare," in Timothy Clack and Robert Johnson ed(s), *The World Information War*. Y.N.: Routledge. pp. 139-162.

- Hartley III, Dean S. and Kenneth O. Hobson, 2021. *Cognitive Superiority*. Switzerland: Springer.
- Jervis, Robert, 2017.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 Johnson, Robert and Timothy Clack, 2021. "Introduction," in Timothy Clack and Robert Johnson ed(s). *The World Information War*. Y.N.: Routledge, pp.1-18.
- Kott, Alexander, 2007. "Introduction," in Alexander Kott ed., *Battle of Cognition*. Westport: Prager . pp. 1-9.
- Lewis, Oliver and Chris DeFaria, 2021. "Does My Suffering Matter?" in Timothy Clack and Robert Johnson ed(s). *The World Information War*. Y.N.: Routledge, pp. 81-94.
- Nye, Joseph S. Jr., 2004. *Soft Power*. New York: PublicAffairs.
- Patrikarakos, David, 2021. "Homo Digitalis Enters the Battle," in Clack and Johnson ed(s), *The World Information War*. Y.N.: Routledge, pp. 34-44.
- Watts, Duncan J., 1999. *Small World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網際網路

- "Homophily in social networks," *Future Learn*, <<https://www.futurelearn.com/info/courses/social-media/0/steps/16055>> .
- "Journalism, 'Fake News' and Disinformation: A Handbook for Journalism Education and Training," *UNESCO*, <<https://en.unesco.org/fightfakenews>> .
- 2017/2. "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 *Whalts. com*, <<https://www.techtarget.com/whatis/definition/six-degrees-of-separation>> .
- 2021/11/21. "Defending Canada against cognitive warfare," *Government of Canada*, <<https://www.canada.ca/en/department-national-defence/maple-leaf/defence/2021/11/defending-canada-cognitive-warfare.html>> .
- 2022/4/11. "China's Role in the Russia-Ukraine War and Its Cognitive Warfare Operations," 遠景基金會, <<https://www.pf.org.tw/article-pfch-2168-8020>> .
- Assa, Haim. 2019. "Influencing Public Opinion," in Yossi Kuperwasser and David Siman-Tov (eds), *The Cognitive Campaign: Strategic and Intelligence Perspectives*. pp.25-36, *INSS*, <https://www.inss.org.il/wp-content/uploads/2019/10/Memo197_e_compressed.pdf> .
- Barrett, Paul M. 2019/9/12. "How disinformation could sway the 2020 election," *Salon*, <https://www.salon.com/2019/09/12/how-disinformation-could-sway-the-2020-election_partner/> .
- Beauchamp-Mustafaga, Nathan., 2021/5/14. "Cognitive Domain Operations: The PLA's New Holistic Concept for Influence Operations," *RAND*, <https://www.rand.org/pubs/external_publications/EP68632.html> .
- Bernal, Alonso, Cameron Carter, Ishpreet Singh, Cathy Cao, Olivia Madreperla. "Cognitive Warfare : An Attack on truth and thought," *NATO*, <<https://www.innovationhub-act.org/sites/default/files/2021-03/Cognitive%20Warfare.pdf>> .

- Bjergul, Lea Kristina. 2021/9/3. "Cognitive warfare and the use of force," *STRATAGEM*, <<https://www.stratagem.no/cognitive-warfare-and-the-use-of-force/>> .
- Buoncrisiani, Martin and Patricia Buoncrisiani., "A Network Model of Knowledge Acquisition," <[file:///C:/Users/m22205/Downloads/A_Network_Model_of_Knowledge_Acquisition%20\(3\).pdf](file:///C:/Users/m22205/Downloads/A_Network_Model_of_Knowledge_Acquisition%20(3).pdf)> .
- Christley, Scott, 2017/8/9. "The World Is Shrinking: 6 Degrees of Separation Is Now 2!," *Digital D. UGHNUT*, <<https://www.digitaldoughnut.com/articles/2017/august/6-degrees-of-separation-is-now-2>> .
- Edelstein, Michelle. 2020/10/9. "What Is a Superspreader?" *Rutgers*, <<https://www.rutgers.edu/news/what-superspreader>> .
- GEC, 2020/8. "GEC Special Report: Pillars of Russia's Disinformation and Propaganda Ecosystem,"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20/08/Pillars-of-Russia%E2%80%99s-Disinformation-and-Propaganda-Ecosystem_08-04-20.pdf> .
- Gordon, Jason. 2022/4/24. "CNN Effect – Explained," *The Business Professor*, <https://thebusinessprofessor.com/en_US/economic-analysis-monetary-policy/cnn-effect-definition> .
- Jill, Long. 2012/5/12. "WHAT IS WAR? A NEW POINT OF VIEW," *Small Wars Journal*, <<https://smallwarsjournal.com/jrnl/art/what-is-war-a-new-point-of-view>> .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2021/5/20. "Countering cognitive warfare: awareness and resilience," *NATO Review*, <<https://www.nato.int/docu/review/articles/2021/05/20/countering-cognitive-warfare-awareness-and-resilience/index.html>> .
- Li, Wen Tung. "Taiwan and the CCP's 'Public Opinion Warfare'," <<https://www.pf.org.tw/files/6510/91DA9418-BA3D-4677-A123-BEA9870F5114>> .
- Lieff, Jon, 2014/11/30. "Neuron Networks in Healthy and Diseased Brains," <<https://jonlieffmd.com/tag/most-brain-circuits-are-small-world-networks>> .
- Mackiewicz, Diana. 2019/11. "Cognitive Warfare," *ResearchGate*,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37228818_Cognitive_Warfare_-_Mackiewicz-Diana_2018> .
- Monaco, Nick. 2021/12/12. *twitter*, <https://twitter.com/_NickMonaco/status/1473679321529262094?tcEBzg_xh0vdfZsUDVm2JpA&s=06> .
- Orinx, Kimberly and Tanguy Struye de Swielande. 2021/5/21. "Cognitive warfare and the vulnerabilities of democracies," *CECRI*, <<http://cecilouvain.be/wp-content/uploads/2021/05/cognitive-warfare-.pdf>> .
- Ottewell, Paul. 2020/12/7. "Defining the Cognitive Domain," *OTH*, <<https://othjournal.com/2020/12/07/defining-the-cognitive-domain/>> .
- Pradhan, SD. 2022/5/8. "Role of cognitive warfare in Russia-Ukraine conflict: Potential for achieving strategic victory bypassing traditional battlefield," *The Times of India*,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blogs/ChanakyaCode/role-of-cognitive-warfare-in-russia-ukraine-conflict-potential-for-achieving-strategic-victory-bypassing-traditional-battlefield/>> .
- Raileekha, Samyak. 2022/1/15. "The future of the battle for minds," *ORF*, <<https://www.orfonline.org/expert-speak/the-future-of-the-battle-for-minds/>> .

與談稿

「從訊息傳遞節點探究認知作戰防制」 與談稿

A Response to "Cognitive Warfare Prevention from Message Delivery Nodes"

傅文成 (Fu, Wen-Cheng)
國防大學新聞學系教授

共軍自美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臺起對我國實施針對性軍演，在軍演中，除了飛彈、海空兵力威脅，亦伴隨「認知作戰」手段，意圖擾我軍、民心。對此，依據我國防部分析，已有超過272則演習相關假訊息流傳在國內社群媒體，這些假訊息經過大量複製、傳散，影響力不容小覷。例如，中共遂行認知作戰研究的智庫，隸屬於北京大學的「南海戰略態勢感知計畫」，即在今(2022)年8月初暴露，「美國5日共派出RC-135V電子偵察機等各型軍機，在6架空中加油機之支援下，前往臺灣周邊空域，以加強監測蒐集中共軍演各項訊號與參數情報。無獨有偶，大陸央視新聞於今年8月2日報導共軍「蘇愷-35」戰機穿越臺灣海峽等訊息，都與真實情況不符，意圖影響我國民眾對於國軍的信任甚明。

自從2014年俄國以複合式戰爭(Hybrid Warfare)，以社群媒體網軍假訊息搭配武裝力量演習，影響克里米亞國家認同投票結果，導致克里米亞以超過94%的高民意支持加入俄羅斯，讓俄國幾乎以最小的武裝衝突成本獲得最大的戰果後，社群媒體的認知攻防已成為世界關注的戰爭型態。今年2月，俄羅斯在對烏克蘭發動一連串虛擬空間的認知作戰後，實體世界則由演轉戰，對烏發動入侵戰爭。但烏克蘭自2014年後累積對抗俄羅斯之資訊作戰經驗，強化民心及關鍵資訊基礎設施之應變與復原韌性，讓俄羅斯暫無法複製2014年的成功結果。美大西洋理事會智庫就表示，隨著網路社群、資訊媒體發展迅速，戰爭型態和過去有著極大的轉變，特別是「認知作戰」部分，藉由破壞社會既有的網絡，加深國內民意對立，進而產生戰時左右戰場勝負的關鍵影響力，假訊息已成為戰爭的無煙硝味戰場。

虛假訊息的認知作戰機制是認為民主制度有弱點，民意容易受到媒體煽動。言論自由、網路自由與行為自由等基礎人權，都被多數國家認為是立國基礎，政府無法直接介入訊息查核機制。而認知作戰透過一連串的相互拉抬的假訊息宣傳機制，可產生低於武裝力量衝突的成本，卻能獲取動搖民心士氣的高效益。在解析具體認知作戰的要素後，

除了原有的社群媒體夾帶高度可信、難以查證的假訊息外；包含國內校園、宗教團體機構、網路、媒體意見領袖、國際媒體傳播等，相互交織構連起一張牢不可破的虛假訊息大網。從趨勢看起來，中共對我國的認知作戰日益升級，不論是透過法律戰、輿論戰、心理戰或統戰攻勢，都不難窺見假訊息操作軌跡，其圖謀不外乎打擊政府威信、分裂臺灣認同及醞釀社會衝突。

如果以假訊息的傳播管道來說，美國資安產業麥迪安公司近日發布一份報告，揭穿大陸假新聞宣傳運動，大陸公關公司「上海海訊社科技有限公司」正在利用至少72個假新聞網站，在全球以多種語言推送符合中共政治利益的文章，其中包含以繁體中文語言、假獨立新聞網站設立的「財富臺灣」、「臺灣焦點」等，透過國內各種來自各種「爆料公社」網路社群媒體社團作為協力網站。如今隨著資訊技術的應用，無論是社群網站或是即時通訊軟體，都已成為國人平日生活的資訊來源與社交活動重心。鑑於網際網路具備匿名性與傳播快速等異於傳統媒體的特性，化被動為主動，將過去應用在心理戰的戰術行為，配合資訊網路擴展心戰的效果，經過精心設計的文宣配合特定的群組發送，更能達成煽動和分化的目的，且其破壞力絕不低於武器裝備。

綜觀中共軍演假訊息操弄事件中，多則中共軍機鳥瞰澎湖、共軍武力集結往福建未經證實的影像，以及集結廈門等影像和傳言，引發民眾焦慮。許多媒體在未經證實、未請專家協助解讀的情況下，僅提及「未經官方證實」，卻大篇幅報導和流傳這些影像。這些資訊內容看似有憑有據，但可能都已經被扭曲，特別是在一般人為了獲得最資訊、最需要依賴專家權威的時候，很容易就落入認知作戰操弄圈套，國人如果沒有獨立思考與分辨能力，很容易受到影響。隨著議題在網路持續被特定團體操作與重塑，網路論述會有傾向於對立、極化的情況。如此情況也導致有心人士可乘之機，透過運用假訊息激化原已對立分歧的網路溝通情境，讓相互溝通更加不易，甚至導致不同立場、陣營者拒絕溝通，深化彼此間的隔閡與仇視。

進言之，中共軍演相關的假訊息大概有2個方式可以簡易破解。首先，透由檢視武力集結影片可發現破綻。觀測這一波共軍武力集結的影像和傳言，從影片中，可以觀測到多則「武力集結」的影像並不是近期的演習事件，從軍隊穿著有長袖和短袖，季節不一致，從影片中的街景，可判斷並不是在同一區域，應屬於剪輯自其他時間點、不同的演習事件，是移花接木型的假訊息，用意是恫嚇民眾，動搖對國軍信心。第二個方法是，民眾需辨別軍事傳言的消息出處。以中共軍事資訊來說，要先辨認是從共軍官方發布出來的傳言，還是民眾在路上「目擊」的影像。若是共軍發布資訊，通常會透過共軍官方微博帳號、央視新聞發布。

總體來說，中共運用軍演對臺遂行網攻與認知作戰，一方面驗證將來對灰色地帶衝突的可行性與途徑，另方面也藉機觀察國人對認知作戰與假訊息的抵抗力。同時也反應讓我國民眾短期間內意識到加強媒體識讀與全民心防，以提升臺灣的整體戰備與心理認知韌性之重要。而民眾要養成破解認知作戰的心法，需具備3個要件：首先未經查證的軍事恫嚇消息，不要轉傳；其次，善於利用事實查核中心、LINE聊天機器人等資源，由專業機構進行查核；第三，比對主流媒體報導和官方訊息，讓真、假訊息有機會相互比對。唯有提升數位素養，發展民眾抵抗假訊息的重要抗體，才能在假訊息充斥的認知戰場，捍衛我國的民主穩定社會。

貳

區域安全 Regional Security

A decorative horizontal band of light gray, stylized wavy lines, resembling traditional East Asian cloud or water motifs, positioned behind the 'Regional Security' text.

印太戰略發展與美「中」競爭關係分析

An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US Indo-Pacific Strategy and the US-China Competition

徐筱琦 (Hsu, Hsiao-Chi)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副教授

摘 要

隨著大國競爭關係的白熱化，印太地區的地緣重要性也日趨重要。為了回應「中國」影響力擴張對其戰略利益可能造成的挑戰，美國自歐巴馬（Barak Obama）政府（2009-2016）開始逐漸將外交戰略的重點由中東轉向亞太地區。川普（Donald Trump）總統（2017-2020）上任後將歐巴馬的亞太戰略進一步向南亞延伸、並提出印太戰略的概念，現任總統拜登（Joe Biden, 2021—）的執政團隊則延續此一概念，但在內涵方面有所調整與擴大。華盛頓的戰略規劃是希望透過強化與亞太/印太區域國家的關係來抗衡「中國」的外交擴張，並避免現有的區域秩序受到改變、進而削弱美國的權力地位。隨著拜登政府的任期已進入第二年，其戰略內容也逐漸清晰，加上今年適逢中共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即將舉行，若無意外，習近平應會順利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並於2023年大陸兩會召開時，順利連任國家主席職位，在這個重要的時間點前後，華盛頓與北京勢必都會更加致力在雙方的權力競逐中取得更有利的位置。因此，本文希望嘗試針對拜登政府印太戰略的內涵以及實際政策行為進行分析，以衡量其所具有的優勢以及不足之處、以及對於臺灣對外策略思考的意涵。

關鍵字：印太戰略、四方安全對話、美「中」關係、區域安全

壹、從亞太到印太的戰略發展

美國的印太戰略架構在川普任內逐步成形，從初期的政策倡議到戰略目標與政策的確立，其內涵隨著國際政經局勢的變遷而不斷調整，涉及的對象與議題範圍也逐步擴大，在本節中將首先回顧近二十年來美國戰略焦點轉向的過程，以說明印太戰略概念崛起的背景脈絡。

早在20世紀的最後幾年，華盛頓政治圈中便有部分人士對於「中國」的持續發展在未來可能對美國造成的挑戰感到不安。小布希（George W. Bush）總統上任之初也曾經嘗試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者」，而非柯林頓政府眼中的「戰略夥伴關係」，但2001年9月11日發生的恐怖攻擊事件大幅改變了其政策走向。¹ 911恐攻後，小布希政府將打擊恐怖組織與恐怖主義活動視為國家安全政策的優先目標，而同年發動的阿富汗戰爭與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更使得中東地區成為美國的戰略利益重心。直到2009年歐巴馬總統上任後，才重新開始重視亞洲地區的重要性，以因應「中國」在亞洲地區日益升高的影響力。此一戰略轉向，後來被歐巴馬政府定調為「亞太再平衡」（Rebalance to Asia and the Pacific），強調美國將持續在此一地區扮演重要角色，以「強化區域穩定與安全、透過開放與透明的體制促進貿易與商務交流、並確保普世權利以及自由受到尊重」。² 川普上任之後，將區域重心從「亞太」進一步擴大為「印太」，並由時任國務卿提勒森（Rex Tillerson）在2017年首度拋出由美國與印度共同推動「自由與開放的印太區域」之概念，並強調日本與澳洲這兩個印太地區的民主國家是重要的合作對象。³ 其後，印太戰略的具體架構逐漸成形，並在2019年五角大廈所公布的「印太戰略報告」（*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中做了較為完整的討論。這份文件在一開始便明確指名印太區域是對於美國未來而言「最為重要的地區」（the single most consequential region for America's future）⁴，並進一步說明美國針對「自由」與「開放」兩個概念之具體願景。前者強調所有區域內國家皆應有權利在不受其他國家脅迫下行使自身主權；後者則主張所有區域內國家皆應擁有使用公有水域、空域、網路以及外太空的權利，並且能夠透過和平方式解決領土與海洋爭端，以及在經濟活動方面有權追求公平

1 David Shambaugh，黃中憲譯，*中美爭霸：兩強相遇東南亞*（臺北：時報文化，2021年9月7日），頁123。

2 原文為：「...to enhance stability and security, facilitate trade and commerce through an open and transparent system, and ensure respect for universal rights and freedoms」。請見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ebruary 2015), visited date, 2022/7/3,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docs/2015_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_2.pdf, p.24.

3 李大中，「川普的印太戰略與美中戰略競爭」，*軍事社會科學專刊*（臺北），第15卷（2019年8月1日），頁5。

4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 (June 1, 2019), visited date, 2022/7/30,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Jul/01/2002152311/-1/-1/1/DEPARTMENT-OF-DEFENSE-INDO-PACIFIC-STRATEGY-REPORT-2019.PDF>, p.1.

與互惠的貿易、開放的投資環境與透明的國際協議。⁵ 此外，報告中更直接將「中國」視為「修正主義強權」（revisionist power），與俄羅斯與北韓並列為威脅區域安全的主要國家。在具體因應策略方面，這份「印太戰略報告」說明將透過提升軍事安全準備（preparedness）、建立夥伴關係（partnerships）以及強化區域網絡連結（promotion of a networked region）等方式來應對潛在挑戰。此前國防部也已於2018年5月將原本的太平洋司令部（U.S. Pacific Command）更名為印太司令部（U.S. Indo-Pacific Command），以更切合新的戰略規劃。

除了軍事安全策略，川普政府也嘗試從經濟層面著手提高美國區域影響力，其中最受到矚目的是2018年由國會通過的「善用投資導引開發法案」（Better Utilization of Investment Leading to Development）。該法案之目的在於整合國內對外援助資源，以更有效率地向印太發展「中國」家進行投資與貸款。此舉欲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相互抗衡的意味顯著。⁶ 在由國防部的「印太戰略報告」中也強調經濟安全即國家安全的主張，⁷ 可以看出川普政府已將經貿政策做為整體國家戰略的一部分。大約三個月後，美國國務院也發布了一份名為「自由與開放的印太：促進共同願景」（*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dvancing a Shared Vision*）的報告，⁸ 這份文件對於「中國」的論述明顯較為溫和、也未特別強調「中國」對於區域秩序的威脅，而是更加著重於美國與印太地區國家的合作上，包括持續強化雙邊關係、支持東協發展、促進區域經貿公平交流、提供發展中國家更多投資機會與援助措施等。其中一項名為「藍點網絡計畫」（Blue Dot Network）的政策，更指出未來將在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U.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與其他國家公、私部門的合作下，共同推動「市場導向、透明且財務永續的基礎建設計畫，更是明顯挑戰了「一帶一路」倡議的全球基建投資布局。

然而，雖然川普政府為印太戰略的政策方向奠定了基礎，但在執行面上卻很難對其成效加以評估。這一方面是因為川普個人的施政特質，使得美國在執行外交政策時經常與區域夥伴甚至盟友發生摩擦（例如要求日本以及南韓提高對於美國駐軍的分攤費用、或是利用提高關稅等手段要求貿易讓步），加上總統本人對於多邊協定與國際組織的缺乏重視，嚴重影響了許多國家對於美國的信任度與好感度。另一方面，隨著「中

5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 p.4.

6 徐遵慈、洪晨陞，「美國對外援助政策之最新發展與臺美推動援外合作之前景」（2019年10月24日），2022年8月2日下載，〈中華經濟研究院〉，<https://web.wtoecenter.org.tw/Page.aspx?pid=331022&nid=68>。

7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 p.4.

8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dvancing a Shared Vision* (November 4, 2019), visited date, 2022/7/31, <https://www.state.gov/a-free-and-open-indo-pacific-advancing-a-shared-vision/>.

國」影響力的不斷提高，許多印太地區國家皆已與其建立了密切的經貿、投資等依賴關係，印太戰略在此一方面尚不足以扭轉此一結構。而川普執政的最後一年在新冠疫情以及總統大選的雙重挑戰之下，施政目標更加聚焦在國內政治上，之後的連任失利也使其無法進一步執行規劃的政策目標。2021年拜登接任總統之後，在外交政策上延續了印太戰略的概念，但在政策內涵上有所調整。在下一節中，本文將針對拜登政府的印太戰略加以檢視與分析。

貳、拜登的印太戰略內涵

在2020年美國總統競選期間，有許多人擔憂若是拜登勝選是否將會翻轉川普政府對「中國」的強硬態度，但也有相當多人認為美「中」抗衡的格局已定，無論是誰執政都不可能進行大幅度的政策改變—拜登上任後的政策行動證實了後者的看法。首先，新任國務卿布林肯（Anthony Blinken）與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在1月初便聯袂訪問日本與南韓，並分別與兩國的外交部長以及國防部長舉行「2+2會談」，宣示美一日與美—韓同盟關係的穩固以及對於區域安全的共同願景。⁹其次，拜登政府在3月初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暫行指南」（*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中，延續川普政府將「中國」視為競爭對象的立場。¹⁰這份指南中列出了美國所面臨的嚴峻挑戰，包括：1. 跨國疾病傳染、氣候變遷、網路安全、全球經濟風險、恐怖與極端主義攻擊、核武擴散等；2. 來自各方對全球民主政體的挑戰；3. 全球權力分配結構變化所帶來的威脅，包含更加強勢的「中國」、持續擴大影響力的俄羅斯、嘗試發展核武等軍事科技的伊朗以及北韓等區域國家；4. 科技快速變革所帶來的機會與挑戰。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權力挑戰一項，該文件特別指出「中國」是唯一一個有能力整合經濟、外交、軍事以及科技能力以挑戰國際體系之穩定與開放性的國家。¹¹而為了因應上述挑戰，該份指南同樣強調美國應該致力自身力量以及強化與同盟、夥伴國家的合作。與川普政府不同的是，文件中言明了美國重新積極參與國際制度與組織的重要性。有學者認為這份指南戰略具有「外交優先、多邊主義、鬥而不破的競合關係」三大特色，¹²反映出拜登政府在將「中國」視為最主要的競爭對手之餘，亦希望能夠保有雙方對話與合作的空間。

9 雖然在美韓「2+2」會談中，兩國對於安全威脅的來源以及共同主張有較多的歧見，但雙方皆對於持續加強安全合作具有共識。

10 The White House,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March 2021), visited date: 2022/7/31,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11 The White House,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p. 7-9.

12 陳煜，「拜登首份國安報告曝！學者指「4大看點」：對付中國要靠三招」（2021年3月15日），2022年8月2日下載，〈風傳媒〉，<https://www.storm.mg/article/3537578>。

而在持續推展以印太地區主的戰略方面，拜登在3月12日透過視訊與日本、澳洲、印度等三國領袖舉行了「四方安全對話」，討論如何共同應對新冠病毒疫情、氣候變遷以及區域安全威脅等挑戰。¹³ 這次視訊會議的亮點之一，是其中有相當大的篇幅聚焦在探討如何透過跨國合作因應新冠疫情發展，並提出了疫苗合作的倡議。為了因應全球疫情持續上升、但許多國家卻依舊深受疫苗短缺之苦的困境，四國領導人提出了疫苗合作計畫的構想，包括在印度擴大建立安全有效的生產設備、透過與世界衛生組織（WHO）以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苗實施計畫」（COVAX）的合作以協助印太地區國家取得並施打疫苗，該計畫預計在2022年底為印太地區的國家提供10億劑疫苗。¹⁴ 時值新冠疫情延燒以及「中國」持續透過疫苗商業合約與捐贈建立全球公衛影響力之際，此項計畫明顯具有與「中國」疫苗外交較勁的意涵，¹⁵ 美國與日本也自該年6月開始積極展開對外疫苗捐贈計畫。9月24日，「印太四方安全對話」舉行首度實體峰會，在會中除了延續3月12日視訊會議提到的合作領域之外，有鑒於疫情造成全球物流阻礙以及日益升高的美「中」競爭情勢，也討論了關於如何在「疫苗、氣候變遷、供應鏈以及潔淨能源以及太空領域」等方面之議題。¹⁶ 四國並於10月上旬在孟加拉灣舉行「馬拉巴爾聯合海戰軍事演習」的第二階段，由於這是四國首次共同參與軍事活動，象徵意味濃厚。¹⁷

從上述發展中可以觀察到，拜登的執政團隊一方面延續印太戰略的概念，另一方面則在內涵上有所調整，不再刻意強調美國優先、而是更加著重在透過積極對話以及雙邊與多邊同步推展的外交工作來重建印太區域國家對美國的信任度與合作意願，¹⁸ 並將重點議題擴大至公共衛生、氣候變遷與供應鏈安全等諸多領域，以創造更多合作機會。另一項與川普印太戰略不同之處，在於拜登政府除了加強印太地區國家的交流與合作之外，也積極說服其他西方國家共同參與抗衡「中國崛起」對於印太區域秩序的挑戰。例如，2021年6月七大工業國組織（G7）高峰會首次針對臺海以及南海問題表達關切，並

13 'Quad Leaders' Joint Statement: "The Spirit of the Quad" (March 12, 2021), visited date 2022/8/1, 《The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3/12/quad-leaders-joint-statement-the-spirit-of-the-quad/>.

14 'Fact Sheet: Quad Summit', visited date 2022/8/1, 《The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3/12/fact-sheet-quad-summit/>.

15 中國自2020年8月開始與許多國家簽訂疫苗合約，並於2021年年初開始積極出口疫苗，其中包含針對有需求國家的無償援助。邱國強，「打疫苗外交 中國：無償援助53國售予27國」（2021年2月23日），2022年8月2日下載，《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2102230281.aspx>。

16 馮昭，「四方安全對話聲明 美日澳印關切印太安全、海洋秩序挑戰」（2021年9月25日），2022年8月2日下載，《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109250071.aspx>。

17 綜合外電報導、施施譯，「四方對話馬拉巴爾軍演第2階段 12日孟加拉灣登場」，2022年8月2日下載，《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110110154.aspx>。

18 陳亮智，「2021年美國拜登政府在印太區域的政策與行動」，在沈明室、劉蕭翔編，2021印太區域安全情勢評估報告（臺北：五南，2021），頁9。

強調維持「印太地區自由與開放」之重要性。隨後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以下簡稱北約）也首次在公開聲明中將「中國」列為安全威脅。¹⁹ 雖然歐洲國家對於如何同時應對「中國」的經濟重要性與外交挑戰依舊呈現明顯的意見分歧，但此一發展已顯示出未來歐洲國家參與印太事務的可能性將會逐漸升高，其中又以英國的態度最為積極。北約峰會後不久，美國、英國與澳洲便宣布成立「澳、英、美安全夥伴」（AUKUS）機制，²⁰ 強化三方在軍事與科技安全方面的合作。美國更承諾將在此架構下協助澳洲建造核動力潛艦，以強化盟國在印太地區抵禦「中國」軍事與外交擴張的能力。

除了外交與軍事安全之外，拜登政府的印太戰略也同樣考慮了從經濟面向著手應對「中國」的挑戰。主要的構想包括藉由提供印太地區國家更多的投資與援助，以抗衡「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影響力，同時尋求在關鍵的經濟與科技領域建立排除「中國」干擾的生產供應鏈。例如，2021年6月，拜登在G7高峰會上提出了「重建更美好世界夥伴關係（Build Back Better World Partnership, B3W）」的倡議，強調G7國家將致力與更多民主國家合作，以提供資金協助中、低收入國家強化基礎建設。美國將此一計畫形容為「由主要民主國家所共同領導之價值導向、高標準且透明的基礎建設夥伴關係，其主要目的為協助開發中國家因應受到疫情影響而更加惡化、總共高達40兆美元以上的基建缺口」。²¹ B3W的計畫內容涵蓋了公共衛生、良善治理、氣候變遷、潔淨能源、勞動標準等諸多標準，可以看出其欲藉此與「中國」為這些國家提供的貸款與援助做出區別。

2022年2月拜登版的「印太戰略報告」終於出爐，報告中明確指出美國印太戰略的願景是建構「自由而開放且更佳緊密連結、繁榮、安全以及具有韌性的印太區域」，²² 並針對上述目標列出了相應的策略，以下簡略摘要整理部分重點：²³

一、維持印太地區的自由與開放：

19 陳亮智，「2021年美國拜登政府在印太區域的政策與行動」，頁11。關於G7公報內容請見“Brussels Summit Communiqué” (June 14, 2021), visited date 2022/8/1, 《NATO》,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news_185000.htm.

20 陳亮智，「2021年美國拜登政府在印太區域的政策與行動」，頁11。

21 原文為：「a values-driven, high-standard, and transparent infrastructure partnership led by major democracies to help narrow the \$40+ trillion infrastructure need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which has been exacerbated by the COVID-19 pandemic.」，詳細內容請見“Fact Sheet: President Biden and G7 Leaders Launch Build Back Better World (B3w) Partnership” (June 12, 2021), download (visited) date: August 3, 2022, 《The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6/12/fact-sheet-president-biden-and-g7-leaders-launch-build-back-better-world-b3w-partnership/>.

22 原文為「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that is more connected, prosperous, secure, and resilient.」，請見The White Hous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February 2022), visited date 2022/8/3,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 p.6.

23 詳細內容請見“Fact Sheet: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February 11, 2022), visited date 2022/8/3, 《The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2/11/fact-sheet-indo-pacific-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

- (一) 投入更多資源以促進地區的民主制度、媒體自由、公民社會，並推動財政透明化以及反貪腐等相關改革；
- (二) 依據國際法治理海洋以及天空，並促進關鍵與新興技術、網際網路與資訊空間的運用與安全性。

二、緊密的區域連結：

- (一) 強化與既有同盟國家以及重要區域夥伴的合作關係²⁴；
- (二) 協助促進東南亞國協（ASEAN, 以下簡稱東協）的自主與團結發展、並強化四方安全對話國家的合作與承諾實踐；
- (三) 支持印度與太平洋島嶼國家的發展；
- (四) 連結印太與歐洲—大西洋地區；
- (五) 加強美國在印太地區、尤其是東南亞以及太平洋島嶼國家的外交行動。

三、區域繁榮：

- (一) 推動「印太經濟架構」（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以促進勞工與環境標準新貿易方式、強化數位經濟治理、建立具有韌性且安全的供應鏈、推動減碳與潔淨能源的共同投資；
- (二) 透過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促進貿易與投資的自由、公平與開放；
- (三) 透過G7國家推動的B3W計畫減少區域國家之間的基礎建設差距。

四、區域安全：

- (一) 強化綜合嚇阻（integrated deterrence）能力、並深化與同盟以及夥伴國家的合作與協同作戰能力（interoperability）；
- (二) 維持臺海和平與穩定；
- (三) 提高因應包括太空、網際空間、關鍵與新興技術競爭等進展性威脅的創新能力；
- (四) 強化與南韓以及日本的延伸嚇阻與行動協作，並推動朝鮮半島無核化；

24 同盟國家包括澳洲、日本、南韓、菲律賓與泰國，重要區域夥伴則列出了印度、印尼、馬來西亞、蒙古、紐西蘭、新加坡、台灣、越南以及太平洋島嶼國家。

(五) 持續推進AUKUS；

(六) 與國會共同合作，為「太平洋嚇阻倡議」（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以及「海上安全倡議」（Maritime Security Initiative）提供充足資金。

五、區域韌性：

(一) 與同盟及夥伴國家合作制定2030年以及2050年氣候目標、戰略、計畫與政策，以達到將地球升溫控制在攝氏1.5度以下的目標；

(二) 降低區域面對氣候變遷以及環境惡化之衝擊的脆弱性；

(三) 終結新冠疫情以及提高全球衛生安全。

若將拜登以及川普兩屆行政團隊的印太戰略相互比較，可以發現有幾個明顯不同之處。首先，拜登版的印太戰略更加強調應對「中國」威脅的必要性。在川普版的印太戰略中將「中國」、俄羅斯以及北韓列為挑戰美國安全的三個主要國家，但拜登版中卻未提到俄羅斯，並僅在第6、13以及17頁提到北韓核武相關問題。²⁵ 第二，拜登版印太戰略更加強調與同盟以及夥伴國家的合作與交往，並同時重視多邊與雙邊外交。第三，儘管兩個版本的印太戰略皆涵蓋經濟策略，但拜登版納入氣候變遷、潔淨能源等發展議題，擴大了可能的合作空間。更加明確認知到區域經濟整合的政治重要性以及區域國家對於經濟發展的重視。第四，拜登版印太戰略嘗試將大西洋與太平洋的同盟與夥伴國家加以連結，強調跨區域合作的重要性。從這四個部分加以觀察，拜登政府的印太戰略較之川普政府更加廣泛、彈性，也更強調外交互動與對話的重要性。但對於印太地區國家而言，戰略規劃是否能夠落實到實際行動才是最主要的關切重點，因此，在拜登拋出印太經濟架構的概念之後，各界便開始高度關注其具體內涵將包含哪些重點。

在各界的期待之下，拜登於2022年5月出訪亞洲期間選擇在日本東京公布了「印太經濟架構」的基本內涵，並與第一波邀請加入的12個成員國共同舉行會議及發表聲明。²⁶ 聲明中強調成員國之間對於建構一個自由、開放、公平、包容、互聯、韌性、安全以及繁榮、且有助於促成永續以及包容性的經濟發展之印太地區具有共識，²⁷ 也提出

25 Captain Sarabjeet S. Parmar, "The Us Indo-Pacific Strategy 2022: An Analysis" (March 3, 2022), visited date 2022/8/3, 《National Maritime Foundation》, <https://maritimeindia.org/the-us-indo-pacific-strategy-2022-an-analysis/>, p.1

26 目前印太經濟框架的成員國包括：美國、日本、韓國、印度、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澳洲、紐西蘭、汶萊等13個國家。

27 原文為「a free, open, fair, inclusive, interconnected, resilient, secure, and prosperous Indo-Pacific region that has the potential to achieve 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economic growth.」，請見「Statement on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May 23, 2022), visited date 2022/8/4, 《The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3/statement-on-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for-prosperity/>; "Fact Sheet: In Asia, President Biden and a Dozen Indo-Pacific Partners Launch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此一架構的四個發展支柱（pillars），包括：²⁸

1. 建立涵蓋數位經濟在內之高標準、包容、自由與公平的貿易；
2. 強化供應鏈的透明、多元、安全以及永續性：整合危機應對機制、擴大合作範圍以因應並調節經濟失序時的商業營運衝擊；增強物流系統的效率與支援；確保對於重要原料、材料、半導體、關鍵礦產與潔淨能源技術等之可取得性。
3. 乾淨能源、減碳以及基礎建設：加速潔淨能源技術的發展與應用，以建構減碳與具有因應氣候變遷韌性之經濟，以符合巴黎氣候協議目標並維持人民與勞工的生活水準。
4. 健全稅收制度與反貪腐：實施有效且健全的稅務、洗錢防制與反賄賂等制度，以杜絕印太地區的逃稅與貪污問題。

正式提出「印太經濟架構」之後，拜登政府也為此一架構的談判進程設下時間表：2023年APEC會議之前完成談判。由此可知其高度重視此一經濟策略。²⁹

「印太經濟架構」的公布讓拜登印太戰略的外交、安全以及經濟三個面向皆有了較為具體的樣貌。而此一戰略是否能夠提升美國面對「中國」時的競爭力？與川普的印太戰略相較是否具有更大的優勢？本文將在下一節中嘗試回答這些問題。

參、拜登印太戰略的前景分析

2022年發布的印太戰略報告以及印太經濟架構具體呈現出拜登政府的戰略作為包含了外交、軍事以及經濟三大面向。在外交方面，該份報告強調將提高美國在印太地區國家的外交存在（diplomatic presence）。如果從國務院高層出訪的數據來看，2021年布林肯先後出訪日本、南韓、印度、印尼、馬來西亞，副國務卿雪蔓（Wendy Sherman）則訪問了印尼、柬埔寨、泰國、印度、巴基斯坦。2022年截至8月10日，布林肯出訪了澳洲、斐濟、日本（2次）、印尼、泰國、菲律賓與柬埔寨，雪蔓則出訪南韓、菲律賓、越南、寮國、薩摩亞、東加、索羅門群島、澳洲與紐西蘭。總計在2021年的17次出

(May 23, 2022), visited date 2022/8/3, 《The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3/fact-sheet-in-asia-president-biden-and-a-dozen-indo-pacific-partners-launch-the-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for-prosperity/>.

28 “Statement on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

29 Matthew P. Goodman and Aidan Arasasingham, “Regional Perspectives on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April 2022), visited date 2022/8/4, 《CSIS》, <https://www.csis.org/analysis/regional-perspectives-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 p.1

訪當中，有三次包含了印太地區國家，而2022年1月至8月10日的15次出訪中則有4次。³⁰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在印太地區的高層級外交交流仍然以日本、南韓、澳洲、印度等國家為主，針對菲律賓、泰國與印尼以外的東協國家以及太平洋島嶼國家之外交努力仍有許多改善空間。但此一情況可能在「中國」與索羅門群島秘密簽署「安全合作協議」、以及「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於2022年5月底的10天南太平洋之旅之後有進一步的改變。例如，美國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在透過視訊於7月舉行的太平洋島國論壇發表談話時，便強調美國將致力深化與該地區國家的關係，包括籌備在東加王國以及吉里巴斯開設大使館、任命美國首位太平洋島國論壇特使、恢復派遣和平工作團（Peace Corps volunteers）等，此外，賀錦麗也表示美國將向國會要求在未來的十年之中，每年提供六千萬美元協助該地區國家之經濟發展與海洋資源韌性。³¹接著在8月初副國務卿雪蔓出訪了東加王國等太平洋島國，顯示出美國的確有意願與能力在此一地區投入更多外交資源。

在軍事方面，拜登印太戰略最重要的進展包括印太四方安全對話以及AUKUS。印太四方安全對話強調成員國持續強化軍事實力以維持自身安全以及印太地區的和平穩定的重要性。在此一背景下，美、日、印、澳於2021年共同在菲律賓海以及孟加拉灣舉行馬拉巴爾聯合軍演，由於這是四個成員國首次的聯合軍事行動，因此格外引人注目。此外，2021年9月成立的AUKUS不僅被視為西方國家在太平洋地區組建同盟以抗衡「中國」軍事擴張的重要策略，另一個重要意義的是它代表了歐洲國家對印太戰略的參與，而連結歐洲與印太盟國與夥伴正是拜登印太戰略中的重要目標之一。拜登政府同時也致力強化與印太地區盟國與夥伴的雙邊合作關係，例如透過對話交流持續強化日本對美日同盟的信心並強調日本在嚇阻「中國」對臺軍事威脅方面的重要性。³²

經濟面向的策略是印太戰略中最受期待、但也最深具挑戰的部分。拜登的「印太經濟架構」嘗試納入多元的經濟議題以提高其吸引力，並將架構中的四大支柱分開處理，成員國家可選擇全數加入或部分加入，此一作法提供了不同需求的國家選擇的彈性，顯示出拜登政府對於印太地區經濟發展的多元性具有相當程度的了解。然而，此一彈性安排在實務上依舊存在許多不足之處，例如美國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的一份研究報告中即指出雖然印太地區國家對於拜登政府重啟經濟交往大多抱持著歡迎的態度，然而對於後者應該扮演的

30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以及副國務卿雪蔓的出訪資料請見下列美國國務院網頁：<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of-states-travel/>; <https://www.state.gov/deputy-secretary-of-states-travel/>。

31 “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Harris at the Pacific Islands Forum” (July 12, 2022), visited date 2022/8/5, 《The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7/12/remarks-by-vice-president-harris-at-the-pacific-islands-forum/>。

32 Andrew Nathan, “What Exactly Is America’s China Policy?” (April 4, 2022), visited date 2022/8/9, 《Foreign Policy》,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4/14/us-china-biden-strategy-geopolitics/>。

角色以及提供的政策內涵，這些國家的想法卻與華盛頓有明顯的落差。首先，報告中接受訪談的許多官員表示與美國重返「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相較，「印太經濟架構」所提供的吸引力依舊屬於次佳的選項。其次，他們希望「印太經濟架構」能夠具有足夠的包容性，能夠對區域內所有不同地理、經濟以及發展情況的國家開放。第三，鑒於過去的經驗，印太國家對於美國是否能夠妥善處理好自身國內不同部門之間的權力安排與協調問題，以提供更清楚精確的談判進程規劃感到疑慮；第四，受訪的各國官員也表示雖然「印太經濟架構」是以「行政協定」（executive agreements）的方式進行、因此不需經過美國國會批准，但部分印太地區國家依然需要經過國內立法機構的審查，如果協定的內容無法提供具體的經濟利益，其吸引力恐怕會大打折扣，特別是大部分印太地區國家都已經擁有一個以上的區域貿易協定會員身份。其中，有受訪官員尤其關切美國不打算在傳統與數位貿易相關協定中提供市場開放的作法，認為此舉與區域國家的經濟需要背道而馳。第四，部分受訪官員對於美國推出「印太經濟架構」的政治目的感到憂心：雖然印太地區國家了解美「中」競爭的戰略需求，但卻未必願意被直接捲入抗衡「中國」的棋局當中。最後，受訪官員也對「印太經濟架構」的可持續性抱持懷疑，擔心未來美國行政權政黨輪替可能帶來的影響。³³ 當「印太經濟架構」的內容正式公布後，雖然參與國對於架構中的部分面向如供應鏈安全、氣候變遷等表達興趣，但許多國家也對美國不準備將開放市場納入談判內容表達失望之意。³⁴

綜合上述分析，拜登的印太戰略整體而言對於區域國家具有相當程度的吸引力：大部分國家歡迎美國更多的外交投入所帶來的關注與資源、傳統盟國與合作夥伴樂意透過進一步合作提升自身與區域防禦能力，但未來印太安全對話以及AUKUS是否能夠持續推進，仍然需要時間觀察；經濟方面，「印太經濟架構」中的供應鏈韌性、潔淨能源/減碳/基礎建設等內涵，有助於促進國家與區域經濟發展及環境永續性，但貿易以及稅制/反貪腐兩項則未必能夠受到多數成員國青睞。然而，對於印太地區國家而言，如何維持區域穩定以及在美「中」大國競爭之間的避險角色，仍然是極為重要的國家利益，因此在參與印太戰略相關合作之時，是否會引起「中國」的強烈反應也會是許多印太區域國家考量重點。

33 Goodman and Arasasingham, “Regional Perspectives on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p. 2-6.

34 Tobias Harris and Trevor Sutton, “Biden’s Economic Plan Leaves Asian Leaders Wanting More” (May 27, 2022), visited date 2022/8/9, 《Foreign Policy》,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5/27/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ipef-biden-asia-trade/>.

肆、從俄烏戰爭與裴洛西訪臺看印太國家的外交反應

2022年在歐洲與東亞分別發生的兩件重大衝突—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及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訪問臺灣後的大陸環臺軍演—提供了觀察印太國家外交態度的重要案例。2月底俄羅斯出兵烏克蘭之後，許多西方國家紛紛對其祭出經濟制裁，聯合國大會、安理會以及人權理事會也針對俄羅斯的行動進行多次譴責、停權等投票案。然而即使在美國的強力呼籲之下，除了日本、澳洲、紐西蘭、新加坡、南韓以及臺灣之外，多數印太地區的國家在此一事件中並未積極回應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與譴責。³⁵ 印度是最明顯、也最常被提出討論的一個例子。雖然印度身為印太四方安全對話成員，但在外交上始終拒絕明確針對俄羅斯的軍事行動加以譴責、亦未參與相關的制裁行動或在投票支持與俄羅斯相關的聯合國議案。除了印度之外，汶萊、印尼、馬來西亞、越南、泰國、菲律賓以及太平洋島嶼國家也未加入西方國家的制裁行列。這些國家不願意強硬表態的原因，除了個別國家與俄羅斯的能源或軍事關係之外，「中國」與俄羅斯日益密切的關係也是一個重要的考量。³⁶

另一個值得觀察的事件是8月2日裴洛西訪臺的後續效應。在裴洛西有意訪問臺灣的消息傳出之後，「中國」官方便透過多種不同管道表達強烈的反對以及警告。在美「中」以及臺海兩岸緊張關係逐漸升溫之際，拜登也一度以「美國軍方認為現在不是好主意」間接表達對此事的關切，³⁷ 但之後便未再對此事表達贊成或反對之立場。最終裴洛西在結束馬來西亞的訪問後搭機前往臺灣，美國也為此在臺海附近部署航母與軍機確保其行程之安全性。³⁸ 裴洛西專機在2日晚間抵達松山機場後，「中國」旋即宣布共軍將於4日中午12時開始，在臺灣周圍的六個海域進行為期3天的實彈演習，此次演習的區域範圍較之1996年臺海危機時更大，距離臺灣本島的位置也更近，形成由四面對臺灣進行包圍的情勢。³⁹ 由於軍演的範圍廣大、且在軍演期間其軍艦與軍機曾數度越過臺灣海峽中線，因此引發國際的高度關注。美國對此加以譴責，G7成員國外長以及美、日、澳三國外長也發布聯合聲明，呼籲「中國」應透過和平方式解決爭端。⁴⁰ 值得注意的

35 Derek Grossman, "Why Most of the Indo-Pacific Tiptoes around Russia" (April 7, 2022), visited date 2022/8/10, *Rand Corporation*, <https://www.rand.org/blog/2022/04/why-most-of-the-indo-pacific-tiptoes-around-russia.html>.

36 Grossman, "Why Most of the Indo-Pacific Tiptoes around Russia".

37 江今葉，「談裴洛西訪台 拜登：軍方認為現在不是好主意」（2022年7月21日），2022年8月9日下載，《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207210015.aspx>。

38 楊英宜，「裴洛西擬明晚訪台 美國就近部署航艦軍機保護」（2022年8月1日），2022年8月9日下載，《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4011058>。

39 廖漢原，「共軍演訓範圍大於96年台海危機 部分侵犯台灣領海」（2022年8月3日），2022年8月9日下載，《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news/aipl/202208030007.aspx>。

40 陳正健，「G7外長聯合聲明關切中共軍演 籲確保台海和平穩定」（2022年8月4日），2022年8月9日下載，

是，此次共軍圍臺演習期間正逢東協外長會議在柬埔寨舉辦，除了東協十國之外，美、中、俄、日、英、澳亦出席參與東亞高峰會。由於日本外相林芳正在東亞高峰會演說中譴責共軍飛彈演習對區域穩定以及日本造成威脅，因此引發「中國」與俄羅斯以中途離席的方式表達不滿。針對軍演造成的緊張態勢，東協國家僅呼籲克制、並重申「一個中國」原則。南韓總統尹錫悅也為了避免爭議而選擇在裴洛西離臺前往首爾訪問時不與其見面。⁴¹ 印度則遲至8月12日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中才針對軍演行動表達「各方克制、勿改變現狀」的呼籲。⁴² 在太平洋島嶼國家方面，僅有馬紹爾群島共和國針對共軍軍演加以譴責。此一事件再一次顯示出印太國家致力捲入美「中」衝突以及不希望區域衝突影響經濟發展前景的態度。⁴³

伍、前景與挑戰

透過俄烏衝突以及「中國」環臺軍演兩個事件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雖然美國自從歐巴馬政府開始便逐步將地緣戰略重心轉向亞太與印太區域，然而與冷戰期間的美蘇對峙不同，多數印太區域國家雖然希望美國的參與能夠提供更多元的外交選項，但卻未必對於「中國」的影響力抱持負面態度。換句話說，對於區域內國家而言，最重要的是如何透過與美、「中」的交往促進自身國家發展，同時能在大國競爭之間趨吉避凶。因此，無論哪一任美國政府，都必須更加充分地理解到這一點，將美國與印太國家的交往本身視為政策目標、而非為了抗衡「中國」影響力的籌碼，如此才能夠真正提升印太地區國家的信任感與合作意願，並在此一發展之下真正強化美國的競爭優勢。事實上，川普政府時期國務院版本的印太戰略報告中就提到：「美國的印太願景不排除任何國家，也不會要求其他國家在夥伴的選擇上必須二選一」。⁴⁴ 如何在實務上落實此一承諾，至關重要。正如美國智庫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研究報告指出，對於維繫全球領導

《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208040003.aspx>。；楊日興，「美日澳外長聯合聲明 籲中國應立即停止軍演」（2022年8月6日），2022年8月9日下載，《工商時報》，<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20806003529-260410?chdtv>。

41 Sarah Zheng and Philip Heijmans, “Pelosi Trip Sets Back Biden’s Effort to Woo Asia against China” (August 9, 2022), visited date 2022/8/10, 《Bloomberg》,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2-08-09/pelosi-trip-hinders-biden-effort-to-galvanize-asia-against-china>.

42 林行健，「台海情勢緊張 印度籲克制勿改變現狀」（2022年8月12日），2022年8月13日下載（或瀏覽），《聯合報》，<https://udn.com/news/story/10930/6533533>。

43 Thi Mai Anh Nguyen, “Pelosi’s Visit to Taiwan Creates a Headache for Asean Countries” (August 5, 2022), visited date 2022/8/10, 《The Diplomat》,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8/pelosis-visit-to-taiwan-creates-a-headache-for-asean-countries/>.

44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dvancing a Shared Vision*, p.6.

地位而言，真正重要的是地緣經濟、而非地緣政治的競爭，⁴⁵當然也不會是立基於道德或價值的競爭。例如現實主義學者華特（Stephen Walt）就曾指出，美國在權力競爭下的外交政策若只強調民主與對抗威權的重要性等價值導向（value-driven）的論述是不夠的，真正的策略必須包含根據自身經濟與安全利益目標來設定具體的政策步驟。⁴⁶華特的建議不僅適用於美國對自身核心利益與戰略的思考，更可以作為華盛頓深入了解印太區域國家利益需求的切入點，以便更務實地推動印太戰略相關政策。

除了從務實的角度去真正理解印太區域國家的需求之外，拜登印太戰略成功與否的另一個重要挑戰是美國的國內政治。2016年川普的崛起代表了美國民眾對於自身經濟狀況以及伴隨著全球化而來的經濟衝擊的不滿，深刻意識到這一點的拜登團隊在競選時即大力強調未來美國在外交以及對外經貿事務上，將更重視爭取國內支持的重要性。執政後此一國內趨勢與政策宣示卻也成為拜登政府推展外交工作的重要挑戰：如何爭取國內民意對於擴大外交、軍事與經貿交流的支持。這當中又以經貿議題更為敏感，當拜登承諾將不會在缺乏國內共識的情況下推動新的對外貿易談判，便已為美國希望透過雙邊經濟誘因或多邊經濟框架來吸引印太國家支持的策略立下一個極難跨越的障礙。因此，拜登提出的經濟架構或政策優惠在國內是否能夠獲得充分支持，將影響到印太國家與之合作或談判的意願。簡言之，美國在推動印太戰略時如何同時做好國內說服的工作，是一大挑戰。最後，是印太地區國家對於美國軍事能力與決心的信心。拜登政府在其戰略文件中明確指出美國政府積極參與印太事務的目標，但在軍事行動方面卻缺乏具體的策略規劃，加之拜登政府早已宣告美國將不會再介入耗費大量人力與物力的永恆戰爭（forever wars），⁴⁷此種立場是否會成為美國強化在印太地區的軍事領導力的阻礙，值得繼續觀察。

雖然從近期的兩個衝突事件中可以觀察到美國針對俄羅斯以及「中國」的立場皆未能獲得多數印太地區國家的正面支持，但拜登政府嘗試重建在此一地區的外交能量的努力依舊是值得期待的。正如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在其研究中所言，由於長期以來美國在東南亞以及南亞的外交投入經常具有「忽冷忽熱」的不連貫性（例如川普政府對此一地區時而積極時而忽略的態度），⁴⁸因此這些國家即使樂見美國在此一地區的「現身」，但對於相關政策的可持續性並不信任。他建議美國政府應該「大幅提高東南

45 James Dobbins, Howard J. Shatz, and Ali Wyne, "Russia Is a Rogue, Not a Peer; China Is a Peer, Not a Rogue: Different Challenges, Different Responses" (October 2018), visited date 2022/8/10, 《Rand Corporation》, <https://www.rand.org/pubs/perspectives/PE310.html>, p.2

46 Stephen M. Walt, "Biden Needs Architects, Not Mechanics, to Fix U.S. Foreign Policy" (July 12, 2022), visited date 2022/7/23, 《Foreign Policy》,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7/12/biden-foreign-policy-outdated-groupthink/>.

47 The White House,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p. 15.

48 David Shambaugh, 黃中憲譯，*中美爭霸：兩強相遇東南亞*，頁138。

亞在美國對亞洲、對全球外交政策裡的戰略順位」，且「與此地區保持穩定、支持、交往的關係」，以便在這些國家有需要時能夠即時給予支持。⁴⁹ 雖然沈大偉的建議是針對東南亞，但包括南亞、太平洋島嶼國家的情況亦同樣適用。以近期太平洋島嶼國家對於美國擴大交往的表態的正面態度為例，可以看出外交耕耘的重要性，雖然短期內未必能有改變區域國家既有外交偏好的效果，但長期而言依然值得期待。

對於臺灣而言，了解到美國印太戰略的優勢與限制、以及印太國家的外交政策立場與偏好是相當重要的。身處在地緣衝突機率相當高的臺海地區，爭取美國的安全保障固然重要，但周邊國家的支持—即使是間接的—亦不容忽視，尤其是臺灣也希望能夠透過加深與東南亞的鏈結來分散經貿投資的風險。因此，我們同樣必須意識到印太地區國家重視經濟發展而在外交上希望維持中立與穩定的立場，才能提高對外交往的外交吸引力。

49 David Shambaugh，黃中憲譯，**中美爭霸：兩強相遇東南亞**，頁408。

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

專書

David Shambaugh著，黃中憲譯。2021。中美爭霸：兩強相遇東南亞 (Where Great Powers Meet: America and China in Southeast Asia)。臺北:時報文化。

網際網路

江今葉。2022/7/21。「談裴洛西訪台 拜登：軍方認為現在不是好主意」，《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207210015.aspx>>。

李大中。2019/8/1。「川普的印太戰略與美中戰略競爭」，《軍事社會科學專刊》（臺北），第15期，頁3-14。

林行健。2022/8/12。「台海情勢緊張 印度籲克制勿改變現狀」，《聯合報》，<<https://udn.com/news/story/10930/6533533>>。

邱國強。2021/2/23。「打疫苗外交 中國：無償援助53國售予27國」，《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2102230281.aspx>>。

施施譯。2021/10/11。「四方對話馬拉巴爾軍演第2階段 12日孟加拉灣登場」，《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110110154.aspx>>。

徐遵慈、洪晨陞。2019/10/24。「美國對外援助政策之最新發展與臺美推動援外合作之前景」，《中華經濟研究院》，<<https://web.wtcenter.org.tw/Page.aspx?pid=331022&nid=68>>。

陳正健。2022/8/4。「G7外長聯合聲明關切中共軍演 籲確保台海和平穩定」，《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208040003.aspx>>。

陳亮智。2021。「2021年美國拜登政府在印太區域的政策與行動」，沈明室、劉蕭翔主編，2021印太區域安全情勢評估報告。臺北: 五南。頁5-14。

陳煜。2021/3/15。「拜登首份國安報告曝！學者指「4大看點」：對付中國要靠三招」，《風傳媒》，<<https://www.storm.mg/article/3537578>>。

馮昭。2021/9/25。「四方安全對話聲明 美日澳印關切印太安全、海洋秩序挑戰」，《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109250071.aspx>>。

楊日興。2022/8/6。「美日澳外長聯合聲明 籲中國應立即停止軍演」，《工商時報》，<<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20806003529-260410?chdtv>>。

楊芙宜。2022/8/1。「裴洛西擬明晚訪台 美國就近部署航艦軍機保護」，《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4011058>>。

廖漢原。2022/8/3。「共軍演訓範圍大於96年台海危機 部分侵犯台灣領海」，《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news/aip/202208030007.aspx>>。

英文部分

專書

David Shambaugh著，黃中憲譯，2021。中美爭霸：兩強相遇東南亞 (Where Great Powers Meet: America and China in Southeast Asia)。臺北：時報文化。

網際網路

Dobbins, James, Howard J. Shatz & Ali Wyne, 2018/10. “Russia Is a Rogue, Not a Peer; China Is a Peer, Not a Rogue: Different Challenges, Different Responses,” *Rand Corporation*, <<https://www.rand.org/pubs/perspectives/PE310.html>>.

Goodman, Matthew P. & Aidan Arasasingham, 2022/4. “Regional Perspectives on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CSIS*, <<https://www.csis.org/analysis/regional-perspectives-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

Grossman, Derek, 2022/4/7. “Why Most of the Indo-Pacific Tiptoes around Russia,” *Rand Corporation*, <<https://www.rand.org/blog/2022/04/why-most-of-the-indo-pacific-tiptoes-around-russia.html>>.

Harris, Tobias & Trevor Sutton, 2022/5/27. “Biden’s Economic Plan Leaves Asian Leaders Wanting More,” *Foreign Policy*,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5/27/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ipef-biden-asia-trade/>>.

Parmar, Sarabjeet S., 2022/3/3. “The Us Indo-Pacific Strategy 2022: An Analysis,” *National Maritime Foundation*, <<https://maritimeindia.org/the-us-indo-pacific-strategy-2022-an-analysis/>>.

Nathan, Andrew, 2022/4/4. “What Exactly Is America’s China Policy?” *Foreign Policy*,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4/14/us-china-biden-strategy-geopolitics/>>.

NATO. 2021/6/14. “Brussels Summit Communiqué,”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news_185000.htm>.

Nguyen, Thi Mai Anh. 2022/8/5. “Pelosi’s Visit to Taiwan Creates a Headache for Asean Countries,” *The Diplomat*,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8/pelosis-visit-to-taiwan-creates-a-headache-for-asean-countries/>>.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9/6/1.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 Washington: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Jul/01/2002152311/-1/-1/1/DEPARTMENT-OF-DEFENSE-INDO-PACIFIC-STRATEGY-REPORT-2019.PDF>>.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9/11/4.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dvancing a Shared Vision*. Washingto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www.state.gov/a-free-and-open-indo-pacific-advancing-a-shared-vision/>>.

The White House. 2015/2.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Washington: The White House,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docs/2015_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_2.pdf>.

- The White House. 2021/3.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Washington: *The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 The White House. 2021/3/12. “Quad Leaders’ Joint Statement: ‘The Spirit of the Quad’,” *The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3/12/quad-leaders-joint-statement-the-spirit-of-the-quad/>>.
- The White House. 2021/3/12. “Fact Sheet: Quad Summit,” *The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3/12/fact-sheet-quad-summit/>>.
- The White House. 2021/6/12. “Fact Sheet: President Biden and G7 Leaders Launch Build Back Better World (B3w) Partnership,” *The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6/12/fact-sheet-president-biden-and-g7-leaders-launch-build-back-better-world-b3w-partnership/>>.
- The White House. 2022/2.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The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
- The White House. 2022/2/11. “Fact Sheet: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2/11/fact-sheet-indo-pacific-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
- The White House. 2022/5/23. “Statement on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The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3/statement-on-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for-prosperity/>>.
- The White House. 2022/5/23. “Fact Sheet: In Asia, President Biden and a Dozen Indo-Pacific Partners Launch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The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3/fact-sheet-in-asia-president-biden-and-a-dozen-indo-pacific-partners-launch-the-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for-prosperity/>>.
- The White House. 2022/7/12. “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Harris at the Pacific Islands Forum,” *The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7/12/remarks-by-vice-president-harris-at-the-pacific-islands-forum/>>.
- Walt, Stephen M.. 2022/7/12. “Biden Needs Architects, Not Mechanics, to Fix U.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7/12/biden-foreign-policy-outdated-groupthink/>>.
- Zheng, Sarah & Philip Heijmans. 2022/8/9. “Pelosi Trip Sets Back Biden’s Effort to Woo Asia against China,” *Bloomberg*,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2-08-09/pelosi-trip-hinders-biden-effort-to-galvanize-asia-against-china>>.

與談稿

「印太戰略發展與美『中』競爭關係分析」 與談稿

A Response to "An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US Indo-Pacific Strategy and the US-China Competition"

王尊彥 (Wang, Tsun-yen)

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員

評論部分

評價：主題訂定明確，行文流暢，結構嚴謹，層次分明，引據充分。

建議：作者可進一步分析，拜登政府在白宮國安會設置「印太事務協調官」一職，並由白宮主導「印太戰略」的意義，以及評估此種安排的正面與負面的影響。

與談部分

正如作者徐筱琦教授所指出，民主黨拜登政府在處理對外關係的手法上，被認為與川普時期的外交手法不同的特徵是，與盟友和夥伴進行合作，而非舉著「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大旗下的單打獨鬥。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的盟友和夥伴，亦各自擁有其自己對印太地區的戰略或構想。沒有任何國家的印太戰略是相同的，不同國家的印太戰略的關注、乃至於欲避免之處，各有不同。舉例來說，日本的印太戰略最早稱為「自由與開放印太戰略」，但後來將「戰略」一詞改為「構想」，後來就連「構想」也刪除，而成為現在的用法「自由與開放的印太」。德國的印太戰略報告名稱亦未用「戰略」、而是採取「方針」（guideline）一詞：《德國—歐洲—亞洲：共同塑造21世紀：德國政府在印太地區的政策方針》（Policy guidelines for the Indo-Pacific：Germany-Europe-Asia: Shaping the 21st Century Together）。根據學者分析，日本和德國政府不使用「戰略」，是為避免刺激大陸。

一個國家的「印太戰略」所展現的是，該國家對印太地區的認知和立場，而其關注與相關的政策措施，最終必須要落實到雙邊關係當中。例如，儘管今（2022）年2月拜登政府已經由白宮公布的印太戰略報告《美國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5月26日，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在喬治華盛頓大學演講，宣告拜登政府的對「中」政策。美國國務院在對臺關係方面，美國國務院於今年5月5日和28日，兩度修改〈美國對臺關係之雙邊關係事實清單〉（U.S. Relations with Taiwan: Bilateral Relations Fact Sheet）的內容，也顯示吾人不僅關注印太戰略，而且也必須進到整體戰略之下個別的雙邊政策，才能夠掌握推動印太戰略過程中的細微而低調的調整，以及該調整對個別國家的戰略與安全意涵。¹

再以太平洋島國為例，對美國而言，太平洋島嶼國家也在其印太戰略涵蓋的地理範圍之內。白宮的《印太戰略報告》說會關注印太地區的「每一個角落」，也多處提及太平洋島國，但是實際上似乎是美國印太戰略的邊陲，而未給予充分的關注，一直到爆發大陸和索羅門群島簽署雙邊安全協定的事件爆發後，²拜登政府方才急忙回防太平洋島國地區。即便如此，「印太經濟架構」（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成立之始，沒有一個太平洋島國加入，直到5月方有斐濟加入，成為該架構的第14個會員國。今年6月，「藍色太平洋夥伴」（Partners in the Blue Pacific）；9月28日至29日，白宮才舉行「美國—太平洋島國峰會」（U.S.-Pacific Country Summit 2022）並發表宣言，提高對太平洋島國的援助。³

對法國而言，南太平洋卻是其在印太的重點地區。法國在南太平洋擁有新喀里多尼亞（New Caledonia）和法屬玻里尼西亞（French Polynesia）等海外領地，任何對於該地的威脅，實質上意味著對法國領土的威脅。換言之，雖然距離法國本土有1萬5,700公里之遙，但卻是法國眼中的「核心利益」，倘若該利益遭到侵犯，巴黎當局的反應強度，勢將比與法國無關的印太利益遭侵犯還來得高。

另以韓半島情勢為例，拜登政府的「印太戰略報告」強調，美國與韓國的同盟非常重要。誠然，美韓同盟存在的主要目的，是為維持韓半島的和平穩定，然去年就任駐

1 美國國務院今年5月5日版「事實清單」的內容，最受廣泛關注之處在於，刪除了在那之前舊版中的「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和「不支持臺灣獨立」等表述，以及在討論美國對兩岸的立場時，稱美國的「一中政策」是由「一法、三公報、六保證」所「指引」的，這種表述突顯了「一法」—《臺灣關係法》—的引導性地位。這種表述方式，與3個月前白宮發表的《印太戰略報告》略為不同，該報告是把「一中政策」和「一法、三公報、六保證」這兩部分，用對等連接詞and所連接，亦即「一中政策」和「一法、三公報、六保證」是對等的。詎料在其後的5月28日，美國國務院再度更動「事實清單」的內容，又將「不支持臺灣獨立」的文字納入。據研判，此緊急更改內容的動作，應係與國務卿布林肯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對中政策演講有關，因渠在講詞中明確表示「不支持臺獨」。

2 “Dr. Anna Poweles”, visited date: 2022/3/24, 《Twitter》<https://twitter.com/annapowles/status/1506845794728837120>.

3 “Declaration on U.S.-Pacific Partnership”, visited date: 2022/9/29, 《White House》<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9/29/declaration-on-u-s-pacific-partnership/>.

韓美軍司令拉卡麥拉（Joseph LaCamera）上將，在赴任前的美國參院軍事委員會聽證會（5月18日）上表示，將推動駐韓美軍納入美軍印太司令部的作戰規劃，⁴暗示美韓同盟除了韓半島以外，也應當應處韓半島以外的事態。沒想到今年9月25日，韓國總統尹錫悅於接受美國CNN有線電視網採訪時表示，倘若臺灣遭到攻擊，北韓可能藉機挑釁生事，因此美韓同盟必須優先應處韓半島事態。⁵韓國政府與駐韓美軍對於韓半島以外局勢的立場出現歧異，這對於美國維持印太地區和平，恐怕會構成障礙，也因此是美國推動印太戰略時，必須進一步調整的部分。

總結來說，美國印太戰略的基礎，主要就是美國對其印太地區盟國／夥伴戰略，在那此基礎之上，共同達成在印太地區的戰略目標。那不該是美國一廂情願（wishful thinking），而是亟需與印太國家攜手合作。美國的印太戰略展現美國對印太地區的決心，而那種決心就是要與盟友與夥伴一齊推動的決心。因此，美國如何使印太國家相信「US is here TO STAY.」，同時和盟友與夥伴建構相互信賴並產生互惠關係，應該是美國推動對印太整體戰略成敗與否的關鍵。至於其他有關國家的印太戰略，基本上亦可從類似視角加以觀察分析。

4 Kim So-hyun, “USFK can support out-of-area contingencies,” visited date: 《Korea Herald》, 2021/5/19, <http://www.koreaherald.com/view.php?ud=20210519000166>.

5 “Yoon: N. Korea Likely to Provoke If China Attacks Taiwan,” visited date:2022/9/26, 《KBS》, https://world.kbs.co.kr/service/news_view.htm?lang=e&Seq_Code=172642.

「中」印在尼泊爾競逐下的美國因素 The U.S. factor in China-India rivalry in Nepal

郭偉山 (Kuo, Wei-Shan)
臺灣印度研究協會學術長兼研究員

摘 要

自1768年建立現代意義的尼泊爾以迄，即因位居喜馬拉雅山脈、恆河平原間的特殊地理區位，不論歷史尼泊爾如何興衰變化，始終緣於夾處中國與印度兩大強權間的內陸深處，而難有自主發展戰略空間。尤其現代印度擺脫殖民後，深感尼國西南距孟加拉國僅間隔約二十公里狹長的西里古里走廊，倘略顯不慎隨時可被切斷本土與東北七邦聯繫。準此，無論基於地緣安全戰略，抑或擴張自身實力考量，印度對尼泊爾長期存在領土野心。中國則自1960年代起，即透過交通基建賡續深化與尼國地緣政治關係的人為聯結，拓展尼泊爾對中的地緣戰略依賴。面對此種相對單純國際格局，尼泊爾除「平衡」對待外，並無過多的國家戰略選擇。然近年地區情勢因緣於美國因素的出現，更憑添尼國應對「中」印相當變數，亦對地緣樣貌造成衝擊，尼泊爾處此情境究應如何因處，實為本文研究重點。

關鍵詞：尼泊爾、「中」印與尼泊爾、美國與尼泊爾關係、千禧年挑戰公司

壹、前言

何謂小國？尼泊爾毫無疑問是個小國，然若缺乏明確且廣泛被接受應用的小國界定，小國研究將難以推動。鑒於現有文獻所呈現的小國概念存在諸多分歧，甚至與「弱國」（weak states）、「窮國」、「失敗國家」（failed states）等概念重疊混淆，而既然各界對其定義充滿隨意性、伸縮性及差異性的社會解讀，即必然取決於個體知識結構與主觀感受。尤其「小國」乙詞經常淪為政治家、媒體編輯與社會受眾「廣泛使用該術語來描述國際政治和解釋國際行為。」¹故本文將採取瑞士學者格賽爾（Hans Geser）「三維度論」，亦即自三種視角認知「小」的意涵：一是「實質性的小」，指國家於領土或人口資源等方面「客觀的小」；二是「關係概念的小」，即與其他國家相較而言「相對規模的小」；三是「屬性規模的小」，係指涉自身與他人「主觀性認識中的規模小」。²此三維度基本涵蓋認知小國主要視角，客觀反映小國群體基本特性，更為界定小國提供可選擇的切入點。

小國並存且數量遠超大國，實為現代國際體系以迄，國際社會客觀存在的事實與長期趨勢。緣於權力規模與心理認知迥異情境，復以力量及影響差異，導致大國與小國間極易衍生不對稱關注，而處此關注視域中，小國勢須依靠平衡、集團、聯盟、中立等各類外交模式，以緩解與大國間的不對稱局面，提高自身安全與自主性。儘管卡爾（Edward Hallett “Ted” Carr）曾提出，大國獨裁係國際社會自然法則，小國外交必須追隨大國外交政策。³米爾斯海默（John Joseph Mearsheimer）亦指出：「這理論（攻勢現實主義）關注的是大國，因為大國對國際政治所發生的變故影響最大。所有國家—不管是大國還是次大國—其命運都從根本上取決於那些最具實力國家的決策和行為。」⁴亦即現實主義理論認為，國際體系無政府特性決定體系安全屬性稀缺，任何國家皆需要透過自助以實現安全。然而小國於內部既受自身物質資源限制，無法將有限資源投入提升本國軍力，加以外部復受制於大國競爭、次強國擴張崛起等體系因素約束，基本無法自主選擇安全戰略。小國做為國際體系的承受者和參與者，清楚大國在國際體系內的主導作用，而大國也明確瞭解小國可能的安全需求，以及小國能為大國提供的戰略價值。⁵因此小國無論選擇哪種安全策略，如結盟、集體安全、中立和兩面下注等，依舊

1 Otmar Holl & Österreichisches Institut für Internationale Politik., *Small States in Europe and Dependence*, (Austria: Austri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83), p. 35.

2 Hans Geser, “Wasist Eigentlich Ein Kleinstaat?” in Kirt Romain & Waschkuhn Arno, ed. *Kleinststaaten-Kon-tinent Europa: Probleme und Perspektiven* (Baden-Baden: Nomos., 2001), pp. 89-100.

3 Edward Hallett “Ted” Carr著，秦亞青譯，*20年危機（1919—1939）：國際關係研究導論*（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Reissued with a New Preface from Michael Cox）（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5 年版），頁99-100。

4 John Joseph Mearsheimer著，王義桅、唐小松譯，*大國政治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頁4-5。

5 陳宇，「不丹對印度的極不對稱安全困境：基於小國/弱國對大國/強國的『安全交換』解釋」，*南亞研究*（成都），

需要提升自身相對實力，而且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霸權國或地區大國的良好互動才能保證自身安全。

鑒於尼泊爾既係夾藏於中國與印度兩個緊鄰且皆正快速崛起的大國間，一旦中國對尼泊爾地緣影響上升勢將使印度對尼國控制力減低。對印度言，尼泊爾地緣位置關鍵性在於兩方面，一是牽制中國西藏，二是尼泊爾地緣位置恰處於「中」印藏南地區領土爭端段。蓋尼國與孟加拉間存在狹長通道—西里古里走廊，其最窄處寬度僅二十公里，其連接印度大陸主體與東北七邦。印度若擬由陸路調派軍隊前往藏南地區，必經西里古里走廊，而尼「中」邊境吉隆縣距該走廊最窄處僅約四百公里，一旦青藏鐵路延伸至吉隆，中國即可通過尼泊爾直接切斷此戰略增援通道。故尼泊爾無論對印度東北地區穩定，抑或「中」印藏南地區領土爭端，皆有特殊重要意義。然而尼國悲催尚不止於此，美國自英國殖民撤離後，即駐點加德滿都，其既需要借助印度牽制中國勢力擴張，亦於某程度排除印度意圖對尼泊爾控制的戰略作為。此意味美國勢力在尼國亦難容小覷，尼泊爾被迫需要在美印「中」三大強權中周旋、平衡，箇中艱辛實難想像。

尼泊爾做為三強權力競逐下的小國，非僅自身實力孱弱導致的脆弱性與敏感性，致其戰略選擇餘地遭受高度限縮，更加需要依賴自身對安全戰略的選擇及對國際體系力量對比變化的精準判斷。小國多數情況僅能選擇追隨大國，於確保自身安全前提下盡量尋求經濟發展可能性。尤其尼泊爾如此特殊的小國，究竟如何選擇安全戰略始能最大限度保護自身安全？其採取安全戰略於美國因素加深運作時，又能呈現何種反應？凡此皆係作者擬通過本文對尼泊爾地緣政治得失思考，嘗試解釋其緊鄰兩大國又受遠端霸權遙控的未來發展，俾供相關研究參考。

貳、夾縫中的地緣政治

尼泊爾地處南亞次大陸北部，北與中國西藏接壤，西、東、南與印度接壤，屬典型內陸國家，尤以其做為亞歐大陸東部強權中國及南亞核心大國印度間的緩衝地帶，地緣位置至關重要。而在印度構置以自身為中心的地區防禦整體框架中，尼泊爾憑藉喜馬拉雅山脈天然安全屏障，成為重要戰略緩衝區。印度首任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即於人民院公開表示：「我們不能容忍在尼泊爾出現任何差錯，也不允許他的柵欄被穿越或變弱，因為那樣將是對我們自身安全的一個威脅。」⁶致使近代歷史尼國始終無以擺脫追隨與扈從的附庸國命運。然則國際政治究屬從未消停的滾動巨輪，最終仍

第3期（2018年7月），頁52-76。

6 Jawaharlal Nehru, "Jawaharlal Nehru's Speeches Vol. 3 (1953 —1957)," (New Delhi: Publications Division, 2017), pp. 257-264.

給予尼國僅14.72萬平方公里面積且3/4屬於山地的弱小山國，於夾縫中獲得國家主權獨立地位與本國經濟發展契機，其轉折實可謂尼泊爾體察區域情勢變化，應時妥適採取均勢外交政策的結果。作者透過嘗試略述尼泊爾近代依附英、印歷史，並即導引至現今地緣政治格局，裨益閱者形塑出較客觀印象。

實際上英國殖民南亞期間，基於英俄大博弈（The Great Game）、防範晚清與民國政府，為確保其在南亞利益現實需要，依其部署實際係積極構築兩道戰略緩衝區與防禦線，一是西藏大面積緩衝區，另則由阿富汗、尼泊爾、錫金、不丹等系列小國，共同形塑第二防禦線。而自印度1947年獨立後，即繼承英領時期「大邊疆」戰略思想，先是圍制錫金。1949年6月，印度「接收錫金過渡時期政府，由印度政府所派的行政專員主管。」⁷隨後於1950年12月，強迫錫金簽約「繼續作為印度的被保護國，在內政方面享有自治權」，惟印度「負責錫金的國防與領土完整，指導其對外關係」。⁸其次嚴控不丹。1949年8月，印度與不丹簽訂《永久和平與友好條約》，印方作為其保護國有權干涉指導其對外事務，並於不丹國內駐軍。⁹

英領印度期間亦於1923年與尼泊爾簽署《永久和平與友好條約》，名義賦予尼泊爾「完全的主權獨立國家」地位，實際則監督控制尼國內政與對外貿易，並剝奪尼國外交權。1947年印度獨立並繼承英國在尼利益，通過《和平友好條約》與尼建構「特殊關係」，全面介入尼泊爾事務。隨著共軍於1950年進藏發動昌平戰役，至1959年達賴喇嘛出逃，此期間尼泊爾除於1955年與中國建交，印度數度於尼泊爾發動政變與深度干涉，更將尼泊爾納入本國地區安全戰略。

尼印兩國間的歷史文化相似性，並未挹注雙邊關係政治層面和諧共處，其主因概可歸納為：一是尼國地緣位置決定其對印度經濟依賴及歷史文化同質性，須知尼泊爾做為內陸國家對外貿易嚴重依附印度，即成為尼國擺脫被控制的重要障礙，如1956—1960年，尼印貿易占其貿易總額95%，而與西藏地區及其他國家地區貿易僅佔5%。¹⁰而同質性文化亦為印方對尼施壓的道義力量。二是印度向視尼泊爾為其勢力範圍，且係與中國間安全屏障，強硬抗拒其他大國染指，故印度對尼泊爾的安全外交政策目標明確，僅於具體政策可視情況採取強硬或懷柔手段。一旦尼印間出現矛盾，尼泊爾地緣劣勢立即顯

7 羅家倫，「揭開中印間有關西藏的幕」，國史館編輯小組編，羅家倫先生文存第2冊（臺北：國史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6年），頁823。

8 Deryck O. Lodrick, "Indo-Sikkimese Treaty: India and Sikkim [1950]" (April 21, 2015), visited date: June, 10, 2022, 《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place/Sikkim#ref1030768>.

9 廖士鋒，「不丹的主權獨立 真能倚靠印度嗎？」（2020年12月6日），2022年5月8日瀏覽，《香港01網》，<https://www.hk01.com/國際分析/557718/不丹的主權獨立-真能倚靠印度嗎>。

10 M. D. Dharamdasani, "India Nepal partnership and South Asian resurgence," (New Delhi: Kanishka Publishers, Distributors., 2000), p.110.

露無遺，如1969年、1989年與2015年，印度對尼泊爾實施三次正式或非正式封鎖，¹¹印度並運用傳統影響力干涉尼國內政，對尼政策始終瀰漫「霸權主義」色彩。然亦因處此地緣政治縫隙中的不公與無奈，相對激發尼泊爾面對印度時，逐漸形成由扈從轉而避險的民族主義意識，加以尼印兩國間存在條約、水資源、邊界、領土等諸多現實問題亟待解決，致使尼泊爾外交處境艱難、國家局勢浮盪未曾稍歇。

現代尼泊爾於2008年廢除君主立憲制建立聯邦民主共和國，基於自身發展與國際政經需要，尼國深感作為擁有獨立主權國身分，有必要更多引進中國因素以推行「中立」、「多元化」外交戰略，冀藉此減少印度影響深度，對印政策亦明顯轉向「平衡」戰略。如2016年3月，尼泊爾總理奧利（Khadga Prasad Sharma Oli）訪中，簽署《「中」尼政府間過境運輸協定》，允許尼方與第三國貿易運輸使用中國港埠進口物資，並以「過境品」名義過境中國直運尼泊爾，儘管「中」尼邊境距海上絲路走廊遙遠，過境貿易並非輕易即達，然卻為兩國互聯互通硬體建設奠定基礎，更為尼方外貿運輸開闢新通道。¹²2017年5月，「中」尼簽署《關於在「一帶一路」倡議下開展合作的諒解備忘錄》，明確加強口岸、公路、鐵路、航空、通信等聯繫，共同建設跨喜馬拉雅立體互聯互通網絡，協助尼方儘早擺脫最不發達國家身分、2030年前成為中等收入國家等目標。¹³2018年6月，尼泊爾總理奧利再度訪「中」，簽署《關於鐵路合作的諒解備忘錄》，推動跨境鐵路前期研究的安全管理。¹⁴習近平則於2019年10月訪尼，簽署《聯合聲明》，同意開展吉隆至加德滿都跨境鐵路項目可行性研究，並重申開展加德滿都—博克拉—蘭毗尼鐵路項目合作。¹⁵

準此可知，印度與尼泊爾地緣政治不信任，而不平衡經濟關係則進一步加深隔閡。蓋印度對尼泊爾經濟制裁係實現政治目的手段，對尼國長期歧視與高壓交往，即使莫迪執政後提出「鄰國優先」外交政策，¹⁶但是兩國政治交往依舊由緊密漸次呈現有限度的疏離。中國對尼泊爾戰略既考量自身利益，更冀圖以之對其他南亞小國發揮示範效

11 1969年印度軍事人員駐紮尼泊爾北部與中國西藏交界處的各個檢查站，尼國決定撤除印度在尼泊爾軍事力量，印度展開第一次經濟封鎖。1989年尼泊爾決定從中國進口武器，印度展開第二次經濟封鎖。2015年印度逼迫尼泊爾修改剛頒布實施的憲法，允許位於尼泊爾南部特萊平原的印度裔馬德西人單獨建邦，進而更有效控制尼泊爾，遂發動第三次經濟封鎖。參見：印度《共和國報》，張樹彬譯，「尼前首相：印度想殖民尼泊爾 我們該求中國幫助」（2015年10月28日），2022年5月18日瀏覽，〈[新浪軍事網](http://mil.news.sina.com.cn/2015-10-28/1803842475.html)〉，<http://mil.news.sina.com.cn/2015-10-28/1803842475.html>。

12 藍建學，「『一帶一路』倡議在南亞：進展、挑戰及方向」（2017年7月3日），2022年5月16日瀏覽，〈[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網](https://www.ciiis.org.cn/yjcg/xslw/202007/t20200710_1126.html)〉，https://www.ciiis.org.cn/yjcg/xslw/202007/t20200710_1126.html。

13 中國駐尼泊爾大使館，「中尼兩國政府簽署「一帶一路」合作協議」（2017年5月13日），2022年5月20日瀏覽，〈[中國駐尼泊爾大使館網](https://www.mfa.gov.cn/ce/cenp/chn/xwdt/t1461292.htm)〉，<https://www.mfa.gov.cn/ce/cenp/chn/xwdt/t1461292.htm>。

14 錢小岩，「《中尼聯合聲明》兩大關鍵詞：『一帶一路』和深化貿易合作」（2019年10月13日），2022年5月16日瀏覽，〈[第一財經網](https://www.yicai.com/news/100359720.html)〉，<https://www.yicai.com/news/100359720.html>。

15 「中尼簽署20項協議 或可稍減印度對尼泊爾的影響力」（2019年10月13日），2022年5月19日瀏覽，〈[美國之音網](https://www.voachinese.com/a/china-nepal-agreements-5122013.html)〉，<https://www.voachinese.com/a/china-nepal-agreements-5122013.html>。

16 朱翠萍，「印度的地緣政治想象對中印關係的影響」，印度洋經濟體研究（昆明），第4期（2016年7月），頁1-25。

益，爭取更大地緣政治利益，其戰略設計即密切結合總體周邊戰略目標，以堅持「互惠互利」為基礎想定，持續擴大經濟交流，力爭實現不以意識形態劃線或追求與印度爭奪勢力範圍。惟尼泊爾對如何獲取資源實為制定自身戰略首要考慮，深究其被動性平衡戰略核心，即係國家於資源稀缺條件展開生存競爭的地緣戰略。¹⁷故尼泊爾近年對外採取維護利益的平衡戰略，主要即既不扞從印度亦不倒向中國，而堅持以獲取自身資源利益最大化為目標，透過加強與「中」印相對一方合作以保持均衡戰略。然此過程，尼泊爾仍須高度密注印度因素，一則緣於地緣環境不可抗力性與運輸成本考量，導致尼國石油、天然氣均需倚賴印度提供，而印度則可通過基礎資源與戰略資源控制尼國政治選擇。另須注意者為尼國內印度教徒占比達90%，印度擁有印度教聖河—恆河，從而相應反映出尼國宗教活動受制於印度。綜上可知，尼泊爾即使在中國對其地緣影響超越印度時，依舊將採行某種偏向印度的被動性平衡戰略，而此實為尼泊爾主觀上難以擺脫的地緣困境與宿命。

參、美國因素介入趨強

誠如美國霍普金斯大學學者索恩頓（Thomas P. Thornton）所言「制定對南亞的安全政策，甚至對該處安全利益進行評估，根本不在美國概念圖上。至少從艾森豪威爾時期起，美國領導曾試圖把南亞歸入東南亞或西南亞，而不是將它作為獨立的整體來考慮。」¹⁸由此可知，儘管基於現實利益考量雙方於1947年建交，且簽署《通商與友好協定》，惟美尼雙邊關係未取得實質發展。蓋至1950年前，尼國除與印度維持貿易關係，並與西藏地區維持小額經濟交往外，尼泊爾與外部世界實際並無貿易聯繫。¹⁹亦即美國於冷戰前對南亞並不存在直接安全利益，甚至連次大陸皆未為戰略界思考，更遑論夾處縫隙中的尼泊爾。至於尼泊爾則鑒於戰後地區局勢出現變化，勢須發展與其他國家關係，以平衡印度獨立後的壓力。而其中因緣於美國既非區域內國家，亦未存在與次大陸交往歷史，並非南亞傳統殖民強國，尼國遂希冀地位超脫的美國填補英國退出後保護空窗，並提供其經濟發展所需援助。²⁰

17 杜德斌、馬亞華，「『一帶一路』：中華民族復興的地緣大戰略」，*地理研究*（北京），第34卷第6期（2015年6月），頁：1005-1014。

18 Thomas P. Thornton, "U.S. Strategic Interests in South Asia," Hafeez Malik, ed., *Determinants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India and Pakista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93), p. 35.

19 Martin Ira Glassner, "Transit Rights for Land: Locked States and the Special Case of Nepal," *World Affairs*, Vol. 140, No. 4(1978), p. 307.

20 Daily Report, "India Wary of American Penetration,"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FBIS) Daily Reports Database, December 17, 1947, Foreign Radio Broadcasts**, Florida: Naples, Readex Inc., 2007, Document Number: FBIS-FRB-47-207.

隨著美蘇全方位對抗博弈加劇，美國戰略界轉而重視南亞，首選對象為關鍵性國家印度，²¹然因尼赫魯等政治精英基於民族主義理想，並深受英國左派影響，對美國始終警覺與不信任，導致雙方關係疏離。²²準此，則尼泊爾形勢即為美國勢力進入南亞提供另項選擇。畢竟尼泊爾獨立穩定既可避免其因外部因素破壞國家均勢，又得確保美方勢力於尼國持續存在，避免全球均衡態勢傾斜而危及美國利益。惟值注意者美國既擬將尼泊爾營造成「中」印間緩衝地帶，即需與印度合作，可美國意圖於運用印度的同時，卻又明顯限制印度在尼特殊地位，此舉即決定尼印兩國關係超越一般意義的國家間關係，其影響至今未能破除。而鑒於「中」蘇對尼泊爾喜馬拉雅邊界的關注日增，尤其共軍入藏對尼衝擊深遠，美國對尼政策遂於1950年初步成型，目標即係保證尼國政權非共性質及反蘇聯陣營的親西方導向，鼓勵尼方參與國際事務，並支持其申請加入聯合國。與此同時，美國敦促尼方確保美國及其盟友繼續使用尼泊爾軍事人力資源，引導其政治經濟制度朝民主化發展。²³然而緣於美印尼外交政策結構性的差異，美國反制「中」尼關係發展的目標終歸失敗，「中」尼於1955年正式建交。

其後美國明顯增強介入尼泊爾事務。²⁴美國總統艾森豪表示：「由於不發達地區的貧窮和不安定情況而使它們的人民成為國際共產主義的一個特別的目標，有必要援助他們達到必要的經濟增長和穩定，……反對共產黨的威脅和誘惑。」²⁵位於「中」印間的尼泊爾對美國南亞政策尤為重要，美國試圖將尼泊爾建構成反中軍事基地及對印施壓節點，「美國相信可以用援助來阻止尼泊爾變成『中』印之間相互競爭的熱點。」²⁶實則杜魯門早於1949年即提出援助經濟不發達國家「第四點計畫」（Point Four Program），尼泊爾即為該計畫受援國之一。美國戰略設想即擬通過經濟與技術援助，提升尼國政治穩定與生活水準，亟力鞏固其獨立地位以對抗共產主義滲透。其中1951年至1961年，對尼泊爾經援總額為4,550萬美元，年均約四百萬美元；1962年至1982年，年均援助1,300萬美元；1983—1990年，年均援助則上升為1,900萬美元。²⁷另則美國決策層於1955年決定賦予對尼泊爾援助的反制「中」尼關係意涵，此意味美國將相關援助計

21 Stephen Cohen著，劉滿貴譯，**大象與孔雀——解讀印度大戰略(Elephants and Peacocks—Interpretation of India's Grand Strategy)**（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頁293。

22 George M. Guess, "The Politics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Aid," (London and Sydney: Croom Helm., 1987), p. 182.

23 Department of State, "Department of State Policy Statement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Nepal" (August 28, 1950), visited date: June, 12, 202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The Near East, South Asia, and Africa, Volume V FRUS [Washington,]. (Document 836)》**,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0v05>.

24 溫強、李星然，「美國對尼泊爾政策的形成與調整——以中尼建交為核心的考察」，**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廣州），第60卷（總286期）2020年第4期（2020年7月），頁48-60。

25 梅孜，**美國總統國情咨文選編**，（北京：時事出版社，1994年），頁215。

26 Narayan Khadka, "U.S. Aid to Nepal in the Cold War Period: Lessons for the Future," *Pacific Affairs*, Vol.73, No.1 (Spring, 2000), pp.77-95.

27 Narayan Khadka, *Foreign Aid and Foreign Policy: Major Powers and Nepal* (New Delhi: Vikas Publishing House Pvt Ltd., 1997), p. 126.

畫置於亞洲整體冷戰戰略範疇，藉此削弱尼泊爾尋求中國援助動機，主要措施即為美國額外單獨給予尼泊爾更多經濟支持，如1956年6月撥款資助24萬美元。

總之冷戰期間美國對尼政策主軸係支持非共黨執政的政權，具體操作則為協助尼泊爾奉行獨立外交政策，裨益爭取尼泊爾於區域與國際議題對美立場的外交支持。而觀諸冷戰結束後至「9·11」事件前，隨著美國全球戰略重點轉移至歐洲與中東地區後，美國對尼援助大幅減少，雙邊官方交往呈消極狀態，直至美國發動反恐戰爭後始獲改善。而亦即於此時在小布希（George Walker Bush）授意下，於2004年成立新的對外援助機構—千禧年挑戰公司（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 MCC），其職能係向欠發達地區評估具良好經濟政策與發展潛力的發展中國家，透過提供經濟援助以協助實現脫貧困境。²⁸典型做法為對受援國土地、能源、交通等領域進行改革，並以美國企業參與受援國相關管理經營。表面觀之，千禧年挑戰公司對外援助重在協助受援國發展，實際則係配合美國國際開發署援外工作，維護美國海外利益。如隨著美國「重返亞洲」、「印太」戰略的推展，千禧年挑戰公司對外經濟援助重點亦轉向亞太國家，特別向中國鄰國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傾斜。²⁹

尼泊爾2012年向千禧年挑戰公司提出尋求援助事宜，2017年8月，兩國確定援助協議文本，9月簽署「千禧年挑戰協議」（以下簡稱「協議」）。根據協議，美國向尼泊爾提供5億美元的援助，尼方注資1.3億美元，協議有效期5年。援助項目主要為建設連接尼泊爾—印度300公里400千瓦輸電線路與3個變壓器，以及修建尼泊爾南部300公里東西高速道路。然而隨著「協議」即將生效，尼國內部因緣於兩大要素卻出現激烈論辯與反彈：

一是自申請撥款以迄至簽署多項諒解備忘錄與協議過程中，尼泊爾政府從未認真研究美方援助的「侵略性」。直至社會輿論激盪始醒悟該等條款將「協議」置於尼國法律之上；免除對MCC官員起訴；不得違背美國政策；將尼泊爾水電出口至印度壟斷市場，而非用於尼國內部；繞過尼泊爾輸電線路建設機構「尼泊爾電力局」（NEA），另創建由美國控制新機構。最關鍵者為成本剝削，蓋自2011年起，NEA始終以3,800萬尼泊爾盧比/公里建設400 kV輸電線，而MCC則係1.6億尼泊爾盧比/公里，為過往成本四倍。³⁰

二是美國國務院南亞事務副助理國務卿蘭茨（David Ranz）於2019年5月訪問尼國

28 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 "Guide to the MCC Indicators for Fiscal Year 2021," October 23, 2020, visited date: June 22, 2022, 《MCC》, <https://www.mcc.gov/resources/doc/guide-to-the-indicators-fy-2021>.

29 戴永紅、姬廣禮，「美國千禧年挑戰公司對南亞國家的援助：進展、影響與對策」，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成都），第48卷第5期（2021年9月），頁68-69。

30 Dipak Gyawali, "Biggest US aid project in Nepal has created turmoil" (April 20, 2022), visited date: July, 2, 2022, 《The Third Pole》, <https://www.thethirdpole.net/en/energy/biggest-us-aid-project-mcc-nepal-created-turmoil/>.

時，卻表示「協議」係「印太」戰略重要組成部分。³¹此言立即成為「協議」轉折點，引發當時執政黨尼泊爾共產黨（Nepal Communist Party）強烈質疑，有關「協議」究竟是否為「印太」戰略組成部分，激起各界激烈爭論。

儘管尼國法律部於2019年做出規定，MCC將取代尼泊爾法律與憲法的規定需獲得議會批准。2020年9月，原尼共召開書記處會議，決定將對「協議」中可能有損國家利益的條款進行修訂，再提交議會討論通過。此即意味尼美兩國需要再進行談判，美國對此拒絕接受。尼國政局與社會隨之動盪，然於美國強勢外交運作下，最終於2022年2月27日獲准通過。

揆諸前述可知，儘管美尼兩國於經貿、援助等領域的合作程度較過往大福提升，尼泊爾亦希冀從對美關係中廣泛獲益，即亦涵括提升其國際地位、發展國內政治等潛在益處，惟對涉及國家獨立與中立等議題，則仍堅持實用主義基本立場。尼泊爾傾向於與美國加深交往的同時，與「中」印保持等距外交，即使尼印關係向較深厚，亦不願使自身所處地緣環境惡化。然以「協議」發展歷程觀之，尼國主觀企求與客觀發展間存在巨大落差，MCC已然引發其內部嚴重的社會與政治兩極分化，或許此即係小國面對霸權時的無奈現實。

肆、三方競逐對尼影響

尼泊爾基於地緣因素考量，其國家外交政策選擇勢須兼顧「中」印兩國因素。蓋地緣於國際社會既為國家間基於地理環境而形成的關係，其內涵非僅係國家間直接地理聯繫，亦涵括人口、宗教、種族、社會等多重因素，並強調國家間自然地理關係重要性。³²準此，尼泊爾國家外交政策選擇所擁有主動性不多，尼泊爾需要鄰國給予便利始能生存，過度疏離任何一個鄰國皆違反尼泊爾國家利益，印「中」兩國重要程度遠遠超過域外任何國家，因此尼泊爾必須將印「中」兩國作為重要發展對象，並承受兩國對尼政策不確定性。³³亦即尼泊爾特殊地理環境及與印「中」間特殊地緣關係，決定尼國必須將外交優先方向置於維持與印「中」兩國對等關係，始可獲得國家政治穩定、經濟發展，是以尼泊爾奉行「不結盟」政策為基礎的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戰略，維護尼泊爾主權完整與國家安全利益，尼泊爾堅持反對為第三方而損害與兩大鄰國關係。

為有效說明尼印、尼中關係，謹將近年經貿往來比較如下：

31 Binod Ghimire, "Why the MCC compact courted controversy in Nepal," (January 9, 2020), visited date: February 22, 2021, 《The Kathmandu Post》, <https://kathmandupost.com/2/2020/01/09/why-the-mc-compact-courted-controversy-in-nepal>.

32 唐希中、劉少華、陳本紅，〈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1949-200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頁39。

33 杜正艾，〈俄羅斯外交傳統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頁22。

一、尼印經貿互動概況

基於印度海關數據，2003年8月1日至2018年1月10日，期間尼泊爾貿易差額平均值為負17,667.7百萬尼泊爾盧比。尼泊爾對印度貿易於2018年10月1日為負85,063.129百萬尼泊爾盧比，相較於同年9月1日的負70,880.960百萬尼泊爾盧比略為下降。³⁴

二、尼「中」經貿互動概況

基於中國海關出口離岸價（FOB）數據，2013年1月4日至2022年1月4日，期間平均值為136.026百萬尼泊爾盧比。該數據的歷史最高值出現於2014年1月10日，達688.996百萬尼泊爾盧比，歷史最低值則出現於2018年1月7日，為負258.622百萬尼泊爾盧比。³⁵

由以上數據觀察明顯可知，印度緣於地理環境便利，貿易口岸地勢平坦順暢，而中國主要倚賴尼「中」公路及穿越喜馬拉雅山脈的若干通商口岸，雙方對尼泊爾的經貿數額呈現巨大差距，相對反映在國家影響力方面顯然印度大於中國。

然而世界格局無論是兩極化或多極化發展，皆對尼泊爾造成尷尬窘境，冷戰期間美國做為世界最強大發達國家，其選擇發展對尼國關係，更多者為戰略形勢需要的選擇，而以尼泊爾孱弱小國根本無以推拒。美國除持續對尼泊爾提供經濟援助與技術輸出，以維護尼泊爾國內基本運轉需要外，並於外交場合多次公開聲明，支持維護尼泊爾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其目的即在於確保尼泊爾獨立自主主權的同時，能與尼泊爾政府進行一對一接觸，從而實現美國南亞戰略部署。美國當然意識到尼泊爾對於印「中」雙方的重要性，任何動靜皆可能影響尼泊爾政權與經濟穩定，美國遂亟力防止尼泊爾內部橫生任何嚴重政治動盪，徒留印「中」介入的機會。³⁶

另為說明美國究竟對尼泊爾經濟投入程度，謹以尼國從美國進口概況觀察。蓋尼泊爾從美國進口總額數，1981年1月1日至2022年1月1日，期間平均值為1.655百萬美元。該數據歷史最高值出現於2021年1月12日，達110.455百萬美元，而歷史最低值則出現於1993年1月12日，為0.110百萬美元。尼泊爾從美國進口總額於2022年1月1日達69.676百萬美元，相較於2021年1月12日的110.455百萬美元略為下降。³⁷從以上數據比較可知，尼泊爾對美國的經貿依賴遠不及中國，更遑論印度。對此則不禁衍生如下疑

34 CEIC Data，「尼泊爾貿易差額：基於海關數據：印度（2003 - 2018 | 月 | 百萬尼泊爾盧比 | NEPAL RASTRA BANK）」，2022年5月19日瀏覽，〈CEIC〉，<https://www.ceicdata.com/zh-hans/nepal/trade-statistics/trade-balance-custom-basis-india>。

35 CEIC Data，「尼泊爾對中國的總出口（2013 - 2022 | 月 | 百萬美元 | CEIC DATA）」，2022年5月20日瀏覽，〈CEIC〉，<https://www.ceicdata.com/zh-hans/nepal/trade-statistics/exports-fob-custom-basis-china>。

36 王艷芬、汪詩明，「冷戰以來美國與尼泊爾的關係」，〈南亞研究（成都）〉，第1期（2009年），頁29-37。

37 CEIC Data，「尼泊爾從美國進口總額（1981 - 2022 | 月 | 百萬美元 | CEIC DATA）」，2022年5月21日瀏覽，〈CEIC〉，<https://www.ceicdata.com/zh-hans/indicator/nepal/total-imports-from-usa>。

問：既然美國與尼泊爾地理位置遠隔重山萬洋，則當初英退印進時，美國依舊能立足於尼國，尤其80餘年來，美國給予尼泊爾的資源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中」印兩國權謀算計、軍事衝突不斷，反而未能取得實質進展。

作者認為欲回答此問題則須從美印「中」大三角關係切入，而觀諸三個實力不對稱的大國形構出以美國單極獨霸的「『中』美印三角」權力格局，美國學者沃馬克（Brantly Womack）對此曾指出，三方實力不對稱程度極易導致三方錯誤認知，三角關係的連鎖效應亦將隨之更加複雜。³⁸有關美印「中」三角格局相互關係概述如次：

一、美「中」關係

美「中」雙方具備結構性矛盾，其中主係緣於迥異政治傳統與價值體系，致未能通透理解對方決策過程，而面對美「中」間實力差距日益縮小的戰略認知與應對途徑等問題，遂使兩國僅存在理性算計而缺乏信任。³⁹即使冷戰結束後，美「中」間曾經嘗試以經濟發展取代安全利益，且基於雙方經濟利益高度趨同，美「中」兩國由冷戰時的完全敵視與不信任，開始轉向培育理性信任。然而隨著中國快速崛起，其與美國護持霸權地位的緊張關係即無以避免地成為互信障礙，尤其自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逐漸將中國視為強勢競爭者甚至挑戰者，雙邊關係中原有的接觸與融入戰略基礎崩毀。另則肇因於美「中」雙方核心利益愈發分歧，導致雙邊關係充斥戰略互疑，美國遂開始「超越接觸」（beyond engagement），從戰略層面加強對中國威懾。⁴⁰

二、美印關係

冷戰期間美國或於戰略上輕視印度，或視其為蘇聯盟友，雙方負面印象主要源於美國支持巴基斯坦、印度靠攏前蘇聯、核武器利益衝突等。惟冷戰結束後，兩國認知趨向接近，並持續增強雙邊戰略互動，特別是自2000年至今，印美關係先後經歷「一種新的夥伴關係」、「戰略夥伴關係」再至「全球夥伴關係」的跨越式發展。⁴¹可畢竟雙方曾經對身份認同與戰略文化存在過差異，加以印度堅持戰略自主及「多元結盟」，其對美國戰略始終表現若即若離，特別是2022年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戰爭時的不選邊自利作為，逐漸出現美印戰略互疑跡象，主要體現為美國提升對印度牽制中國能力與意願的不

38 Brantly Womack, *China Among Unequals: Asymmetric Foreign Relations in Asia*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pany, 2010), p. 402.

39 王緝思、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中美戰略互疑：解析與應對〉（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頁1-11。

40 王偉男、周建明，〈『超越接觸』：美國戰略調整背景下的對中政策辨析〉，〈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3期（2013年3月），頁72。

41 張力，〈美國『重返亞太』戰略與印度的角色選擇〉，〈南亞研究〉（成都），第2期（2012年），頁1-7。

確定性認知，而印度亦懷疑印「中」發生衝突時美國可能提供的支持力度。⁴²

三、印「中」關係

向即較屬緊繃態勢，主係基於「中」印歷史領土爭議未決、中國與巴基斯坦準盟友關係，加上印度承繼英國殖民疆界緩衝思想，始終視中國為其於亞洲基本戰略競爭對象。中國則擔憂印度利用「藏獨」與臺灣問題製造麻煩，並進行戰略壓制。特別是中國崛起速度遠超印度，且將勢力透過「帶路」倡議向南亞延伸，致對中國的信任度始終處於低盪，雙方僅維持謹慎的低限度合作。⁴³儘管中國冀望以經濟吸引印度，印度卻在安全、歷史問題上不信任中國。雖然同為崛起中大國，兩者面臨的國際體系結構性壓力程度差異卻極大，中國實力優勢很難轉換成對印度脅迫，畢竟其正面臨美國更強大壓力。

儘管冷戰時期美蘇兩大陣營對峙，印度傾向前蘇聯，但美國亦充份利用蘇「中」間矛盾對立及印「中」邊界情仇，將印「中」兩國牽制分離於尼泊爾兩邊，加以當時雙方皆無力另闢戰場，遂樂於將尼泊爾視作戰略緩衝區。冷戰結束後，雖然美印曾為核試爆發生齟齬，然隨著美國先後對阿富汗、伊拉克反恐用兵，美國迅即拉攏區域大國印度，鑒於尼泊爾與印度深厚政經關係，美國基於地緣政治考量，尼泊爾再度進入美國視野。無論期間尼泊爾是否嘗試加強對中關係以茲維持平衡中立，印度是否願意美國勢力過度深入尼泊爾，美國皆巧妙透過千禧年挑戰公司向尼泊爾提供經濟援助製造話題，先是美方官員有意釋放該援助協議本身即屬「印太」戰略一環，再有美國強制尼國政府接受「協議」情事，箇中或許即隱含挾尼國強迫印度向美就範意圖。面對印「中」較勁脅迫固然是直接的，然則美國誘以小利即達挾制尼泊爾目的，此實為小國面對強權的宿命。

伍、結論

揆諸尼泊爾生存發展絕對係透過與外部交流溝通過程而實現。無論是對美印「中」等大國或尼泊爾小國而言，國家利益同樣係決定國家行為的關鍵性因素。尤其尼泊爾的國家利益更具有明顯層次性，亦即如何維持國家生存實為其首要需求，此主要體現於：一是尼泊爾生存不易，沉痛歷史使其更加深刻體會需要加倍維護。二是尼泊爾生存依舊面臨戰爭等傳統安全領域，以及經濟、水資源等非傳統安全威脅。而為保障自身

42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編，**中美亞太共處之道：中國·美國與第三方**（上海：時事出版社，2013年版），頁258。

43 江西元，「21世紀中印政治與戰略關係前景分析」，**學術探索**（昆明），第2期（2004年2月），頁60-63。

生存勢須擁有更高層次利益需求—國家安全。儘管一般小國基於自身脆弱性必然衍生更強烈恐懼，此種不安全感經常轉化為追求多方面安全，其中尤以軍事安全為最，致使彼等非僅需要大國為其提供政經、軍事協助，更遑論彼此成為朋友、盟友，甚至戰友。然以尼泊爾的特殊條件與限制，採取前述方式可能更加危險，起碼小國對外策略中的抵制性策略（strategy of resistance）完全不適用。

作者認為對尼泊爾較適合的或許為平衡性策略（strategy of balancing）的大國平衡、中立與不結盟，以及適應性策略（strategy of accommodation）的追隨、黏合與見風轉舵等，交相搓揉、靈活運用的混合型策略。前者得以體現尼泊爾與美印「中」大國的平衡關係，後者則可採取某種策略讓尼國與美印「中」大國通過互動以適應彼此行為，而鑒於適應性源自於真實的共同利益，緣此促進相對平和的交往。此種對外策略或可彌補尼泊爾的負面條件，蓋對於是否服從三個大國的指導或滿足彼等不同需求，尼泊爾將很難擁有選擇的可能性，畢竟只有共同利益始得以擴大美印「中」對尼國違約行為的容忍空間。同時為實現共同利益，如何維持良好雙邊關係即不再盡歸由弱小的尼國承擔全部責任，美印「中」大國同樣需要負擔義務，甚至期間出現少次數不服從行為，亦不至於徹底破壞彼此關係。如果尼國決策者具備處理國際關係的大智慧，或許尼國有機會運用自身與大國親近關係，於某種程度上影響大國決策。

對任何國家言，鄰國狀況與戰略選擇皆至關重要，畢竟國家交往範圍泰半侷限於鄰國範圍，對外策略實施對象亦多為鄰國，儘管居處現代世界環境中，國際性大國亦可無視國家相對位置，於全球範圍內採取行動。若是尼泊爾並非夾藏於印「中」兩大強國間，其國家命運或許比較好過。雖然從大國視角觀察，地緣因素對於對外決策的影響正逐漸衰減，然對尼泊爾此種小國言，其擘劃對外策略時皆需考慮地緣因素，進而做出最明智對外策略選擇。兩大鄰國讓尼泊爾對外策略選擇必須考慮三方感受，無法任意孤行，更何況美國因素愈益凸顯。不過絕佳的相對位置亦使得尼泊爾能夠動態推演成為關鍵小國的地位，逐漸獲得與美國、印度、中國談判博弈籌碼，倘若尼國欠缺此等地緣因素，可能即無必要亦無能力進行大國平衡。

作者認為或許先處理美、印、尼小三角關係，即美國與印度共同接受彼此在尼國的勢力存在，即使此種存在是不對等的，惟美國不嘗試削弱印度對尼國的傳統地位，則雙方在對尼議題上即不易衍生矛盾。再以相對和諧的小三角處理美、印、「中」大三角關係，印度冀望繼續與尼泊爾保持特殊關係，然則中國亦致力於尼國實現與印度同等影響力，特別是隨著中國增加對尼國政治、軍事與經濟投入後，印度始終懷疑尼泊爾與中國的任何接觸。儘管印度同樣不信任美國，但若雙方聯合能有效減低中國勢力，則在尼議題暫時聯合將符合印度利益。尼泊爾處於前述大小兩個不均衡的三角關係中，如何精

準的同時於該等大國間審慎保持平衡擺盪，即使特殊時候被迫必須暫時相對靠向某邊，最終仍須適當飄移返還天秤的中心點，則此種戰略選擇，或許較有利於尼泊爾在面對大國間進行戰略競逐時，相當程度適時發揮關鍵性影響，以實現維繫國家生存目的。

現實主義學者吉爾平（Robert Gilpin）認為小國能否生存取決於大國對擴張成本與收益的理性選擇，加以儘管國際社會不存在中央政府，但如果存在能夠起絕對主導作用的霸權國家，其功能相當於國內的中央政府權威，且其願意也能夠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物品，則霸權下合作是可能的。此似為美國插旗尼泊爾提供合理的道德解釋，然須清晰認知美國在尼泊爾的行為本質，依舊係為其推行區域霸權戰略服務。姑不論冷戰時期美國利用尼泊爾牽制前蘇聯，於冷戰格局崩解後立即甩鍋的現實，以及反恐戰爭基於地緣考量拉攏尼印的思考，僅聯繫起始於2010年前後美國國內激發出日益強烈對中國崛起的警覺，與緣此布局對中國戰略大包圍圈的戰略規劃，尼泊爾再也脫不出美國掌控。其實深究美國的戰略意圖實具兩層深義，一是透過美國升高對尼國政府與政治菁英的影響，防止尼共與中共藉由黨對黨交往，擴大中國在尼勢力，尤其是對尼施予關鍵經濟援助，既使尼國利益與美國印太區域戰略需求相互網綁，且或可嘗試改善收攏尼國社會對美國的友好觀感。二是美國深知尼泊爾對印度箝制中國及維護其作為南亞霸權的地緣重要性，美國推動「印太戰略」需要印度，但是印度總以戰略自主於國際事務間是出名的擺盪投機，美國緊抓尼泊爾不過是挾制印度聽從的另個保單，當然其成效仍須待時間驗證。然而毋庸諱言，美國愈益介入尼泊爾已是既成事實，此舉對南亞及周邊區域勢力平衡態勢與未來發展，皆係重要變數，後續美國會再採取何種對尼策略，無疑將是長期觀察重要課題。

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

專書

王緝思、李侃如，2013年（Kenneth Lieberthal）。**中美戰略互疑：解析與應對**。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編，2013年。**中美亞太共處之道：中國·美國與第三方**。上海：時事出版社。

杜正艾，2007。**俄羅斯外交傳統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梅孜，1994。**美國總統國情咨文選編**。北京：時事出版社。

唐希中、劉少華、陳本紅，2003。**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1949-200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專書譯著

Carr, Edward Hallett “Ted” ,著，秦亞青譯，2005年。**20年危機（1919—1939）：國際關係研究導論**（*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Reissued with a New Preface from Michael Cox*）。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Cohen, Stephen著，劉滿貴譯，2002年。**大象與孔雀——解讀印度大戰略**（*Elephants and Peacocks—Interpretation of India's Grand Strategy*），北京：新華出版社。

Mearsheimer, John Joseph,著，王義桅、唐小松譯，2003年。**大國政治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專書論文

羅家倫，1976年。「揭開中印間有關西藏的幕」，國史館編輯小組主編，**羅家倫先生文存第2冊**，台北：國史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頁823。

期刊論文

王偉男、周建明，2013/3。「『超越接觸』：美國戰略調整背景下的對中政策辨析」，**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3期，頁72。

王艷芬、汪詩明，2009/1。「冷戰以來美國與尼泊爾的關係」，**南亞研究**（成都），第1期，頁29-37。

江西元，2004/2。「21世紀中印政治與戰略關係前景分析」，**學術探索**（昆明），第2期，頁60-63。

朱翠萍，2016/7。「印度的地緣政治想象對中印關係的影響」，**印度洋經濟體研究**（昆明），第4期，頁1-25。

杜德斌、馬亞華，2015/6。「『一帶一路』：中華民族復興的地緣大戰略」，**地理研究**（北京），第34卷第6期，頁：1005-1014。

陳宇，2018/7。「不丹對印度的極不對稱安全困境：基於小國/弱國對大國/強國的『安全交換』解釋」，**南亞研究**（成都），第3期，頁52-76。

張力，2012/4。「美國『重返亞太』戰略與印度的角色選擇」，**南亞研究**（成都），第2期，頁1-7。

溫強、李星然，2020/7。「美國對尼泊爾政策的形成與調整—以中尼建交為核心的考察」，**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廣州），第60卷（總286期）2020年第4期，頁48-60。

戴永紅、姬廣禮，2021/9。「美國千禧年挑戰公司對南亞國家的援助：進展、影響與對策」，**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成都），第48卷第5期，頁68-69。

網際網路

中國駐尼泊爾大使館，2017/5/13。「中尼兩國政府簽署「一帶一路」合作協議」，**《中國駐尼泊爾大使館網》**，〈<https://www.mfa.gov.cn/ce/cenp/chn/xwdt/t1461292.htm>〉。

尼泊爾課題組，2018/11。「『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與尼泊爾的發展合作」，**《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網》**，〈<https://china.asiafoundation.org/wp-content/uploads/2019/04/China-aid-and-foreign-investment-in-Nepal.pdf>〉。

印度共和國報，張樹彬譯，2015/10/28。「尼前首相：印度想殖民尼泊爾 我們該求中國幫助」，**《新浪軍事網》**，〈<http://mil.news.sina.com.cn/2015-10-28/1803842475.html>〉。

廖士鋒，2020/12/6。「不丹的主權獨立 真能倚靠印度嗎？」，**《香港01網》**，〈<https://www.hk01.com/國際分析/557718/不丹的主權獨立-真能倚靠印度嗎>〉。

錢小岩，2019/10/13。「《中尼聯合聲明》兩大關鍵詞：『一帶一路』和深化貿易合作」，**《第一財經網》**，〈<https://www.yicai.com/news/100359720.html>〉。

藍建學，2017/7/3。「『一帶一路』倡議在南亞：進展、挑戰及方向」，**《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網》**，〈https://www.ciis.org.cn/yjcg/xslw/202007/t20200710_1126.html〉。

「中尼簽署20項協議 或可稍減印度對尼泊爾的影響力」，2019/10/13，**《美國之音網》**，〈<https://www.voachinese.com/a/china-nepal-agreements-/5122013.html>〉。

CEIC Data，「尼泊爾貿易差額：基於海關數據：印度（2003 - 2018 | 月 | 百萬尼泊爾盧比 | NEPAL RASTRA BANK）」，**《CEIC》**，〈<https://www.ceicdata.com/zh-hans/nepal/trade-statistics/trade-balance-custom-basis-india>〉。

CEIC Data，「尼泊爾對中國的總出口（2013 - 2022 | 月 | 百萬美元 | CEIC DATA）」，**《CEIC》**，〈<https://www.ceicdata.com/zh-hans/nepal/trade-statistics/exports-fob-custom-basis-china>〉。

CEIC Data，「尼泊爾從美國進口總額（1981 - 2022 | 月 | 百萬美元 | CEIC DATA）」，**《CEIC》**，〈<https://www.ceicdata.com/zh-hans/indicator/nepal/total-imports-from-usa>〉。

外文部分

專書

Dharamdasani, M. D., 2000. *India Nepal partnership and South Asian resurgence*. New Delhi: Kanishka Publishers, Distributors.

Guess, George M., 1987. *The Politics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Aid*. London and Sydney: Croom Helm.

Holl, Otmar. & Politik, Österreichisches Institut für Internationale., 1983. *Small States in Europe and Dependence*. Austria: Austri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Khadka, Narayan., 1997. *Foreign Aid and Foreign Policy: Major Powers and Nepal*. New Delhi: Vikas Publishing House Pvt Ltd.

Womack, Brantly., 2010. *China Among Unequals: Asymmetric Foreign Relations in Asia*.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pany.

專書論文

Geser, Hans., 2001. “Wasist Eigentlich Ein Kleinstaat?” in Kirt Romain & Waschkuhn Arno, ed., *Kleinstaaaten-Kon-tinent Europa: Probleme und Perspektiven*, Baden-Baden: Nomos. pp. 89-100.

Thornton, Thomas P., 1993. “U.S. Strategic Interests in South Asia,” in Hafeez Malik, ed., *Determinants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India and Pakista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 35.

期刊

Glassner, Martin Ira., 1978. “Transit Rights for Land: Locked States and the Special Case of Nepal,” *World Affairs*, Vol. 140, No. 4, p. 307.

Khadka, Narayan., Spring, 2000. “U.S. Aid to Nepal in the Cold War Period: Lessons for the Future,” *Pacific Affairs*, Vol.73, No.1, pp.77-95.

Nehru, Jawaharlal., 2017. *Jawaharlal Nehru's Speeches Vol. 3 (1953 —1957)*. New Delhi: Publications Division.

媒體報告

Daily Report, 1947/11/17. “India Wary of American Penetration,”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FBIS) Daily Reports Database, Foreign Radio Broadcasts, Florida: Naples, Readex Inc.*, 2007, Document Number: FBIS-FRB-47-207.

網際網路

Binod Ghimire, 2020/1/9. “Why the MCC compact courted controversy in Nepal,” *The Kathmandu Post*, <<https://kathmandupost.com/2/2020/01/09/why-the-mc-compact-courted-controversy-in-nepal>>.

Department of State, 1950/8/28. “Department of State Policy Statement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Nepal,”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The Near East, South Asia, and Africa, Volume V, FRUS [Washington,]. (Document 836)*,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0v05>>.

Lodrick, Deryck O. 2015/4/21. “Indo-Sikkimese Treaty: India and Sikkim [1950],” *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place/Sikkim#ref1030768>>.

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 2020/8/ 23. “Guide to the MCC Indicators for Fiscal Year 2021,” *MCC*, <https://www.mcc.gov/resources/doc/guide-to-the-indicators-fy-2021>.

與談稿

「『中』印在尼泊爾競逐下的美國因素」與
談稿A Response to "The U.S. factor in China-India
ivalry in Nepal"

方天賜 (Fang, Tien-sze)

國立清華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兼印度中心副主任
臺灣印度研究協會理事長

本文《『中』印在尼泊爾競逐下的美國因素》由印度研究協會郭偉山研究員分析撰寫，是國內非常少數探討尼泊爾問題的專文，因此對這個學術主題有實質的貢獻。此外，本文不僅是探討尼泊爾在「中國」與印度之間的處境，還增加美國的介入因素與考量，讓本文的範疇更加宏觀，是本文另一個值得肯定的特色。

為了探討上述的意旨，作者將全文區分為「前言」、「夾縫中的地緣政治」、「美國因素介入趨強」、「三方競逐對尼影響」及「結論」等節。以下便就其架構順序，進一步討論其論點與省思。

壹、前言：誰是小國？

本節主要是探討「小國」的相關概念。如文中指出，小國的概念包括「實質性的小」、「關係概念的小」及「屬性規模的小」。在此定義下，尼泊爾便是所謂的小國之一。特別是，從地理位置來看，尼泊爾只有「中國」與印度這兩個鄰國，不論面積、人口都遠在尼泊爾之上。在這兩強之間，尼泊爾是不折不扣的小國。

國際關係研究，特別是現實主義者，多以悲觀的角度看待小國的發展命運。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以「米洛斯對話（Melian Dialogue）強調「強者恣意而行，弱者自需受苦（The strong do what they can and the weak suffer what they must.）」」。英國學者卡爾（E. C. Carr）甚至認為：小的獨立民族國家已經難以存在；由眾多民族國家組成的國際組織也難以運作。可見小國在國際政治中的弱勢地位。

因此，作者精準地指出，尼泊爾作為強權力競逐下的小國，相對國力較少小所帶來的脆弱性與敏感性，導致其戰略受到限縮，也因此需要對安全戰略及國際體系進行準

確的判斷。誠如作者指出，小國在「多數情況」僅能選擇追隨大國，在確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尋求拓展經濟等其他面向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作為一個夾在「中」印兩國之間的小國，在國家安全戰略及對外關係上能具有多少的「能動性」，便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

貳、夾縫中的地緣政治：小國只能求生嗎？

尼泊爾雖然位於「中」印之間，但從地理條件來看，因為北部是與西藏高原接壤，所以往南與印度交流較為便利。也因此，尼泊爾與印度在文化、宗教、歷史上的交流都較為密切。作者提及，印度將其視為「勢力範圍」及「緩衝區」。尼泊爾的喜馬拉雅山脈天然安全屏障，有助印度抵禦來自北方的威脅，可以成為印度地區防禦整體框架中的重要戰略緩衝區。作者也援引印度首任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的看法，印度不能容忍在尼泊爾出現任何差錯，也不允許他的柵欄被穿越或變弱，因為那將是對印度自身安全的一個威脅。

另一方面，印度也因為認知它與尼泊爾的特殊關係，希望將尼泊爾視為其勢力範圍。值得注意的是，所謂的勢力範圍其實便具有「反介入/區域拒止」（Anti-Access/Area Denial, A2/AD）的意涵，意圖阻斷第三方的力量進入此區域。除此之外，勢力範圍還隱含區域霸權的階層性關係。基本上，勢力範圍內的國家必須要遵照或至少不能違反霸權國的利益，否則便可能遭到嚴厲的懲處。如作者所言，印度至少在1969年、1989年與2015年三度對尼泊爾實施正式或非正式封鎖，藉此對尼泊爾施壓，強迫其放棄原有的政策。雖然印度總理莫迪執政後之後提出「鄰國優先」外交政策，但作者亦觀察到印度與尼泊爾存在高度的地緣政治不信任及而經濟失衡，進一步加深兩國之間的隔閡。

在此背景下，尼泊爾也思考如何反制或削弱印度對其的宰制力，另一個鄰國--「中國」成為尼泊爾的主要選項。如作者提到，印度希望引進「中國」力量，以便轉向「平衡」、「中立」、「多元化」等外交戰略。近年來的尼「中」具體合作，包括2016年3月《中尼政府間過境運輸協定》、2017年5月《關於在「一帶一路」倡議下開展合作的諒解備忘錄》、2018年6月《關於鐵路合作的諒解備忘錄》等。值得一提的是「平衡」、「中立」、「多元化」等戰略的內涵仍有差異，作者或許可以再進行區分與說明。

就尼泊爾而言，「中國」不僅是與尼泊爾相接的鄰國，長期以來印「中」關係不睦，使得「中」印兩國之間本來就處於競逐狀態。也因此，尼泊爾的策略其實是要善用「中」印的對立情勢，讓自身成為「中」尼印中必須拉攏、不得放棄的對象。因此作者認為，「尼泊爾近年對外採取維護利益的平衡戰略，主要即既不扞從印度亦不倒向『中

國』，而堅持以獲取自身資源利益最大化為目標，通過加強與『中』印相對一方合作以保持均衡戰略。」這樣的觀察頗為中肯。

由此來看，尼泊爾雖然具有客觀上的地緣困境，仍有其外交上的運作空間。甚至，可以爭取成為三角關係中的「樞紐」地位，或成為左右逢源的贏家。

參、美國因素介入趨強：全球霸權的興趣所在？

本文的特色之一即是加入美國因素的變項分析。有趣的是，美國作為世界主要強權，但與尼泊爾的直接關係並不密切。美國對於尼泊爾的興趣主要是來自於尼泊爾與印度及「中國」關係。換言之，美國的主要關切是利用尼泊爾對『中』印兩國產生作用，也就是尼泊爾的地緣價值。由此再度印證，夾處於兩強中的地緣條件未必都是弱勢，也可能轉換成自身的籌碼。

因此，在冷戰時代，美國與尼泊爾交往，以克服印美間的疏離關係，將尼泊爾視為美國介入南亞的根據地之一。借用作者的說法，美國「試圖將尼泊爾建構成反「中」軍事基地及對印施壓節點。」

當前美國對於尼泊爾的政策思維則有所不同。美國希望提升尼國政治穩定與生活水準，以鞏固其獨立於印「中」的自主地位。指標性的作為則是2017年9月的《千禧年挑戰協議》（Millennium Challenge Compact）。這個合作計畫是由美國對外援助機構「千禧年挑戰公司」（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 MCC）與尼國合作，由美方出資5億美元、尼方負擔1.3億美元方的方式，共同開發尼泊爾的基礎建設。此案看似立意良好，也可以協助尼泊爾強化自身的發展。但在合約中，其實蘊含許多不平等的條款。比方說，協議規定不可以牴觸美國法律，但若與尼泊爾法律發生衝突，則以條約內容為主。換言之，條約的位階凌駕在尼泊爾本國法律之上。除此之外，該協定還包括指定設定新機構及將電力輸出印度的強制條款，作者在文中都有列舉說明，讀者可以進一步參考。

尼方因此希望用議會同意授權的方式，讓這個協議可以過關，但引發尼國反對派的示威抗議。美方乃要求尼泊爾在2022年2月28日前通過，否則將資金轉給他國，並暗示將影響美尼關係。在此壓力下，尼泊爾議會於2月27日通過此案。

美尼《千禧年挑戰協議》無疑是當前美國介入尼泊爾的縮影寫照。持平而論，這個計畫明顯是為了平衡「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相對地，本案則是得到印度的支持。協議明白揭櫫：千禧年挑戰公司與美國國際開發署 (USAID)、美國國務院及印度政府密切合作，藉以選定和設計投資項目。因此，印度的角色值得注意。故建議作者可以補充「中國」及印度對此協議的看法及因應作為。

肆、三方競逐對尼影響：誰是尼泊爾的敵與友？

作者在本節中，主要是分析尼泊爾在美印、「中」印大三角關係背景下的發展。作者明確指出，尼泊爾需要仰賴來自鄰國的便利，因此尼泊爾必須將「中」印兩國作為重要發展對象，並承受兩國對尼政策不確定性。美國則基於地緣政治考量，再度強化與尼泊爾關係。作者也花了比較大的篇幅討論美「中」、美印、「中」印等三組關係。

但因為本文是以尼泊爾為研究對象，故建議在此部分中，可以轉換成尼泊爾的視野。也就是說，尼泊爾本身是如何看待美「中」印的互動？以前述的「一帶一路」及《千禧年挑戰協議》為例，既然尼泊爾明知這裡面有許多的爭議，為何還是決定簽署跟加入？尼泊爾的考量為何？另外，也許也可以補充說明一個基本但關鍵的問題：在尼泊爾眼中，印、美、「中」、美三國各帶來什麼樣的威脅與機會？在尼泊爾眼中，何者是尼泊爾最大的國家安全威脅？釐清這些問題後，應該可以進一步強化作者的相關論述。

伍、結語：弱國不能無外交

作者在結語中提出兩個重要的觀察。第一，「對尼泊爾較適合的或許為平衡性策略（strategy of balancing）的大國平衡、中立與不結盟，以及適應性策略（strategy of accommodation）的追隨、黏合與見風轉舵等，交相搓揉、靈活運用的混合型策略。」第二，「絕佳的相對位置亦使得尼泊爾能夠動態推演成為關鍵小國的地位」。這兩個面向相當適切地總結了當前尼泊爾外交的特色。

但本文的價值並不僅在於尼泊爾這一個個案分析，而是進一步印證我們對小國外交的省思。若大國政治是所謂的悲劇，那小國政治又會是什麼樣貌？國際關係研究在傳統上重視大國間的角力，將小國視為國際政治的配角或龍套。悲觀者可能會以「弱國無外交」論述來睥睨小國外交的可能性。但事實上，弱小國家因為在政、經、軍、科、文等領域的相對實力較小，所以更需要仰賴外交的智慧及手段，也就是「弱國不能無外交」。國際實踐也已經證明，小國並非只有抗衡及扈從兩種選擇，還包括軟平衡、中立、避險、適應等諸多手段。換言之，小國必須展現更多的動態彈性。尼泊爾如何應對外部的強權結構，也許便可以作為我們思考的背景之一。

解構中國大陸「次國家級外交」與亞太 非傳統安全利益關係

To deconstruc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na's "Subnational diplomacy" and Asia Pacific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黃秋龍* (Huang, Chiu-Lung)
展望與探索雜誌社研究員

摘 要

鑑於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德國墨卡托中國研究所等西方主要國家與機構，陸續對大陸「次國家級外交」(Subnational diplomacy)提出警示。然而，即使中國大陸(下稱大陸)在面臨國際社會抗「中」聯盟情勢下，卻仍能「以周邊和大國為重點，以發展中國家為基礎，以多邊為舞臺」，顯然與其應用「次國家級外交」策略，具有相當關聯性。本文分析「次國家級外交」歸納發現，除在拓展對外關係上具有獨特優勢外，甚至也能擴深非傳統安全利益場域。進而，本文以為大陸「次國家級外交」場域擴深，也經常與其所偏好之政治進程相互複合，包括參與國際維和行動、應對氣候變遷、「一帶一路」倡議、深度參與全球治理，以及加強反恐、網路和執法等國際領域合作等。正因此場域擴深之複合特性，從而「次國家級外交」對西方主要國家與亞太周邊之衝擊影響，也在政治、軍事、外交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之複合安全領域，呈現交互作用關係。亦即，評估「次國家級外交」之衝擊影響，將係新興複合安全(Complex security)議題。初步發現包括：意圖讓親「中」勢力從量變到質變、大陸以辯證思維看待「次國家級外交」、利用西方民主開放體制、具有長程戰略利益考量、利用脅迫顛覆虛假訊息進行國會政治工作等。

關鍵詞：次國家級外交、非傳統安全、複合安全、地方包圍中央

*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政治學系、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學系兼任副教授

壹、前言

今(2022)年7月6日，隸屬美國國家情報總監(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辦公室的美國國家反情報和安全中心(The National Counter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Center)，發布「守護我們未來：在美國州與地方層級保護政府和商界領袖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影響力行動危害」(Safeguarding our future bulletin – Protecting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leaders at the U.S. state and local level from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influence operations)簡報(下稱「簡報」)，指出大陸官方在尋求利用與美國各州和地方領導人多年的商業和文化關係，來推進其地緣政治和軍事目標，呼籲美國各州和地方領導人，警惕大陸次國家級影響力行動(Subnational influence operations)。¹鑑於次國家級影響力行動，經常係採公開合法形式進行，而今西方國家對大陸提高警惕，大陸次國家級影響力行動也可能影響亞太非傳統安全利益，值予關注。

貳、問題意識與研究構想

一、問題描述與問題意識

由於，美國國家情報總監既直接受美國總統指揮管理，亦係美國聯邦政府內閣層級機關。如今發布對大陸必須高度警惕訊息，不僅極為罕見，而且國際新興知名英文政治期刊《外交家》(The Diplomat)，於今年1月4日，曾發表「拜登政府下的中美次國家級交流」(China-US Subnational Exchanges unde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專文指出，雖然川普(Donald J. Trump)政府時期以來，即致力於應處大陸次國家級影響力行動，以及聯邦政府與大陸保持必要的緊張態勢，然而目前雙方卻仍在提升次國家級關係。²基於情勢看來，大陸正意圖規避抗「中」聯盟的政治與意識形態紛爭，轉而持續應用「次國家級外交」策略，不僅引起國際重要智庫關切；更值得注意的是，該策略係利用西方國家地方政府、社會基層結構與利害關係人，對抗或緩和各國對「中」政策，以利朝大陸所偏好的政治進程推進。例如：參與國際維和行動、應對氣候變遷、「一帶一路」倡議、深度參與全球治理，以及加強反恐、網路和執法等國際領域合作等。³

1 “Safeguarding our future bulletin – Protecting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leaders at the U.S. state and local level from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influence operations,” (2022/7/6), visited date 2022/8/17,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https://www.dni.gov/files/NCSC/documents/SafeguardingOurFuture/PRC_Subnational_Influence-06-July-2022.pdf.

2 Flora Yan, “China-US Subnational Exchanges unde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2022/1/4), visited date 2022/8/17, 《The Diplomat》,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1/china-us-subnational-exchanges-under-the-biden-administration/>.

3 「楊潔篪：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外交思想 不斷譜寫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篇章」(2017年7月17日)，2022年8月

當前美國、西方主要國家與大陸之競合關係，不僅呈現在經貿、金融、疫情、意識形態、軍事科技、地緣政治等領域，而且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發布2021年度咨文時，已稱大陸是制度競爭者、對手、合作夥伴。⁴即使美國社會比較為分裂，然而共和黨、民主黨菁英把大陸看成競爭對手之共識，卻是達到歷史空前高度；甚至，美國國防部部長奧斯汀（Lloyd J. Austin）也將對大陸戰略競爭稱為「綜合威懾」（Integrated Deterrence）。⁵從而，本文問題意識發想，緣起於何以大陸在面臨國際社會抗「中」聯盟情勢下，還能宣稱「以周邊和大國為重點，以發展中國家為基礎，以多邊為舞臺」，⁶初步以為與其應用「次國家級外交」策略，具有一定關聯。

二、研究構想

藉由問題描述與提出問題意識，進而說明本文研究構想。首先，在嘗試了解，相較於傳統外交與傳統安全範疇，「次國家級外交」有何獨特優勢與拓展場域機制。接續，解釋「次國家級外交」，何以存在有利於擴深雙邊關係發展動力，以及拓展非傳統安全領域空間。正由於場域擴深之複合特性，從而「次國家級外交」對西方主要國家與亞太周邊之衝擊影響，也反映在政治、軍事、外交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相互複合，彼此呈現交互作用關係上。基此，本文將進而就大陸推動其所偏好政治進程，對亞太周邊之衝擊影響，在複合安全層面上，嘗試做出若干初步評估。

參、「次國家級外交」具有獨特優勢

一、「次國家級外交」能助推國家級外交

「次國家級政府」（Subnational government）在中央政府擁有領土絕對主權與集中所有政治權力之單一制國家（Unitary state）而言，即指「次中央政府」，也即地方政府。然而，「次國家級外交」則是一種以兩國間地方政府為主的官方外交模式，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次國家級外交對國家級外交發揮重要推動作用。2010年，時任美國駐大陸大使

17日下載，《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17/0717/c64094-29410176.html>。

4 「歐盟2021年度咨文：中國是競爭者、對手、合作夥伴」（2021年9月15日），2022年8月17日下載，《德國之聲》，<https://www.dw.com/zh/%E6%AC%A7%E7%9B%9F2021%E5%B9%B4%E5%BA%A6%E5%92%A8%E6%96%87-%E4%B8%AD%E5%9B%BD%E6%98%AF%E7%AB%9E%E4%BA%89%E8%80%85%E5%AF%B9%E6%89%8B%E5%90%88%E4%BD%9C%E4%BC%99%E4%BC%B4/a-59189635>。

5 Lloyd J. Austin, “Austin Says Current Operations Give Hints of New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2022/2/18), visited date 2022/8/17,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2940956/austin-says-current-operations-give-hints-of-new-national-defense-strategy/>.

6 「楊潔篪：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外交思想 不斷譜寫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篇章」。

洪博培(Jon Meade Huntsman)⁷建議大陸領導人參加2011年的美國州長會議，旨在推動美「中」地方政府交流。同年，「美國駐華大使館和領事館」正式提出該名詞，並開展多方面的「中」次國家級外交活動，如在「美國駐華大使館和領事館」網站上出現「河南小組」、「陝西小組」和「山東小組」，每個小組均由該館新聞文化處、政治處、經濟處和領事處的不同工作人員組成，負責加強美國與大陸特定省份的直接交往，這種外交模式即稱之為「次國家級合作」。⁸由於，該合作機制具有長程戰略利益，有助於建立美國州長與大陸省級黨委書記、省長之間的交流平臺，也可能讓彼此未來國家領導人，藉由該平臺相互「打交道」。

「次國家級外交」是美國前國務卿萊斯(Condoleezza Rice)倡議「轉型外交」(Transformational diplomacy)的延伸，即在中央政府之外，在社會基層和廣大公民中施加影響。⁹事實上，「次國家級外交」有別於公共/民間外交(Public diplomacy)，不僅因其具有強烈的官方色彩，更有其獨特的優勢，包括：(一)地方交往是非主權性的，並不代表國家，然若國家間關係出現問題的時候，地方性外交仍然可以進行。見諸1989年大陸發生天安門事件後，美「中」高層交往暫停，1990年7月7日，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朱鎔基，即曾率領武漢、重慶、合肥、寧波、太原5位市長共同訪美，就美國對大陸最惠國待遇與雙方經貿利害關係進行溝通，在一定程度上開啟雙方交往的局面。¹⁰1998年3月，朱鎔基出任國務院總理，1999年4月6日至14日再度訪美，亦適逢美國再度提案要求聯合國譴責「中國」人權問題，美日安保立法案甫獲日本眾議院通過，彼此關係由「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跌入谷底之際。事實上，朱鎔基同時在推展「次國家級外交」，不僅與洛杉磯市市長、加州州長、科羅拉多州州長、「西部州長協會」、芝加哥市市長、伊利諾多州州長、紐約經濟俱樂部、紐約州州長會面或餐敘，並參加科羅拉多州與湖南省、丹佛市與昆明市締結為姊妹州市儀式。¹¹(二)「次國家級外交」看似服務地方政府，但可能影響兩國外交政策。「次國家級外交」行為不僅在經濟領域的作用顯而易見之外，同時也要注意，越來越多的國家領導人就是直接來自次國家級政府。例如，歐巴馬(Barack Obama)之前的5位美國總統中，有4位是出身自次國家級首長，包括曾任喬治亞

7 洪博培(Jon Meade Huntsman)，美國政治人物、商人和外交家，會講流利的中文，曾經在2005年到2009年期間擔任猶他州州長、1992年到1993年期間擔任美國駐新加坡大使，2009年8月起擔任第9任美國駐大陸大使，至2011年4月30日離任。

8 「中美外交開始『地方支援中央』」(2011年3月14日)，2022年8月17日下載，《南方週末》，<http://style.sina.com.cn/news/p/2011-03-14/092475074.shtml>。

9 Condoleezza Rice, "Transformational Diplomacy," (2006/1/18), visited date 2022/8/17,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2001-2009.state.gov/secretary/rm/2006/59306.htm>.

10 「朱鎔基的第一次訪美」(無發布日期)，2022年8月17日下載，《熱點新聞》，https://www.cnnews.today/showArticle?main_id=5551f74cd3c06edfcd02b82aa8ed30df。

11 「大陸工作簡報1999年5月」(1999年5月)，2022年8月17日下載，《中華民國大陸委員會》，<https://www.mac.gov.tw/cp.aspx?n=AAB9AAF3A7B802E2>。

州州長卡特(Jimmy Carter)、加利福尼亞州州長雷根(Ronald Reagan)、阿肯色州州長柯林頓(Bill Clinton)、德克薩斯州州長小布希(George W. Bush)等。

二、「次國家級外交」拓展非傳統安全領域空間

20世紀70年代，「次國家級政府」不僅在對外經濟交往中的作用明顯加強。進入80年代，還涉足軍備控制、無核化、制裁南非種族隔離政權等國際事務。冷戰結束以來，「次國家級外交」更獲得全面快速發展：參與國際事務的「次國家級政府」越來越多、涉足的領域越來越寬泛，並對國家中央政府外交中的參與權重快速提升，中央政府與「次國家級政府」在外交事務中出現強化協作的趨勢。在全球化背景下，地方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日益成為次國家政府合法性的基礎，而地方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不得不越來越多地依賴於國際合作。見諸氣候變遷、跨境犯罪、恐怖主義等非傳統安全問題，造成國家間相互依存的深化、國際聯繫的增強，乃成為「次國家級外交」的拉力；相對的，中央對「次國家級政府」關切跨界利益，以及國際事務參與能力的增強，則係「次國家級外交」的推力。而今，非傳統安全利益的跨界聯動性，以及國際社會協商型的非零和性博弈模式，使得決定國家整體利益的實現方式也相應變化，「次國家級外交」越來越成為國家利益實現的重要途徑。例如，歐洲聯盟與大陸的外交與經貿關係，因新疆人權等政治問題而產生震盪甚至相互制裁。然而，自2021年11月以來，大陸已派出歐洲事務特別代表吳紅波¹²，組團密集訪問歐洲國家與歐盟對外事務部，以及包括遭大陸制裁在德國及歐洲最具規模且專門研究大陸政策的智庫—墨卡托中國研究所（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MERICS），為展開談判預為準備。檢視該代表團主要目的，就在於評估與歐盟解除制裁，以及重啟「中歐全面投資協定」（China-EU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f Investment）的可能性。¹³可見，「次國家級外交」的相關活動，既可以減輕中央政府的工作負擔，也可以發揮「次國家級政府」的工作積極性，不僅在非傳統安全領域上拓展活動空間，也直接促進整體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進步。

三、「次國家級外交」有利擴深雙邊關係發展

2021年12月31日，德國經濟亞太委員會主席、西門子公司(Siemens)總裁博樂仁(Roland Busch)，在《南德意志報》(Süddeutsche Zeitung)警告綠黨籍外交部部長貝爾克博(Annalena Baerbock)「不要與中國採取對抗性外交」，「如果發布出口禁令，意味我們不能再從中國購買太陽能電池，德國能源轉型將就此告終」。¹⁴博樂仁曾於2005年在

12 吳紅波（1952年5月~，山東省泰安市寧陽縣人），大陸外交官，於2012年5月獲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任命為聯合國副秘書長，負責經濟和社會事務，2019年11月，出任大陸首位歐洲事務特別代表。

13 「中國訪歐團尋求解除制裁 學者：勉強承認失策」（2022年1月6日），2022年8月17日下載，《自由亞洲電臺》，<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unshiwaijiao/ci-01062022134233.html>。

14 「德國西門子總裁警告外長不要對抗中國」（2022年1月3日），2022年1月19日下載，《法國國際廣播電臺》，<https://>

上海出任西門子公司汽車亞太區總裁兼執行長，至2020年3月擔任公司總裁迄今。西門子在大陸經營已逾一百五十年，目前擁有三萬名以上員工，21個研發中心，主要從事電氣化、自動化與數位化領域業務，實際從事大陸城市生活就業等網路構築。2021年11月12日，博樂仁發布該公司2021年財政年度(2020年10月1日至2021年9月30日)，西門子新訂單額達到714億歐元，營收達到623億歐元，均實現兩位數成長(2020財政年度訂單及營收金額分別為580、553億歐元)。¹⁵

再者，對德國汽車製造商福斯公司 (Volkswagen, 大陸稱：大眾公司)而言，大陸既是福斯汽車重要生產基地、供貨方，也是其極其重要的銷售市場。今年6月30日，該公司首席執行官迪斯 (Herbert Diess)，接受德國發行量前3大新聞週刊之一《明鏡》(Spiegel)採訪，強調大陸市場對德國經濟具重要性，並指出：「在德國，人們嚴重低估了中國給德國繁榮帶來的貢獻」，「如果與中國脫鉤，德國的情況看起來將完全不同，經濟增長、繁榮和就業機會都會受到影響」，「如果沒有與中國的業務往來，通貨膨脹將進一步加劇」。同時，迪斯也回應新疆問題表示：「我們一直在思考設置在新疆的工廠」，「時至今日，我認為我們應該留在那裡，因為撤出的選項沒有任何用處。我們可以確保那裡不存在強迫勞動。」¹⁶另外，德國最大經濟研究機構之一「經濟研究院」(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於今年8月8日，發布《地緣政治挑戰及其對德國經濟模式的影響》(Geopolitische Herausforderungen und ihre Folgen für das deutsche Wirtschaftsmodell)德文研究報告，在英文簡報稱，如果出現西方國家與大陸雙邊脫鉤情況，大陸GDP降幅會高達2.27%。此數據將遠高於西方國家的GDP損失，大陸將成為最大輸家。同時，對於如果德「中」間發生貿易問題，其對德國關鍵經濟產業，認為將會變得非常艱難，甚至要付出6倍於英國脫歐之代價。¹⁷顯然，西門子公司、福斯公司，不僅對大陸之經貿利益實乃不言而喻，而且存在影響德國對大陸政策的利害關係。可見「次國家級外交」未必侷限於官方往來，它也有利於擴深雙邊關係發展，包括：智庫深度對話、構築友好城市網絡、民間和官方互訪、訂立正式合作協定等。

www.rfi.fr/tw/%E4%B8%AD%E5%9C%8B/20220103-%E5%BE%B7%E5%9C%8B%E8%A5%BF%E9%96%80%E5%AD%90%E7%B8%BD%E8%A3%81%E8%AD%A6%E5%91%8A%E5%A4%96%E9%95%B7%E4%B8%8D%E8%A6-%81%E5%B0%8D%E6%8A%97%E4%B8%AD%E5%9C%8B。

15 「西門子作為專注的科技公司取得成功開局，2021財年業績表現卓越」(2021年11月12日)，2022年1月19日下載，〈SIEMENS〉，<https://m.thesjoquists.com/www/Company/SiemensIndustry/newsDetail.ashx?id=105605>。

16 「大眾總裁：沒有對華業務，德國通脹將更嚴重」(2022年7月1日)，2022年8月17日下載，〈德國之聲〉，<https://www.dw.com/zh/%E5%A4%A7%E4%BC%97%E6%80%BB%E8%A3%81%E6%B2%A1%E6%9C%89%E5%AF%B9%E5%8D%8E%E4%B8%9A%E5%8A%A1%E5%BE%B7%E5%9B%BD%E9%80%9A%E8%83%80%E5%B0%86%E6%9B%B4%E4%B8%A5%E9%87%8D/a-62327465>。

17 Clemens Fuest, Lisandra Flach, Florian Dorn, Lisa Scheckenhofer, "A trade war with China would cost Germany six times as much as Brexit," (2022/8/8), visited date 2022/8/17,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 <https://www.ifo.de/en/press-release/2022-08-08/trade-war-china-would-cost-germany-six-times-much-brexit>.

四、推動大陸所偏好的政治進程

2021年12月20日，美國愛荷華州前州長、駐大陸前大使布蘭斯塔德（Terry Branstad）宣布，正在組建專注於美「中」關係的諮詢集團，將為向大陸投資的企業家和投資人提供指導和解決方案。¹⁸布蘭斯塔德則曾被大陸官媒喻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有著和大陸人打交道的豐富經驗。布蘭斯塔德曾2度擔任愛荷華州州長，1983年推動愛荷華州與大陸河北省結成姐妹省；習近平尚未擔任大陸國家主席時，曾於1985年以河北省正定縣縣委書記身分，以省級農業代表團名義訪問愛荷華州，與時任州長布蘭斯塔德會面。之後兩人曾2度官式會面，外界視布蘭斯塔德與習近平關係友好，布蘭斯塔德於2017年7月出任駐大陸大使，2020年10月離任。¹⁹另曾任美國3任加州前州長、現任「加中氣候中心」（California-China Climate Institute）主席布朗（Jerry Brown），不僅重提2017年與習近平「非凡的」（Unusual）會面，並與大陸簽訂氣候變遷與潔淨、水資源技術等協議，倡議拜登總統應與大陸展開氣候變遷合作。布朗亦曾以加州災難性乾旱議題，2017年6月1日，聯合61位州市長，發表抗議前總統川普退出《巴黎協定》，並與時任紐約州州長庫墨（Andrew Mark Cuomo）、華盛頓州州長英斯利（Jay Robert Inslee），結盟為美國氣候聯盟共同主席，號召其他州市長加入。布朗認為川普、拜登固然與「中國」存在真實與顯著的分歧，卻可在氣候變遷上尋找全球轉型出路，展開共同合作。²⁰而今，時值美國制定系列反制大陸法案與部署國際抗「中」聯盟之際，大陸更是加緊向西方國家地方政府、社會部門與利害關係人施壓。顯然，「次國家級外交」出現新興策略運用空間，不僅在對抗或緩和各國對大陸政策，更在推動大陸所偏好的氣候變遷等政治進程。

肆、「次國家級外交」衝擊影響複合安全利益

一、意圖讓親「中」勢力從量變到質變

德國墨卡托中國研究所於2021年11月18日，發布「小池塘裡的大魚：中國在歐洲的次國家級外交」（Big fish in small ponds: China's subnational diplomacy in Europe）報告，

18 「美國前駐華大使組建諮詢集團指導投資中國」（2022年1月3日），2022年8月17日下載，《法國國際廣播電臺》，<https://www.rfi.fr/tw/%E5%9C%8B%E9%9A%9B/20211222-%E7%BE%8E%E5%9C%8B%E5%89%8D%E9%A7%90%E8%8F%AF%E5%A4%A7%E4%BD%BF%E7%B5%84%E5%BB%BA%E8%AB%AE%E8%A9%A2%E9%9B%86%E5%9C%98%E6%8C%87%E5%B0%8E%E6%8A%95%E8%B3%87%E4%B8%AD%E5%9C%8B>。

19 「布蘭斯塔德大使修睦不成 別了中國」（2020年5月10日），2022年1月19日下載，《法國國際廣播電臺》，<https://www.rfi.fr/tw/%E4%B8%AD%E5%9C%8B/20201004-%E5%B8%83%E8%98%AD%E6%96%AF%E5%A1%94%E5%BE%B7%E5%A4%A7%E4%BD%BF%E4%BF%AE%E7%9D%A6%E4%B8%8D%E6%88%90%E5%88%A5%E4%BA%86%E4%B8%AD%E5%9C%8B>。

20 Yan, "China-US Subnational Exchanges unde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指出大陸對歐洲政策，不僅在很大程度上繞過了歐盟機構和國家層級政府，穩步擴大與次級部門的聯繫，與數不清的地區和城市建立各類夥伴關係；而且次國家級外交導致對大陸投資、研發合作以及政治和文化交流的增加，使歐洲的地方政府和城市，基本上對大陸持歡迎態度。同時，該報告亦發現美「中」兩國關係近年來雖然迅速惡化，從白宮到國會與美國聯邦層級的政界領袖，在「中國問題」上所持立場基本高度一致，但是在地方層級的州、市政府中，對「中國」的態度很多時候卻迥然不同。在50位州長中，只有6位對大陸態度強硬，明確對大陸示好的州長則多達17個。²¹同月23日，美國捍衛民主基金會(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即曾發布「中國如何嘗試讓美國自我反轉」(How China is Trying to Turn the U.S. against Itself)研究報告，就長期以來普遍為人忽略的大陸對外戰略提出警告。該報告指出，有關大陸的研究方法論過於簡單，人們慣於基於大陸的公開聲明；事實上，大陸將地方政府關係視為對美施加影響的潛在工具，大陸期待的是，在短期內，美國州級和地方政府可以向聯邦政府施加壓力；從長遠來看，大陸將美國地方官員，視為未來的國家領導人來進行交往。²²可見，「次國家級外交」不僅出現新興策略運用空間，也為大陸總體國家利益與外交戰略服務，既在推動大陸所偏好的政治論述，也意圖讓親「中」勢力從量變到質變，以培養對其友好之國際力量。

二、大陸以辯證思維看待「次國家級外交」

2020年8月24日，習近平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不僅強調要「以辯證思維看待新發展階段的新機遇新挑戰」，並且要運用矛盾論進行表述：「我們要辯證認識和把握國內外大勢，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域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刻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展變化帶來的新特徵新要求，深刻認識錯綜複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增強機遇意識和風險意識，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勇於開頂風船，善於轉危為機，努力實現更高品質、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²³事實上，運用矛盾論之具體實踐則在「以高水平對外開放打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習近平既明確指出：「當前，國際社會對經濟全球化前景有不少擔憂。我們認為，國際經濟聯通和交往仍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

21 Heinrich Böll Stiftung, "Big fish in small ponds: China's subnational diplomacy in Europe," (2021/11/18), visited date 2022/8/17, 《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https://merics.org/en/report/big-fish-small-ponds-chinas-subnational-diplomacy-europe>.

22 Nathan Picarsic and Emily de La Bruyère, "How China Is Trying to Turn the U.S. against Itself: Across the country, Beijing has worked to cultivate relationships with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and private businesses in an effort to advance its agenda," (2021/11/23), visited date 2022/8/17, 《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 <https://www.fdd.org/analysis/2021/11/23/china-trying-to-turn-the-us-against-itself/?nowprocket=1>.

23 「(受權發布) 習近平：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的講話」(2020年8月24日)，2022年8月17日下載，《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8/24/c_1126407772.htm。

的一個重要動力就是對外開放。對外開放是基本國策，我們要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形成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要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推動完善更加公平合理的國際經濟治理體系」。同時，習近平也揭示當前在推進對外開放中要注意的兩點：「一是凡是願意同我們合作的國家、地區和企業，包括美國的州、地方和企業，我們都要積極開展合作，形成全方位、多層次、多元化的開放合作格局。二是越開放越要重視安全，越要統籌好發展和安全，著力增強自身競爭能力、開放監管能力、風險防控能力，煉就金剛不壞之身。」²⁴顯然，習近平當前推進對外開放的對象，已針對美國的州、地方和企業，甚至西方民主國家，充分應用「次國家級外交」策略。值得注意的是，該策略充分應用矛盾辯證關係，更體現於習近平2018年5月4日，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週年大會時所曾表述的說法：「辯證唯物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²⁵

三、「次國家級外交」利用西方民主開放體制

2021年11月30日，大陸外交部副部長謝鋒，在北京與美國工商界和地方州市代表舉行視訊交流對話，謝鋒顯然應用「次國家級外交」策略。一方面，毫不掩飾的要求美國地方政府官員「發聲出力，仗義執言」，「做中美關係止損企穩的先行者和推動者，為兩國關係『鼓與呼』」，「『大樹底下好乘涼』。大環境好了，經貿合作就會更順暢。反之，兩國關係惡化，商界也不可能『悶聲發大財』」；甚至意圖對抗或緩和美國對「中」政策，「希望大家繼續發揮重要獨特作用，發聲出力，仗義執言，推動美國政府奉行理性務實的對華政策，停止打貿易戰、產業戰、科技戰，停止製造價值觀、意識形態、地緣政治對抗與衝突」，「希望商界朋友明確反對經貿問題政治化，反對濫用國家安全概念，推動拜登政府取消對華加徵的關稅，停止對中國企業的打壓和制裁」，「阻止國會通過《創新與競爭法案》等涉華法案」。²⁶再方面，謝鋒也提出大陸所偏好的政治進程，形式上是「做中美人民友誼的橋梁和紐帶，增進相互理解與信任」，「希望你們把在華所見所聞所感傳回大洋彼岸，不必溢美，真實就好，讓美國普通人全面、客觀、真實地瞭解中國」。實質上則是「臺灣、新疆、香港、西藏等問題涉及中國主權安全發展等核心利益」，「中方沒有任何妥協餘地」，「中國北京於明(2022)年2月舉辦冬奧會，美國洛杉磯也將於2028年舉辦夏奧會，中美應該相互支持」，「希望美國工商界和地方州市為此做出積極貢獻」。²⁷

24 「（受權發布）習近平：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的講話」。

25 「習近平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2014年11月4日），2022年8月17日下載，〈人民網〉，<http://cpc.people.com.cn/n1/2018/0505/c64094-29966415.html>。

26 「外交部副部長謝鋒與美國工商界和地方州市代表視頻交流」，（2021年11月30日），2022年8月17日下載，〈中國大陸外交部〉，https://www.fmprc.gov.cn/web/wjbxw_673019/202111/t20211130_10459101.shtml。

27 「外交部副部長謝鋒與美國工商界和地方州市代表視頻交流」。

可見，謝鋒除了呼籲次國家級部門對抗或緩和拜登政府對「中」政策，既在利用西方民主開放體制，更在倡議大陸所偏好的政治進程，包括維護其境內主權完整、確保2022年2月冬奧會順利進行等。然而，卻將對我國安全利益和國際抗「中」聯盟，造成不穩定與潛在衝擊。見諸2022年北京冬季奧運會前夕，美國西雅圖市周邊的斯特拉孔市(Steilacoom, Washington)市長穆理(Dick Muri)、塔科馬市(Tacoma, Washington)市長伍達德斯多(Victoria Woodards)，分別致函習近平，預祝冬奧會圓滿成功，並得到習近平回信。²⁸然而，正逢美國對北京冬奧會進行外交抵制的大環境下，這種繞過國家聯邦政府的「次國家級外交」，不僅凸顯美國聯邦與州市地方的政治矛盾，更成為大陸對內部與國際社會進行政治宣傳之工具。

四、「次國家級外交」具有長程戰略利益考量

《英國廣播公司新聞》(BBC News)、《泰晤士報》(The Times)與《法國國際廣播電臺》(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法國新聞社》(L' Agence France-Presse)等國際媒體，於今年1月13日，援引英國安全局(即軍情五處[Military Intelligence, Section 5])對國會議員發出罕見的警告指出，一名長期在英國經營律師業務者李貞駒(Christine Ching Kui Lee)女士，受大陸統戰部門徵召，秘密滲透到英國議會，試圖干預英國政治。李貞駒扮演促進者角色，向政黨、議員、議會候選人和嚮往在英國擔任政治職務的人提供捐款，資金則來自在大陸或香港的非英國人。²⁹同月13日，加拿大情報局(Canad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Service)向《環球郵報》(Globe and Mail)證實，該局正向國會參眾議員通報，提醒他們要提防外國的影響和干預行動。通報這些情報是為了提高議員們對來自外國的干預和其他敵意行為的意識，加強個人保安措施，以保障加拿大國民及其利益。雖然該局並未公布受通報對象，但其中兩名華裔議員包括保守黨負責外交事務評論的莊文浩(Michael Chong)和新民主黨負責移民事務評論的國會議員關慧貞(Jenny Kwan)承認獲得了該局的通報。由此顯示，該局所謂的「外國」，主要是針對「中國」。³⁰

「中國駐英國大使館」就英國安全局對李貞駒之通報曾提出反駁，強調「堅決反對捕風捉影，對英國的華人群體進行抹黑、恐嚇」。然而，李貞駒之職場特性卻易於發展政治工作，她不僅曾參與目前已解散的跨黨派議會組織「在英華人」(Chinese in Britain)，獲得前首相梅伊(Teresa May)頒贈「光點獎章」(Point of Light award)；亦係「中國海外交流協會」成員、「中國駐英國大使館」首席法律顧問、大陸國務院僑務辦

28 「習近平覆信美國華盛頓州塔科馬市市長伍達德斯、斯特拉孔市市長穆理」(2022年2月2日)，2022年8月17日下載，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2-02/02/c_1128324404.htm。

29 「英國軍情五處警告中共代理人滲透議會 中國駐英使館發聲明駁斥」(2022年1月13日)，2022年8月17日下載，<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uk-59980740>。

30 「中國影響滲透加拿大 加國情報局與學者提出警告」(2022年1月22日)，2022年8月17日下載，<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unshiwaijiao/1f-01122022144316.html>。

公室(中共中央統戰部對外加掛牌子)法律顧問，還是英國國會跨黨派中國小組秘書，創立「英國華人參政計畫」，積極開展英「中」國會外交關係，曾受邀列席大陸全國政協會議，也到北京面見領導高層包括習近平等人。³¹可見，李貞駒職場的可發揮空間，除了明確顯示她對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性，其法律專業背景更有助於規避當地國偵辦其間諜罪的法定要件。

事實上，檢視李貞駒的行為樣態，則是再度出現大陸針對英國國會具有潛力的意見領袖著手的政治工作模式。李貞駒涉入英國政治，顯係源自於布萊爾(Tony Blair)擔任首相期間(1997-2007)，當時她與倫敦工黨議員暨部長加迪納(Barry Gardiner)結盟。據《泰晤士報》報導，加迪納接受李貞駒 20 萬英鎊捐贈，此結盟關係令加迪納及其選區黨部受惠。後來加迪納成為「英國華人參政計畫」主席，李貞駒兒子魏克斯(Michael Wilkes)則擔任副主席，積極倡議英國華人如何在政治上取得影響力，大陸官媒也讚揚李貞駒的工作。魏克斯受聘於加迪納期間，曾為加迪納負責安排每天的行程。³²雖然，魏克斯已於今年1月13日辭職，值得注意的是，藉此案例可見，大陸針對國會意見領袖的政治工作模式，仍將屢見不鮮。例如，美國前參議員、情報委員會主席范士丹(Dianne Feinstein)，2003年被列為第5富裕參議員，其夫婿Richard C. Blum銀行家投資大陸事業。然而，時任范士丹辦公室主任劉紹漢，曾與「社會正義教育基金會」合作，藉操作二次大戰慰安婦求償議題，試圖掩護其情報工作身分。³³

綜此顯示，即使當前大陸面臨美國發起的國際抗「中」聯盟與制裁行動，仍慣於利用西方民主國家權力制衡的特性，在未達刑事起訴要件前，進行國會政治遊說或滲透，試圖影響當地國政府部門對「中」政策或行動。

五、利用脅迫顛覆虛假訊息進行國會政治工作

加拿大情報局職掌國家安全、情報、反間諜、反顛覆、反恐怖、電子監聽、外線跟蹤、竊聽，以及情報人員的召募與派遣等工作，隸屬於加拿大皇家警騎(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主要任務是負責蒐集對加拿大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情報，偵察威脅國家安全的各種活動，並向政府有關部門提供安全評估報告。而今，該局罕見地對國會參眾議員發出警告，除了提防外國(「中國」)及其代理人從事滲透活動，試圖影響國會議政和政府決策之外，同時也提醒議員外國干預的手段，包括脅迫、顛覆和

31 「英國軍情五處警告中共代理人滲透議會 中國駐英使館發聲明駁斥」。

32 「英國軍情五處警告中共代理人滲透議會 中國駐英使館發聲明駁斥」。

33 “Feinstein defended China against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s husband got rich off Chinese companies,” (2022/1/26), visited date 2022/8/17, 《Fox News》<https://www.foxnews.com/politics/feinstein-repeatedly-defended-china-against-human-rights-accusations-as-husband-got-rich-off-chinese-companies>.

利用虛假訊息(Misinformation)等手段，並指稱要注意「中國」如何利用代理人或商業說客來達到目的。據接受該局通報的議員關慧貞表示，在2021年聯邦大選前後都收到情報局的簡報，內容主要集中在大陸對加拿大進行滲透，並有助於所有議員瞭解這個問題。再者，加拿大學者研究亦顯示去年加拿大聯邦大選中，有親大陸人士利用散播虛假訊息等手段抹黑保守黨候選人，干預加拿大政治運作。例如，加拿大麥基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研究人員李紫楓(Sze-Fung Lee)和馮班傑明(Benjamin Fung)於今年1月4日，在新興數位期刊Policy Options Politiques發表「虛假訊息和中國在加拿大的干預」(Misinformation and Chinese interference in Canada's affairs)，即指出2021年聯邦大選期間，微信上大量散播著針對保守黨候選人的虛假宣傳，令人不安地證明了敵對的外國(「中國」)行為者，如何干預加拿大的政治體系。³⁴

回顧前揭美國國家反情報和安全中心「簡報」指出，美國州和地方領導人數十年來，與大陸建立很多實體聯繫，通常給雙方都帶來益處，但是隨著美「中」緊張關係加劇，習近平領導下的官方機關，越來越尋求利用美「中」間地方與企業關係，來影響美國政策並推進大陸地緣政治利益。包括：一、大陸官方瞭解美國各州和地方領導人，在一定程度上獨立於聯邦政府，可能會尋求利用他們做為代理人，來宣導大陸所希望的美國國家政策，尤其是關於改善美國與大陸經濟合作；二、減少美國對大陸針對臺灣、藏人、維吾爾人、民主活動人士和其他人權方面政策批評；三、大陸次國家級影響力行動，既有公開形式的公共外交活動，也可同時具有欺騙性和脅迫性(Deceptive and coercive)，看似良性商業機會或民間交流，實則隱藏著大陸的政治議程；四、大陸次國家級影響力行動者，除中共中央統戰部在海外影響力活動扮演領導作用，大陸外交部、公安部和教育部也參與其中，還有一些半官方實體或代理人，如「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等；五、大陸採取軟硬兼施兩手策略，不僅廣泛蒐集對象訊息，甚至對象在職場生涯初期，就成為情蒐目標，以期在彼等晉升後加以利用，用來推動大陸政經利益，甚至也利用經貿和投資，來獎勵或懲罰地方、企業領導人。概括而言，大陸次國家級影響力行動，不僅為其政軍地緣戰略與政治議程服務，同時也交互運用「地方包圍中央」(Using the local to surround the central)與軟硬兼施兩手策略。³⁵

概括看來，固然大陸「次國家級外交」有助於擴深複合安全利益場域，卻因經常與其所偏好之政治進程相互複合，從而也正因此複合特性，使得「次國家級外交」對西

34 Sze-Fung Lee and Benjamin Fung, "Misinformation and Chinese interference in Canada's affairs," (2022/1/4), visited date 2022/8/17, *Policy Options Politiques*, <https://policyoptions.irpp.org/magazines/january-2022/misinformation-and-chinese-interference-in-canadas-affairs/>.

35 "Safeguarding our future bulletin – Protecting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leaders at the U.S. state and local level from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influence operations."

方主要國家與亞太周邊之衝擊影響，也在複合安全領域，呈現交互作用關係。故而，此即係利害相關國家，持續對「次國家級外交」發出警惕之主要原因。

伍、結語

大陸次國家級影響力行動，在政治進程上既意圖規避抗「中」聯盟的政治與意識形態紛爭，其手段則繞過國際組織機構和國家層級政府，穩步擴大與次級部門聯繫。大陸次國家級影響力行動的親「中」勢力質變因素，為其總體國家利益與外交戰略培養友好勢力。然而，卻將對我國安全利益和國際抗「中」聯盟，造成不穩定與潛在衝擊。值得國人與國際社會關注的是，由於次級部門多缺乏政治警覺、對大陸貿易夥伴了解不足、往來協議透明度匱乏、實際經驗未能分享，以及與政府官方聯結機制亟待建立等情勢下，乃誘使地方政府和城市，對大陸持歡迎態度。

大陸之所以能運用「次國家級外交」策略，顯然存在著事務發展的對立矛盾因素。一方面，係利用西方國家政體多元和去中心化的對立特點，以及民主政治政治碎片化(Political fragmentation)權力分散在不同派別與勢力的矛盾因素，使得民主政府難以有效運作，從而有系統地拉攏、鼓動各國地方政府，從次國家級層面對抗、緩和各國的對「中」政策。再方面，地方政府與次國家級部門，與中共黨國威權體制的意識形態政治紛爭既不明顯，地方首長亦鮮少以反「中」議題做為競選訴求。從而，有利於彼此利益互惠，遂行「次國家級外交」策略。值得注意的是，「次國家級外交」策略的親「中」勢力質變因素，卻為大陸總體國家利益與外交戰略培養友好勢力。鑑此，本文以為既要了解中共表述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也得洞察其辯證思維及如何利用矛盾因素，方能充分應對衝擊影響。

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

官方文件

1999/5。「大陸工作簡報1999年5月」，《中華民國大陸委員會》，<<https://www.mac.gov.tw/cp.aspx?n=AAB9AAF3A7B802E2>>。

網際網路

2011/3/14。「中美外交開始『地方支援中央』」，《南方週末》，<<http://style.sina.com.cn/news/p/2011-03-14/092475074.shtml>>。

2014/11/4。「習近平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網》，<<http://cpc.people.com.cn/n1/2018/0505/c64094-29966415.html>>。

2017/7/17。「楊潔篪：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外交思想 不斷譜寫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篇章」，《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17/0717/c64094-29410176.html>>。

2020/5/10。「布蘭斯塔德大使修睦不成 別了中國」，《法國國際廣播電臺》，<<https://www.rfi.fr/tw/%E4%B8%AD%E5%9C%8B/20201004-%E5%B8%83%E8%98%AD%E6%96%AF%E5%A1%94%E5%BE%B7%E5%A4%A7%E4%BD%BF%E4%BF%AE%E7%9D%A6%E4%B8%8D%E6%88%90-%E5%88%A5%E4%BA%86%E4%B8%AD%E5%9C%8B>>。

2020/8/24。「（受權發布）習近平：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的講話」，《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8/24/c_1126407772.htm>。

2021/9/15。「歐盟2021年度語文：中國是競爭者、對手、合作夥伴」，《德國之聲》，<<https://www.dw.com/zh/%E6%AC%A7%E7%9B%9F2021%E5%B9%B4%E5%BA%A6%E5%92%A8%E6%96%87-%E4%B8%AD%E5%9B%BD%E6%98%AF%E7%AB%9E%E4%BA%89%E8%80%85%E5%AF%B9%E6%89%8B%E5%90%88%E4%BD%9C%E4%BC%99%E4%BC%B4-a-59189635>>。

2021/11/12。「西門子作為專注的科技公司取得成功開局，2021財年業績表現卓越」，《SIEMENS》，<<https://m.thesjoquists.com/www/Company/SiemensIndustry/newsDetail.ashx?id=105605>>。

2021/11/30。「外交部副部長謝鋒與美國工商界和地方州市代表視頻交流」，《中國大陸外交部》，<https://www.fmprc.gov.cn/web/wjbxw_673019/202111/t20211130_10459101.shtml>。

2022/1/3。「美國前駐華大使組建諮詢集團指導投資中國」，《法國國際廣播電臺》，<<https://www.rfi.fr/tw/%E5%9C%8B%E9%9A%9B/20211222-%E7%BE%8E%E5%9C%8B%E5%89%8D%E9%A7%90%E8%8F%AF%E5%A4%A7%E4%BD%BF%E7%B5%84%E5%BB%BA%E8%AB%AE%E8%A9%A2%E9%9B%86%E5%9C%98%E6%8C%87%E5%B0%8E%E6%8A%95%E8%B3%87%E4%B8%AD%E5%9C%8B>>。

- 2022/1/3。「德國西門子總裁警告外長不要對抗中國」，《法國國際廣播電臺》，<<https://www.rfi.fr/tw/%E4%B8%AD%E5%9C%8B/20220103-%E5%BE%B7%E5%9C%8B%E8%A5%BF%E9%96%80%E5%AD%90%E7%B8%BD%E8%A3%81%E8%AD%A6%E5%91%8A%E5%A4%96%E9%95%B7%E4%B8%8D%E8%A6%81%E5%B0%8D%E6%8A%97%E4%B8%AD%E5%9C%8B>>。
- 2022/1/6。「中國訪歐團尋求解除制裁 學者：勉強承認失策」，《自由亞洲電臺》，<<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unshiwaijiao/cl-01062022134233.html>>。
- 2022/1/13。「英國軍情五處警告中共代理人滲透議會 中國駐英使館發聲明駁斥」，《BBC News 中文》，<<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uk-59980740>>。
- 2022/1/22。「中國影響滲透加拿大 加國情報局與學者提出警告」，《自由亞洲電臺》，<<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unshiwaijiao/lf-01122022144316.html>>。
- 2022/2/2。「習近平覆信美國華盛頓州塔科馬市市長伍達德斯、斯特拉孔市市長穆里」，《新華網》，<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2-02/02/c_1128324404.htm>。
- 2022/7/1。「大眾總裁：沒有對華業務，德國通脹將更嚴重」，《德國之聲》，<<https://www.dw.com/zh/%E5%A4%A7%E4%BC%97%E6%80%BB%E8%A3%81%E6%B2%A1%E6%9C%89%E5%AF%B9%E5%8D%8E%E4%B8%9A%E5%8A%A1%E5%BE%B7%E5%9B%BD%E9%80%9A%E8%83%80%E5%B0%86%E6%9B%B4%E4%B8%A5%E9%87%8D/a-62327465>>。
- Dateless。「朱鎔基的第一次訪美」，《熱點新聞》，<https://www.cnnnews.today/showArticle?main_id=5551f74cd3c06edfcd02b82aa8ed30df>。

英文部分

官方文件

- U.S.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2022/7/6. “Safeguarding our future bulletin – Protecting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leaders at the U.S. state and local level from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influence operations,” *U.S.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https://www.dni.gov/files/NCSC/documents/SafeguardingOurFuture/PRC_Subnational_Influence-06-July-2022.pdf>.

網際網路

- 2022/1/26. “Feinstein defended China against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s husband got rich off Chinese companies,” *Fox News*, <<https://www.foxnews.com/politics/feinstein-repeatedly-defended-china-against-human-rights-accusations-as-husband-got-rich-off-chinese-companies>>.
- Austin, Lloyd J. 2022/2/18. “Austin Says Current Operations Give Hints of New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2940956/austin-says-current-operations-give-hints-of-new-national-defense-strategy/>>.
- Fuest, Clemens, Lisandra Flach, Florian Dorn, Lisa Scheckenhofer. 2022/8/8. “A trade war with China would cost Germany six times as much as Brexit,”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 <<https://www.ier.at/en/press-releases/a-trade-war-with-china-would-cost-germany-six-times-as-much-as-brexit>>.

ifo.de/en/press-release/2022-08-08/trade-war-china-would-cost-germany-six-times-much-brexit>.

Lee, Sze-Fung and Benjamin Fung. 2022/1/4. “Misinformation and Chinese interference in Canada’s affairs,” *Policy Options Politiques*, <<https://policyoptions.irpp.org/magazines/january-2022/misinformation-and-chinese-interference-in-canadas-affairs/>>.

Picarsic, Nathan and Emily de La Bruyère. 2021/11/23. “How China Is Trying to Turn the U.S. against Itself: Across the country, Beijing has worked to cultivate relationships with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and private businesses in an effort to advance its agenda,” *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 <<https://www.fdd.org/analysis/2021/11/23/china-trying-to-turn-the-us-against-itself/?nowprocket=1>>.

Rice, Condoleezza. 2006/1/18. “Transformational Diplomac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2001-2009.state.gov/secretary/rm/2006/59306.htm>>.

Stiftung, Heinrich Böll. 2021/11/18. “Big fish in small ponds: China’s subnational diplomacy in Europe,” *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https://merics.org/en/report/big-fish-small-ponds-chinas-subnational-diplomacy-europe>>.

Yan, Flora. 2022/1/4. “China-US Subnational Exchanges unde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he Diplomat*,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1/china-us-subnational-exchanges-under-the-biden-administration/>>.

與談稿

「解構中國大陸『次國家級外交』與亞太非傳統安全利益關係」與談稿

A Response to "To deconstruc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na's "Subnational diplomacy" and Asia Pacific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連弘宜 (Lien, Hong-yi)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兼國際事務學院院長

壹、前言

黃秋龍教授研究員的這篇大作「解構中國大陸『次國家級外交』與亞太非傳統安全利益關係」，以美國官方文件提醒美國政府必須注意中國大陸對美方進行「次國家級外交」活動為起始，文中描述中國大陸在美國及歐洲國家所進行的一系列活動，主要係以地方政府為標的，設法透過對地方政府的活動，再由地方向中央(聯邦)政府施加壓力，或甚至地方領導人透過選舉成為中央(聯邦)領導人之後，將此關係帶到中央(聯邦)政府。

貳、重要論點

黃教授黃研究員在此篇大作文章中清楚地標明問題描述及問題意識，黃教授大膽假設「中國大陸在面臨國際社會抗『中』聯盟情勢下，還能宣稱『以周邊和大國為重點，以發展中國家為基礎，以多邊為舞臺』」，初步以為與其應用「次國家級外交」策略，具有一定關聯。黃教授黃研究員指出：該策略係利用西方國家地方政府、社會基層結構與利害關係人，對抗或緩和各國對中政策，以利朝中國大陸所偏好的政治進程推進。黃教授黃研究員在本論文中發現諸多論點：意圖讓親「中」中勢力從量變到質變；中國大陸以辯證思維看待「次國家級外交」；利用西方民主開放體制；具有長程戰略利益考量；利用脅迫顛覆虛假訊息進行國會政治工作等。

黃教授黃研究員所闡述中國大陸「次國家級外交」行為，主要著重在影響當地國政治及經濟領域。「次國家級外交」有別於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因其具有強烈的官方色彩，更具備獨特的優勢。(一)地方交往是非主權性的，並不代表國家，然若國家間關係出現問題的時候，地方性外交仍然可以進行。(二)「『次國家級外交』看似服務地方政府，但可能影響兩國外交政策。」此外，「『次國家級外交』的相關活動，既可以減輕中央政府的工作負擔，也可以發揮『次國家級外交』的工作積極性，不僅在非傳統安全領域上拓展活動空間，也直接促進整體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進步。」

此外，黃教授黃研究員對於「次國家級外交」的內涵有更擴大的解釋：「『次國家級外交』未必侷限於官方往來，它也有利於擴深雙邊關係發展，包括：智庫深度對話、構築友好城市網絡、民間和官方互訪、訂立正式合作協定等。」黃教授黃研究員指出「次國家級外交」出現新興策略運用空間，「不僅在對抗或緩和各國對中國大陸政策，更在推動中國大陸所偏好的氣候變遷等政治進程。」此新興策略運用空間，「也為中國大陸總體國家利益與外交戰略服務，既在推動中國大陸所偏好的政治論述，也意圖讓親中勢力從量變到質變，以培養對其友好之國際力量。」總之，「中國大陸次國家級影響力行動，不僅為其政軍地緣戰略與政治議程服務，同時也交互運用『地方包圍中央』與軟硬兼施兩手策略。」

黃教授黃研究員在文末指出，中國大陸「次國家級外交」能夠具有成效之原因在於：(一)「次級部門多缺乏政治警覺、對大陸貿易夥伴了解不足、往來協議透明度匱乏、實際經驗未能分享，以及與政府官方聯結機制。亟待建立等情勢下，乃誘使地方政府和城市，對大陸持歡迎態度。」；(二)「利用西方國家政體多元和去中心化的對立特點，以及民主政治政治碎片化權力分散在不同派別與勢力的矛盾因素。」；(三)「地方政府與次國家級部門，與中共黨國威權體制的意識形態政治紛爭既不明顯，地方首長亦鮮少以反中議題作為競選訴求。」

參、問題釐清

一、經貿議題較容易切入，能否奏效取決中央政府政策

黃教授黃研究員在論文中闡述中國大陸官方在經貿方面有計畫、有目標地針對美歐國家的地方政府、民間企業等提出軟硬兼施的訴求。企業當然以營利為目的，自然會遊說或施壓母國政府允許與中國大陸進行各種商業活動。但若該國政府或友邦政府已組成抗中聯盟，則該企業似乎可施展的策略不多。除非這些企業聯合起來，且能夠證明若不

與中國大陸貿易，則該領域的企業無生存空間。或者若不與中國大陸貿易，該國將蒙受重大的損失，甚至喪失經貿大國的地位，迫使該國政府允許或帶頭與中國大陸進行經貿往來。

黃教授黃研究員在文中提及，德國許多大企業表達與中國大陸經貿往來的重要性。若德中兩國雙邊經貿關係受到影響，包括雙邊生產製造業在內，德國的經濟將受到重創。此點也印證德國總理蕭茲(Olaf Scholz)在美歐國家強大的壓力下，仍堅持率領德國商界代表團於今(2022)年11月上旬訪「中」中。但此舉也正好反思文中所提中國大陸「次國家級外交」行為，若中國大陸與德國在經貿關係上已到相互依存的程度，或更確切一點說明，德國依賴中國大陸市場的程度已達到中央(聯邦)政府都無法忽視的程度，中方似乎已經不需要「次國家級外交」，直接訴諸正常中央政府級外交即可。

二、西方國家華裔人士行為是否觸犯當地國法律

黃教授黃研究員在論文中提及在英國及加拿大等國，應該是該國的人民的當地華裔人士，受到中國大陸統戰部門徵召，秘密滲透到英國議會，試圖干預英國政治。加拿大情報局對國會參眾議員發出警告，「除了提防外國及其代理人從事滲透活動，試圖影響國會議政和政府決策之外，同時也提醒議員外國干預的手段，包括脅迫、顛覆和利用虛假訊息等手段，並指稱要注意中國如何利用代理人 and 商業說客來達成目的。」

西方國家號稱是法治國家，若上述行為違反該國的法律規範，該國司法部門應將嫌疑人依法定程序審訊，釐清是否違反該國法律。而非肆意擴大渲染，指稱這些華裔人士對特定對象效忠，且工作經費來自特定來源等。一切依法定程序進行，若觸犯法律，則予以判刑；若無涉及法律規範，則應儘速給予當事人清白。若只是為了對抗特定對象，針對涉及該對象的疑似觸法行為予以曝光，或甚至以放大鏡檢視所有行為，此舉僅是政治上的操作而已。

肆、結論

黃教授黃研究員的此篇大作文章雖主要描述中國大陸為規避與西方國家中央(聯邦)政府的交涉，轉而訴諸地方政府或民間企業等非中央(聯邦)政府機構。但中國大陸此種舉動，對兩岸關係而言，似可將「次國家級外交」方式用於對臺政策。若兩岸關係不佳，或對岸官方意圖規避與我方中央政府接觸，其可能使用此種方式尋求地方政府(縣市政府)及民間企業，尤其是在中國大陸投資的臺商企業。本論文中對西方國家的策略、手法等皆可如法泡製用於對臺政策。過去一段期間，當兩岸關係進展順暢時，兩岸傾向由

中央政府層級透過白手套溝通。但當關係進展不順時，對岸會直接訴諸某一特定地區(縣市)、機構團體(對兩岸關係和緩較偏好者)、行業(農民等)。對岸持續無法獲得善意的回應時，亦會選擇優先打擊的對象，例如禁止進口我方的農產品是較常使用的方式。

總之，「次國家級外交」應是一種輔助行為。當外交可正常推展時，即雙邊中央級政府能夠也願意彼此相互溝通，「次國家級外交」的重要性似應隨之降低。但若雙邊外交因各種因素而無法正常運作時，「次國家級外交」即發揮功能。當然，這種情形發生於單方不願再正常推展雙邊外交，而另一方則有意願繼續維持，甚至有加強的意願。

「中」中方使用「次國家級外交」針對西方國家及我方，但原因不盡相同。對西方國家使用此方式是因為西方國家聯手對抗中方，而對我方使用此方式可能是企圖規避與我方中央政府層級接觸，也有可能是我方政府迴避與中方接觸，迫使「中」中方使用此種方式應對兩岸關係。美「中」中雙邊的對抗不僅讓國際關係受到影響，對兩岸關係更是造成激烈的震盪。美國聯合全球盟友藉由俄烏戰爭抗俄，同時也聯合盟友抗「中」中。但西方盟友為了自己國家的利益，已逐漸有走自己道路的傾向，此舉值得各界觀察。兩岸關係維持和平非理所當然，而是需要兩岸政府與人民共同細心維護。任何激烈的言論與行為皆會刺激，甚至惡化兩岸關係。維持和平需要高度的智慧，唯有體認彼此的利益所在，避免踩踏對方的紅線與禁區，兩岸和平才有繼續維持的可能性。



兩岸關係

Cross - Strait Relations

從臺灣民意檢視中共 對臺「一代一線」政策之成效

Examin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CP's "One Generation, One Line" Policy towards Taiwan from the View of Taiwan's Public Opinion

關弘昌 (Kuan, Hung-chang)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副教授

摘 要

本文討論中共在2017年所宣示的「一代一線」「惠臺」政策是否有達成其所期待的成效。本文根據民意調查資料檢視了臺灣整體民眾、臺灣的青年世代、中南部民眾、以及勞工與農林漁牧基層民眾等不同群體，對於是否應該加強兩岸經貿關係、以及對於統獨議題的態度變化。本文發現從2017年到2020年，臺灣民眾對於「加強兩岸經貿關係」的支持比例愈來愈低，主張未來兩岸應該統一的比例也愈趨減少，因此本文認為「一代一線」政策到2020年為止，並沒有發生成效。本文認為這與2019年香港發生「反送中運動」，導致臺灣民眾對中共觀感不佳有密切關係。

關鍵字：臺灣民意、惠臺政策、一代一線、兩岸關係

壹、前言

時任中國大陸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2017年3月全國政協會議開幕時曾提及：「加強與臺灣基層一線和青年一代交往交流，厚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民意基礎。」¹此一談話被視為是中共對臺「一代一線」政策之由來，²也是過去「三中一青」政策（亦即針對臺灣的中小企業、中低收入民眾、中南部民眾、以及青年）的延續與擴大。

不論是「三中一青」或「一代一線」政策，都屬中共的「惠臺」政策。所謂「惠臺」政策出現於胡錦濤時期，相對於對臺灣武力威嚇與外交打壓等強硬手段，是中共對臺政策中「軟」的部分。其原則可以歸納為「針對民眾、利益補貼、擴大受益、減少受害」，³也就是繞過臺灣政府官方，以臺灣民眾做為目標的一種政策作為，試圖透過對臺灣民眾的大幅讓利（例如補貼）或各種交流活動來增進臺灣民眾的經濟利益，期望能「以經促統」，以完成兩岸的「和平統一」。⁴而若從國際關係理論的角度來看，「惠臺」政策則是屬於一種對其他國家所施展的「經濟治略」（economic statecraft）手段，⁵也就是企圖運用經濟利誘的方式來達到影響他國之目的。

經由包含中國大陸的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推動，⁶「惠臺」政策出現以來針對臺灣不同的民眾而有多樣的內容，例如對臺灣青年有擴大舉辦兩岸青年交流、在陸臺生比照陸生收費、承認臺灣學歷、開放專業證照考試資格、放寬臺灣學生及其他臺灣居民在大陸就業的相關規定；⁷支持在大陸大學畢業的臺生自主創業；⁸鼓勵臺灣青年赴陸創業就業、兩岸青創基地正式成立搭建創業平臺、陸企設立億元創業基金支持臺灣青年登陸創業等。⁹針對臺灣企業或臺商，則有實施平潭綜合實驗區企業所得稅優惠；¹⁰以及協助

1 楊家鑫、藍孝威，「陸對台交流鎖定一代一線」（2017年5月24日），2022年7月22日瀏覽，〈中時新聞網〉，<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524000374-260108>。

2 楊家鑫、藍孝威，「陸對台交流鎖定一代一線」。

3 耿曙，「經濟扭轉政治？中共『惠台政策』的政治影響」，〈問題與研究（臺北）〉，第48卷第3期（2009年9月），頁12。

4 耿曙，「經濟扭轉政治？中共『惠台政策』的政治影響」，頁2。

5 耿曙，「經濟扭轉政治？中共『惠台政策』的政治影響」，頁4-7。

6 趙子龍、何明帥，「『惠臺爭先賽』：大陸惠臺政策擴散之時空演進與路徑」，〈中國大陸研究（臺北）〉，第63卷第4期（2020年12月），頁102。

7 耿曙，「經濟扭轉政治？中共『惠台政策』的政治影響」，頁12；耿曙、曾于蓁，「中共邀訪台灣青年政策的政治影響」，〈問題與研究（臺北）〉，第49卷第3期（2010年9月），頁31；陳淳斌，「中共惠台政策演變與台灣政黨選票結構及民意變遷」（2016年8月19日），2022年7月20日瀏覽，〈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網頁〉，<https://www.npf.org.tw/2/16076?reload>。

8 陳言喬，「海峽論壇推31項惠台政策」，〈經濟日報〉，2013年6月17日，第A10版。

9 曾于蓁，「統戰的制度場域：青創基地與臺青的利益連結」，〈國家發展研究（臺北）〉，第18卷第1期（2018年12月），頁119；一般報導，「海峽論壇『政策紅包』多，細數十條『乾貨』」（2015年6月18日），2022年8月9日瀏覽，〈人民網〉，<http://tw.people.com.cn/n/2015/0618/c14657-27173339.html>。

10 一般報導，「第六屆海峽論壇惠台政策發佈情況」（2014年6月17日），2022年8月9日瀏覽，〈海峽論壇官方網

臺資企業拓展大陸市場、許可臺灣地區律師事務所在福州，廈門試點設立分支機構從事涉臺民事法律諮詢服務、對在大陸的臺資企業增加貸款額度等。¹¹針對臺灣農漁民則有開放多種水果蔬菜零關稅進口、規劃緊急農產採購機制、開放農民赴大陸投資等；¹²還有以採購團形式來臺灣的大宗採購與定量定向採購、以及在臺南市學甲區的虱目魚製作；¹³加強兩岸農業合作平臺建設、大陸增設臺灣農民創業園區、大陸開放進口臺灣大米。¹⁴

2017年「一代一線」政策出現之後，相關的「惠臺」措施更加著重於吸引臺灣民眾前往中國大陸創業或居住。例如新增開放臺灣居民在大陸事業單位就業試點地區、臺灣居民可在試點地區大專院校與公立醫院等單位就業；¹⁵臺灣民眾在大陸就業後可參加住房公積金繳存以取得購屋和租屋所需之低利資金、在大陸居住就業和就學的臺灣民眾可以參加當地社會保險、未就學及未就業的臺灣民眾亦可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未來臺籍人士在大陸辦理信用卡除年齡限制外其他核准條件與大陸公民相同等。¹⁶2018年2月，國臺辦公布了新一波的「對臺31項措施」，分別包括加快給予臺資企業與大陸企業同等待遇，以及逐步為在陸臺灣民眾提供與大陸公民同等的待遇。¹⁷另外在2018年8月，國臺辦暨公安部、港澳辦宣布9月將推出「港澳臺居民居住證申領發放辦法」，凡在大陸居住半年以上且有合法穩定就業、住宿、連續就讀等條件之一的港澳臺居民皆可申請，而持臺灣居民居住證可享受與大陸民眾同等之待遇，包括社會保險、義務教育、參加職業資格考試等。¹⁸2019年11月，國臺辦與國家發改委則發布「對臺26項措施」，針對臺資企業的措施有：可以同等參與中國大陸重大技術裝備、5G、循環經濟（資源回收）、民航、主題公園、新型金融組織等投資建設，同等享受融資、貿易救濟、出口信用保險、進出口便利、標準制訂等政策，支持兩岸青年就業創業基地示範點建設等；針對臺灣民眾則提供同等待遇，包括在領事保護、農業合作、交通出行、通訊資費、購房資格、文化體育、職稱評審、分類招考等方面提供更多便利和支持。¹⁹而在2021

站》，http://www.taiwan.cn/hxlt/result/apple5_45043/201406/t20140617_6332581.htm。

11 陳淳斌，「中共惠台政策演變與台灣政黨選票結構及民意變遷」。

12 耿曙，「經濟扭轉政治？中共『惠台政策』的政治影響」，頁12。

13 曾于蓁，「中共對臺農漁採購政策變化：契作機制及其效果」，*問題與研究*（臺北），第54卷第1期（2015年3月），頁105-108。

14 陳淳斌，「中共惠台政策演變與台灣政黨選票結構及民意變遷」。

15 蔡浩祥、藍孝威，「俞正聲將重申：對台胞照顧不變」（2017年5月11日），2022年8月9日瀏覽，〈中時新聞網〉，<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511000406-260108>。

16 王偉力，「海峽論壇推『台民西進』，多項『惠台』優惠對抗民進黨去中政策」（2017年6月18日），2022年8月9日瀏覽，〈風傳媒〉，<http://www.storm.mg/article/285005>。

17 李仲維，「陸公布31條惠台措施，對台政策開春大禮，遍及各類領域」，〈聯合報〉，2018年3月1日，第A1版。

18 陳君碩、林勁傑，「強調同等待遇，9月1日上路，陸推台胞居住證，18碼類身分證」（2018年8月17日），2022年8月9日瀏覽，〈中時新聞網〉，<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817000568-260108>。

19 「繼31條後中國再推出對台26條」（2019年11月4日），2022年8月9日瀏覽，〈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911040030.aspx>。

年「七一」中共百年黨慶後，浙江在7月舉辦了臺灣青年實習就業招聘活動，共提出了三千多個實習就業機會；²⁰內蒙古首家「臺灣青年就業創業基地」舉行揭牌儀式，期望推動臺灣青年在內蒙古實習、就業和創業。²¹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21年3月至福建考察時曾說：「在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上邁出更大步伐」；「要突出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勇於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²²習近平談話中的「以惠促融」正點出了中共「惠臺」政策的目的乃在於促成兩岸的「融合」。究竟「一代一線」政策有沒有達成這一目標與效果？這是本文想要探討的問題。

貳、研究方法

一、觀察架構

為了瞭解「一代一線」政策是否有達成習近平說的「兩岸融合」，以及俞正聲提及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民意基礎」，本文將從臺灣的民意調查資料著手，觀察臺灣的民意在這段時間內發生了什麼變化。

對於臺灣民意的觀察，本文將以「議題面向」及「目標群體」兩個部分作為架構。

「議題面向」指臺灣民眾在關於兩岸關係不同議題上的態度。中共期待經由「惠臺」政策所達成之「兩岸融合」，除了兩岸能有更緊密的經貿聯繫，最終則是期盼政治上的兩岸統一。²³因此「議題面向」包含有經貿與政治兩方面：經貿方面是臺灣民眾認為「應該加強或是降低與中國大陸的經貿關係」，政治方面則是臺灣民眾對於「兩岸未來應該是要統一，還是臺灣應該要獨立」的態度。

在此，本文將統獨態度另外分成「統獨六分類態度」與「條件式統獨態度」。「統獨六分類態度」是對於臺灣民眾統獨態度的傳統六分類法，在詢問受訪者對統獨問題的態度時把選項分成「儘快統一」、「儘快宣布獨立」、「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

20 「杭州（浙江）舉辦台灣青年就業活動，提供逾3,000個實習機會」，*經濟日報*，2021年7月17日，第A9版。

21 「呼和浩特（內蒙古）兩岸青創基地揭牌，助台青在地就業」，*經濟日報*，2021年7月24日，第A9版。

22 陳君碩，「習近平：以通惠情促融，在探索兩岸融合發展邁出更大步伐」（2021年3月25日），2022年8月9日瀏覽，*《旺報》*（*《中時新聞網》*），<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10325004281-260409?chdtv>。

23 大陸學者趙子龍與何明帥提到，「惠臺政策」乃在反對「臺灣獨立」和「促進和平統一」的基本對臺工作方針下提出「經濟讓利」原則，以兩岸經貿交流作為突破口，提升兩岸貿易往來和吸引臺資企業赴陸投資，使更多臺灣民眾因而更加理解中國大陸「反獨促統」的真正意義，從而能支援大陸的對臺工作。見趙子龍、何明帥，「『惠臺爭先賽』：大陸惠臺政策擴散之時空演進與路徑」，頁102。

一」、「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獨立或統一」、「永遠維持現狀」六項。基於精簡之需，本文分析時將此六個選項合併為「統一」、「獨立」、「維持現狀」三個選項。

「條件式統獨態度」則包括「條件式統一」與「條件式獨立」。臺灣民眾對於「統獨六分類態度」的選擇通常會考量現實環境的限制，例如即使態度是偏向臺灣獨立，但因中共威脅若臺灣獨立將對臺灣動武，因此轉而選擇「維持現狀」。又例如心中態度是主張統一，但因兩岸政經社會條件差異太大，因此也轉而選擇「維持現狀」。而「條件式統獨態度」則是用以測量若去除現實環境的限制後，民眾心中對於統獨問題的真正傾向。其中「條件式統一」詢問受訪者若臺灣和中國大陸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條件差不多時是否贊成臺灣和中國大陸統一。因為這題目假設兩岸在各方面條件相當，排除受訪者可能會有的「兩岸政經社會環境差異極大」的顧慮，比較能真正測量出民眾是否真心傾向兩岸統一。「條件式獨立」則是詢問受訪者在臺灣宣布獨立而中國大陸不會攻打臺灣的情形下，對臺灣獨立的贊成程度。由於把受訪者通常會顧慮的戰爭風險排除，這一題目可以測量出他們對於臺灣獨立的真正支持態度。

至於「目標群體」，則指中共「惠臺」政策所針對之對象。基於「一代一線」政策乃針對臺灣的「青年一代」與「基層一線」，亦即臺灣的年輕人及社會基層民眾，本文的目標群體觀察對象除了有「臺灣整體民眾」之外，也包括臺灣的「青年世代」、「中南部民眾」、「農林漁牧及勞工」這三類群體。其中「青年世代」是指在問卷資料收集當年受訪者年齡介於20歲至39歲者。「中南部民眾」則指戶籍所在地屬於臺灣中南部縣市之受訪者，這些縣市包括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²⁴至於「農林漁牧及勞工」則是受訪者職業屬於農林漁牧業，以及在政府單位與公營事業部門及民營事業部門就業之勞工。

綜合以上「議題面向」及「目標群體」兩個部分，本文將觀察「臺灣整體民眾」與「青年世代」、「中南部民眾」、「農林漁牧及勞工」等不同類型群體在前面提及的「議題面向」上的態度變化情形，亦即各種態度的次數分配（frequency）的百分比變化，以判斷中共「一代一線」政策之成效。本文認為，如果各群體在兩岸政經關係態度上出現中共所期待的發展，不論此發展是否真由「一代一線」政策造成，從結果來看中共皆可將其詮釋為「一代一線」政策有達成目標。其中中共最樂見的情況會是臺灣民眾在統獨態度出現「支持統一的比例上升，而支持臺灣獨立的比例下降」的趨勢。若這一目標沒有達成，中共其次樂見的情況則是使臺灣民眾「支持加強兩岸經貿關係」之趨勢能夠維持並且增強。而若以上兩情況皆未發生，「一代一線」政策即可謂沒有任何成效。

24 由於問卷調查單位所提供之資料在戶籍區域上已經把中南部縣市分類成「中彰投」、「雲嘉南」、「高屏澎」等三類，所以本文使用之中南部資料也包含有澎湖縣之受訪者。

二、研究時期、研究資料及限制

本文的研究時期將涵蓋2016年至2020年這段時期。由於中共是在2017年提出「一代一線」政策，本文選擇此政策出現的前一年，亦即2016年，做為觀察臺灣民眾兩岸關係態度的起點，以便於對照2017年至2020年的變化。至於以2020年做為研究時期的結束點，則是由於目前相關問卷調查所能取得的最新資料乃於2020年收集。

由於目前並沒有針對曾接受過「惠臺政策」之臺灣民眾（包含上述各目標群體）所作之問卷調查資料，本文只能運用抽樣之母體為「全臺灣民眾」之調查資料來進行分析，並從其中觀察不同目標群體在各種議題面向上的相關態度。本文使用之調查資料主要包括有兩組資料。第一組資料是美國杜克大學政治系牛銘實教授主持，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執行的「兩岸關係和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該系列調查從2002年開始不定期進行，目前最新一筆公開可使用資料是2020年的調查資料，本文運用了其中的2016年、2017年、2019年、以及2020年四筆資料。²⁵其中2019年的調查是在1月進行，由於2019年6月香港爆發的「反送中運動」被認為對於臺灣民眾的兩岸關係態度有深刻影響，²⁶以下的圖表中會把2019年資料寫為「2019年1月」，以便讀者得知該資料是香港「反送中運動」之前所收集。

「兩岸關係和國家安全民意調查」提供了本文觀察臺灣民眾對於「應該加強或是降低與中國大陸的經貿關係」、「統獨六分類態度」、與「條件式統獨態度」等議題之態度時所需之資料。不過，由於在這四筆資料中僅2019年以及2020年的問卷有詢問受訪者的職業，因此對「農林漁牧及勞工」此一群體之觀察也只於這兩個年度呈現。

本文另外使用了第二組資料，這是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吳重禮教授主持的「中國印象調查研究」，本文將此一調查資料用於觀察臺灣整體民眾對於「如果大陸政府提供臺灣更多經濟利益，會不會增加對中國大陸的好感」、「如果中國大陸政府不限制臺灣的外交活動，會不會增加對中國大陸的好感」、「如果中國大陸政府撤除對臺飛彈，停止軍機、軍艦繞臺等軍事行動，會不會增加對中國大陸的好感」、「如果兩岸簽訂和平協議，中國大陸保證不打臺灣，臺灣保證不獨立，會不會增加對中國大陸的好感」等問題的回答。這一調查從2014年開始進行，到目前最後一筆公開可使用資料是2019年第二次的調查。本文使用了其中的「2016年中國印象調查研究」、「2017年第一次中國印象調查研究」、「2018年中國印象調查研究」、以及「2019年第一次中國印象調查研究」²⁷。其中2019年的第一次調查乃於香港「反送中運動」發生之前的3月所進行。

25 2016年資料是在11月中旬至下旬所收集，2017年資料則在11月底至12月初收集。2019年的調查於1月上旬進行，是在香港「反送中運動」爆發之前所進行。2020年調查則是在10月下旬進行，已經是新冠肺炎疫情出現之後。

26 Amy Chang Chien, 「香港『反送中』催化台灣社會紅色恐懼」(2019年8月21日)，2022年8月8日瀏覽，《紐約時報中文網》，<https://cn.nytimes.com/asia-pacific/20190821/hongkong-taiwan-fury-fallout-presidential-race/zh-hant/>。

27 2016年的調查研究是在1月下旬進行，2017年第一次調查研究則是在3月下旬進行。2018年的調查資料是在9月中下旬收集，而2019年第一次調查研究的進行時間是3月，2019年第二次調查研究則於9月進行。

參、「一代一線」政策實施後的臺灣民意

從2017年3月中共宣示推出「一代一線」「惠臺」政策，到2020年為止的這段時間內，臺灣民眾對於兩岸經貿交流幅度的看法，以及對於統獨問題的態度有什麼變化？而這些變化是否符合中國大陸對於「一代一線」政策效果的期待？本節根據前一節提及之調查資料進行了數項分析，以下分別討論其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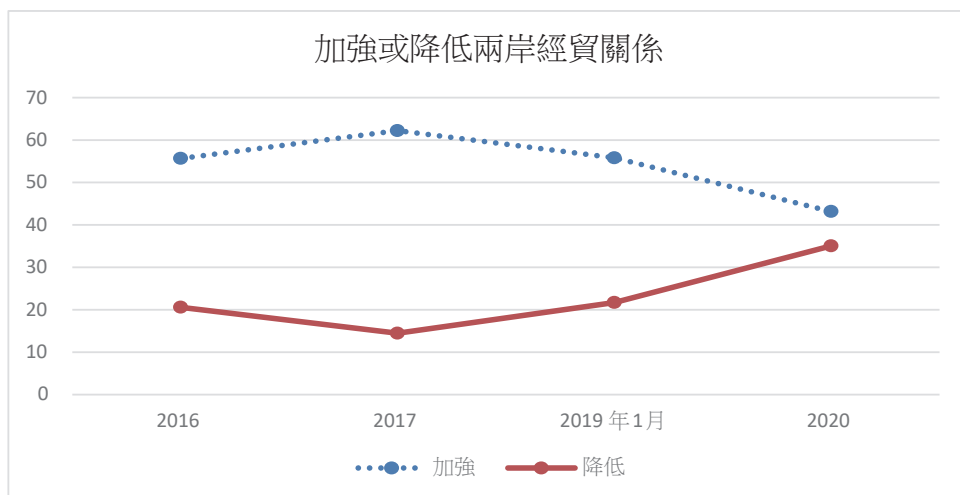
以下先就臺灣「整體民眾」在兩岸政經關係上的態度變化來加以觀察。表1及圖1是2016年至2020年臺灣整體民眾期待兩岸經貿關係應該加強或降低的比例變化。其中認為應該「加強」兩岸經貿關係的比例從2016年的55.66%增加到2017年的62.22%，之後則再下降至2019年1月的55.80%，2020年又降到最低的43.15%。而主張應該「降低」兩岸經貿關係的比例則先從2016年的20.58%降到2017年的14.47%，在回升到2019年1月的21.70%，2020年則又再上升到35.05%。因此，主張應該「加強」兩岸經貿關係的比例在這段時期內是先升後降，而認為應該「降低」兩岸經貿關係的比例則是先降後升。

表 1 臺灣民眾對兩岸經貿關係之期待（百分比）

	加強	降低
2016	55.66	20.58
2017	62.22	14.47
2019年1月	55.80	21.70
2020	43.15	35.05

資料來源：「2016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17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18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20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

圖 1 臺灣民眾對兩岸經貿關係之期待（百分比）



資料來源：「2016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17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18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20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

表2及圖2則是2016年至2020年臺灣整體民眾在「統獨六分類態度」上的變化。如同長期以來的民調資料所顯示，其中大多數民眾選擇「維持現狀」，比例大約都在60%上下附近。主張「獨立」者在2016年有23.29%，2017年則降到16.56%，但2019年1月上升為21.79%，2020年再增加成25.77%。而主張「統一」者的比例在2016年是12.44%，2017年上升到17.61%，2019年1月則下降為15.09%，2020年又再降為7.93%。所以整體而言，在這段時期「維持現狀」的比例大約持平，而主張「獨立」者的比例乃是先降後升，主張「統一」者的比例則是先升後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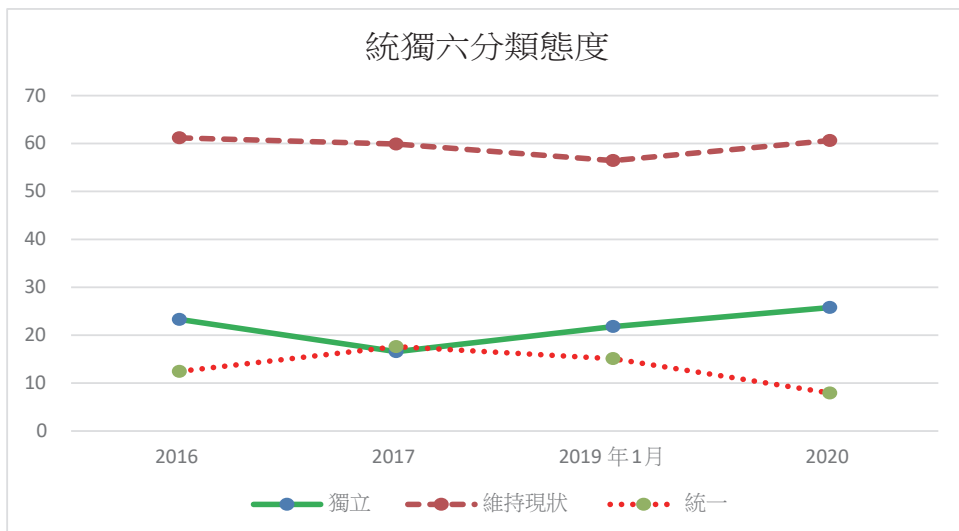
表 2 臺灣民眾統獨六分類態度（百分比）

	獨立	維持現狀	統一
2016	23.29	61.18	12.44
2017	16.56	59.89	17.61
2019年1月	21.79	56.43	15.09
2020	25.77	60.63	7.93

資料來源：「2016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17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18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20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

說明：「獨立」包括「儘快宣布獨立」與「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維持現狀」包括「永遠維持現狀」與「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獨立或統一」；「統一」包括「儘快統一」與「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

圖 2 臺灣民眾統獨六分類態度（百分比）



資料來源：「2016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17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18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20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

表3與圖3是2016年到2020年臺灣整體民眾在「條件式統獨態度」上的變化。其中贊同「條件式獨立」者在2016年有66.60%，2017年降為58.12%，2019年1月時則略上升到60.98%，2020年又再增加至69.01%。至於贊同「條件式統一」者在2016年有30.03%，2017年上升到35.21%，2019年1月略降為34.11%，2020年再降到28.65%。因此，在這段期間贊同「條件式獨立」者的比例是先降後升，而贊同「條件式統一」者的比例則是先升後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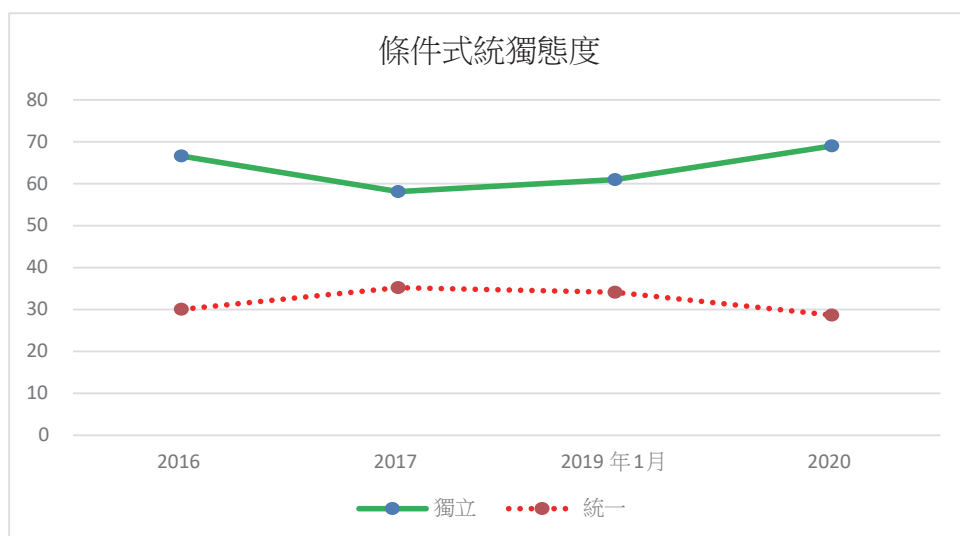
表 3 臺灣民眾條件式統獨態度（百分比）

	獨立	統一
2016	66.60	30.03
2017	58.12	35.21
2019年1月	60.98	34.11
2020	69.01	28.65

資料來源：「2016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17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18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20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

說明：「獨立」表示對「如果臺灣宣佈獨立，而大陸不會攻打臺灣，請問您贊不贊成臺灣獨立？」此一問題回答「贊成」與「非常贊成」者。「統一」表示對「如果臺灣和大陸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條件差不多時，請問您贊不贊成臺灣和大陸統一？」此一問題回答「贊成」與「非常贊成」者。

圖 3 臺灣民眾條件式統獨態度（百分比）



資料來源：「2016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17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18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20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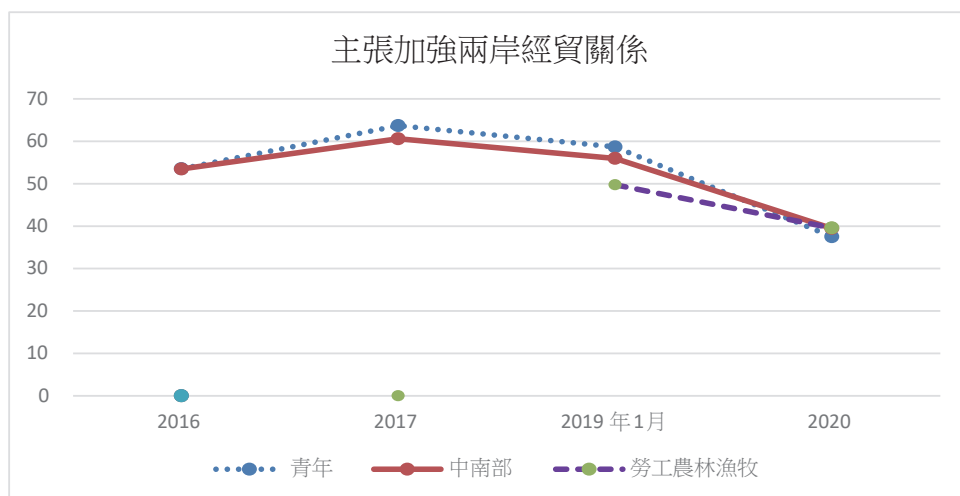
在呈現臺灣整體民眾的態度變化之後，以下則是2016年至2020年不同類型的目標群體在兩岸政經議題上的態度變化。首先表4及圖4是這些目標群體在這幾年間主張應該「加強兩岸經貿關係」的比例變化。其中青年世代在2016年有53.53%贊同加強兩岸經貿關係，2017年上升到63.69%，2019年1月下降到58.67%，2020年則大幅降到37.50%。而中南部民眾在2016年贊同加強兩岸經貿關係者有53.47%，2017年上升到60.60%，2019年1月下降到55.96%，到2020年也大幅降到39.46%。至於勞工與農林漁牧業者贊同加強兩岸經貿關係者，在2019年1月有49.75%，2020年則降到39.57%。以上數據顯示，從2016年到2020年臺灣青年世代及中南部民眾主張應該加強兩岸經貿關係的比例都是先升後降，而勞工與農林漁牧業者贊同加強兩岸經貿關係的比例從2019年1月到2020年也是下降趨勢，雖然其下降的幅度比起青年及中南部民眾是比較小的。

表 4 臺灣不同群體民眾主張**加強**兩岸經貿關係之比例（百分比）

	青年	中南部	勞工農林漁牧
2016	53.53	53.47	NA
2017	63.69	60.60	NA
2019年1月	58.67	55.96	49.75
2020	37.50	39.46	39.57

資料來源：「2016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17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18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20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

圖 4 臺灣不同群體民眾主張**加強**兩岸經貿關係之比例（百分比）



資料來源：「2016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17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18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20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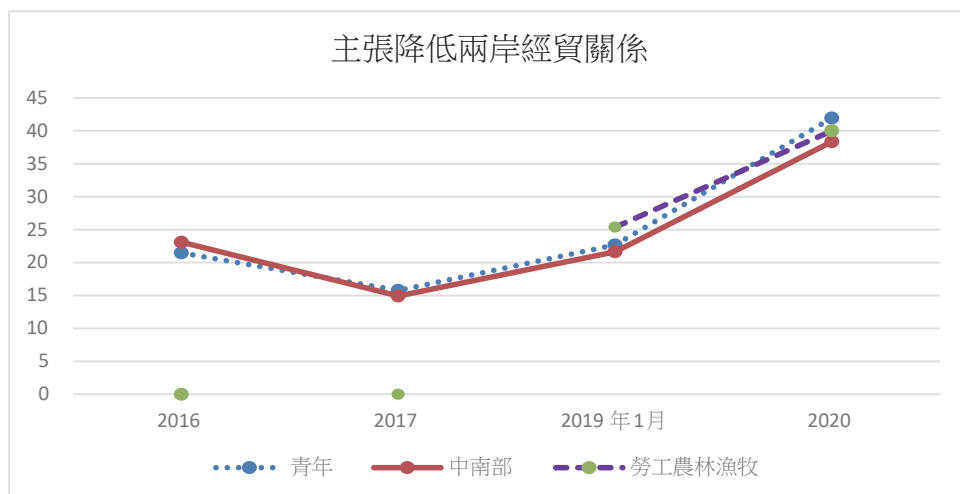
表5及圖5則是這些不同目標群體主張應該「降低兩岸經貿關係」的比例變化。其中青年世代的比例在2016年有21.47%，2017年減少成15.77%，2019年1月回升到22.67%，2020年則遽增為41.94%。而中南部民眾認為應該降低兩岸經貿關係的比例從2016年的23.09%減少到2017年的14.93%，之後又上升到2019年1月的21.63%，並在2020年再增加到38.35%。至於勞工與農林漁牧業者贊同降低兩岸經貿關係的比例在2019年1月有25.37%，到2020年時則上升到40.00%。就以上數據來看，從2016年到2020年臺灣青年世代及中南部民眾認為應該降低兩岸經貿關係的比例都是先降後升，而勞工與農林漁牧業者抱持此一態度的比例在2019年1月到2020年這兩年之間也是往上升的趨勢。

表 5 臺灣不同群體民眾主張**降低**兩岸經貿關係之比例（百分比）

	青年	中南部	勞工農林漁牧
2016	21.47	23.09	NA
2017	15.77	14.93	NA
2019年1月	22.67	21.63	25.37
2020	41.94	38.35	40.00

資料來源：「2016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17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18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20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

圖 5 臺灣不同群體民眾主張**降低**兩岸經貿關係之比例（百分比）



資料來源：「2016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17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18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20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

表6與圖6是這些不同目標群體在「統獨六分類態度」上主張「獨立」的比例變化。其中青年世代的比例在2016年是32.37%，2017年則減少到22.03%，到2019年1月又上升為26.00%，2020年則又再增加到39.52%。中南部民眾主張獨立的比例在2016年有

24.82%，2017年則減少為15.67%，2019年1月則回升至20.85%，到了2020年又再上升為27.58%。而勞工與農林漁牧業者主張獨立的比例在2019年1月是21.40%，2020年則增加為24.35%。以上數據顯示，在2016年至2020年的期間，臺灣青年世代與中南部民眾在統獨六分類態度中主張獨立的比例皆是先降後升，而勞工與農林漁牧業者主張獨立的比例從2019年1月到2020年也是向上增加的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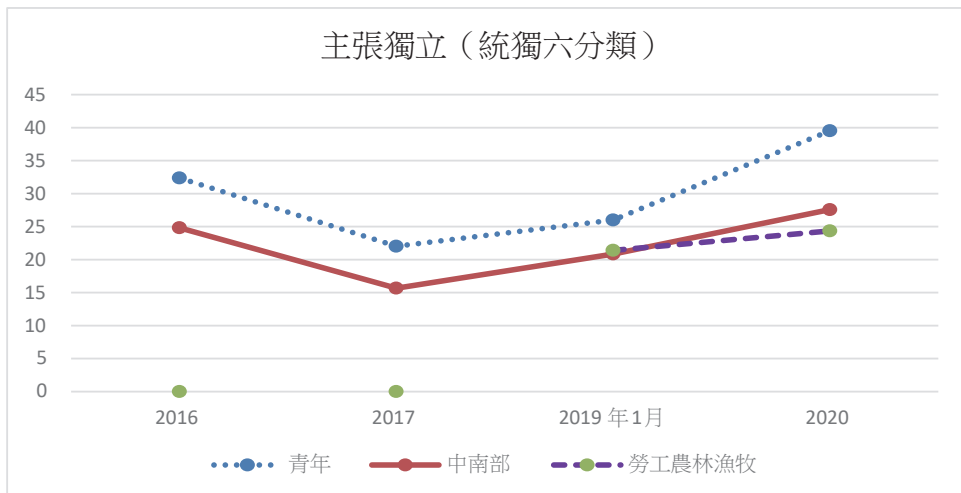
表 6 臺灣不同群體民眾主張獨立之比例（統獨六分類；百分比）

	青年	中南部	勞工農林漁牧
2016	32.37	24.82	NA
2017	22.03	15.67	NA
2019年1月	26.00	20.85	21.40
2020	39.52	27.58	24.35

資料來源：「2016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17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18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20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

說明：「獨立」包括「儘快宣布獨立」與「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

圖 6 臺灣不同群體民眾主張獨立之比例（統獨六分類；百分比）



資料來源：「2016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17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18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20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

表7與圖7是臺灣青年、中南部民眾、勞工與農林漁牧業者在「統獨六分類態度」上主張「統一」的比例變化。與剛才主張獨立者的比例相較，主張統一者的比例是更低的。其中青年世代在2016年的比例是7.05%，2017年增加有一倍之多，到達14.59%，2019年1月時則又減少一半到7.00%，2020年再減少近半為3.63%。而中南部民眾主張統一的比例在2016年有9.20%，2017年增為17.01%，2019年1月時略減到15.05%，2020

年則再減少約一半為7.13%。至於勞工及農林漁牧業者在2019年1月的比例是10.95%，到2020年比例則降低大約一半到5.65%。從以上的數字可以發現，在2016年至2020年期間，臺灣的青年世代與中南部民眾主張統一的比例都是先升後降，勞工與農林漁牧業者主張統一者從2019年1月到2020年也是減少的趨勢。此外這些數字也顯示，2019年1月到2020年，這些群體主張統一比例的下降幅度都有約一半之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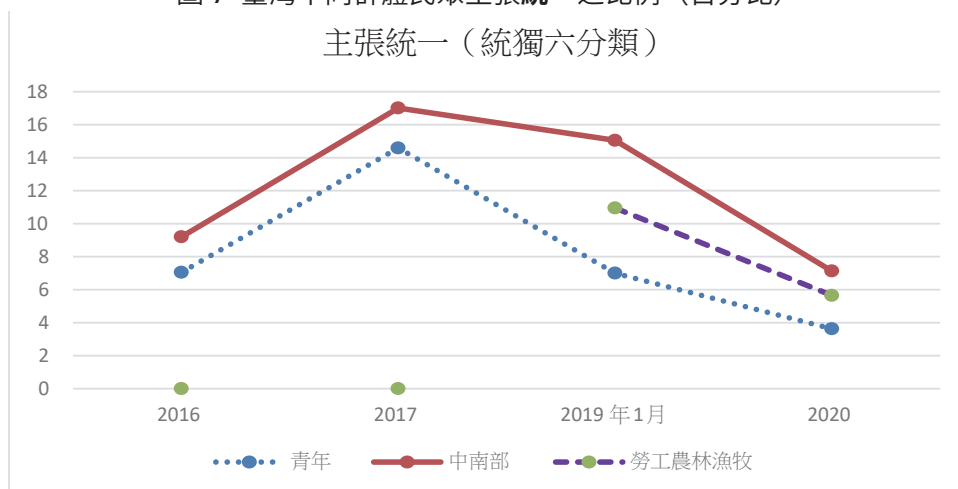
表 7 臺灣不同群體民眾主張統一之比例（統獨六分類；百分比）

	青年	中南部	勞工農林漁牧
2016	7.05	9.20	NA
2017	14.59	17.01	NA
2019年1月	7.00	15.05	10.95
2020	3.63	7.13	5.65

資料來源：「2016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17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18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20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

說明：「統一」包括「儘快統一」與「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

圖 7 臺灣不同群體民眾主張統一之比例（百分比）
主張統一（統獨六分類）



資料來源：「2016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17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18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20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

接著表8與圖8是這些目標群體贊同「條件式獨立」的比例變化。其中青年世代的比例在三個群體中是比較高的，在2016年有79.81%，2017年降到70.84%，2019年1月再上升到76.33%，2020年再次增加到85.89%。而臺灣中南部民眾在2016年贊同「條件式獨立」的比例是71.36%，2017年減少為57.61%，到2019年略微增加到60.81%，2020年則大幅增加為72.74%。在勞工與農林漁牧業者方面，贊同「條件式獨立」的比例在2019年

1月有64.67%，2020年則上升為70.43%。以上的數據顯示，在2016年到2020年的期間臺灣的青年世代與中南部民眾支持「條件式獨立」的比例皆為先降後升，而勞工與農林漁牧業者的支持比例從2019年到2020年也是上升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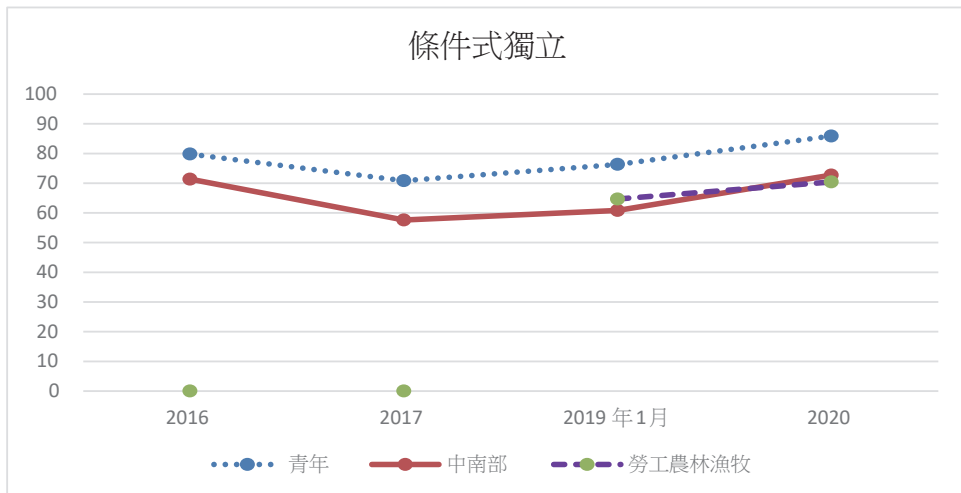
表 8 臺灣不同群體民眾贊同條件式獨立之比例（百分比）

	青年	中南部	勞工農林漁牧
2016	79.81	71.36	NA
2017	70.84	57.61	NA
2019年1月	76.33	60.81	64.67
2020	85.89	72.74	70.43

資料來源：「2016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17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18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20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

說明：「條件式獨立」表示對「如果臺灣宣佈獨立，而大陸不會攻打臺灣，請問您贊不贊成臺灣獨立？」此一問題回答「贊成」與「非常贊成」者。

圖 8 臺灣不同群體民眾贊同條件式獨立之比例（百分比）



資料來源：「2016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17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18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20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

最後，表9與圖9是臺灣青年世代、中南部民眾、勞工與農林漁牧業者贊同「條件式統一」的比例變化。其中，青年世代在2016年有26.92%，2017年增為29.17%，2019年1月則降回26.00%，2020年時再降到17.74%。而中南部民眾在2016年贊同「條件式統一」的比例有27.43%，2017年增加為36.72%，到2019年1月略微降低到35.90%，2020年時則大幅降到26.62%。至於勞工與農林漁牧業者贊同「條件式統一」的比例在2019年1月有28.86%，到2020年則減少為24.79%。以上這些數據顯示，臺灣的青年世代與中南部

民眾在2016年至2020年的期間支持「條件式統一」的比例乃是先升後降，而勞工與農林漁牧業者從2019年到2020年贊同「條件式統一」的比例也是降低的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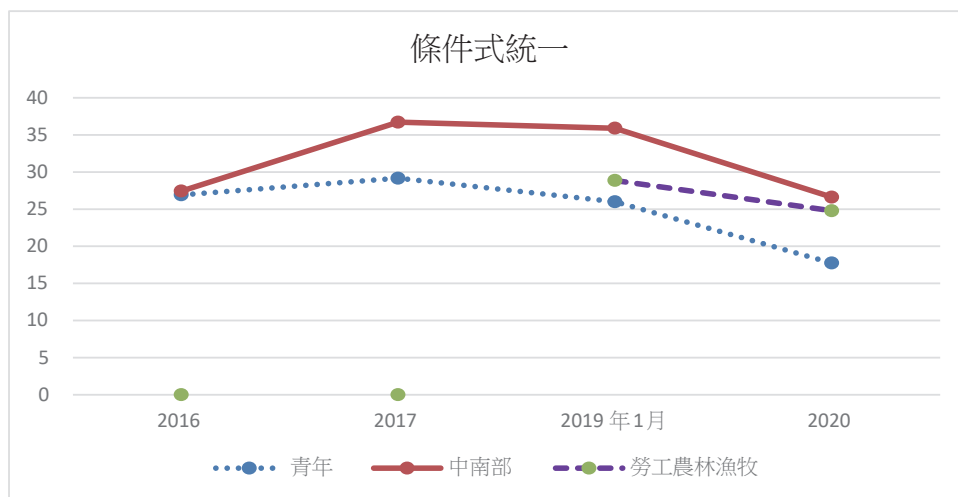
表 9 臺灣不同群體民眾贊同**條件式統一**之比例（百分比）

	青年	中南部	勞工農林漁牧
2016	26.92	27.43	NA
2017	29.17	36.72	NA
2019年1月	26.00	35.90	28.86
2020	17.74	26.62	24.79

資料來源：「2016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17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18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20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

說明：「條件式統一」表示對「如果臺灣和大陸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條件差不多時，請問您贊不贊成臺灣和大陸統一？」此一問題回答「贊成」與「非常贊成」者。

圖 9 臺灣不同群體民眾贊同**條件式統一**之比例（百分比）



資料來源：「2016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17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18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2020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料。

肆、綜合討論

表10是綜合以上各圖表觀察結果的一個整理。從中可以發現，支持「加強兩岸經貿關係」及贊同「統一」（包括「統獨六分類態度」與「條件式統一」）的臺灣整體民眾、青年世代、與中南部民眾，其比例在2016年到2020年期間都呈現「先升後降」的趨勢，而且其中由上升轉為下降的年份都在2017年，也就是2017年以後都是下降趨勢。而勞工與農林漁牧業者在支持「加強兩岸經貿關係」及贊同「統一」（包括「統獨六分類

態度」與「條件式統一」)的比例從2019年到2020年也都是「下降」。

相對地，表10顯示支持「降低兩岸經貿關係」與主張「獨立」（包括「統獨六分類態度」及「條件式獨立」)的臺灣整體民眾、青年世代、與中南部民眾，其比例在2016年到2020年期間都表現出「先降後升」的軌跡，而且從各圖表可看出，其中由下降轉為上升的年份也都在2017年，亦即2017年以後都是上升趨勢。而勞工與農林漁牧業者在支持「降低兩岸經貿關係」及贊同「獨立（包括「統獨六分類態度」與「條件式獨立」)的比例從2019年到2020年也都是「上升」。

表 10 各圖表結果之綜合整理

	整體民 (2016-2020)	青年 (2016-2020)	中南部 (2016-2020)	勞工 農林漁牧 (2019-2020)
支持加強兩岸經貿關係	先升後降	先升後降	先升後降	下降
支持降低兩岸經貿關係	先降後升	先降後升	先降後升	上升
主張獨立（統獨六分類）	先降後升	先降後升	先降後升	上升
主張統一（統獨六分類）	先升後降	先升後降	先升後降	下降
贊同條件式獨立	先降後升	先降後升	先降後升	上升
贊同條件式統一	先升後降	先升後降	先升後降	下降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以上的發現顯示，在2017年3月中共宣示提出「一代一線」政策之後到2020年的這段時間，不論是臺灣整體民眾還是「一代一線」政策針對的臺灣青年世代、中南部民眾、與勞工農林漁牧基層民眾，他們在兩岸政經關係上的態度變化其實都不符合中共「兩岸融合」的期待。在兩岸經貿關係上，中共期待的是能有愈來愈多臺灣民眾支持「加強」兩岸經貿往來，但是本文發現臺灣民眾卻是愈來愈多人傾向「降低」兩岸經貿關係。而在統獨議題方面，中共期待的是愈來愈多臺灣民眾支持兩岸統一，但是本文發現臺灣民眾則是愈來愈多人支持臺灣獨立（不論是「統獨六分類」或「條件式獨立」）。這樣的結果顯示，「一代一線」政策從提出到2020年的這段時間內，中共所預期的成效並沒有出現。

「一代一線」政策未成功的原因，毫無疑問與2019年6月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有密切關係。中共對這個運動的強硬鎮壓處理方式，使多數臺灣民眾對中共產生高度的反感，這種負面感受進而使臺灣民眾不僅愈來愈傾向減少兩岸經貿往來，更讓臺灣民眾愈來愈不願意與中國大陸統一。這樣的發展也顯示，中共若期待只倚賴「惠臺」政策所包含的各種經濟利益誘因來吸引大多數的臺灣民眾靠向中共的立場，尤其是支持兩岸統一，成功的機率可以說是微乎其微。

「惠臺」政策的經濟利益誘因或許對少部分臺灣民眾具有吸引力，但相較於此，中共更能贏得多數臺灣民眾好感，進而使臺灣民眾可能轉而傾向它所期待的「兩岸融合」目標的作法，其實是在於其他方面。

表11與圖10是2016年到2019年3月之間，臺灣整體民眾在「如果大陸政府提供臺灣更多經濟利益」、「如果中國大陸政府不限制臺灣的外交活動」、「如果中國大陸政府撤除對臺飛彈與停止軍機軍艦繞臺等軍事行動」、「如果兩岸簽訂協議（或「兩岸相互約定」），中國大陸保證不打臺灣，臺灣保證不獨立」等不同情況之下會「增加對中國大陸好感」的比例。這一組圖表顯示，雖然隨不同年份而有起有伏，但是會因為「中國大陸政府提供臺灣更多經濟利益」而對中國大陸增加好感的比例，在四種情況之中一直都是最低的。換言之，中共想以經濟利益誘因「贏得臺灣同胞的心」，效果其實並不如「停止打壓臺灣的外交空間」、「停止對臺部署飛彈與軍機軍艦繞臺」、以及「在臺灣不宣布獨立的前提下承諾不會攻打臺灣」。這是中共在推動「一代一線」或未來的其他惠臺政策時，應該可以加以思考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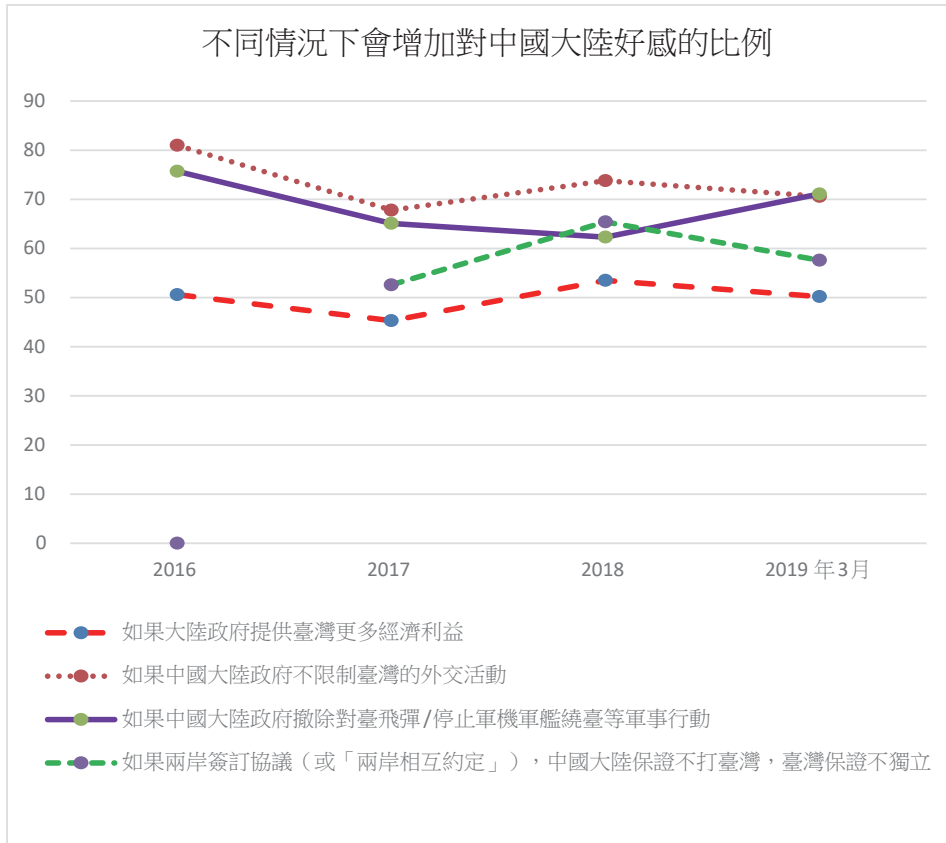
表 11 臺灣民眾在不同情況下會增加對中國大陸好感的比例（百分比）

	2016	2017	2018	2019 3月
如果大陸政府提供臺灣更多經濟利益	50.6	45.3	53.5	50.2
如果中國大陸政府不限制臺灣的外交活動	81.0	67.8	73.8	70.6
如果中國大陸政府撤除對臺飛彈/ 停止軍機軍艦繞臺等軍事行動	75.7	65.1	62.3	71.1
如果兩岸簽訂協議（或「兩岸相互 約定」），中國大陸保證不打臺灣， 臺灣保證不獨立	NA	52.6	65.4	57.6

資料來源：2016年中國印象調查研究報告書、2017年第一次中國印象調查研究報告書、2018年中國印象調查研究報告書、2019年第一次中國印象調查研究報告書。

說明：1.「會」包括「一定會」與「可能會」兩選項，「不會」包括「可能不會」與「一定不會」兩選項。2.「如果中國大陸政府撤除對臺飛彈」為2016、2017年問卷題目，「如果中國大陸政府停止軍機軍艦繞臺等軍事行動」為2018年問卷題目，2019年題目則同時包含以上兩者。另外，2016年問卷沒有「如果兩岸簽訂協議（或『兩岸相互約定』），中國大陸保證不打臺灣，臺灣保證不獨立」這一題目。

圖 10 臺灣民眾在不同情況下會增加對中國大陸好感的比例（百分比）



資料來源：2016年中國印象調查研究報告書、2017年第一次中國印象調查研究報告書、2018年中國印象調查研究報告書、2019年第一次中國印象調查研究報告書。

伍、結語

本文以上檢視了臺灣整體民眾與青年世代、中南部民眾、以及勞工與農林漁牧基層民眾等不同群體，對於是否應該加強兩岸經貿關係、以及統獨議題的態度變化，用以判斷中共在2017年所宣示的「一代一線」惠臺政策是否有達成它所期待的成效，也就是臺灣民眾能更加支持兩岸間的「融合」。不過本文發現，從2017年到2020年，由於臺灣民眾對於「加強兩岸經貿關係」的支持愈來愈低，主張未來兩岸應該統一的比例也愈趨減少，中共所期待的成效並沒有出現。本文認為，之所以有此結果，與2019年香港發生的「反送中運動」導致臺灣民眾對中共觀感不佳，有密切關係。

這樣的結果也說明，作為中共對臺政策中「軟」的一部份，中共的「惠臺」政策是否能有成效，並非只是單純依靠經濟利益的誘因即可完全決定，而是還會受到中共其他方面作為的影響，尤其是政治或軍事上是否有任何「硬」的行為。如果中共在執行軟的「惠臺」政策時，同時也出現硬的作為，例如對香港「反送中運動」的強硬鎮壓態度，或者對臺灣進行軍事演習與軍機擾臺、外交打壓，那麼惠臺政策的效果就算可能出現，也有極高的機率會被中共其他強硬的作為所抵銷。中共若真想贏得臺灣民眾的心，然後讓臺灣靠向「中國」，最該做的應該是避免對臺灣的文攻武嚇及外交打壓；「惠臺」政策相較之下反而並非重點。

參考書目

- Amy Chang Chien, 2019/8/21。「香港『反送中』催化臺灣社會紅色恐懼」，《紐約時報中文網》，<<https://cn.nytimes.com/asia-pacific/20190821/hongkong-taiwan-fury-fallout-presidential-race/zh-hant/>>。
- 一般報導，2014/6/17。「第六屆海峽論壇惠臺政策發佈情況」，《海峽論壇官方網站》，<http://www.taiwan.cn/hxlt/result/apple5_45043/201406/t20140617_6332581.htm>。
- 一般報導，2015/6/18。「海峽論壇『政策紅包』多，細數十條『乾貨』」，《人民網》，<<http://tw.people.com.cn/n/2015/0618/c14657-27173339.html>>。
- 一般報導，2019/11/4。「繼31條後中國再推出對臺26條」，《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911040030.aspx>>。
- 一般報導，2021/7/17。「杭州（浙江）舉辦臺灣青年就業活動，提供逾3,000個實習機會」，《經濟日報》，第A9版。
- 一般報導，2021/7/24。「呼和浩特（內蒙古）兩岸青創基地揭牌，助臺青在地就業」，《經濟日報》，第A9版。
- 王偉力，2017/6/18。「海峽論壇推『臺民西進』，多項『惠臺』優惠對抗民進黨去中政策」，《風傳媒》，<<http://www.storm.mg/article/285005>>。
- 李仲維，2018/3/1。「陸公布31條惠臺措施，對臺政策開春大禮，遍及各類領域」，《聯合報》，第A1版。
- 耿曙，2009/9。「經濟扭轉政治？中共『惠臺政策』的政治影響」，《問題與研究》（臺北），第48卷第3期，頁1-32。
- 耿曙、曾于蓁，2010/9。「中共邀訪臺灣青年政策的政治影響」，《問題與研究》（臺北），第49卷第3期，頁29-70。
- 陳君碩，2021/3/25。「習近平：以通惠情促融，在探索兩岸融合發展邁出更大步伐」，《旺報》（《中時新聞網》），<<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10325004281-260409?chdtv>>。
- 陳君碩、林勁傑，2018/8/17。「強調同等待遇，9月1日上路，陸推臺胞居住證，18碼類身分證」，《中時新聞網》，<<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817000568-260108>>。
- 陳言喬，2013/6/17。「海峽論壇推31項惠臺政策」，《經濟日報》，第A10版。
- 陳淳斌，2016/8/19。「中共惠臺政策演變與臺灣政黨選票結構及民意變遷」，《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網頁》，<<https://www.npf.org.tw/2/16076?reload>>。
- 曾于蓁，2015/3。「中共對臺農漁採購政策變化：契作機制及其效果」，《問題與研究》（臺北），第54卷第1期，頁95-128。
- 曾于蓁，2018/12。「統戰的制度場域：青創基地與臺青的利益連結」，《國家發展研究》（臺北），第18卷第1期，頁111-146。

楊家鑫、藍孝威，2017/5/24。「陸對臺交流鎖定一代一線」，《中時新聞網》，<<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524000374-260108>>。

趙子龍、何明帥，2020/12。「『惠臺爭先賽』：大陸惠臺政策擴散之時空演進與路徑」，《中國大陸研究（臺北）》，第63卷第4期，頁81-116。

蔡浩祥、藍孝威，2017/5/11。「俞正聲將重申：對臺胞照顧不變」，《中時新聞網》，<<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511000406-260108>>。

與談稿

「從臺灣民意檢視中共對臺『一代一線』政策之成效」與談稿

A Response to "Examin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CP's "One Generation, One Line" Policy towards Taiwan from the View of Taiwan's Public Opinion"

薛健吾 (Hsueh, Chienwu)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副教授

感謝主辦單位「臺師大東亞系」、「展望與探索雜誌社，以及「中共研究雜誌社」的邀請，本次有幸參與與談的文章為臺師大東亞系關弘昌老師的大作「從臺灣民意檢視中共對臺『一代一線』政策之成效」。本文的主旨開宗明義，即在於直接檢視中共對臺的「一代一線」政策到底取得了多大的效果。

壹、本文內容概述

「一代一線」政策是中共長期以來的對臺統戰工作中之「惠臺」政策的其中一環，是過去「三中一青」（中小企業、中低收入民眾、中南部民眾、青年）政策的延續與擴大，始於2017年3月大陸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全國政協會議開幕時所宣稱的「加強與臺灣『基層一線』和『青年一代』交往交流，厚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民意基礎」，其主要的推動目的據信在於要對抗2016年上臺的民進黨政府所推動的更為積極的「去中國化」政策。其中，比較重要的政策宣示有三波：2018年2月28日的「對臺31項措施」、2018年8月19日的「港澳臺居民居住證申領發放辦法」，以及2019年11月4日的「對臺26項措施」，期望達到習近平在2021年3月所說「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的促進兩岸「融合」的效果。

本文從「議題面向」和「目標群體」兩個方面來評估中共的「一代一線」政策到底對臺灣達到了多大的效果。「議題面向」是觀察臺灣民眾在兩岸相關議題上的態度是否有所轉變，「目標群體」是觀察「一代一線」的目標受眾——包括「臺灣全體人民」、

「青年世代」、「中南部民眾」和「農林漁牧及勞工」——對「中國」的態度是否有所轉變。本文的觀察期間為2016年至2020年，涵蓋「一代一線」推出的前一年和推出的後兩年，使用的資料為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的「兩岸關係和國家安全民意調查」以及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的「中國印象調查研究」這兩筆民調資料。

本文在分析上述資料之後，得到兩個主要發現。第一，本文發現，不論「目標群體」為何，近年來他們對於「中國」的態度變化都不符合「一代一線」政策的期待，在四大目標群體（臺灣全體人民、青年世代、中南部民眾、農林漁牧及勞工）之中，都是愈來愈多人傾向於減少兩岸的經貿往來和支持臺灣獨立。第二，本文發現，若是比較四大前提條件（提供更多經濟利益、不限制臺灣外交活動、撤除飛彈、停止軍機軍艦繞臺、簽訂不獨立不攻打的協議），則可以發現「提供更多的經濟利益」對於增加臺灣人民對「中國」好感度的效果一直都是四種裡面最差的，可見經濟誘引效果的重大侷限性。也就是說，「中共若想贏得臺灣民心，就應該要避免文攻武嚇和外交打壓，惠臺政策反而不是重點」，這是本文對於兩岸關係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發現。

貳、評論交流意見

關老師的大作很好地為我們示範了要如何運用最新的民調資料來回答與我們臺灣切身相關的重要問題，中共對臺的各種統戰手段層出不窮，但很少研究專門去回答到底中共的各種對臺統戰行為到底成效有多大的問題，本文非常及時地補上了這個缺口。惟受限於資料可得性的限制，我們無法更為直接地去驗證中共「一代一線」的影響，這並非本文本身的問題，評論人謹在此提出討論，以期待未來各個相關的研究單位能夠有更充足的研究資源來蒐集更為直接的資料，讓我們對於中共對臺統戰的效果，有更精準的評估。

第一個資料上的限制是沒有辦法進行「反事實的比較」（counterfactual analysis）的問題。因為也有一種可能是，如果中共沒有執行「一代一線」政策，那麼臺灣民眾對於「中國」的正面觀感，可能還會比資料上所看到的還要來得更低得許多，如此一來，「一代一線」政策可能還是有它一定的效果存在，若沒有與這個「反事實」（counterfactual）來進行比較，我們就永遠無法確定這一點。但這一點是所有民調研究所共通面對的限制，並非本文的重大問題，期待未來有更多的研究單位和研究經費可以透過「問卷實驗法」等方式來解決，例如可以用隨機抽樣的方式來將受訪者分成實驗組（提供中共「一代一線」相關政策的資訊）與對照組（未提供「一代一線」相關政策的資訊），以回答這個攸關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問題。

第二個資料上的限制是沒有針對「有直接受益於『一代一線』政策的受眾」進行民調的問題。由於這兩筆民調資料都是以全體臺灣人民為母體來進行抽樣，而不是以「有直接受益於『一代一線』政策的受眾」來進行抽樣，因此導致有「分析單位」（unit of analysis）不夠精準之憾。例如許多研究嘗試分析「孔子學院」的影響，然而大多數的研究是使用「孔子學院」設置之後，當地的民眾對中國的觀感是否有變化，但問題在於，理論上只有去過「孔子學院」的人才有可能有機會受到「孔子學院」的影響，沒有去過「孔子學院」的人受到「孔子學院」的影響的機會自然是非常小，因此看「當地民眾」對「中國」觀感的變化是一個比較不精準的分析單位，應該要看「去過孔子學院的民眾」對「中國」觀感的變化才能更好地去評估「孔子學院」的影響。期待未來能有足夠的研究資源，讓相關的研究單位來使用訪談法，抽樣訪談「本來就沒有意願」和「本來就有意願」到中國去發展的民眾，釐清這兩類的受訪者在「一代一線」政策推出的前後「是否有到中國發展」以及「對中國觀感的變化」，相信如此的研究設計更能精準掌握中共「一代一線」政策的實際影響。特別重要的問題是，透過這類的研究設計，找出哪一種背景的臺灣民眾會因此而被吸引到「中國」、哪一種背景的臺灣民眾會因此而大幅增加，或是減少對「中國」的正面觀感，相信會是更為直接的發現。

第三個資料上的限制是未排除其他影響因素的問題。例如，本文在文中多次強調2019年6月香港「反送中運動」可能是導致臺灣民眾對「中國」的正面觀感無法提升的關鍵，惟文中並沒有比較合適的資料去直接證明這一點，唯一的佐證僅是2019年的民調資料是在1月蒐集，而香港「反送中運動」是發生在2019年的6月，因此本文做出其可能影響到2020年的民調結果的論述。當然，除了2019年6月的「反送中運動」之外，可能還有其他因素也會影響到臺灣民眾對於「中國」的觀感，例如中共在民調前後的其他國內外行為與其他對臺政策、美國的兩岸政策、臺灣的經濟情況、臺灣當時是否正值重大選舉期間、臺灣的執政黨和在野黨在民調當時的支持度與形象等等，這些都是會對當下對「中國」的民意產生影響的因素，在未排除這些影響因素對民眾的「中國」觀感所造成的影響之前，比較難以確定「一代一線」到底帶來多大的影響。

最後一個資料上的限制是尚未涵蓋到對臺灣的反制措施的有效性的評估。例如，在2018年2月28日中共提出「對臺31項措施」之後，行政院隨即也在2018年3月16日推出了涵蓋4大方向與8大策略的「強臺策略」，試圖回應「中國」惠臺措施的影響。臺灣對「中國」各種惠臺政策的反制措施是否有效？在多大的程度上有效？對於哪一種背景的臺灣民眾可能最有用？這些都是我們也很關心的重要議題，可惜目前尚未有可得的資料來供我們作分析。換個角度而言，也許對於臺灣民眾來說，某種程度上也應該要樂見「中國」持續對臺推出各種各樣的「惠臺」措施，畢竟有競爭才有進步，最好的不被統戰的方法，應該是臺灣政府在中共的壓力之下，持續把臺灣發展成一個充滿機會的地方，讓中共不管推出何種「惠臺」措施都在臺灣的蓬勃發展之下相形失色。

China-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20th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runo Magno¹

Ph. D. Candidate, Federal University of Rio Grande do Sul, Brazil

Introduc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PRC and US through a systemic approach. This exploratory essay aims to reflect on this competition evolution and its root causes.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phenomena result from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ystem transition caused by the 4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achieve this, first, this paper will make some considerations about 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ransition. After that, the Chinese foreign, economic, and defense policies changes to adapt to this scenario will be analyzed. The following section will analyze these changes through the US' responses to these events. The last section will discuss recent events and perspectives on the future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20th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System is undergoing a transition. It is a consensus amo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cademics that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s no longer unipolar, and the PRC presents itself today as a new economic,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ole. From an economic point of view, the polarization is related to the productive re-concentration in China and the USA and the growth of state investments in these countries, mainly in infrastructure, to make this new productive sector viable.

This new productive sector is related to high tech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obotics, and 5G. Its primary input is state-of-the-art or high-end semiconductors. All these technologies are identified with a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economic

¹ Political Science Doctoral Candidate at the Federal University of Rio Grande do Sul, Brazil. Taiwan's MoFA's Taiwan Fellowship 2022 and Visiting Scholar at the Taiwan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NCCU. brunomgn@gmail.com

production base founded on disruptive technology and its essential inputs are related to changes in leadership and the very na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5G, and Robotics have enough disruptive characteristics to indicate the emergence of a new techno-productive paradigm². These new technologies are not just alter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capital and labor and providing new forms of social organization. However, they have also become fundamental in the economic, political, and military organization of States and are becoming a critical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element³. Proficiency in these technologies will be necessary for any power to maintain or develop industrial economies, produce deterrence, and plead for a non-subordinate international position. In US and PRC cases, the leadership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would be at stake.

However, at the base of these technologies' implementation is the capacity for mass production of semiconductors and state-of-the-art semiconductors development. This market is dominated by Taiwan,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SMC. TSMC alone represents 28% of the global market share and is one of only two companies that master the less than 5nm technology essential for developing 5G equipment. If we consider UMC, another leading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mpany, Taiwan alone accounts for 41% of the global semiconductor market share⁴.

This scenario is opposed to what occurred from the 1970s onwards. In this decade, Taiwan was a recipient of technology and leveraged it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from the FDI of other powers such as Japan. This process became known as the “flying geese paradigm”⁵ or even as the Japanese subcontracting model⁶, which resulted in the emergence of Asian Tigers or NICs⁷.

Today, on the contrary, Taiwan exports technology, a key technology in the dispute for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SMC is the leading supplier to US and Chinese companies such as Apple, Nvidia, Intel, Huawei, HTC, and ZTE. This scenario of market and technology concentration in Taiwan may represent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the island.

2 Carlota Perez,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nd Financial Capital: The Dynamics of Bubbles and Golden Ages*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2002).

3 Thomas L. Friedman, *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Picador, 2007).

4 D Gai, “A Mega Wave of Capex Cycle Starts in Logic Semiconductor Industry,” Counterpoint Research, 2021, <https://www.counterpointresearch.com/mega-wave-capex-cycle-logic-semiconductor-industry/>.

5 Kaname Akamatsu, “A HISTORICAL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1 (August 1962): 3–25, <https://doi.org/10.1111/j.1746-1049.1962.tb01020.x>.

6 Giovanni Arrighi, *Ilusão Do Desenvolvimento* (Petrópolis: Vozes, 1998).

7 Paulo Fagundes Vizentini, *Dez Anos Que Abalaram o Século XX* (Porto Alegre: Novo Século, 1999).

PRC and the US have already recognized the role of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 central to their Grand Strategy. This also means that, for the first time, major powers do not have control or limited decision power over the primary industries, technologies, and infrastructures of the current global economic system.

The PRC enunciated new policies to tackle this issue in its 13th five-year plan (2016-2020), especially in the Made in China 2025 program. The 14th five-year plan continues this planning and states the need to guarantee the supply chain of the technology sector, in which it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has a central role, and announces a stimulus package of 1.4 trillion dollars for the area to be invested over the five years⁸.

Likewise,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became central to the new foreign policy o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he US considers 5G technology and semiconductor production central to its Indo-Pacific strategy, as outlined in the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Guide⁹. The first results of this policy can be seen in the announcements by Japa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of billionaire investments in new state-of-the-art semiconductor production pl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¹⁰.

China's International Repositioning

It is common sense that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ceased to be unipolar at some point in the 2010s. Although US hegemony remains unchallenged, especially in the military sphere, the country can no longer project its influence unilaterally. Russian and, especially, Chinese capabilities prevent the US from acting with impunity in their respective regions. Furthermore, there is a strong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Russia and Europe and, especially, betwee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cluding the USA. These changes in the military and economic sphere ended up wearing out and perhaps putting in check the current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governance.

8 K M Sutter and M D Sutherland, "China's 14th Five Year's Plan: A First Look."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21),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IF/IF11684>.

9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Washington, March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10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Japan, "U.S.- Japan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U.S.-Japan Global Partnership For A New Era" (Washington: The White House, 2021); T Bajarin, "Why TSMC's Arizona Fab Is Strategic For Tech's Future In The US," Forbes, 2021, <https://www.forbes.com/sites/timbajarin/2021/02/16/why-tsmcs-arizona-fab-is-strategic-for-techs-future-in-the-us/?sh=1e7753511c8a>; Andrew Salmon, "Moon Set to Help Biden 'Build Back Better,'" Asia Times, 2021.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whose epicenter was in the United States, highlighted these progressive chang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world power and provoked, on the one hand, a search for greater representation, especially in Russia and China, in the multilateral governance system¹¹. Indeed, there was an investment in comprehensive regional integration processes such as the Eurasian Union on the part of Russia, and the East Asian Community (EAC), on the part of China. Furthermore, finally, in the security sphere, security communities, the primary example being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In a scenario of relative US decline, after decades of military spending in the Middle East,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2009-2016), at the end of 2011, presents its “pivot to Asia”¹² to reposition the US in East Asia, rally the region’s allies around its leadership and contain Chinese influence. Since then,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its neighbor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have significantly deteriorated. The EAC proposal was shelved after a sequence of political-diplomatic conflicts that had territorial disputes as a backdrop. Anti-Chinese groups in Japan reignited the dispute over the Diaoyu/Senkaku Islands after their attempted takeover, causing anti-Japanese protests in China and further destabilizing the Democratic Party government, a major proponent of the (EAC). Conflicts between South Korea and Japan have re-emerged over the Dokdo/Takeshima Islands dispute following the visit of President Lee Myung-bak.

Instability spread to ASEAN’s neighbors, with protests destabilizing Thailand’s governments (2013-2014) and Cambodia (2013-2014). The intensification of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lso resurfaced. After the historic agreement in July 2011, which defined the guidelines for implementing the Declaration of Conduct of the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began to weaken due to controversies over fisheries and oil and gas. This scenario contributed to the change in Chinese policy, with the installation of military bases on the disputed islands starting in 2013.

In Taiwan, the so-called Sunflower Revolution (2014) took place, which fatally wounded the government of Ma Ying-jeou from Guomindang, considered pro-Chinese and responsible for encouraging unprecedented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The developments of this event made the pro-integration policy with the Guomindang mainland unpopular, resulting in the victory of the independentist-leaning Progressive Democratic Party in the January 2016 elections.

11 Li Xing, *Mapping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Gewerbestrasse: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12 H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2019,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1/10/11/americas-pacific-century/>.

In Hong Kong, the Umbrella Revolution (2014) took place, a series of protests, blockades, and strikes that lasted about two months, which began with a proposal by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culminated in the demand for universal suffrage and the abolition of the Hong Kong Legislature. This began the shudder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CCP government and the autonomous region. After the events of 2014, tensions around the Hong Kong electoral system continued, and the groups that led the protests began to mobilize and garner international support.

Faced with the US's Asian pivot, EAC's unfeasibility, and instability with neighbor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relationships, there was a change in Chinese perception of its international insertion profile. The rise of Xi Jinping to the Presidency in 2013 followed the adoption of BRI (2013), Made in China 2025 (2015), and the Active Defense Doctrine (2015). The articulation between these three policies suggests a project of self-sufficiency in high-tech production and a Chinese-centered economic network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sphere.

The BRI differs from the project symbolized by EAC, predominant until 2011, which aimed at greater integration of China with the neighbors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via the then-current global supply chain. The initiative replaced the previous strategy with a Eurasian Infrastructure Integration System with China at its center. Launched in 2013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on a visit to Kazakhstan and Indonesia, the BRI initially proposed to join Asia, Africa, and Europe through a set of infrastructure (energy,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 involving two axles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21st Maritime Silk Road) and six development corridors¹³. The initiative already has a global reach, with 139 countries adhering to the Chinese initiative¹⁴. In general, the BRI illustrates the abandonment of the low-profile diplomatic pattern, predominant since the era of Deng Xiaoping, for a more assertive and purposeful approach characterized by the “search for the Realization ” or Striving for Achievement¹⁵.

The BRI aims to create an economic network that allows China to access raw materials and markets (economy of scale) to enable its rise in the high-tech market. More specifically, BRI is an overflow of Chinese development. It shows the possibility of shaping a Sinocentric

13 China, “Vision and Actions on Jointly Building Belt and Road - Belt and Road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eijing, March 2015), <http://2017.beltandroadforum.org/english/n100/2017/0410/c22-45.html>.

14 David Sacks, “Countries in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ho's In And Who's Out,”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21, <https://www.cfr.org/blog/countries-chinas-belt-and-road-initiative-whos-and-whos-out>.

15 X. Yan, “From Keeping a Low Profile to Striving for Achievement,”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7, no. 2 (June 1, 2014): 153–84, <https://doi.org/10.1093/cjip/pou027>.

system while fulfilling several articulated goals, such as 1) Demand creation for idle capacity of heavy industry (steel, cement, aluminum, oil refining, etc.); 2) Provision of natural, energetic and food resources; 3) Promo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companies and the export of engineering services; 4) Promotion of Renminbi (RMB) convertibility, among others¹⁶. That is, BRI allows the redirection of idle and capital capac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infrastructure, maintaining the robustness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while externally paving the paths for exporting Chinese goods to new markets and densification relations with the countries of Southeast Asia, Central Asia and Europe¹⁷.

In addition to providing the equation of a set of challenge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model, such as the reduction of regional inequalities¹⁸ and the export of idle capacity of heavy industry (Scherer, 2015), the BRI reflects the Chinese claim to take the top in hierarchy value added to regional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apples, 2018). To this end, it promotes International Capacity Cooperation policies¹⁹ and actions to promo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expressed in Made in China 2025, the 14th five-year plan (2021-2025), and, more recently, in China Standards 2035. The interlacing between BRI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s also verified when we consider Beijing's claim to export new global standards in different technical-productive segments along the Belt and Route, as in the case of 5G, high-speed railways and energy transmission (which It has the State Grid as a leader in the ultra-high voltage (UHV) transmission segment).

In this sense, the profile of active international insertion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is in line with the adoption of the Made in China 2025 program (2015) adoption, whose objective is precisely productive autonomy. The project aims to raise the domestic content of state-of-the-art technologies, such as semiconductors, to 40% in 2020 and 70% in 2025. The plan, incorporated into the 13th five-year plan (2016-2020), provides for a set of policies To foste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en sectors considered strategic: 1) new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

16 Diego Pautasso and Carlos Renato Ungaretti, "A Nova Rota Da Seda e a Recriação Do Sistema Sinocêntrico," *Estudos Internacionais: Revista de Relações Internacionais Da PUC Minas* 4, no. 3 (2017): 25, <https://doi.org/10.5752/p.2317-773x.2016v4n3p25>; Diego Pautasso et al., "Três Dimensões Da Guerra Comercial Entre China e EUA," *Carta Internacional* 16, no. 2 (July 1, 2021): e1122, <https://doi.org/10.21530/ci.v16n2.2021.1122>.

17 Li Xing, *Mapping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Gowerbestrasse: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18 One of China's strategic goals with BRI i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West, especially the province of Xinjiang, in order to reduce internal regional asymmetries in China. This province is at the core of the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CPEC) and integration initiatives in Central Asia.

19 International Capacity Cooperation, aims at the gradual migration of low value-added manufactures to other countries and reducing the pressure of industries with excessive capacity. The goal is to optimize the distribution of value chains and focus on Chinese development in technology-intensive sectors.

automated machines and tools and robotics; 3) aerospace and aeronautical equipment; 4) Maritime equipment and high technology transport; 5) Modern road transport equipment; 6) new energy vehicles and equipment; 7) Energy equipment; 8) Agricultural equipment; 9) New materials; and 10) Biopharmaceuticals and Advanced Medical Equipment²⁰.

The plan also lists a series of goals, including indicators for innovation, patents, product quality, and emission reduction²¹ also recalls that the Chinese plan strategy includes initiatives such as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licensing requirements, acquisition of strategic foreign companies, and various reverse engineering activities. With the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intensifying for the leadership of critical technological-productive segments²²,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been folding efforts to achieve productive autonomy. It is worth recalling Washington's actions to contain the international projection of Huawei, a leading 5G technology segment, as well as measures to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 China. The pandemic further reinforced the technological self-sufficiency imperative, given the frequent mentions of productive reterritorialization attempts, especially in sensitive sectors.

Given this scenario, the 14th five-year plan foresees the centrality of innovation in the general modernization of China, with self-sufficiency and self-improvement in S&T acting as strategic support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while guiding China for world avant-garde and preparing the country for the leading economic battlefields today²³. The proposal is to raise Research & Development (R&D) expenses by over 7% per year, representing, in absolute terms, 2.4% of GDP. The plan also foresees a 1.4 trillion dollar stimulus package for the area to be invested over five years, aiming to reach the condition of a moderately developed economy in 2035 and fully developed in 2050²⁴. The resources will be directed to sectors such as

20 Diego Pautasso, "DESENVOLVIMENTO E PODER GLOBAL DA CHINA: A POLÍTICA MADE IN CHINA 2025," *AUSTRAL: Brazilian Journal of Strategy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8, no. 16 (2019): 183–98, <https://www.seer.ufrgs.br/austral/article/viewFile/88779/54807>.

21 Célio Hiratuka, "Changes in the Chinese Development Strategy after the Global Crisis and Its Impacts in Latin America," *Revista de Economia Contemporânea* 22, no. 1 (2018); Diego Pautasso, "DESENVOLVIMENTO E PODER GLOBAL DA CHINA: A POLÍTICA MADE IN CHINA 2025," *AUSTRAL: Brazilian Journal of Strategy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8, no. 16 (2019): 183–98, <https://www.seer.ufrgs.br/austral/article/viewFile/88779/54807>.

22 Diego Pautasso et al., "Três Dimensões Da Guerra Comercial Entre China e EUA," *Carta Internacional* 16, no. 2 (July 1, 2021): e1122, <https://doi.org/10.21530/ci.v16n2.2021.1122>.

23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Proposa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n Drawing Up the 14th Five-Year Plan for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Long-Range Objectives for 2030," *Tradução Center for Security and Emerging Technology* (Xinhua News Agency, November 3, 2020), https://cset.georgetown.edu/wp-content/uploads/t0237_5th_Plenum_Proposal_EN-1.pdf.

24 K M Sutter and M D Sutherland, "China's 14th Five Year's Plan: A First Look."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21),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quantum information, semiconductors, neuroscience, genetic engineering, clinical medicine, and the exploration of space, depths, and soils²⁵.

In addition to the Made in China 2025 and the strategies provided for in the last five-year plan, China is expected to launch China Standards 2035, an ambitious plan lasting 15 years and which is a kind of successor and complement to Made in China 2025. The plan is expected to establish planning for major Chinese technology companies and establish global standards in segments such as 5G networks, Internet of Things (IoT),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 is essential to understand the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the Made in China 2025 and the China Standards 2035, as the former seeks to turn China into a leader in the production of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while the second aims to boost leadership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global standards, promoting those corporations from the country to the “first-level”^{26 27}.

There are Chinese proposal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governance associated with the redefini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ertion strategy through the BRI and the search for a development model centered on innovation and self-sufficiency. Until 2013, Beijing was betting on a reform of the UN/Bretton-Woods multilateral governance system. After this, it devoted herself to the creation of parallel institutions²⁸, such as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the New Development Bank (NBD), and the Comprehensive Regional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the world’s largest commercial agreement. For Xing (2019)²⁹, thi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urning point demonstrates Beijing’s goal of putting itself in a rule-shaper position, surpassing the former rule-settler instance. For Hiratuka (2018)³⁰, changes in China’s international insertion are articulated with the search for greater leadership in the financial sphere in response to slow changes in traditional multilate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ese institutions (AIIB and NDB), with the addition of the Silk Route Fund and the active performance of Chinese development banks - such as the China Development Bank (CDB) - represent alternative financing mechanisms, meaning also the establishment of institutional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IF/IF11684>.

25 Mallapaty Smriti, “China’s Five-Year Plan Focuses on Scientific Self-Reliance,” *Nature*, 2021.

26 Chinese legislators often invoke the idea that third-level companies make products, second-level companies project technology and first-level companies define standards (Koty, 2020).

27 Alexander Chipman Koty, “What Is the China Standards 2035 Plan and How Will It Impact Emerging Industries?,” *China Briefing*, 2020.

28 Oliver Stuenkel, *O Mundo Pós-Occidental: Potências Emergentes e a Nova Ordem Global* (Rio de Janeiro: Zahar, 2018).

29 Li Xing, *Mapping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Gowerbestrasse: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30 Célio Hiratuka, “Changes in the Chinese Development Strategy after the Global Crisis and Its Impacts in Latin America.,” *Revista de Economia Contemporânea* 22, no. 1 (2018).

innovation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IIB, for example, has over 100 member countries and has funded 130 projects totaling more than \$ 25 billion in investments³¹. The creation of these parallel institutions, in addition to demonstrating a propositional profile in terms of governance, expands the mobilization of capital to finance the BRI, reducing the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deficit in Asia and, consequently, contribu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reinforcing the “win-win” diplomacy idea³².

Finally, China promoted changes in its military doctrine, establishing as principles the “active defense in a new situation” and the focus on military preparation to overcome “computerized local wars” with greater high-tech investment, such as satellite development³³. In addition, the doctrine reverses the traditional primacy attributed to land operations and attributes greater importance to combined aircraft operations, the defense of open seas, and acting in cyberspace and outer space³⁴. The country has also adopted a more assertive position in its strategic surroundings by constructing artificial islands, the Aerial Identification Zones on the East China Sea, and the Southern Sea of China. China recently built its first military base abroad in DJIBOUTI, with the official purpose of combating piracy in the Indian Ocean³⁵. Thus, China’s intention to expand the geographical area of acting of its armed forces and become able to defend its increasing interests of the country, its companies, and its nationals abroad,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itiative belt and route, in all domains (earth, air, sea, outer space, and cyberspace). Thus, the reorientation of China’s defense doctrine is in line with its new foreign policy and its new insertion profil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s a great power pole and a rule shaper.

United States response

The panorama described so far illustrates the background to the current scenario of Sino-

31 AIIB, “Project Summary,”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2022.

32 Marcos A. Cintra and Eduardo Costa Pinto, “China Em Transformação: Transição e Estratégias de Desenvolvimento,” *Revista de Economia Política* 37, no. 2 (2017).

33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s Military Strategy” (Pequim, 2015); Yuan-Chou Jing, “He Study of China’s Military Strategy and Satellite Development: Moving Toward ‘Winning the Informationized War Globally’?,” *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31, no. 1 (2019): 99–120.

34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s Military Strategy” (Pequim, 2015); Denis J. Blasko, “The 2015 Chinese Defense White Paper on Strategy in Perspective: Maritime Missions Require a Change in the PLA Mindset,” *China Brief* 15, no. 12 (2015).

35 Yang Liu and Han Yin, “China Builds New Facility in Djibouti Base for Anti-Piracy Operations,” *Global Times*, 2018, <https://www.globaltimes.cn/content/1104961.shtml>.

American competition, especially the transformation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wer, the US adoption of the pivot to Asia, and the redefinitions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insertion since Xi Jinping. Because of this, it intends to explore Washington's response to the growing Chinese projection on a global scale, dealing in particular with economic, technological, and political-strategic competition. Equally relevant is the objective of relating these dimensions of the Great Powers Competition, placing Washington's actions concerning China's provinc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as a way of containing China's regional integration initiatives (BRI) and preventing Beijing's pretension to achieving self-sufficiency in various technological segments (Made in China 2025), especially semiconductors.

The background for understanding thi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ecurity conflict goes beyond the potential immediate gains and is found in the current moment of technological transition. The mastery of 5G technologies, robotic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ll not only change our daily lives with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oT), new work relationships, and new possibilities for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but will also be central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Proficiency in these technologies will be necessary for any power to maintain or develop industrial economies, produce deterrent security devices, and plead for regional leadership or non-subordinated international insertion. In the case of the USA and China, the very leadership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would be at stake³⁶. It is this technology that represents a new techno-economic paradigm and puts pressure on current technological limits, constituting a new dynamic of competition and accumulation, which today is also conventionally called Industry 4.0³⁷.

Even though China currently leading the 5G market and exporting its standard³⁸, at the bas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technology is the capacity for mass production of semiconducto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utting-edge semiconductors and related infrastructure³⁹. However, neither China nor the United States has this productive capacity in

36 Paulo Visentini et al., "NERINT STRATEGIC ANALYSIS," *AUSTRAL: Brazilian Journal of Strategy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9, no. 18 (January 6, 2021): 281–313, <https://doi.org/10.22456/2238-6912.110383>.

37 Antônio Carlos Diegues and José Eduardo Roselino, "Política Industrial, Tecno-Nacionalismo e Indústria 4.0: A Guerra Tecnológica Entre China e EUA," *Texto Para Discussão UNICAMP IE*, no. 401 (January 2021): 1–19,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Antonio_Diegues/publications.

38 Antônio Carlos Diegues and José Eduardo Roselino, "Política Industrial, Tecno-Nacionalismo e Indústria 4.0: A Guerra Tecnológica Entre China e EUA," *Texto Para Discussão UNICAMP IE*, no. 401 (January 2021): 1–19,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Antonio_Diegues/publications; Diego Pautasso et al., "Três Dimensões Da Guerra Comercial Entre China e EUA," *Carta Internacional* 16, no. 2 (July 1, 2021): e1122, <https://doi.org/10.21530/ci.v16n2.2021.1122>.

39 Antônio Carlos Diegues and José Eduardo Roselino, "Política Industrial, Tecno-Nacionalismo e Indústria 4.0: A Guerra Tecnológica Entre China e EUA," *Texto Para Discussão UNICAMP IE*, no. 401 (January 2021): 1–19,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Antonio_Diegues/publications.

their territory. Customized semiconductor production companies, known as digital foundries, are currently concentrated in East Asia,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SMC, located in Taiwan and responsible for 28% of the global market share. Currently, the Taiwanese company is one of only two that dominates the technology of 5nm semiconductors, which is essential for developing 5G equipment⁴⁰. Follows in control of this market share the Taiwanese UMC, with 13%, the South Korean Samsung, with 10% (which is also capable of the production below 5nm); and the Global Foundries, bas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with capital in Abu Dhabi, with 7%. China participates in this ranking with SMIC, which holds 11% of the global share, but has only matured its 14nm⁴¹ factories and is in the first steps in producing 7nm semiconductors⁴².

These companies account for 69% of the global custom semiconductor market, with Taiwanese TSMC being the undisputed leader in technology and supplier to American and Chinese companies, such as Apple, Nvidia, Intel, Huawei, HTC, and ZTE. Considering these numbers, at least 58% of the total production and 100% of the production of high-end semiconductors is concentrated in US allies. Additionally, the machinery needed for producing high-end semiconductors is also dominated by US allies, in this case mainly the Netherlands with the ASML Company⁴³.

This represents a challenge for China, as this sector tends to be increasingly regulated, territorialized, and central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between great powers and coalitions⁴⁴. However, it is also a challenge for the US, which needs to recruit these allies to its own technological standard and convince them to invest in productive capacity in US territory.

In this context, the trade war waged by President Donald Trump must be evaluated. Starting in 2018, the US government unilaterally applied a series of tariff barriers against Chinese products. These barriers were mainly aimed at industrial and high-tech products, specifically at those priority sectors of the Made in China 2025 policies. Trump's clear

gate.net/profile/Antonio_Diegues/publications.

40 Diegues and Roselino, "Política Industrial, Tecno-Nacionalismo e Indústria 4.0: A Guerra Tecnológica Entre China e EUA."

41 Despite this, the Chinese SMIC is well positioned with regard to semiconductors of previous generations, still extremely essential and present in numerous applications from automobiles to refrigerators (KARPHAL, 2021).

42 D Gai, "A Mega Wave of Capex Cycle Starts in Logic Semiconductor Industry," Counterpoint Research, 2021, <https://www.counterpointresearch.com/mega-wave-capex-cycle-logic-semiconductor-industry/>.

43 Scott Foster, "China on Course to Elude US Chip-Making Equipment Bans – Asia Times," Asia Times, October 3, 2022, https://asiatimes.com/2022/10/china-on-course-to-elude-us-chip-making-equipment-bans/?mc_cid=d39c3c3434&mc_eid=433d40afbb.

44 James A Lewis, "Learning the Superior Techniques of the Barbarians: China's Pursuit of Semiconductor Independence China Innovation Policy Series" (Washington, January 2019), https://csis-website-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publication/190115_Lewis_Semiconductor_v6.pdf.

objective was to recover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US cutting-edge industrial sector in relation to China⁴⁵. In a second moment, the companies responsible for the Chinese 5G standard became the target of sanctions, and, under the pretext of the crisis in Hong Kong, the United States began to prohibit companies in the country, or holders of US technology, from exporting technologies to China, the specific production of cutting-edge semiconductors, or that trade with several Chinese companies in the technology sector, including Huawei and ZTE, Chinese leaders in 5G technology⁴⁶.

This represented a significant blow to the Chinese high-tech sector, which had Taiwan as its primary source of human resources and technology in the area and TSMC as its leading supplier⁴⁷. In addition, TSMC announced the deployment of its newest sub-5nm technology factory in Arizona, USA, while Samsung will do the same in Austin, Texas⁴⁸, and the American Intel announced its entry into this market⁴⁹. A move that allows the US to expand global control over this technology. These movements denote not only the US attempt to stop Chinese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its 5G technology standard internationally but also the attempt to reposition itself, internalizing the production of this sector in its territory, in an attempt to recover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 in the productive and intellectual field.

Significant to this new trend is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G7 meeting in the United Kingdom, which took place in June 2021. With the announcement of a new UK policy for Asia, a ‘tilt,’ as described, was invited to the summit of Indo-Pacific strategic partners: South Korea, Australia, and India. Japan and the USA are added to France, which had already announced a new strategy for the Indo-Pacific region.

The expectations, which signaled Washington’s intention to use the G7 as the main forum for articulating a joint strategy to contain China, were confirmed with the summit meeting in Cornwall. The final communiqué of the meeting made direct and indirect mentions of China,

45 Pautasso et al., “Três Dimensões Da Guerra Comercial Entre China e EUA.”

46 Diegues and Roselino; Diego Pautasso et al., “Três Dimensões Da Guerra Comercial Entre China e EUA,” *Carta Internacional* 16, no. 2 (July 1, 2021): e1122, <https://doi.org/10.21530/ci.v16n2.2021.1122>.

47 James A Lewis, “Learning the Superior Techniques of the Barbarians: China’s Pursuit of Semiconductor Independence China Innovation Policy Series” (Washington, January 2019), https://csis-website-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publication/190115_Lewis_Semiconductor_v6.pdf.

48 T Bajarín, “Why TSMC’s Arizona Fab Is Strategic For Tech’s Future In The US,” *Forbes*, 2021, <https://www.forbes.com/sites/timbajarin/2021/02/16/why-tsmcs-arizona-fab-is-strategic-for-techs-future-in-the-us/?sh=1e7753511c8a>.

49 E Chang, “Taiwan’s TSMC Still Holding the Cards despite Intel’s Foundry Intentions,” *Taiwan News*, 2021, <https://www.taiwannews.com.tw/en/news/4163290>.

appealing to the Asian country to “respect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especially concerning Xinjiang,” but also about “the rights, freedoms and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from Hong Kong”⁵⁰. The communiqué also announced the creation of a program to expand funding for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designated as Build Back Better World (3BW).

The initiative, interpreted as a way to rival the BRI, seeks to build “a transparent, values-driven, high-quality infrastructure partnership led by major democracies to help reduce the more than \$40 trillion infrastructure need in the world in the development, which has been exacerbated by the COVID-19 pandemic”⁵¹. In this sense, it is inferred that the rivalry with the BRI stems not only from the dispute for influence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but also from the search for a market for the export of technological standards. This initiative aligns with the intensification of competition in the security sphere. Days after the G7 meeting, President Joe Biden met with counterparts at the NATO meeting, whose final communiqué also reserved a prominent place for China. The statement states, “China’s declared ambitions and assertive behavior present systemic challenges to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⁵².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allies in the regional sphere, it is worth recalling the Quad⁵³ meeting held in March 2021. In addition to the expected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parties regarding the security sphere,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coordination was also announced. Biden considers 5G technology and semiconductor production central to his Indo-Pacific strategy⁵⁴. Subsequently, US state and defense secretaries visited Japan and South Korea. In their statements, they pointed to the issues of Hong Kong, Uighurs, and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s central. This entire diplomatic offensive was carried out on the eve of the meeting between the foreign ministers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March, in Alaska. As a result, Chinese diplomats delivered a harsh speech to their American counterparts, reaffirming their goals set out in the Five Year Plans and demanding an end to meddling in

50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ARBIS BAY G7 SUMMIT COMMUNIQUÉ,” The White House, June 13,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6/13/carbis-bay-g7-summit-communiqué/>.

51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ACT SHEET: President Biden and G7 Leaders Launch Build Back Better World (B3W) Partnership,” The White House, June 12,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6/12/fact-sheet-president-biden-and-g7-leaders-launch-build-back-better-world-b3w-partnership/>.

52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Brussels Summit Communiqué Issued by NATO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2021), 14-Jun.-2021,” NATO, June 14, 2021,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news_185000.htm.

53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forum held between Australia, India, Japan, and USA.

54 N WADHAMS, “Biden Putting Tech, Not Troops, at Core of U.S.-China Policy,” Bloomberg, 2021,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1-03-01/biden-putting-tech-not-troops-at-center-of-u-s-china-strategy>.

Chinese domestic affairs. Just four days later, the US announced a new round of sanctions against China, denouncing an ongoing Uighur genocide in Xinjiang.

These latest events demonstrate that Biden is continuing Trump's China policy. The difference lies in tactics: strengthening alliances and integrating them into its policy of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as stated i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e⁵⁵. In addition, it revives strong ideological rhetoric to legitimize these policies centered on defendi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Finally, it is worth summarizing a set of perspectives associated with the US response and competition with China. First, the economic dimension of competition between Great Powers is fundamentally characterized by Washington's attempts to approach European and Asian allies to contain Chinese technological self-sufficiency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policies. In this sense, the actions to territorialize the high technology industry, especially semiconductors, stand out. 3BW's proposition, in turn, illustrates not only the dispute for economic influence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but a competition for the export of technological standards. Second, the ideological dimension of this competition, which serves to legitimize strategies to contain China, whose most evident facet lies in the human rights complaints in Xinjiang, the centerpiece of strategic BRI projects, such as the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Third, the military and security dimension involves re-articulating allies in arrangements such as NATO and the Quad. The intertwining between these three dimensions takes place precisely in the dispute for the vanguard of the emerging techno-economic paradigm, based mainly o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since it is the crucial variable in the leadership of the new cycle of accumulation on a global scale.

In conclusion: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the 20th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cently, throughout 2022, the tendencies described in this paper seem to be confirmed. This could be attested by a series of developments in 2022, highlighting the ongoing Bali G-20 Summit, the US CHIPS Act, the new Taiwan Strait Crisis, and the 20th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⁵⁵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Washington, March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The G-20 Foreign Ministers and Financial Ministers meetings were held on July 7th and 13th, respectively. The Russian participation in the meetings and the Ukraine question dominated the agenda of both meetings. Western countries floated the idea of boycotting the G-20 meetings if their demand to expel Russia from the forum is not adhered to. Nevertheless, all member countries attended and exchanged accusations, the main agenda was not tackled, and no joint communiqué was released. Any agreement regarding food crisis, inflation surge, or supply chain crisis will have to wait.

G-20 Summit is considered the main forum for economic, trade, and financial articulation between the big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and the main arena of debate between developed and emerging powers. After the failed American bid to sustain a unipolar world in the 2000s, the emerging powers of the time demanded more representation in the current financial and trade system. That was reached by including China (2001) and Russia (2012) in the WTO, expanding the voting powers of emerging countries in the World Bank and the IMF, and elevating the G-20 as the main forum for articulating trade and economic policies. This development at the time seemed to represent an acknowledgment of the US' leadership statu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a general consensus around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s.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deteriorated US unipolarity. In addition, international tensions such as the Georgian War, Crimean Annexation, China's brinkmanship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aiwan Strait, and the Ukrainian War further weakened the existing multilateral system in resolving the tensions between the established and emerging powers. It is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the financial, economic, and trade spheres.

Emerging countries gained very little representation in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The current energy and technological transition and building new green economy infrastructure based on the 4.0 industry require huge credit supports- the ongoing US-China strategic rivalry stalls such progress. The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resulted in at least two coexisting infrastructure networks and standards represented initially by US' B3W initiative and China's BRI. Rival infrastructure initiatives are changing the perceptions of regional countries toward multilateral initiatives. The US is reinvigorating old security alliances, such as NATO, AUKUS, and Quad, expanding their attributions to include a comprehensive Indo-Pacific Strategy. China is betting on strengthening the Beijing-centered regional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SCO, and emerging powers, such as the BRICs. Recently, China proposed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to counter the US-led Indo-Pacific Strategy and attract developing countries into its orbit.

G-20, a forum for forging compromises between the emerging and the developed world,

is now an outlet to manifest their disagreements. Not that this new function could not have its role. Nevertheless, the locus for constructing new regimes and compromises seems to shift towards regional organizations and fora with a clear division between emerging and developed powers. Against such a backdrop, the G-20 summit in Bali is improbable to act on major global challenges, such as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crisis, food security, and energy security. In the future, the G-20 Bali summit can be earmarked as the end of the globalized world as we know it and the start of a new standard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⁵⁶.

Also confirming the trend of the continuing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around the technological transition was the approval of the CHIPS and Science Act in July of 2022. CHIPS stands for Creating Helpful Incentives to Produce Semiconductors. The bill aims to fund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of semiconductors on US soil. It also provides financing for R&D and Innovation areas, having very similar goals to the Made In China and China Standards policies. This bill is one of the few initiatives in the current US government that counts on bipartisan support and promises investments of around 280 billion dollars, surpassing the 1960s space program that sent the man to the moon⁵⁷.

Chinese compromis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semiconductor technology is also bearing fruit. Also, in July 2022, the large-scale production of the first 7nm semiconductor was announced entirely with Chinese technology by SMIC, with reports that the 5nm production is already underway⁵⁸.

Until this series of events around July, it seemed that US and China could be in a rapprochement process. Bilateral meetings were held between the respective state and defense departments, with an initial consensual agenda being reached. This represented the most meaningful development in the China-US relationship since the failed Anchorage Summit in March 2021. That was put on hold with an official trip by the US Speaker of the House to Taiwan.

56 Bruno Magno, "G-20 Bali Summit: End of Globalized World, Start of New Standard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Taiwan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TCSS Security Commentaries, August 19, 2022, <https://taiwancss.wordpress.com/2022/08/23/g-20-bali-summit-end-of-globalized-world-start-of-new-standard-for-international-relations/?blogsub=subscribed#subscribe-blog>.

57 Urban C. Lehner, "The CHIPS Act Is a US Industrial Moonshot – Asia Times," Asia Times, October 5, 2022, https://asiatimes.com/2022/10/the-chips-act-is-a-us-industrial-moonshot/?mc_cid=d39c3c3434&mc_eid=433d40afbb.

58 Scott Foster, "China on Course to Elude US Chip-Making Equipment Bans – Asia Times," Asia Times, October 3, 2022, https://asiatimes.com/2022/10/china-on-course-to-elude-us-chip-making-equipment-bans/?mc_cid=d39c3c3434&mc_eid=433d40afbb; Scott Foster, "SMIC's 7-Nm Chip Process a Wake-up Call for US – Asia Times," Asia Times, July 25, 2022, <https://asiatimes.com/2022/07/smics-7-nm-chip-process-a-wake-up-call-for-us/>.

It was the first visit by a House Speaker, the second on the Presidential succession line, since the Strait Crisis of 1997. China responded with economic sanctions against Taiwan, immediate suspension of dialogue and partnerships with the US (especially on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an unprecedented live munition military drill.

Although a full-scale war is unlikely, Pelosi's trip's net result was a change of the military status quo on the Taiwan Strait. For the first time, Chinese vessels and aircraft trespassed the "median line," the tacitly agreed border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on the strait. One of the drill objectives was to demonstrate China's capabilities of enacting a blockade on the Taiwan island. What is threatening not only Taiwan but also other US East Asian allies: Korea and Japan.

The current tendency is the normalization or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se drills on China's part; as of August 15th, new drills were announced after another US representative's surprise visit occurred on that day. This "new normal" could disrupt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even more. The strait is one of the busiest sea lanes in the world and a vital corridor for the traffic of energy (oil and natural gas) and semiconductors, vital for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e main high-tech Taiwanese export.

From the Chinese point of view, this could represent one more political/economic/military asset to bargain with the US. Since the sea lane disruption could eventually be harmful to China as well, a negotiated resolution is more likely. However, now China clearly has an advantage in negotiations vis-a-vis the US.

For Taiwan, the results are very unfavorable. On one side, the Taiwanese armed forces are even more pressured by the Chinese PLA. On the other hand, Taiwan is even more strategically dependent on the US. Due to the lack of offici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direct dialogue is impossible. Taiwan is dependent on US'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military might avoid a possible blockade or Chinese aggression. This also means that the current Taiwanese Armed Forces modernization will potentially be more prone to US pressure and rely solely on an asymmetric war profile instead of a hybrid profile that combines conventional high-tech systems such as submarines and fighters with asymmetric systems and forces. The former is not only crucial in a dissuatory manner and relevant to conducting independent operations and doctrine and furthering indigenous technology and defense industries. This strong dependency is harmful to Taiwan and other US East Asian allies as well since US's own internal political instability could lead to unproductive initiatives, such as Pelosi's visit to Taiwan.

These events certainly informed the recent 20th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Xi Jinping has been reelected for an unprecedented third term as party leader and secured complete hegemony in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The final congress resolution also emphasized moder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based 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new industries, having Sections IV and V dedicated to Industry Modernization, S&T, and Innovation⁵⁹.

The current trend confirms the technology transition (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at the center of the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and, thus, at the core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ransition. This means that, among other things, an increasing trend of securitization over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over costs and competitiveness imperatives.

59 China, “Hold High the Great Banner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Strive in Unity to Build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ll Respects” (Beijing, October 22, 2022), <https://global.chinadaily.com.cn/a/202210/25/WS6357e484a310fd2b29e7e7de.html>.

與談稿

A Response to "China-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20th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y care about Taiwan?

Guermantes Lailar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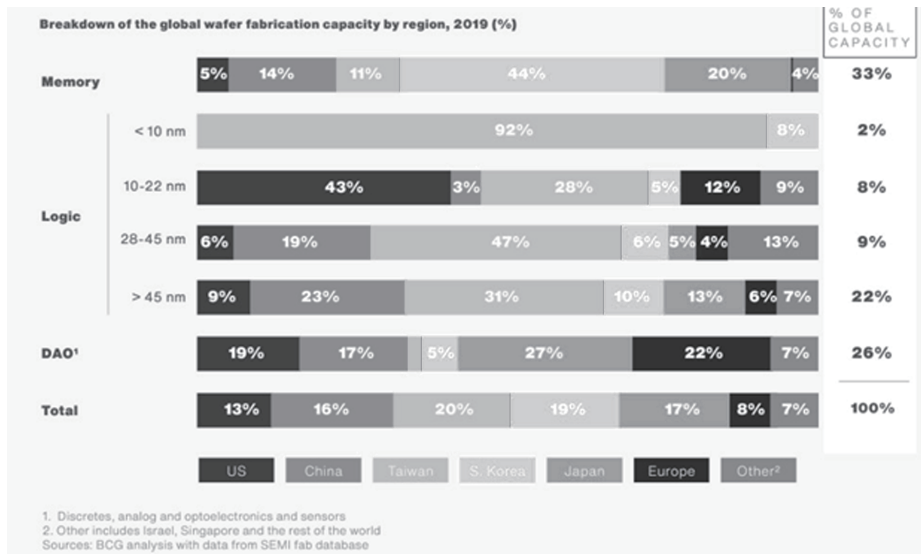
Strategic and Innovative Group, USA

Semiconductors produced in Taiwan are essential components of the world economy. Yet, production of semiconductors is not the primary reason to support Taiwan. Taiwan is important to the world because it is a model for peaceful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s from an authoritarian state to a democratic state that delivers to its citizens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individual freedoms. This essay will contrast the argument to support Taiwan based on chip production with an argument to support Taiwan as a model of peaceful democratic political evolu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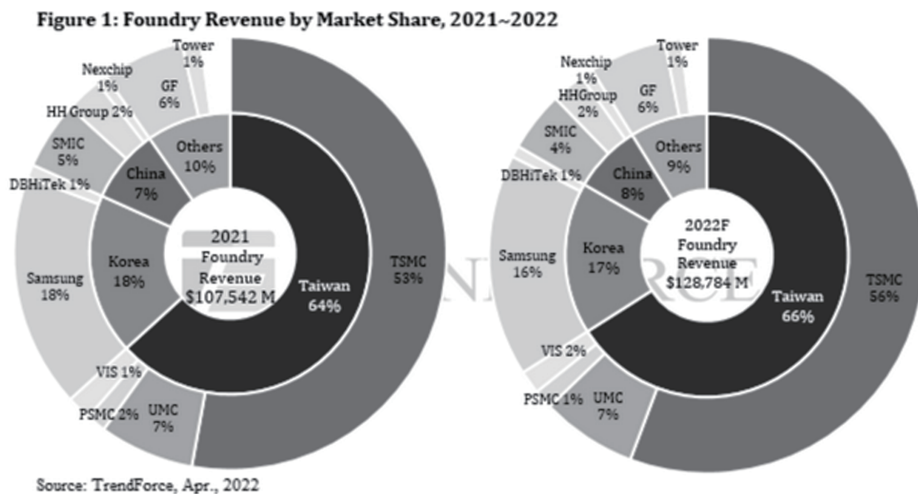
We begin by reviewing Taiwan's global status as manufacturer of semiconductors followed by polling trends and historical, strategic, military, and ideological justifications for Taiwan's importance to the world.

The Taiwan's Chip Production

In 2019, Taiwan produced 92 percent of all high-end chips (10 nanometers and below) and 20 percent of all semiconductors in the world (see chart below). In effect, Taiwan controls a particularly important product in the world economy.



Placed in a context of foundry revenue by market share and by country, the following graphic by TrendForce demonstrates that Taiwan's market share continues to rise from 64 percent in 2021 to a projected 66 percent in 2022.



How significant is the semiconductor business to the world economy? T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spends more money to purchase semiconductors (\$350 billion worth of semiconductors in 2020) than it does for crude oil. Semiconductors are like the oil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but for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volution.

One obvious challenge for Taiwan is economic competition in production of advanced microchips. If companies located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develop the capacity to produce advanced microchips and Taiwan's microchip market share plummets, does Taiwan become irrelevant to the world?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Position on Taiwanese Microchips

Biden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seek to mitigate the loss of semiconductors to the global economy from a Taiwan crisis. For example, on 22 September 2022, in a 60 Minutes interview Secretary of State Blinken said:

“Taiwan itself, were anything to happen, it is where virtually all the semiconductors-- are-- are made. One of the-- one of the reasons we're now investing so heavily in our own capacity to produce semiconductors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designed them, but the actual production is done in a handful of places, and Taiwan produces most of them, if [that production is] disrupted[,] the effects that that would have on the global economy could be devastating.”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requested chip manufacturers to set up production in the US as a way to mitigate the risk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conflict with Taiwan. Intel and 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mpany (TSMC) are building fabrication plants in Arizona and should start production sometime after 2024/5.

Think Tanks and News Organizations on Taiwan

Think tanks, such as CSIS and RAND Corporation, have published articles reinforcing the importance of Taiwan's semiconductor production to the global economy. News organizations, such as Reuters or Time Magazine, reiterate the argument that Taiwan is important because of its semiconductor business. The consequence of these publications is that Taiwan's economic role of producing semiconductors dominates discussion regarding its strategic importance.

Western Public Opinion Support for Taiwan in a Crisis Instigated by the CCP

The German Marshall Fund's (GMF) September 2022 survey of fourteen European and North American countries (Canada, France, Germany, Italy, Lithuania, the Netherlands, Poland, Portugal, Romania, Spain, Sweden, Turkey, UK, and US) provides a sobering account concerning their support of Taiwan during a military crisis. The GMF conducted the survey during June-July 2022 while many of these countries were enthusiastic supporters of NATO

supplying weapons and other support to Ukraine fighting a Russian invasion:

- Across the fourteen countries surveyed, 35 percent of respondents support only diplomatic measures and 32 percent support joint economic sanctions. Few respondents support sending arms (four percent) or troops (two percent) to Taiwan. Twelve percent want their country to take no action.
- Eight percent of Americans surveyed were willing to send arms, and seven percent were willing to send troops to Taiwan. Support for these measures is also low among the United States' closest allies in Europe: in the United Kingdom (five percent arms and three percent troops) and France (three percent and two percent). In other countries, fewer than five percent of respondents support the deployment of troops, with the lowest shares of between one percent and two percent in Italy, Poland, Turkey, Spain, Romania, and Lithuania. These allied countries do not support sending arms. Only five percent of respondents in Canada, Swede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support sending arms to Taiwan.
- In the US, twenty percent of Republicans and thirteen percent Democrats preferred to take no action at all, while twelve percent of Republicans and eight percent of Democrats supported arms deliveries to Taiwan.

If leaders of any European or North American country proposed to supply weapons or send troops to Taiwan, they would have to make a very convincing argument to move public opinion, based on these polling results, from single digits to more than 50 percent.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CCGA) conducted a US poll in July and August 2022 and found a very different conclusion than GMF survey regarding American attitudes:

- In the event of a Chinese invasion of Taiwan, American majorities would support imposing diplomatic and economic sanctions (76 percent), sending additional arms and military supplies to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65 percent), and using the US Navy to prevent Beijing from imposing a blockade against Taiwan (62 percent).
- Four in ten would support sending US troops to Taiwan to help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defend the country against China (40 percent).

Perhaps the GMF poll did not ask the right questions which distorted the true support that Americans and possibly Europeans have for Taiwan? The CCGA has asked the same questions since 1982 with similar trends. Convincing more Americans to send troops from 40 percent to

above 50 percent is achievable with the right leadership. Having the CCGA conduct a similar poll in the same European countries as the GMF could confirm a greater support than originally reported by the GMF poll.

Historical Basis for US Support to Taiwan

On 29 January 1955, Congress and President Eisenhower signed a Joint Resolution called the “Authorization for the President To Employ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Protecting the Security of Formosa [ROC], the Pescadores, and Related Positions and Territories of That Area.” The Joint Resolution made references that mirror the current CCP’s aggressive behavior today:

“Whereas certain territories in the West Pacific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re now under armed attack, and threats and declarations have been and are being made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hat such armed attack is in aid of and in preparation for armed attack on Formosa [Taiwan] and the Pescadores,

Whereas such armed attack if continued would gravely endanger the peace and security of the West Pacific Area and particularly of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 and

Whereas the secure possession by friendly governmen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Island chain, of which Formosa is a part, is essential to the vital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all friendly nations in or bordering upon the Pacific Ocean; and

Therefore be it *Resolved by the Senate an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Congress assembled*, that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be and he hereby is authorized to employ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he deems necessary for the specific purpose of securing and protecting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 against armed attack...”

President Eisenhower and the US Congress recognized Taiwan’s strategic significance in 1955 by declaring its military defense as a **vital interest** to the US. They recognized Taiwan’s significance *before* it became a semiconductor technological world supplier.

Counterfactual: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PLA Conquering Taiwan

Taiwan and its islands are part of the first island chain that include islands from northern Japan to the Philippines, Malaysia, and Indonesia.

If Taiwan submits to CCP control, vulnerability to CCP designs increases for Japan, South Korea, and other countries in Southeast Asia. These countries would have to increase their national security budgets and change how they prepare for challenges to their sovereignty and security. In addition to altering budget priorities, self-defense would require some nations to confront constitutional and social and cultural constraints. For example, Japan's constitution, or better said, the catastrophe of the 1930's – 1940's, made Japan leery of restricts the size and missions of Japan's Self-Defense Forces, and it still finds it difficult to do so. Japan's citizens also are reticent to develop nuclear weapons as a hedge against a failure of US deterrence of PLA aggression against Japan. Since the 1970s, the CCP has claimed sovereignty over the Senkaku Islands of Japan (called Diaoyutai by PRC and Taiwan) islands that lie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Nuclear Free Zones and Umbrellas

All non-nuclear weapons countries in Asia have signed some form of international nuclear weapons-free zone agreement. They will not be able to openly develop an indigenous nuclear deterrent unless they withdraw from these agreements.

For those under a US nuclear umbrella, they will have to depend on feckless US political leadership to use US nuclear weapons to defend them. In 1976, Japan ratified the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NPT); Japan could rapidly build nuclear weapons using its nuclear waste stockpiles from its 33 operable nuclear power plants. Similarly, in 1975, South Korea ratified the NPT. South Korea currently operates 25 nuclear power plants. Both countries could have or could be capable of having clandestine nuclear weapons programs.

Once the PLA occupied Taiwan, North Korea and the CCP would challenge Japan's and South Korea's security and use nuclear weapons to intimidate and constrain responses to CCP initiatives. For example, the PLA could disrupt shipping lanes used by South Korea and Japan and restrict or prohibit passage through the South China Sea (SCS) and the East China Sea. The CCP views Taiwan as part of its so-called Nine-Dash Line claim of 90 percent of the SCS. With the US allies threatened, the US would have to divide its declining air and naval forces to protect its allies throughout Asia while the CCP can concentrate the PLA and its other maritime assets with its many SCS bases.

CCP justifies more expansion in the SCS and the PLA gets more SCS bases



Taiping Island / Itu Aba – 16 June 2022 (Source)



Taiping Island (Source)

Taiwan's Kaohsiung's Cijin District (旗津) administers Taiping (1,600 km away) and Dongsha (430 km away) Islands. Both islands have Taiwan's Coast Guard and Marines stationed on them.



Dongsha Island / Pratas Island ~ 2020 (Source)



Analysts sometimes forget that Taiwan has claims in the SCS. Taiwan'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claims the Nansha (Spratly) Islands, Shisha (Paracel) Islands, Chungsha Islands (Macclesfield Bank), and Tungsha (Pratas) Islands, as well as their surrounding waters. Taiwan's MOFA also states that "Taiping Island (Itu Aba), the largest (0.5 square km) of the naturally formed Nansha (Spratly) Islands, has been garrisoned by ROC troops since 1956." Taiwan's territorial claims will shift to the PRC if they control Taiwan, making the CCP's claim in the SCS stronger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and giving the CCP more reason to continue its expansion into China's "Persian Gulf" based on the gas and oil resources under the sea. Additionally, they would take Taiping and Dongsha Islands giving the PLA more airports and ports to conduct their operations adding to the many other PLA controlled SCS islands that they already have militarized (Woody Island, Fiery Cross Reef, Subi Reef, Mischief Reef all have 10,000 foot runways).

Nuclear Submarine Base in eastern Taiwan

If the PLA takes Taiwan, the PLA Navy (PLAN) will build nuclear submarine bases on the eastern side of Taiwan because these require a port that will allow them to move into and out of the area stealthily. Just as the US Navy's nuclear submarine base in Naval Base Kitsap, Washington State is close to deep waters, the eastern side of Taiwan drops deep into the ocean which makes detection extremely challenging. Locating PLAN submarine bases on Taiwan's eastern shore, increases the PLAN's nuclear threat. In addition to a nuclear threat, the PLAN's submarines, PLAN surface ships and PLA fighter aircraft forward deployed to Taiwan and its islands could disrupt shipping lanes between the US and Asian allies.

Taiwan: Democr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aiwan peacefully transformed from a dictatorship to a thriving democracy run by ethnic Chinese people. Taiwan, as a democratic and prosperous state, is an ideological threat to the PRC and CCP. The very existence of Taiwan offers ethnic Chinese people an example of a successful nation that does not employ the intrusive and totalitaria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CP.

The city-state of Hong Kong also represented a government providing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political freedom; in 2020, the CCP broke the 1984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which stated that Hong Kong would transfer to China under a principl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for a period of 50 years.

Taiwan's Importance and Relevance

Taiwan's importance has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US role in Asia. As Grant Newsham noted in his article earlier this year: “The fall of Taiwan will leave a searing impression on all regional nations (even North Korea):

- The vaunted U.S. military couldn't, or wouldn't, stop Beijing.
- Fear of economic and financial retaliation didn't stop Beijing.
- Even fear of America's nuclear weapons didn't stop Beijing.
-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llies couldn't stop Beijing from taking—by force or bullying—democratic, independent, U.S.-friendly Taiwan, and subjugating its 24 million citizens.”

Taiwan is relevant to the world because it demonstrates that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individual and political freedom can co-exist. Those who value freedom, appreciate Taiwan's democracy, and want to prevent the CCP from taking over Asia need to amplify the arguments above to ensure the survival of Taiwan.

Investment in R&D by Taiwan SMEs as a Covid-19 business survival strategy: Initial Results

Buwule, Robert
Kyambogo University, Uganda

Abstract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had an enormous effect on businesses most especially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SMEs). Though a number of business enterprises have faced many setbacks due to the pandemic, however, some SMEs have remained resilient even in the abnormal business environment. The Covid-19 pandemic ushered in innovative business survival strategies that led some SMEs to blossom instead of collapsing. One of the business survival strategie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s an investment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o what extent selected SMEs in Taiwan are investing in R&D and how this strategy has contributed to their survival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This is a qualitative study and interviews and focus group discussions will be used to collect data.

This paper reports on the extent to which Taiwan SMEs have researched, innovated and created new applications, products and procedures during the covid-19 era, the level of government of China subsidies to business establishments in the area of R&D, SME's institutional preparedness, R&D infrastructure, human resources competency in R&D and the SME's top management attitude towards R&D.

Key words: Research & Development,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Research & Innovation

1.0 Introduction and Background to the Study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had an enormous effect on businesses all over the world particularly on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SMEs). This pandemic will always be remembered for gruesome lockdowns on businesses in many parts of the globe. Following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in Wuhan, China in December 2019, it quickly spread across the whole world infecting and killing millions of people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Most countries imposed lockdowns, travel restrictions and quarantines that drastically caused most SMEs business activities to come to a standstill and even collapse/clos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 Since many of the SMEs are still growing and vulnerable, they could not survive the long periods of business inactivity. For example in Nepal, lockdowns weakened 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onditions of the enterprises and lowered their viability. Meanwhile all this happened with little or almost no moral and economic supports from the governments (Basnyat and Sharma).

Though a number of business enterprises faced many setbacks due to the pandemic, some SMEs remained resilient even under the abnormal business environment. The Covid-19 pandemic ushered in innovative business survival strategies that led some SMEs to blossom instead of collapsing. A number of SMES in the energy, consumption indicated a decrease, while in sectors like electricity SMEs instead gained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Tsai, 2021). One of the business survival strategy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s investment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Akpan et al., 2020). Doloreux et al., (2016) basically defines R&D as the firm's deliberate effort to research, gather information, innovate and create new applications and technical knowledge so as to give the firm more sales and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over other firms. R&D may consist of basic, applied or experimental research that a firm chooses to conduct with the intention of discovering and developing new products and procedures, or improve on the existing ones (OECD, 2002).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has come up with a deliberate move in this direction. It seeks to enhance R&D and promote, upgrade and transform SMEs to a level where they can easily respon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conditions. The government decided to pursue this direction so as to assist SMEs in thei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to enhance their digital application capacity by actively promoting a diverse range of measures such as; applying the cloud technology, coaching, manufacturing, structural inno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 Administration, 2021

White Paper on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in Taiwan). Governments are increasingly showing interest in supporting researchers to exemplify innovation than incorporates ideas, practices and objects that are perceived to be business innovations in th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Bhaskaran). The innovations are exemplified in form of new goods or services, new methods of production, production processes, procedures, product performances, establishing new markets, utilizing new supply sources, and creating new organizational forms and general strategic experimentation (Tidd et al.).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has also taken a step to offer subsidies to business establishments in the area of R&D. According to Xu et al., (2021) government R&D subsidies stimulated corporate R&D investment though the subsidies may have no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firm'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 growing number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MNCs) are investing heavily in R&D operations (Sun & Wen, 2007). Actually more and more MNCs are establishing R&D facilities in China. Since 1994, around 700 foreign R&D units have been set up since Nortel Network established the first foreign R&D centre in China (Economic Intelligence Unit, 2004; Walsh, 2007). Most of these multi nationals deal in;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pharmaceuticals, and electronics. China's large market and abundant talents, are some of the catalysts for these companies investing heavily in R&D (Sun et al., 2006). Specifically electronics firms in Taiwan have exhibited better performance in terms of innovative activity and productivity as a result of investing heavily in R&D (Yang et al., 2010). SMEs have attempted to invest in R&D most especially Family Business groups but again they engage in risky R&D behaviours (Min, 2021). Different dynamics in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create divergent situations in which SMEs introduce substantially greater numbers of new products, services, techniques, forms of organization, sources of supply, and markets (Bhaskaran).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SMEs) have different definitions around the world. According to Taiwan standards, an SME is an enterprise with paid-in capital of not more than NT\$100 million with not more than 200 regular employees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 Administration, 2021 *White Paper on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in Taiwan*). By 2019, Taiwan had 1,491,420 SMEs in Taiwan, accounting for 97.65% of all enterprises. They offer employment to over 9,054,000 persons, or 78.73% of the working population, an indicator that SME are the cornerstone of stability and job creation in Taiwan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ROC).

Extant literature shows a lot of attention on how MNC in Taiwan engage in R&D to

improve their business. Not much however is exhibited for SMEs. There was therefore need to conduct a thorough study on the extent to which SMEs in Taiwan invest and take advantage of R&D as a covid-19 business survival strategy. The focus of this such a study should be on the SME's institutional preparedness, R&D infrastructure, human resources competency in R&D and the SME's top management attitude towards R&D.

1.1 Aim of Research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o what extent selected SMEs in Taiwan are investing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how this strategy has contributed to their survival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1.2 Research Objectives

This study was guided by four research objectives and these were;

- (a) To establish the extent to which SMEs in Taiwan invest in R&D
- (b)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R&D in the business survival of SMEs during the Covid -19 Pandemic
- (c) To explore the role libraries and other sources of R&D play in supporting Taiwan SMES
- (d) To suggest strategies of how R&D for Taiwan SMEs can be improved

2.0 Literature Review

Challenges and hardships experienced by SME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have revealed an unprecedented level of vulnerability of these enterprises (Basnyat and Sharma). That notwithstanding, for SMEs to survive during crisis environments, they have to continually introduce innovative and dynamic business manoeuvres such as new products that customers appreciate. Fast-paced innovation is almost a prerequisite for the successful SMEs (Kessler et al.). They continually introduce innovations into the market, fine-tune their products with the help of the customer feedback as well as setting customer friendly prices (Smith and Reinertsen). Studies conducted in the U.S. revealed that 50 percent of all innovations and 95 percent of all radical innovations are introduced by SMEs (Kessler et al.). Such radical innovations have a potential of increasing the SME's sales and ultimately improve the business performance of the firm.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has attempted to play a pivotal role in this regard. It has come up with a strategy of strengthening small business start-ups, incubation and innovation acceleration. The government wishes to create a high-quality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in Taiwan. Further stills, there is also a Township Revitalization Project for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that seeks to promote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in townships. It strives to transform and expand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markets through digital innovation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 Administration, *2021 White Paper on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in Taiwan*). Transformational governmental leadership should be in position to create an inspirational vision that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ideas within their SMEs. For example Taiwan's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has stimulated mindfulness, positive performance, self-efficacy, and green performance. (Sun et al.; Chen et al.).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starts by the Human Resources (HR) communicating the strategic vision to their employees. It is at this stage that the HR recruits and retains an R&D conscious work force. That implements innovative firm practices such as using eco-friendly principles, augment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dropping emissions, use of less material in production and design, cost and waste reduction, use of green raw materials, less use of electricity and water (Sun et al.)

SME innovation orientation is quantified by analysing the R&D expenditure (Bhaskaran). For example SMES in Urbanised China devote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their expenditure on R&D infrastructure. They spend on funds to develop improved housing for their own markets. They designed property rights for these housing that are 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conditioned to the customer contexts and aspirations (Sa and Haila).

Collaborative R&D strategic alliances may occur between firms within the same industry or among competitors (Harbison and Pekar Jr). Even when SMES might be competing against each other, they can research and innovate together to have comparative advantage over large companies (Gnyawali and Park). This normally happens in international markets where if an alliance of SMEs manage to produce a new product quicker than the large companies, they can reap in a number of ways such as attracting a number of customers, increasing the market share, increasing profits and extending the sale life of that new product. Kessler et al., (2007) however argues that some times that external sourcing of this form of R&D may slow down innovation in SMEs and may indeed act as a barrier to fast-paced development (Kessler et al.).

For R&D to be more effective SMEs have to contact or create relationships and networks with different sources of such innovations such as; government, Libraries, Universities, research institution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s and industry. In Australia, government has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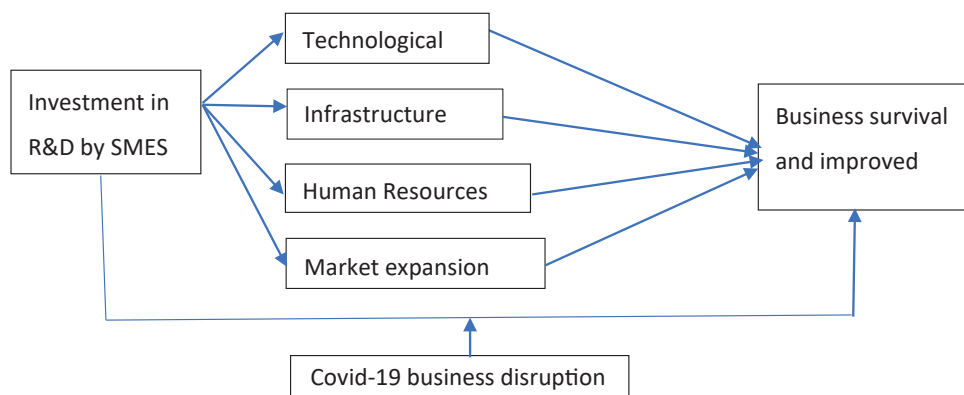
played a great role in linking SMEs dealing in seafood retail enterprises to R&D networks, institutions and universities. These linkages have helped a great deal of these retail seafood dealers in accessing information and adopting innovation easily (Bhaskaran).

High tech SMEs particularly product developers constantly face ever-shortening product life cycles, rising R&D costs, conflicts in ownership of technology through patents and licensing, high risk and uncertainty in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a lack of resources to pursue large-scale innovation projects (Kessler et al.). Unlike large firms which normally have a stronger financial muscle to increase innovation speed, SMEs are limited by a shortage of technical, human, and capital resources (Dhawan). SMEs are further curtailed by inadequate capabilities in marketing and production, limited sophistication, managerial and administrative expertise, Informal Strategic planning and poor documentation. They also lack formal processes, procedures, and reward systems for innovations (Gnyawali and Park).

To avoid some of these encumbrances, SMEs in Taiwan have attempted to cultivate a culture that allows internal learning and knowledge generation. This can be triggered by rewarding risk, teamwork, empowerment and institutionalised cross-functional communication (Clark and Fujimoto). Other SMEs have gone further to improve R&D by building requisite competencies in knowledge application and technology exploitation of in-house innovation.

While research has been done on R&D in SMEs, very few studies examine how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SMEs) have managed to survive the COVID-19 disruptions through the investment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is study attempted to address this literature gap. Basing on the extant literature reviewed, the researcher developed a research framework to guide this study. In this framework, for SMEs to survive and blossom during the Covid-19 crisis they had to invest in four key areas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these were;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Human resources and the market or customer satisfaction. Below in Figure 1 is the research frame work.

Figure 1. Research Framework



3.0 Research Methodology

This study was purely qualitative in nature. The researcher adopted an interpretive research design where research participants were issued with semi-structured questionnaires to collect their views on the study. According Schwartz-Shea & Yanow (19) an interpretive research design is an ‘observation brought out in analyses of scientific work from a practice perspective.’ This research design is intertwined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right from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data collection and data analysis. The interpretive research design further combines observation, talking and close reading. Interpretive researchers make presuppositions explicit.

Purposive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identify SMEs with a dynamic and innovative environment. The SME proprietors were requested to provide information about how their enterprises survived the COVID-19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R&D. This was coupled with Chain referral where different research participants were introduced and recommended by other possible participants (King et al.). To maintain a social distance, some participants were sent links to the online questionnaire while others were called and filled the questionnaire with them. There also others who were contacted through zoom, Google meet and other social media applications. Different participants were selected to represent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SMEs until a saturation point was reached (Sa and Haila; Fusch and Ness). Data collection was conducted between 15th to 29th September 2022. Filling a questionnaire could last between 15 to 20 minutes. The research data was analysed thematically through reduction, present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Smith). Reduction aimed to reach the crucial data that can help in addressing the main research questions.

4.0 Research Findings and discussi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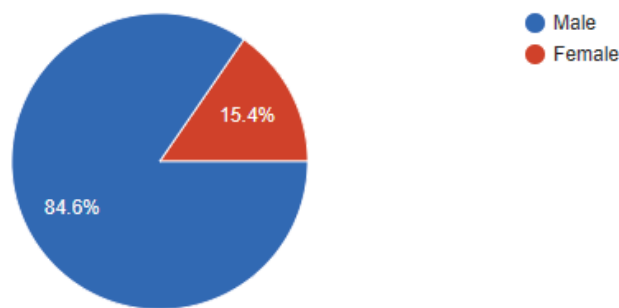
Below are the findings and discussions of the study out of the 13 respondents that manag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study. These are initial or preliminary results as the study is still on going. The respondents were mainly proprietors and representatives of Taiwan SMEs engaged i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businesses.

(a)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search participants

The researcher first sought to know the gender of the respondents and below in Figure 2 is the graphical representation.

Figure 2. Showing the gender of the respondents (Source: Field data)

13 respons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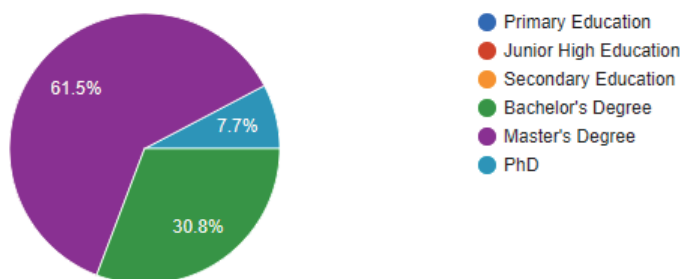


From the graph above, it can be seen that 11 (84.6%) respondents were male while 2 (15.4%) respondents were female. This could be partly due to the 1980s Taiwan's export-oriented economy which decided to change the economic structure from a labour-intensive driven to capital and skill-intensive driven economy. So since many of the SMEs were family business, the husbands automatically become the bosses (Chu). This trend seems to be still the case up to now. Further still the Taiwan's export-led economy has created men to become employers and women mainly as wage workers. Amazingly SMEs are excluded from labour legislation and gender equal employment laws (Chen). This is however different from a related study on Taiwanese SMEs that found out that 39 (38.6%) of the respondents were male and the majority 62 (61.4%) were female. The researchers however add that that the gender and age of respondents don't have a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since the Taiwanese collectivist culture dictates that individuals are more likely to comply with the opinions of salient others regardless of their gender or age (Nuryyev et al.).

The study sought to establish the academic qualification of respondents and in the pie chart below is the illustration.

Figure 3. Showing the highest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of the respondents (Source: Field data).

13 respons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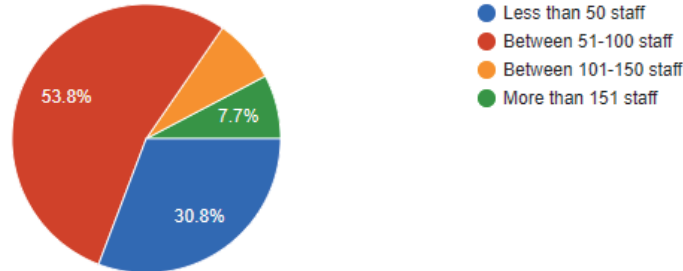


From Figure 3 above it is very evident that the highest portion of the respondents 8 (61.5%) had Masters Degrees, these were followed by 4 (30.8%) respondents who had Bachelor's degrees and 1 (7.7%) respondent had a doctorate. None of the respondents had stopped in secondary or lower education qualification. This is a direct indicator that for one to run and SME investing in R&D, they have to possess more than average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Traditionally, family businesses faced many setbacks as a result of employing unqualified members instead of qualified staff members (Chu). This business strategy actually dates back to the 1940s when Taiwan was still colonised by Japan (Mabena). Japan provided most Taiwanese people with education to transform the island into a hi-tech economy. This trend continued through the years and recently Colleges/Universities of technology in Taiwan are responsible for developing a higher level of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of personnel for the fields of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between the 1945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clos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aiwan already had 47 Institutes/Universities of technology with 13,608 graduates, 921 Masters Degrees and 42 had doctorates (Mabena).

The study went further to establish the number of staff employed in the enterprises and below in the pie chart is what was revealed according to the respondents in this study.

Figure 4. Showing the number of staff employed in the SMEs involved in the study (Source: Field data).

13 respons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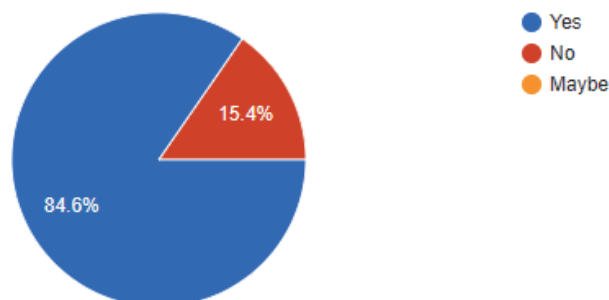
From Figure 4 above it is evident that most of the SMEs, 7 (53.8%) involved in the study employ between 51-100 staff members, this was followed by 4 (30.8%) SMEs which employ less than 50 staff members. Only one respondent fell in the category of SMEs that employ between 101-150 staff members and also only one SME employs more than 150 staff members. By 1995, over 90% of Taiwan firms were SMEs and half of them employed less than 10 staff members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1996). Many of these staff were family members and relatives who sometimes would take low or no pay (Chen). So historically Taiwan SMEs prefer lean staffing structures. Another related study on SMEs in Taiwan indicated that 656 (69.4%) SMEs had less than 30 staff members, 205 (23.5%) SMEs had 31-100 staff members and only 63 (7.2%) had more than 100 staff members (Yeh-Yun Lin and Yi-Ching Chen).

(b) Extent of investing in R&D

The researcher was interested to know the extent to which SMEs in Taiwan invest in R&D. They asked the respondents whether their enterprises directly inject funds into R&D. Below is graphical representation of their views.

Figure 5. Showing the investment in R&D by Taiwanese SMEs (Source: Field da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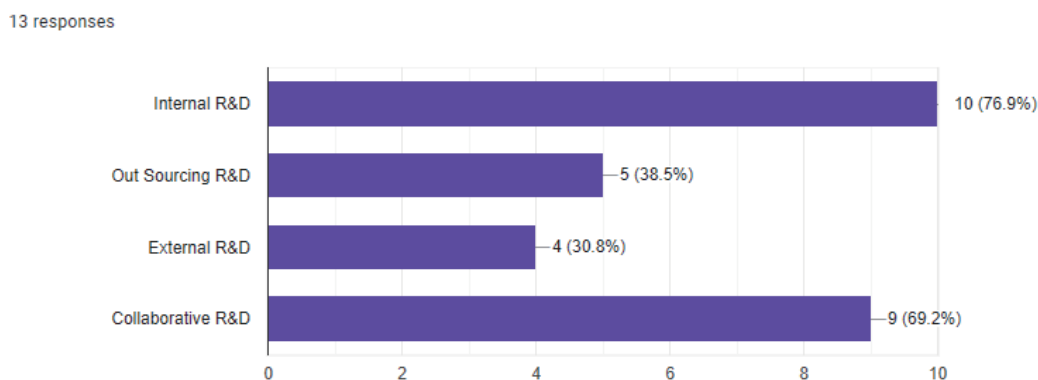
13 responses



It is no secret that most of the respondents 11 (84.6%) indicated that they directly inject funds in R&D while only 2 (15.4%) indicated that they don't according to Fig. 5 above. A number of related studies on Taiwanese SME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show that Taiwanese SMEs inject substantial amounts of funds in R&D so as to intensify firm performance, innovativeness and improve their firms' operational efficiency (Hitt et al.; Delios and Beamish; Kotabe et 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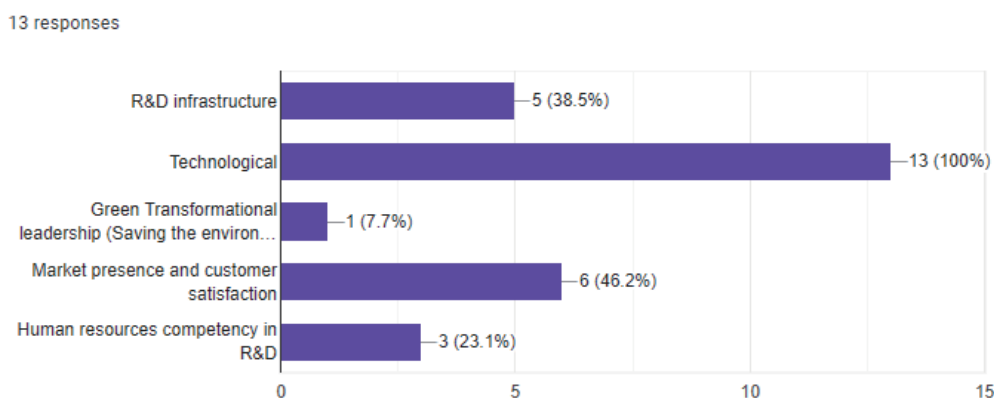
After establishing the extent to which Taiwanese SMEs invest in R&D, the researcher delved further to establish the exact categories of R&D they invest in. Below is the bar graphs is what was found out.

Figure 6. Showing the categories of R&D the Taiwanese SMEs invest in (Source: Field da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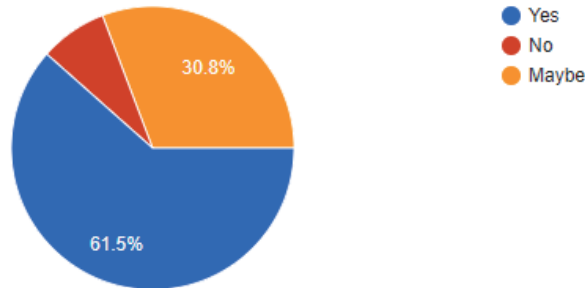
Basing on the bar graph above, it can be clearly seen that most Taiwanese SMEs 10 (76.9%) invest in internal R&D, this is followed by 9 (69.2%) respondents who invest in collaborative R&D. There also cases of SMEs who invest in outsourcing R&D and others invest in external R&D.

Business areas focused on in R&D



(c) The impact of R&D in the business survival of SMEs during the Covid -19 Pandemi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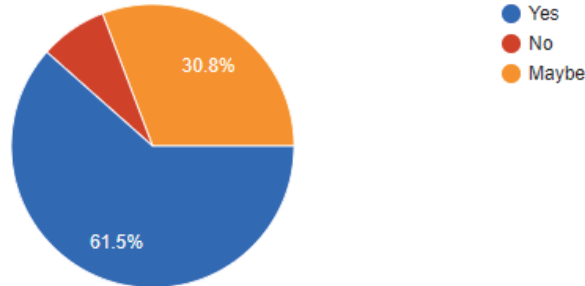
13 responses



Among the respondents who stated R&D had an impact in the SME business survival during the Covid-19 crisis, they were further asked to rate the level of helpfulness of R&D in business survival during the Covid-19 crisis and below in the pie chart were their views

Figure 9. Showing the helpfulness of investing R&D during the covid-19 Crisis (Source: Field data).

13 respons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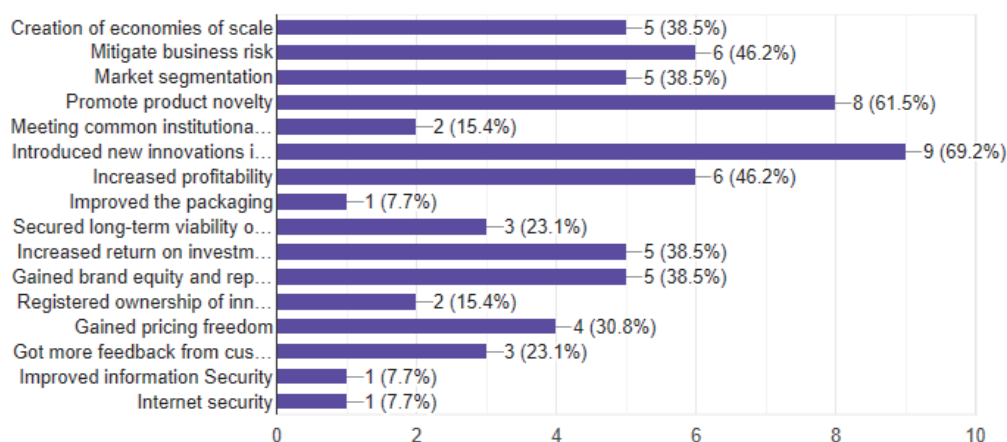


According to the respondents, 4 (40%) of them stated that investing in R&D was very helpful during the crisis, another 4 (40%) of them stated that it was fairly helpful and only 2 (20%) respondent declared that it was marginally helpful. Before the Covid-19 era Taiwanese SMEs had long started to actively engage in R&D activities so as to increase productivity, improve product quality, lower costs of production, develop new products, expand production flexibility and to standardise production procedures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 Administration, *White Paper on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in Taiwan*; Chiao et al.). Therefore by the time the crisis came, a number of SMEs didn't struggle to survive as they used the same R&D innovations to manoeuvre through.

The researcher sought to know the benefits the SMEs get from investing in R&D. Below in the bar graph were their responses.

Figure 10. Showing the benefits of investing in R&D (Source: Field da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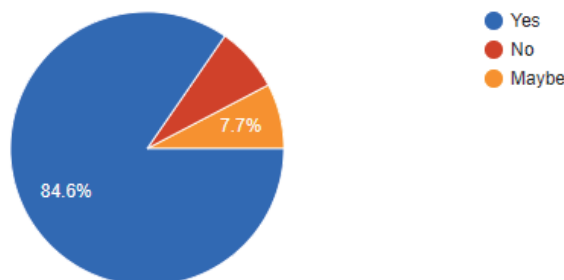
13 responses



The top four benefits SMEs get from investing in R&D as illustrated in Figure 10 above are; introduction of new innovations 9 (69.2%), promotion of product novelty 8 (61.5%), mitigation of business risk 6 (46.2%) and increasing profitability 6 (46.2%). There were also many other benefits such as; creation of economies of scale, market segmentation, improved packaging, increased return on investment and gaining pricing freedom among others. This is not very different from other related literature which highlights almost the same benefits accruing from investing in R&D. Extant literature highlights benefits of investing in R&D such as; product innovation, process innovation, stimulating export performance foster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s, specialized marketing capabilities and standardization (Kotabe et al.; Nassimbeni)

Investment in Collaborative 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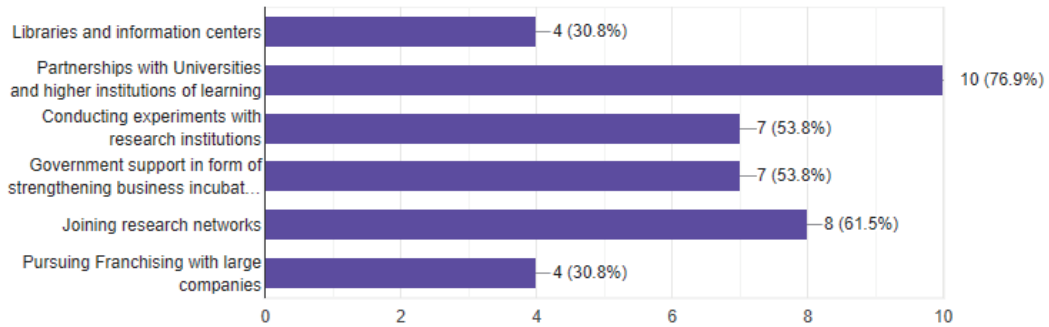
13 responses



Aw (2002) also demonstrated the positive impacts of R&D and export activities on performance (productivity) (Chiao et 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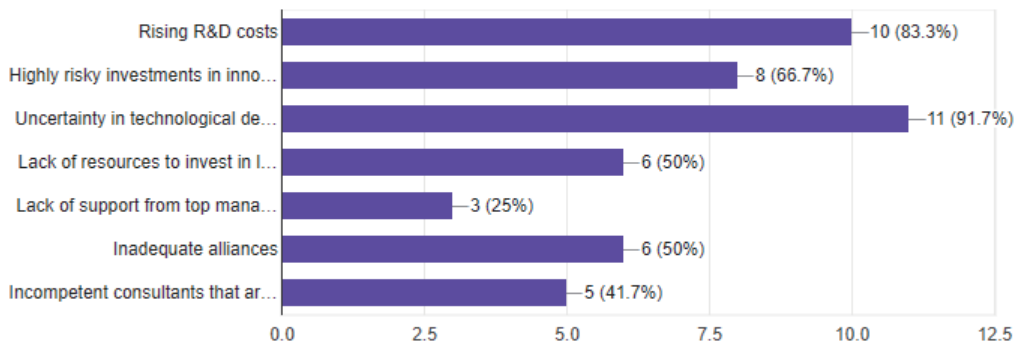
(d) The role the libraries and other sources of R&D play in supporting Taiwan SMES

13 responses



(e) Challenges of SMEs investing in 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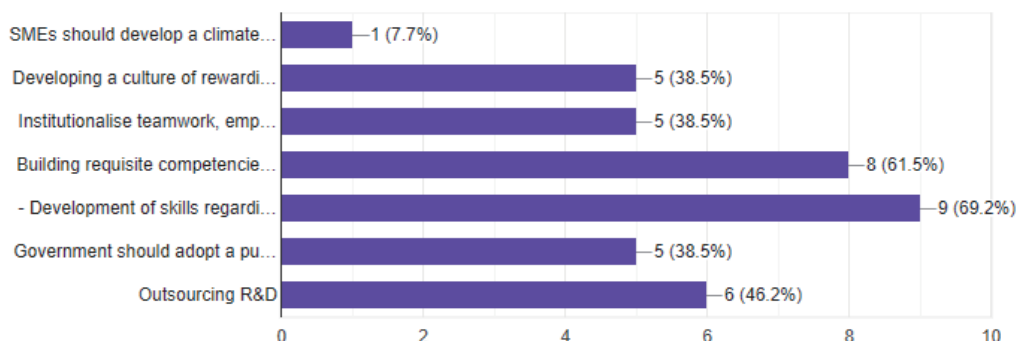
12 responses



On one hand, the low levels of R&D intensity of our sampled firms may be attributed to their smaller average size, which reflects their deficiency in R&D capabilities. On the other hand, we suspect that these figures are underreported. Though R&D expenditure is tax-deductible in Taiwan, some firms regard the reporting procedures as complicated and bothersome. Therefore, most SMEs in Taiwan choose not to report (or to underreport) their actual R&D investments. SMEs tend to believe that dealing with the tax authorities outweighs any tax-shield benefits (Chiao et al.)

(f) Strategies of how R&D in Taiwan SMEs can be improved

13 responses



process innovation activities. In addition, the Contractual Supply Ratio in 2000, calculated by dividing the sales revenues from subcontracting services for foreign clients (i.e., OEMs and ODMs) by total revenues (Lee et al., 2001) was about 81%. Such a ratio suggests that a high proportion of Taiwanese firms are manufacturers for their foreign clients. Thus, we conclude that a great part of Taiwanese SMEs in the textile and electronics industries treats cost/quality key to their survival and success. In such cases, firms tend to equip themselves with process capabilities rather than product competencies. It is quite common for Taiwanese companies to adopt practices such as quality control circles; such practices generally involve group learning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Chen, 1999). These practices fit neatly into the notion of “process innovation” (Utterback and Abernathy, 1975). Compared with “product innovation” (which is generally regarded as a Western style of innovation), process innovation is thought to encourage such beneficial results as cost reduction, expanded production capacity, improved quality, and, among other benefits, development of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Such benefits stand in sharp contrast to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fforded by RBV, which may be more quickly visible, but the beneficial effects of which may enjoy a shorter lifespan. It is therefore expected that a minimum level of R&D expenditure is not required for R&D investment to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firm performance. We expect such R&D investment for process innovation to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firm performance. Thus, (Chiao et al.)

Recommendations

To survive in this Covid-19 era, it might also behoove SMEs to develop skills in boundary spanning. Public policy might be adapted to assist SMEs with staffing R&D experts (Kessler et al.).

Scholars have further suggested that SMEs need to collaborate with competitors so that they can create economies of scale, mitigate risk, and leverage resources together (Morris et al.)(Morris, Kocak, and Özer 2007). Covid-19 created an equaliser where SMEs faced similar challenges and thus required to access, acquire, and use relevant R&D resources held by each other to out compete the large enterprises (Gnyawali and Park)

5.0 Conclusion

China is one of the leading attraction of Foreign R&D in the world today (Zedtwitz et al., 2007). More so Taiwan spurs a lot of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This study therefore sets out to investigate how SMEs in Taiwan have taken advantage of R&D to drive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remain at the top of the business competition in spite of the covid-19 disruptions.

References

- Basnyat, Sandeep, and Sunil Sharma. "Effects of COVID-19 Crisis on Small and Medium-Sized Hotel Operators: Insights from Nepal." *Anatolia*, vol. 32, no. 1, (2021), pp. 106–20, <https://doi.org/10.1080/13032917.2021.1879184>.
- Bhaskaran, Suku. "Incremental Innovation and Business Performance: Small and Medium-Size Food Enterprises in a Concentrated Industry Environment."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vol. 44, no. 1, (2006), pp. 64–80, 10.1111/j.1540-627X.2006.00154.x.
- Chen, Fen-ling. *Unemployment and Policy Responses in Taiwan: Gender and Family Implications BT - Transforming the Developmental Welfare State in East Asia*. Edited by Huck-ju Kw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05, pp. 170–90, https://doi.org/10.1057/9780230523661_8.
- Chen, Y. S., et al. "Gree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Green Performance: The Mediation Effects of Green Mindfulness and Green Self-Efficacy." *Sustainability*, vol. 6, no. 10, (2014), pp. 6604–21.
- Chiao, Yu-Ching, et al. "Performance,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Firm-Specific Advantages of SMEs in a Newly-Industrialized Economy."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vol. 26, (2006), pp. 475–92, <https://doi.org/10.1007/s11187-005-5604-6>.
- Chu, Wenyi.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Ownership on SME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Public Firms in Taiwan."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vol. 33, no. 3, (2009), pp. 353–73, <https://doi.org/10.1007/s11187-009-9178-6>.
- Clark, K., and T. Fujimoto. *Product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1.
- Delios, A., and P. W. Beamish. "Geographic Scope Product Diversification, and the Corporate Performance of Japanese Firm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 20, no. 8, (1999), pp. 711–27.
- Dhawan, R. "Firm Size and Productivity Differential: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a Panel of US Firm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vol. 44, no. 3, (2001), pp. 269–93.
- Fusch, P. I., and L. R. Ness. "Are We There yet? Data Saturation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 Qualitative Report*, vol. 20, (2015), pp. 1408–16.
- Gnyawali, Devi R., and Byung-jin (Robert) Park. "Co-opeti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 Multilevel Conceptual Model."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vol. 47, no. 3, (2009), pp. 308–30, <https://doi.org/10.1111/j.1540-627X.2009.00273.x>.
- Harbison, J. R., and P. Pekar Jr. *Smart Alliances*. Jossey-Bass, 1998.
- Hitt, M., et al. "A Midrange Theory of the Interactive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and Product Diversification on Innovation and Performance."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 20, no. 2, (1994), pp. 297–326.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 "Contagion or Starvation, the Dilemma Facing Informal Worker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Web Document*, 2020.
- Kessler, Eric H., et al. "External Knowledge Accession and Innovation Speed in the Small and Medium Sized Enterprise (SME)." *Small Enterprise Research*, vol. 15, no. 1, (2007), pp. 1–21, 10.1080/13215906.2007.11005829.

- King, G., et al.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 Kotabe, M., et al. "Multinationality and Firm Performanc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R&D and Marketing Capabilit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 33, no. 1, (2002), pp. 79–97.
- Mabena, William. "The Role of Education in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Lessons for South Africa." *Lessons from Taiwan Skills Development, Trade and SMEs*, edited by William Mabena et al.,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2, pp. 1–14.
-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ROC. "The Number of Enterprises, Employed Persons and Total Sales in SMEs Have Grown Stably in 2019." *Web Page*, 2022, https://www.moea.gov.tw/MNS/english/news/News.aspx?kind=6&menu_id=176&news_id=92049#:~:text=According to the 2020 White Paper on Small,0.99%25 compared to 2018. Both were historic highs.
- Morris, M. H., et al. "Coopetition as a Small Business Strategy: Implications for Performance."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Strategy*, vol. 18, no. 1, (2007), pp. 35–55.
- Nassimbeni, G. "Technology, Innovation Capacity, and the Export Attitude of Small Manufacturing Firms: A Logit/Tobit Model." *Research Policy*, vol. 30, no. 1, (2001), pp. 245–.
- Nuryyev, Guych, et al. "Blockchain Technology Adoption Behavior and Sustainability of the Business in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SMEs: An Empirical Study." *Sustainability*, vol. 12, no. 1256, (2020), pp. 1–26, <https://doi.org/10.3390/su12031256>.
- Sa, Haoxuan, and Anne Haila. "Urban Villagers as Real Estate Developers: Embracing Property Mind through 'Planting' Housing in North-East China." *Housing Studies*, (2021), pp. 1–21.
- Schwartz-Shea, Peregrine, and Dvora Yanow. *Interpretive Research Design : Concepts and Processes*.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1, <http://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kyambogou-ebooks/detail.action?docID=957663>.
-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 Administration. *2021 White Paper on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in Taiwan*. 2021, https://book.moeasmea.gov.tw/book/doc_detail.jsp?pub_SerialNo=2021A01681&click=2021A01681#.
- . *White Paper on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in Taiwan*. 2003.
- Smith, J. A. *Qualitative Psychology: A Practical Guide to Research Methods*. Edited by J. A. Smith, 2015.
- Smith, P. G., and D. G. Reinertsen. "Shortening the Product Development Cycle." *Research Technology Management*, vol. 35, no. 3, (1992), pp. 44–49.
- Sun, Xiaomei, et al. "Gree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Economic Research-Ekonomska Istraživanja*, (2022), 10.1080/1331677X.2021.2025127.
- Tidd, J., et al. *Managing Innovation*. 3rd. ed, John Wiley and Sons, Inc, 2005.
-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Pandemic." *Web Document*, 2020.

Yeh-Yun Lin, Carol, and Mavis Yi-Ching Chen. “Does Innovation Lead to Performance? An Empirical Study of SMEs in Taiwan.” *Management Research News*, vol. 30, no. 2, (Jan. 2007), pp. 115–32, <https://doi.org/10.1108/01409170710722955>.

A Response to “Investment in R& D by Taiwanese SMEs as a Covid-19 business survival strategy: Initial Results”

Rup Narayan Das

Indian Counci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dia

First of all, I am grateful to the organizers, including Central Library, for this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this day-long Conference here. We have already discussed very important issues ahead of the 20th Party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discussions have been very stimulating and enlightening. The Party Congress would be taking place at a time when China has hardened its stance towards Taiwan in the wake of the visit of the Speaker of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Ms. Nancy Pelosi earlier in August in spite of the restraint shown by Taiwan. Taiwan has not succumbed to China’s provocations of military drills and intrusion into its Air Defence Identification Zone (AIZ). China not only violated Taiwan’s sovereignty and security by firing missiles, but it has also threatened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and in the Taiwan Strait. A situation like the ‘Fourth Taiwan Strait Crisis’ has been created. It is not only a threat to freedom and democracy in Taiwan, but also a threat to democracy in general and a threat to the “Indo-Pacific. It is a great reassurance that the entire democratic world led by the US has reached out to Taiwan reiterating its support to Taiwan in its rock-like resolve to protect freedom and democracy. Other democratic countries like Japan, the United Kingdom, Australia, New Zealand, Germany, France, and Ukraine, a victims of the Russian invasion; and Taiwan’s diplomatic allies have also extended their support to Taiwan. India has also expressed concerns for peace and urged not to unilaterally change the status quo. The visits by Parliamentary delegations from abroad to Taiwan and the reiteration of their support for Taiwan have also boosted the morale of Taiwan in this critical time.

With all humility and modesty, I must say that I am not qualified to be a discussant of this paper, written by Dr. Robert Stalone Buwule. I am not an economist, but I have some degree of knowledge of foreign policy issues including China, Taiwan, and India-China relations. This topic certainly requires some domain knowledge. Be that as it may, one need not be a rocket scientist to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what Dr. Robert Stallone has done. The only thing

common between the author and myself, besides both being Ph.Ds., both of us belong to the institution of Parliament. I served in the research division of the Indian Parliament, while he serves in the library of the Ugandan Parliament.

Like everyone else in the audience here, I heard the presentation with great interest and I must compliment him for an excellent paper and its presentation. Out of curiosity, when I googled his name on the internet, I was impressed that he is an accomplished scholar having published a number of high-quality research papers in reputed journals. Although he belongs to Library Science, I notice that he has done high-quality research on small and medium-scale industries and this work is an extension of his earlier research work on small and medium-scale industries.

As I said earlier this conference is taking place in the backdrop of the 20th Party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ich is going to take place later this month and in the context of Regional Security in the Indo-Pacific. Apparently, it seems to be there is no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itle of the paper and the theme of the conference, but if the dots are connecte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aper is establish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theme of the Conference. Taiwan's economy, particularly it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s very critical to ensure regional security and the economy of any country. Taiwan is on the frontline of saving democracy; when the juggernaut of autocracy is on the ascendency with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A strong and resilient Taiwanese economy is a bulwark to safeguard and strengthen democracy in Taiwan. Democracy in Taiwan has been earned and consolidated in Taiwan in a very hard way.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like two sides of the coin have supplemented and complemented each other; one reinforcing the other. The strengthening of democracy in Taiwan is an anathema to the communist regime in China. The fact that Taiwan, a vibrant democracy in its neighborhood, has achieved economic prosperity through democratic means is not palatable to the communist regime. It, therefore, tries to debunk democracy in Taiwan.

Turning to the discussion of the paper, I must say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building blocks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such as agriculture, industry, and service sector, and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SMEs). In the integrated global economy, the national economy is seamlessly integrated with the global economy. SMEs play a very significant role. The economy of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over the years have supplemented and complemented each other. It is unfortunate, however, that in recent times especially after the DPP came to power in Taiwan attempts are being made by the communist regime in China to weaken Taiwan's economy and to erode people's confidence in the effectiveness and a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to

manage the economy to ensure the livelihood of the people and quality of life. China's decision to ban buying pineapples from Taiwan earlier and later banning the import of groupers are just examples of intention to dampen the domestic economy of Taiwan. These economic sanctions are imposed by China on Taiwan deliberately to affect the ensuing local elections in Taiwan, to be held on 26th of November.

It is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at the investment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SMEs, particularly during the pandemic period is very critical. This paper is an empirical study. Citing authoritative sources, the author define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s the firm’s deliberate effort to research, gather information, innovate and create new applications and technical knowledge so as to give the firm maximum sales and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over others”. On the basis of his study, the author observes that specifically, electronics firms in Taiwan have exhibited better performance in terms of innovative activities and productivity as a result of investing heavily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He further says that SMEs have attempted to invest in R&D behaviorally in family run business groups but again in risky R&D behaviour. He opines that different dynamics in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create divergent situations in which SMEs introduce a substantially greater number of new products, services, techniques, forms of organizations, sources of supplies, and markets. Citing authoritative sources, he writes that an SME is an enterprise with paid-in capital of not more than NT\$ 100 million and not more than 200 regular employees. He concludes that in spite of many setbacks and hardships caused by the pandemic, some SMEs remained resilient; the COVID-19 pandemic ushered in innovative business survival strategies that led some SMEs to blossom instead of collapsing.

Covid-19 was and continues to be a major challenge, but it was also an opportunity in many ways. It affected the world economy, national economy, and personal income of individuals. Like most other countries Taiwan also faced the challenge with fortitude and creative ideas not only to face the pandemic but also to make its economy, including the SME sector, resilient. The major breakthrough was Taiwan’s demonstration of its value to the world, especially in the areas of disease prevention, economy, and diplomacy. While most countries were struggling to cope with the pandemic, Taiwan’s meticulous control and monitoring succeeded in keeping the public safe. For months without imposing an official lockdown, Taiwan reported no new COVID-19 cases. When the virus gradually became endemic, the government swiftly adjusted its strategy to coexist with the virus and return to normalcy. The pandemic response has kept pace with the world and kept the Taiwanese relatively shielded from the worst of its consequences. Taiwan also avoided the worst of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pandemic which earned world recognition and applause. In 2021, Taiwan's economic growth surpassed that of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 This year the IMF estimates Taiwan's GDP per capita will be US 36,000 higher than that of South Korea. Taiwan also has demonstrated its industrial perseverance in the face of global supply chain disruption and it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has contributed to relieving global chip shortage.ⁱ

The worst affected during the pandemic were unorganized sector labourers and wage earners. Drawing from my own experience in India, I can say that people literally died like cattle-died of Covid-19 due to lack of hospitalization, oxygen, and even sometimes food. It was bizarre. Some sectors of the economy like industry, manufacturing, construction, and hospitality industry including tourism suffered heavy losses, some even closed down. Some sectors of the economy, however, took advantage of this crisis and reinvented themselves. The digital economy benefitted because most transactions were through e-commerce. Food delivery systems like Food Panda, Zumato, and Uber Eats flourished.

Talking about R&I in India's context,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and medic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received major government support. I must mention here that in record time India could manufacture Covid-19 vaccines like Covishield which was manufactur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Extrazena of Oxford University in record time. I have doubts if such large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can fall under SMEs, but they did a turnaround during the pandemic. Similarly, within a very short period, India could produce protective gear and masks on a massive scale. So also India produced ventilators and oxygen concentrators in record time. Huge amount of money was pumped into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these sectors.

In conclusion, it can be said that at a time when business optimism has slightly dropped, the SME sector needs to be supported for a resilient economy. According to a recent study done by the US-based Dun & Bradstreet (D&B) in the month of September this year the business level of Taiwanese business has dropped to a seven-quarter low, as factors such as the COVID-19 pandemic, inflationary pressure, and supply chain bottlenecks have not yet fully stabilized. The business optimism index is 108.1 this quarter, a fall of 18.8 percent from the previous quarter and a decline of 10 percent from a year earlier, marking its lowest level since the first quarter of last year. The index comprises six sub-indicators that gauge business sentiment toward sales volume, net profit, selling prices, new orders, inventory levels, and workforce size. The survey found that optimal levels of Taiwanese businesses for net sales, new orders, and net profit were at their lowest in seven quarters.ⁱⁱ

The SMEs sector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in Taiwan. It augurs well that the 21st Century

Trade Talks which has been initiated between the US and Taiwan also takes cognizance of the SME sector in the framework of US-Taiwan trade.

End notes

-
- i “The Liberty Times editorial: National Day for Taiwanese unity” (2022/10/15), visited date: 2022/10/15, 《Taipei Times》, <https://www.taipeitimes.com/News/editorials/archives/2022/10/15/2003787058>.
 - ii “Local business optimism drops to seven-quarter low” (2022/9/20), visited date: 2022/9/20, 《Taipei Times》, <https://www.taipeitimes.com/News/biz/archives/2022/09/20/2003785586>.
-
- The writer is a retired officer of the Lok Sabha Secretariat of Indian Parliament and was a Taiwan Fellow at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from April 2022 to November 2022. Views are personal.

肆

附 錄

Appendixes

兩岸關係大事紀 (2021年11月至2022年10月) Major Episodes Involving Cross-Strait Relations from November 2021 through October 2022

鄭光傑 (Cheng, Kuang-Chieh)

展望與探索雜誌社研究員

編輯

【2021年】

11月2日：由大陸國臺辦和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共同主辦的第17屆「桂臺經貿文化合作論壇」在廣西南寧舉行，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常委、統戰部部長徐紹川主持開幕式。

第15屆「海峽兩岸媒體荊楚行」在湖北武漢舉行，來自《新華社》、中央廣播電視總臺、中新社、湖北電視臺、湖北日報，以及臺灣《聯合報》、TVBS電視臺、東森電視臺等兩岸十多家新聞媒體、二十多位記者參與活動。

11月4日：大陸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在北京舉行「涉臺專家學者座談會」，包括大陸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全國臺聯、全國臺灣研究會、中國人民大學、北京聯合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廈門大學等單位專家學者，深入分析民進黨政府近期系列言論。

11月5日：大陸國臺辦發言人朱鳳蓮針對美國部分官員支持臺灣參與聯合國系統，以及對「臺獨」頑固分子採取懲戒措施，應詢表示：

（一）聯合國是由主權國家組成的政府間國際組織。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不是主權國家，理所當然不能成為聯合國成員。

（二）大陸依法對清單中的「臺獨」頑固分子實施懲戒，禁止其本人及家屬進入大陸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限制其關聯機構與大陸有關組織、個人進行合作，絕不允許其關聯企業和金主在大陸謀利，將採取其它必要的懲戒措施。

11月6日：第8屆「鄂臺（苗栗）青少年武當文化體驗營」在湖北武當山和臺灣苗栗同步舉行，交流活動包含雲遊武當、交流演出和武術教學等內容，兩岸青少年約二百人參加活動。

11月8日：由中華文化聯誼會、海峽兩岸旅遊交流協會、臺灣人間文教基金會等承辦的「守望精神家園-第7屆兩岸非物質文化遺產月」及美麗中華行活動在臺灣高雄佛光山佛陀紀念館舉行，中華文化聯誼會會長、海峽兩岸旅遊交流協會會長張旭透過視訊表示，兩岸同胞要繼續手牽手、心連心，和衷共濟、團結向前，共同傳承與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深化兩岸融合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動力。

11月9日：由廣東省人民政府主辦的「2021年南澳論壇」在廣東汕頭舉行，以「彙聚僑心僑力、推進融合發展」為主題，汕頭市委書記溫湛濱表示，希望臺汕兩地以舉辦南澳論壇為契機，不斷加深聯繫與交流，不斷創新合作機制與方式，攜手譜寫深化經貿文化交流合作新篇章，為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做出貢獻。

11月10日：大陸國臺辦舉行新聞發布會，由發言人朱鳳蓮主持，要點如次：

- （一）大陸堅決反對美國與臺灣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和軍事聯繫。敦促美國一些國會議員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不向「臺獨」勢力發出錯誤信號，否則只會給臺海和平穩定帶來進一步損害。
- （二）對公然挑釁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行徑，大陸絕不容忍，將依法對「臺獨」頑固分子實施懲戒。
- （三）大陸願意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但絕不為各種形式的「臺獨」分裂活動留下任何空間。
- （四）臺灣派有關人員參加APEC相關活動，須符合「一個中國」原則和APEC諒解備忘錄的有關規定。
- （五）臺灣以所謂「禁止水域、限制水域」等為名查扣大陸船隻，甚至對大陸船員採取危險粗暴手段，完全是為製造事端，是不負責任的危險行為，大陸堅決反對。
- （六）堅持「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只有回歸「九二共識」，恢復兩岸對話協商的政治基礎，臺海和平才有保障，兩岸關

係才能重回正軌並繼續向前發展。

（七）清華海峽研究院是一家以企業化方式運作的科研機構，2015年成立以來，為推動兩岸科技交流和創新、促進兩岸融合發展發揮積極作用。民進黨政府慣以種種藉口為兩岸同胞交流合作設置障礙，不斷進行干擾破壞，這種倒行逆施是不得人心的。

11月11日：中共第19屆6中全會8日至11日在北京舉行，出席人員包括中央委員197人，候補中央委員151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和有關方面負責人員、中共19大代表中部分基層人員和專家學者列席會議。

11月12日：由廣東省廣州市臺辦指導、穗臺經濟文化交流中心主辦的「『築夢珠江』穗臺青年文化交流系列活動」在廣東廣州匯龍海峽兩岸青年就業創業基地舉行，以「文化同心、青春築夢」為主題，活動包括「緣定網秀」、「線連非遺」、「雲展辛亥」三部分，採「線上+線下」和多點聯動方式，約二百名兩岸青年參與線下交流，逾二萬人參與線上活動。

「紀念臺盟成立74週年暨紀念謝雪紅同志誕辰120週年座談會」在北京舉行，座談會由臺盟中央常務副主席李鉞鋒主持。全國政協副主席、臺盟中央主席蘇輝出並指出，謝雪紅一生，是經受革命鬥爭鍛煉和考驗的一生，是為共產主義理想、為多黨合作事業、為「祖國」統一大業奮鬥不息的一生。紀念謝雪紅，就是要學習她頑強不屈，勇於革命的鬥爭精神，始終挺起精神脊梁，永遠保持奮鬥精神、革命精神，為早日實現「祖國」完全統一而不懈奮鬥。

中臺辦(國臺辦)主任劉結一，先後召開室務會議、辦黨史學習教育領導小組會議和機關二級巡視員以上幹部及事業單位班子成員會議，傳達學習中共第19屆6中全會精神，研究學習貫徹工作做出動員部署。

11月13日：臺盟北京市委會學習貫徹「中共第19屆6中全會精神座談會」在北京舉行。座談會集體學習《中國共產黨第19屆中央委員會第6次全體會議公報》。

上海中山學社、廣東孫中山基金會和臺灣孫中山紀念館發起的「『孫中山·辛亥革命·中國現代化』學術研討會」在上海舉行。民革上海市委會主委、上海中山學社社長高小玫表示，今年是辛亥革命110週年，從學術角度探討孫中山等革命先驅與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歷史關聯，具有啟迪現實的意義。

11月16日：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透過視訊與美國總統拜登會晤，針對雙方關係發展的戰略性、全域性、根本性問題以及共同關心的重要問題進行充分、深入溝通和交流。

《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全文，約三萬六千多字，涉臺內容包括：黨把握解決臺灣問題大局，確立「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推動兩岸雙方達成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推進兩岸協商談判，實現全面直接雙向「三通」，開啟兩岸政黨交流。

11月19日：由上海市海峽兩岸民間交流與發展研究會主辦的第2屆「海峽兩岸民間論壇」，以視訊連線方式在上海與臺北同步舉行。論壇以「疫情下的兩岸民間互信」為主題，圍繞「當前兩岸民意對撞的本質」、「民間互信危機對兩岸經貿社會文化交流的影響」、「疫情對兩岸民間互信的影響與疫情後的展望」、「增進兩岸民間互信的路徑思考」等議題進行研討。

11月21日：由大陸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臺灣萬芳醫學中心、海峽兩岸醫藥衛生交流協會醫院管理專委會、浙江省醫院協會、健康界多方共同主辦的第10屆「海峽兩岸醫院院長論壇」在浙江杭州舉行，圍繞「浙大二院專場：高品質發展的思與行」、「浙大二院-哈佛國際醫學創新論壇」、「卓越醫療中心的創新與高效專場對話」主題設置13個專場。

11月23日：由大陸安徽省臺辦、淮南市人民政府聯合主辦，安徽理工大學承辦的第3屆臺皖高校科技文化交流論壇在安徽淮南舉行。論壇包括開幕式、教育科技論壇、經濟文化論壇、科技之旅等內容，透過線上線下方式，開展交流研討。

11月24日：大陸國臺辦舉行新聞發布會，由發言人朱鳳蓮主持，要點如次：

- （一）民進黨政府歪曲污蔑《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暴露頑固堅持「臺獨」分裂立場的政治本質。
- （二）中國共產黨致力解決臺灣問題、促進「祖國」統一的歷史進程，是中共百年奮鬥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總結中國共產黨始終牢牢把握兩岸關係主導權和主動權。
- （三）依法打擊「臺獨」頑固分子及其關聯企業和金主，根本目的是維護臺海和平穩定和兩岸同胞切身利益。
- （四）推進兩岸應通盡通，包括基礎設施聯通，是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提出的重大主張，符合深化兩岸融合發展的需要，也符合兩岸同胞根本利益。
- （五）東部戰區組織兵力在臺灣海峽進行戰備警巡和海空聯合演練，是應對

「臺獨」勢力謀「獨」挑釁的必要舉措。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挫敗任何人任何勢力以任何形式策劃實施「臺獨」分裂活動。

11月25日：由臺盟中央主辦的第8屆「大江論壇--津臺職業教育融合發展論壇」在天津舉行。以「提升職業教育品質、促進兩岸融合發展」為主題，大陸全國政協副主席、臺盟中央主席蘇輝透過視訊表示，活動必將為兩岸學子、特別是臺灣青年來大陸追夢、築夢、圓夢，搭建新平臺，開闢新管道。

第24屆「臺京科技論壇峰會」透過視訊連線方式在臺北、北京兩地同步舉行。以「合作推動新發展、攜手構建新格局」為主題，聚焦兩岸高新技術產業、高端服務業等領域，兩岸相關部門、產業協會、知名企業代表和科技界人士深入交流、共話發展。

11月26日：由大陸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中華全國臺灣同胞聯誼會等單位共同舉辦的第8屆「兩岸智庫學術論壇」在北京舉行，以「弘揚辛亥精神、共創復興偉業」為主題，共有九十多位兩岸專家學者和臺商臺青透過視訊共同參與。

由臺盟中央主辦「2021年大江論壇·臺皖青年三創論壇」在安徽黃山舉行，以「皖臺青年創意創新創業--文創產品研發及運營」為主題，來自兩岸青年圍繞農產品深加工、高端康養、文創紀念品等議題進行交流研討。

第16屆「海峽兩岸（臺粵）高等教育論壇」臺灣中華大學與廣東廣州兩會場，以線上、線下方式聯合舉行。以「普及化時代的海峽兩岸高等教育」為主題，著眼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新階段、新理念、新格局，探討高等教育普及化與建設高質量高等教育體系，謀劃臺粵高等教育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的合作發展契機、政策和路徑。

11月27日：由大陸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兩岸關係南開大學研究基地、天津市臺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臺灣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共同主辦的首屆「兩岸共同市場海河論壇」在天津舉行。兩岸知名專家學者，圍繞「深化兩岸融合發展、打造兩岸共同市場」主題，透過「線上+線下」方式，開展深入交流研討。

11月29日：臺盟北京市委會舉辦2021「交流與共享」研討會在北京舉行，會議主題為「兩岸同心攜手圓夢」。中共北京市委統戰部、北京市臺辦、北京聯合大學臺灣研究院等有關單位和臺灣部分政黨、社團代表人士，從事兩岸關係研究的專家學者，以及在京臺盟盟員和臺胞代表出席。

11月30日：2021「中華傳統文化研習營」在江蘇宜興舉行，包括江蘇省13個設區市的臺

胞代表等近五十人參加。江蘇省臺辦副主任吳偉榮表示，中華傳統文化承載著中華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透過研習營，在傳承和弘揚中華傳統文化過程中，深刻領悟中華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將源遠流長的中華傳統文化發揚光大。

「北京市臺聯成立40週年座談會」在北京舉行，會議由北京市臺聯黨組書記黃塞溪主持，北京市臺聯會長高峰做題為《砥礪奮進四十載、揚帆啟航新時代》主旨報告。

- 12月1日：以「新經濟、新發展」為主題的「2021臺北上海城市論壇」透過視訊方式在臺北與上海同步舉行，臺北市市長柯文哲、上海市市長龔正出席開幕式並發表講話。臺北市副市長蔡炳坤、上海市副市長陳通、臺北市政府秘書長陳志銘、上海市政府秘書長馬春雷分別進行主題演講。雙方簽署「臺北市與上海市創新科技交流合作備忘錄」、「臺北市立國樂團與上海民族樂團交流合作備忘錄」、「臺北市立動物園與上海動物園野生動物保育交流合作備忘錄」。
- 12月2日：大陸福建省漳州市人民檢察院、市臺港澳辦聯合舉行「漳州市臺胞臺商服務中心檢察官工作室」揭牌儀式，漳州市檢察院和漳州市臺港澳辦聯合會簽《關於在全市推廣設立臺胞臺商服務中心檢察官工作室的實施意見》，漳州市檢察院率先在漳州市臺胞臺商服務中心設立檢察官工作室，並要求有條件的縣(區)結合當地工作實際設立檢察官工作室，切實保障臺胞臺企合法權益。
- 12月3日：由大陸福建省閩南師範大學主辦的「漳臺同名同宗村續緣交流會」在福建漳州舉行，設有漳州閩南師範大學、我嘉義縣兩個分會場。共有來自漳州與臺灣5對10個同名同宗村宗親代表，透過互聯網進行線上線下懇親交流。閩南師範大學副校長何紹福表示，交流活動進一步增強兩岸同胞永遠無法隔絕的血脈親情，閩南師範大學將繼續為加強兩岸同胞交流交往添光增彩。
- 12月4日：由致公黨四川省委員會、四川省臺辦等單位聯合主辦的第8屆「兩岸同根·致力為公」系列文化交流活動在四川成都舉行，以「兩岸同根、健康同行、命運同擔」為主題，共有兩岸政界、商界、文化界有關人士及優秀青年代表等五百多人透過線上線下方式與會。致公黨中央副主席閻小培表示，「兩岸同根·致力為公」系列文化交流活動，持續發揮弘揚中華文化，增進兩岸同胞心靈契合，共享發展機遇，助推兩岸融合發展，助力青年發展，共創民族美好未來。
- 12月6日：由大陸河北省冀臺經濟文化交流協會指導，河北省周易研究會和我臺南市堪

興文化協會主辦的首屆「冀臺國學文化交流會」在冀臺聯文化產業園舉行。活動分設河北石家莊和我臺南市兩個會場，針對中華民族起源，周易、伏羲文化傳承與發展等議題，進行學術探討，凝聚海峽兩岸文化同源、民族一體共識，挖掘兩岸文化交流共同價值觀，共塑兩岸同胞的民族和文化認同。

- 12月7日：2021「兩岸企業家紫金山峰會」透過視訊方式，分別在臺北市與江蘇南京同步舉行，以「把握新格局、共享新機遇」為主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向兩岸企業家峰會理事會致賀信表示，加強兩岸經濟合作，契合兩岸民心所向，利於增進同胞福祉，希望峰會雙方理事會團結兩岸企業界人士，觀大勢、明大義、行大道，堅定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堅決與「臺獨」分裂勢力劃清界限，為推進「祖國」完全統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力量。
- 12月8日：第13屆「海峽兩岸道教文化論壇」在江西鷹潭舉行，以「傳承融合、論道當下」為主題，針對傳承發揚道教文化、道教與當代社會發展、後疫情時代道醫養生3個主題進行研討。論壇以線上線下相結合方式舉行，共有來自兩岸道教界的專家學者、經濟文化界六十多人，探討道教文化發展。
- 12月9日：大陸國臺辦經濟局、江蘇省臺辦、江蘇省商務廳、淮安市政府主辦第16屆「臺商論壇」在江蘇淮安舉行。以「兩岸智慧共話發展大計、攜手合作共繪美好願景」為主旨，以「深耕產業融合發展、共用機遇開創新局」為主題，以「吸引臺商、集聚臺資、壯大臺企」為工作主線，共同挖掘兩岸產業合作新資源、新商機，推動臺淮兩地產業合作與交流開新局。
- 12月10日：「海峽金融論壇·臺企發展峰會」在福建廈門舉行，兩岸八十多位金融高管和專家學者，共同探討兩岸金融交流合作。福建省委常委、副省長郭寧寧表示，臺閩融合發展已經走向深耕厚植的關鍵期，福建「惠臺」政策的覆蓋面和臺胞的受益面持續走在全大陸前列。希望廣大臺商臺胞堅定信心，搶抓機遇，主動融入大陸新發展格局，在探索兩岸融合發展之路上邁出更大的步伐。
- 12月11日：第13屆「海峽論壇」在福建廈門舉行開幕式，以「擴大民間交流、深化融合發展」為主題，除論壇大會外，計有青年、基層、文化、經濟4大交流版塊、41場活動，福建省各設區市同期舉辦56項活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出席開幕式時表示，「海峽論壇」是深受兩岸同胞認可的「百姓論壇」，大陸將全面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展，完善保障臺灣同胞福祉和在大陸享受同等待遇的制度和政策，鼓勵臺灣同胞，特別是青年朋友來大陸追夢、築夢、圓夢。

12月12日：由大陸全國婦聯主辦，福建省婦聯及我中華婦女會總會承辦的第13屆「海峽婦女論壇」透過線上線下相結合方式，以「心相繫促相融共和聲」為主題，兩岸各界婦女代表一百五十多人同時在福州主會場、臺中分會場參加活動。

由大陸全國政協港澳臺僑委員會和福建省政協主辦的第4屆「兩岸基層治理論壇」在福建福州舉行。兩岸一百多名基層代表和相關界別代表人士圍繞「繁榮發展民俗文化」主題，以線上線下方式與會。大陸全國政協副主席、臺盟中央主席蘇輝透過視訊表示，兩岸同根同源同屬一個民俗文化圈，反映著中華民族和大陸人民基本的生活方式與風土人情，承載著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和精神基因，兩岸同胞應以實現民族復興為己任，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中，共增文化自信，實現心靈契合。

12月13日：第7屆「海峽兩岸學前教育論壇」在福建福州舉行，由福建省教育廳廳長林和平主持開幕式，近兩百位兩岸知名專家、學者、園長、教師以及教育行政人員，圍繞「構建高質量教育體系、引領新時代學前教育」主題，透過線上線下結合方式進行交流研討。

12月15日：第12屆「海峽兩岸傳統文化可持續設計研討會」在江蘇宜興陶瓷博物館研究院，透過視訊連線方式舉行。宜興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宣傳部部長馬鐘表示，宜興做為兩岸交流交往最活躍的地區之一，積極發揮對臺工作資源特色優勢，透過研討會以及相關系列活動，讓更多的臺灣同胞了解中華文化、感受紫砂魅力，對增強兩岸同胞文化血脈聯繫和中華民族意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大陸國臺辦舉行新聞發布會，發言人馬曉光主持，要點如次：

- （一）第13屆「海峽論壇」，主要成果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分別是彰顯兩岸交流強大民意基礎、促進民間合作喜結碩果、務實舉措助力兩岸青年成長成才、推進兩岸「雲端」交流向縱深發展。
- （二）「臺獨」是絕路，只會給臺灣帶來災難，嚴重損害廣大臺灣同胞，包括工商界的根本利益，絕不會得逞。希望臺灣有關企業和負責人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以實際行動與「臺獨」勢力劃清界線，多做維護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事。
- （三）臺灣是「中國」一部分。「一個中國」原則是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和國際社會普遍共識，民進黨政府為謀「獨」挑釁、挾洋自重，不斷勾連外部勢力製造事端，甘當「以臺制華」的棋子，出賣民族利益。對於

這種行徑，必須迎頭痛擊。

（四）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人民法院臺胞權益保障十大典型案例」，這些案例體現人民法院辦理涉臺案件工作三個方面特點。第一是強化全面平等保護。第二是著力優化營商環境。第三是堅持提供優質訴訟服務。

（五）打擊暴力犯罪，保護兩岸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維護兩岸同胞幸福安寧生活環境和兩岸交流秩序，是大陸一貫做法。對攸關兩岸民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案件，大陸方面均高度重視、認真負責，依法及時妥善處理，盡最大努力維護兩岸同胞合法權益。

由大陸北京大學主辦的第7屆「中華文化論壇」在北京大學舉行，以「弘揚中華文明、建設文化強國」為主題。兩岸及港澳地區學術界、文藝界等一百五十多位專家學者以現場交流、視訊連線、提交論文等多種形式與會。大陸國臺辦主任劉結一書面致詞指出，兩岸同胞要堅定文化自信，堅決反對「去中國化」等「臺獨」圖謀，進一步密切文化交流合作，共同促進中華優秀文化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攜手推動中華文化守正創新、繁榮發展，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祖國」完全統一的進程中共同鑄造中華文化新輝煌。

12月18日：由兩岸機構聯合主辦的第13屆「兩岸智庫論壇」在福建福州舉行，兩岸專家、學者圍繞「當前兩岸文化交流的困境和出路」、「進一步深化兩岸文化產業融合發展的機遇和挑戰」、「兩岸青年傳承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責任擔當與實踐探索」、「鄉村振興戰略下兩岸青年的新機遇和新路徑」等議題，進行思想交流、理論研討。

12月21日：由九州文化傳播中心與福建社會科學院聯合主辦，九州出版社、福建省海峽文化研究中心、國家圖書館出版社與廈門外圖集團有限公司共同承辦的「海峽兩岸出版交流季暨第4屆兩岸出版與人文智庫論壇」在福建泉州舉行，兩岸六十多位出版業者、專家學者透過線上線下方式，共同探討「十四五」時期，兩岸出版合作與兩岸文化融合的機遇與發展。

12月22日：「中華全國臺灣同胞聯誼會成立40週年」在北京舉行，全國臺聯副會長鄭平表示，40年來，全國臺聯積極發揮橋樑紐帶作用，努力踐行「兩岸一家親」理念，聯絡各領域、各部門，持續深化兩岸民間交流合作，臺聯組織要進一步提昇政治站位，找準工作著力點和努力方向，積極爭取臺灣民心，持續打造更加充滿親和力、凝聚力、感召力的「臺胞之家」。

12月29日：大陸國臺辦舉行新聞發布會，由發言人馬曉光主持，要點如次：

- (一) 兩岸民間各領域交流合作沒有斷，呈現新的特點：第一是新時代新征程帶來兩岸同胞心靈契合新氣象。第二是臺灣同胞同等待遇相關政策落地落實取得新成效，更多臺灣同胞來大陸築夢、圓夢。第三是兩岸交流活動依然精彩紛呈，新媒體傳播效應顯著。第四是在大陸工作、學習、生活的臺灣同胞已逐漸成為線下兩岸交流主體，青年日益成為兩岸融合發展的主力軍。
- (二) 大陸將深入貫徹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持續擴大兩岸經貿合作、深化兩岸融合發展，積極支持臺胞臺企參與「十四五」規劃實施，分享更多發展機遇，享受更多同等待遇，得到更好服務保障。
- (三) 關於臺灣地區參與區域經濟合作問題，大陸立場是一貫的、明確的，即必須按照「一個中國」原則處理。民進黨政府打著經貿幌子謀「獨」不會得逞。有關國家政客應恪守「一個中國」原則，不要向「臺獨」勢力發出錯誤的信號。
- (四) 大陸支持兩岸文化交流的政策沒有改變。對於在大陸進行的營業性演出活動，有關部門一貫依法依規管理，為的是引導更多內容健康、積極向上的文化產品進入市場。鼓勵支持演藝人員自覺弘揚行風藝德，不斷提高思想品德修養、職業道德素養和人文藝術涵養，樹立良好社會形象，做德藝雙馨的文藝工作者。
- (五) 《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簽署實施以來，給兩岸企業和民眾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大陸願意為造福兩岸同胞做出最大努力，但臺灣同胞的福祉利益能否獲得保障和增進，關鍵在於兩岸同胞團結起來，堅決反對「臺獨」分裂圖謀，共同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
- (六) 民進黨政府謀「獨」挑釁和外部勢力插手干預的鬥爭可能更尖銳、更激烈。大陸堅信始終握有主導權和主動權，願意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但如果「臺獨」分裂勢力挑釁逼迫，甚至突破紅線，大陸將採取斷然措施。

12月31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大陸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新年茶話會。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主持。習近平指出，大陸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強化反「獨」促統大

勢，有力應對外部挑戰，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同日，習近平透過《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和《互聯網》，發表2022年新年賀詞並指出，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兩岸同胞的共同心願。真誠期盼全體中華兒女攜手向前，共創中華民族美好未來。

【2022年】

1月1日： 蔡總統發表「2022新年談話」並強調，2022年政府穩健執政的四大主軸，分別是持續走向世界、維持經濟發展動能、鞏固社會安全體系、堅守國家主權。面對疫情下的經濟新情勢，兩岸有各自的挑戰，要提醒北京政府，不要誤判情勢，更要防止內部「軍事冒進主義」的擴張。各自努力照顧好人民的生活，安定社會民心，兩岸才會有空間和氛圍，以和平的方式，共同面對問題、共同尋求解方，讓區域的緊張情勢有所緩解。

大陸國臺辦發言人朱鳳蓮針對蔡總統元旦談話和陸委會有關言論回應表示，當前臺海局勢緊張嚴峻，根源是民進黨政府拒不承認「九二共識」，肆意謀「獨」挑釁，勾連外部勢力對抗大陸，圖謀改變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所謂四個堅持，包藏分裂國家的禍心。走「臺獨」絕路，只會將臺灣推入深淵，給廣大臺灣同胞帶來深重災難。

大陸國臺辦主任劉結一在2022年第1期《兩岸關係》雜誌，發表題為「共擔民族大義、共用盛世榮光」新年賀詞。劉結一指出，「祖國」統一民族大義、歷史大勢。「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堅定信念。無論臺海形勢如何風雲變幻，時與勢始終在主張國家統一力量這邊，希望廣大臺灣同胞看清大勢所趨、大道所歸、大義所在，一道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堅決反對「臺獨」分裂，共襄「祖國」統一偉業，共用民族復興榮光。

大陸海協會會長張志軍在2022年第1期《兩岸關係》雜誌，發表題為「穩舵揚帆、勇毅前行」新年賀詞。張志軍指出，維護「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秉持「兩岸一家親」理念，穩妥處理各類涉臺突發事件和急難救助事項，盡心竭力為兩岸同胞排憂解難；保持與臺灣各界聯繫，開展多種形式的互動溝通，團結廣大臺灣同胞繼續深化兩岸交流合作，為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展和「祖國」統一進程做出貢獻，迎接中共20大召開。

1月4日：由大陸福建省臺聯、清流縣政協、廈門市鄭成功研究會聯合主辦的「紀念鄭成功收復臺灣360週年暨海峽兩岸中華忠孝美育研討會」4日至6日在福建清流舉行。兩岸專家學者、臺胞圍繞「兩岸文化融合與福建實踐」、「建設海峽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議題展開交流。廈門市鄭成功研究會會長鄭希遠表示，鄭成功是兩岸人民共同敬仰的民族英雄，要進一步弘揚鄭成功愛國主義精神，促進兩岸的交流合作，增進兩岸的文化認同。

1月6日：中臺辦召開「黨史學習教育總結會議」，由中臺辦主任劉結一主持時指出，在全黨開展黨史學習教育，是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黨的百年歷史新起點，要繼續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持續把黨史學習教育成果轉化為推動新時代對臺工作、推進「祖國」統一進程的強大動力和實際成效。

1月12日：大陸國臺辦舉行新聞發布會，由發言人朱鳳蓮主持，要點如次：

- (一) 大陸將按照習近平重要講話精神，全面貫徹「新時代黨解決臺灣問題總體方略」，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堅決粉碎「臺獨」分裂圖謀，堅決遏制外部勢力干涉，持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勇於探索兩岸融合發展新路。
- (二)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今年1月1日正式生效，在大陸的臺資企業可充分享受RCEP成員方關稅及原產地規則優惠，打開更廣闊市場。
- (三) 大陸有關部門依法暫停臺灣地區兩家養殖場活魚輸入，目的是保護大陸消費者健康安全，不針對任何養殖戶。希望臺灣地區有關方面加強養殖過程監管，加強對養殖戶輔導，確保輸入大陸農漁產品安全。
- (四) 民進黨政府為謀取政治私利，不斷玩弄卑劣伎倆、搞小動作，已引發臺灣社會普遍不滿和抨擊。希望臺灣負責任的政黨、團體和廣大臺灣同胞保持高度警惕，不要被一步步綁上「臺獨」戰車，不要讓臺灣極少數圖謀政治私利的政黨把臺灣推向危險深淵，一起共同反對任何「臺獨」分裂圖謀。
- (五) 大陸將深入貫徹落「實新時代黨解決臺灣問題總體方略」和中共中央對臺工作決策部署，堅決粉碎「臺獨」分裂圖謀，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涉，繼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展，紮實推進「祖國」統一進程，努力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

目標營造有利臺海環境，迎接中共20大召開。

1月19日：大陸國臺辦發言人朱鳳蓮針對斯洛維尼亞總理將臺灣稱為「民主國家」並表示支持立陶宛與臺灣「互設代表處」應詢時表示，斯洛維尼亞有關政客之言論罔顧事實、混淆視聽，大陸敦促斯洛維尼亞政府以實際行動恪守在涉臺問題上的嚴肅承諾，慎重妥善處理涉臺問題。

1月20日：大陸國臺辦發言人朱鳳蓮針對我賴副總統過境美國應詢時表示，民進黨藉所謂過境美國圖謀臺美官方接觸，尋機進行謀「獨」操弄，是其「倚美謀獨」的一貫伎倆，無論以什麼名目，都改變不了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事實。大陸堅決反對美國同臺灣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美方應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不向「臺獨」勢力發出錯誤信號。挺臺謀「獨」只會進一步損害臺海和平穩定。

1月25日：中共「2022年對臺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主持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出席時強調，要發揚鬥爭精神，堅決遏制「臺獨」挑釁和外部勢力干涉，要秉持「兩岸一家親」理念，完善同臺企臺胞分享發展機遇和落實同等待遇的政策，為臺灣基層民眾、青年群體參與兩岸交流合作提供更多便利條件。

1月26日：大陸國臺辦舉行新聞發布會，由發言人朱鳳蓮主持，要點如次：

（一）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中共19大和第19屆歷次全會精神，深入貫徹落實「新時代黨解決臺灣問題的總體方略」和中共中央對臺工作決策部署，增強歷史自信，樹牢底線思維，發揚鬥爭精神，強化精準施策，堅決粉碎「臺獨」分裂圖謀，紮實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展，推進「祖國」統一進程。

（二）民進黨一些政客在加深勾連外部反「華」勢力進行謀「獨」挑釁，煽動兩岸民眾敵對敵意的同時，又藉紀念蔣經國先生扭曲歷史事實、進行政治操弄、煽動所謂「抗中保臺」，其本質是誤導臺灣民眾，謀取一黨一己私利。

（三）大陸一貫積極支援兩岸文化交流，歡迎臺灣演藝人員來大陸發展，支持在大陸文化產業發展進程中分享機遇、實現夢想。民進黨政府把兩岸民眾正常交流一概污蔑為統戰，大肆恐嚇，說明兩岸民眾越是走親走近，民進黨政府越是心虛、害怕。

(四)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一個中國」原則是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和國際社會普遍共識。任何人任何勢力都無法阻擋「祖國」統一大勢。

(五) 「臺獨」分裂勢力絕不等同於臺灣民眾。「臺獨」分裂勢力及其活動，目的是要把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危害到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加強兩岸交流合作是兩岸同胞的共同願望，符合兩岸同胞利益福祉。秉持「兩岸一家親」理念，從增進臺灣同胞福祉和幫助金門解決實際民生困難出發，持續推動福建沿海地區與金門、馬祖通水、通電、通氣、通橋相關工作。

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在北京與中國國民黨前主席洪秀柱會面時表示，兩岸同文同種、血濃於水的天然紐帶，任何力量切割不斷，國家強大、民族復興、兩岸統一的歷史大勢，任何勢力阻擋不了。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基礎上，願意與臺灣各黨派、團體和人士，就兩岸關係相關問題開展廣泛深入的對話溝通和民主協商，尋求社會共識，期望兩岸同胞在反「獨」促統的目標上繼續奮進，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迎接兩岸融合，加速兩岸和平統一大業。

2月14日：大陸國臺辦發言人馬曉光針對美國「印太戰略報告」涉臺內容應詢時表示，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臺灣的前途只能也必須由全體人民共同決定，美方「印太戰略」在涉臺問題上，嚴重干涉「中國」內政，違背「一個中國」原則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給臺海和平穩定帶來損害，大陸敦促美方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有關規定，不要在臺灣問題上玩火。

2月15日：大陸國臺辦發言人馬曉光應詢時表示，2021年臺灣學生申請就讀大陸高校人數持續增加，大陸教育部近期對2022年大陸高校招收碩士專業、本科專業臺灣學生有關事項做出安排，啟動相關招生工作，臺灣學生報名和錄取流程將進一步優化，大陸將一如既往為臺灣學生來大陸學習深造提供便利和服務，幫助臺灣學子實現人生夢想。

2月16日：大陸全國政協港澳臺僑委員會媒體見面會在北京舉行，主題為「凝心聚力，開創政協港澳臺僑工作新局面」。大陸全國政協港澳臺僑委員會主任朱小丹表示，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學習貫徹中共19大和第19屆歷次全會精神，堅持「雙向發力」、增強協商效能，擴大團結聯誼、強化統戰職能，強化責任擔當、激勵委員作為，推動人民政協

港澳臺僑事業取得新進展、邁上新臺階。

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在北京與新黨主席吳成典透過視訊會面時表示，新黨長期以來旗幟鮮明支持國家統一、反對「臺獨」，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希望廣大臺灣同胞深刻認識「祖國」統一是歷史大勢，堅定不移反對「臺獨」分裂行徑和外部勢力干涉，築牢反「獨」促「統」的強大陣線。

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應詢時表示，美國向臺灣出售武器，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特別是「八一七」公報規定，嚴重損害「中國」主權、安全利益、美「中」關係和臺海和平穩定。根據大陸《反外國制裁法》有關規定，決定對長期參與美國向臺灣出售武器的美國軍工企業雷神技術公司和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侵權行為實施反制。敦促美國政府和有關方面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停止售臺武器和臺美軍事聯繫。大陸將根據形勢發展，繼續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定維護自身主權和安全利益。

2月23日：大陸國臺辦舉行新聞發布會，由發言人馬曉光主持，要點如次：

- （一）春節是中華民族最重要的傳統節日，兩岸同胞充滿真情新春互動，彰顯兩岸同胞同文同種、血濃於水的天然紐帶，任何力量都切割不斷，兩岸民間交流大趨勢任何力量也阻擋不了。
- （二）大陸堅決反對任何「臺獨」分裂圖謀，包括通過所謂「制憲、修憲」謀求「法理臺獨」。如果「臺獨」分裂勢力誤判形勢、鋌而走險、觸碰紅線，大陸將採取斷然措施予以堅決粉碎。
- （三）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臺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當前臺海形勢緊張的根源，是民進黨政府和「臺獨」勢力勾連外部勢力不斷進行謀「獨」挑釁。大陸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所採取的一切必要行動，針對的是「臺獨」分裂活動和外部勢力干涉，目的是從根本上維護兩岸同胞切身利益和中華民族整體利益。
- （四）兩岸經濟交流合作給兩岸民眾，特別是臺灣企業和民眾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這是眾所周知，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民進黨政府倒行逆施，只會損害廣大臺灣同胞的利益。
- （五）臺海形勢持續緊張動盪，根本原因是民進黨政府一再企圖「倚美謀

獨」，而美方一些人有意搞「以臺制華」。無論民進黨政府與外國勢力如何勾連表演，都無法改變臺灣是「中國」領土一部分的鐵的事實，也阻擋不了國家強大、民族復興、兩岸統一的歷史大勢。

2月25日：「紀念臺灣人民二二八起義75週年」座談會在北京舉行，大陸全國政協副主席、臺盟中央主席蘇輝出席時表示，民進黨政府不斷操弄「二二八」議題，圖謀將這場愛國民主運動與「臺獨」建立歷史聯結，藉以謀取政治利益。期盼兩岸同胞攜手同心，堅決反對「臺獨」分裂，共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展。堅信在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堅強領導下，統一大業一定能夠早日實現。

3月1日：中臺辦（國臺辦）舉行「機關黨的工作暨紀檢工作會議」，中臺辦副主任、機關黨委書記裴金佳主持，中臺辦副主任陳元豐、龍明彪、劉軍川出席。中臺辦主任劉結一出席時表示，中臺辦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幹部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進一步夯實基層基礎，大力推進「四強」黨支部建設，在基層黨組織建設上實現新的進步。要全面落實黨建責任制，以強大合力推動機關黨建高品質發展。

3月5日：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大陸第13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5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要堅持對臺工作大政方針，貫徹「新時代黨解決臺灣問題的總體方略」，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祖國」統一。堅決反對「臺獨」分裂行徑，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涉。兩岸同胞要和衷共濟，共創民族復興的光榮偉業。

3月7日：大陸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針對「中國外交和對外關係」回答「中」外記者提問時表示，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臺灣問題完全是「中國」的內政，烏克蘭問題則是俄烏兩個國家之間的爭端。臺海局勢面臨緊張，根源就在於民進黨政府拒不認同「一個中國」原則，企圖改變兩岸同屬「一中」的現狀，美國一些勢力為遏制大陸的振興，縱容鼓動「臺獨」勢力發展，臺灣的前途希望在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在於實現國家的統一，「挾洋謀獨」、「以臺制華」注定失敗，臺灣終會回到「祖國」的懷抱。

3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參加第13屆全國人大第5次會議臺灣代表團審議時指出，2021年在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堅強領導下，對臺工作穩中有進。要貫徹「新時代黨解決臺灣問題的總體方略」和黨中央對臺工作決策部署，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堅決反對「臺獨」及外部勢力干涉，切實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展。

3月10日：大陸全國人大代表、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張志軍受訪時指出，「新時代黨解決臺灣問題的總體方略」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是新時代對臺工作、推動「祖國」完全統一提供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大陸牢牢把握兩岸關係主導權和主動權，團結廣大臺灣同胞共同努力，推動兩岸關係克難前行、穩中有進。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堅決粉碎民進黨政府謀「獨」挑釁。持續為臺胞、臺企提供發展機遇和同等待遇，進一步完善惠及廣大臺灣同胞的政策措施。

3月11日：李克強在「中」外記者會回答記者提問時指出，大陸對臺大政方針就是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堅決反對「臺獨」分裂行徑。願意繼續與廣大臺灣同胞分享發展機遇，對到大陸發展的臺灣同胞提供同等待遇，只要兩岸同胞和衷共濟、團結向前，就一定能夠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共用中華民族復興的福祉。

3月16日：大陸國臺辦舉行新聞發布會，由發言人朱鳳蓮主持，要點如次：

- （一）國臺辦、商務部、市場監督管理總局16日聯合印發《關於做好臺灣居民在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地區申請設立個體工商戶工作的通知》並自即日起實施。
- （二）「政府工作報告」涉臺內容闡述當前對臺工作大政方針、原則立場和目標任務，對做好對臺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 （三）《反分裂國家法》實施17年來，在震懾「臺獨」分裂勢力、維護臺海和平穩定、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統一進程等方面發揮獨特的重要作用。大陸將根據形勢發展變化，加強運用法治方式和法治力量打擊「臺獨」分裂勢力，推進「祖國」統一進程。
- （四）「對臺農林22項措施」發布實施1年來，各地區各部門積極做好落實工作，在資金補助、融資貸款、參與鄉村振興、開拓內需市場、研發創新等方面取得實效。
- （五）大陸堅決反對美國出售武器給臺灣，反對美方與臺灣進行軍事聯繫等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民進黨政府一再拿臺灣納稅人的血汗錢購買美國軍火，企圖「以武謀獨」不會得逞，只會損害臺海和平穩定，損害臺灣民眾利益。
- （六）臺灣問題與烏克蘭問題有著本質區別，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臺灣問題完全是「中國」的內政，不容任何外來干涉。

3月21日：我大陸委員會針對大陸東方航空公司航班在廣西墜毀事件及罹難受災民眾，表達哀悼與誠摯慰問並強調，目前陸方已啟動應急機制、全力搜救，我方已即時透過海基會、民航局等相關單位，密切掌握情況發展，並請陸方儘速協助查明是否有臺灣民眾受難；如有需要，也願提供必要協助。對於事件發生及可能受難情況，希望陸方妥善處置，務必查明事故原因，確保飛航及旅客生命安全。

3月23日：由兩岸和平發展論壇、臺灣《觀察》雜誌、《海峽評論》雜誌、臺灣鄭成功文化協會等團體在臺北聯合舉辦「鄭成功收復臺灣的時代意義座談會」。
《觀察》雜誌社發行人紀欣指出，紀念鄭成功，最重要的是促進兩岸復歸統一。回顧歷史可知，臺灣不論是明末被荷蘭人侵占，或清末被日本人割據，都是因民族自身弱亂而遭外族掠奪，後皆因民族復興戰勝了侵略者。兩岸雖分隔至今，但今天的「中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兩岸復歸統一將是歷史的必然。

3月30日：大陸國臺辦舉行新聞發布會，由發言人朱鳳蓮主持，要點如次：

- (一) 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兩岸同胞的共同願望。實現「祖國」和平統一，是兩岸同胞互利雙贏的共同願景。
- (二) 疫情對舉辦兩岸交流活動造成一定影響，但隨著各地從嚴從實抓好疫情防控工作，儘快實現社會面動態清零，兩岸各領域交流一定會繼續保持發展勢頭。
- (三) 國臺辦、商務部、市場監督管理總局聯合印發實施《關於做好臺灣居民在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地區申請設立個體工商戶工作的通知》彰顯「兩岸一家親」理念，適合以臺青為主的臺灣居民在大陸進行小規模創業，契合臺灣年輕人與基層臺商需求，有助於降低臺胞到大陸創業門檻。
- (四)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儘管海峽兩岸尚未完全統一，但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中國」主權和領土從未分割。
- (五) 聯合國第2758號決議從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解決「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前提是「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4月1日：大陸四川省舉行對臺交流基地授牌儀式，四川省臺辦主任羅治平出席活動時指出，四川省計劃以建川博物館為平臺，利用文化資源，推動舉辦海峽兩岸博物館館長峰會、來臺舉辦抗戰文物展覽等活動，促進臺川交流。為持續推動省級對臺交流基地建設，四川省臺辦公布相關舉措，深化兩岸交流、助推基地高品質發展。

4月5日：「壬寅(2022)年清明浙江縉雲海峽兩岸共祭軒轅黃帝大典」在浙江省縉雲縣仙都黃帝祠宇舉行。祭典以「同根同祖，兩岸共祭」為主題，結合當前疫情防控形勢，以精簡參祭人員、網路直撥、網上祭祀平臺等形式呈現。縉雲縣政協主席傅勇斐、副主席李汝東及麗水市政協副主席何衛寧等二百多人參加。

4月13日：大陸國臺辦舉行新聞發布會，由發言人馬曉光主持，要點如次：

- （一）世界衛生組織是主權國家加入的聯合國專門機構，臺灣做為「中國」一部分，無權加入。任何有關臺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都必須在「一個中國」原則下解決。美國政府多次表示反對臺灣參與僅限主權國家加入的國際組織。敦促美方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在臺灣問題上謹言慎行。
- （二）臺灣參加任何經濟組織，都必須符合「一個中國」原則。大陸反對臺灣地區參與任何有官方性質的經貿安排或簽署有官方性質的經貿協議。
- （三）民進黨政府，歪曲和否認「九二共識」，嚴重違背臺灣民眾主流願望，嚴重損害臺灣民眾利益福祉。奉勸民進黨政府不要再用政治話術欺騙民眾，只有真正從臺灣民眾福祉出發，承認「九二共識」，以實際行動改善兩岸關係，才是正途。
- （四）慎終追遠、崇敬祖先是中華兒女共同文化傳承，更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綿延至今的強大精神動力。民進黨政府處心積慮兜售「兩國論」，企圖切斷臺灣同胞中華民族根脈，割裂兩岸同胞血脈聯繫，對兩岸同胞共祭黃帝進行污衊栽贓，數典忘祖，令人不齒。
- （五）大陸對臺胞臺企一視同仁，國務院及有關部門、地方公布扶持企業發展的政策措施，符合條件的臺商均可一體適用。希望廣大臺商臺企積

極瞭解掌握、應享盡享。各地臺辦一如既往靠前服務，協助臺商臺企瞭解並用好相關政策措施。

4月15日：我大陸委員會針對國人李明哲在陸獲釋表示，李明哲關心大陸公民社會與民主發展，遭到大陸法院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名審判，並監禁5年，臺灣人民無法接受，政府認為傳播民主理念無罪，對於有部分媒體報導李明哲回臺將受到司法偵審一節，實屬誤解，絕非事實。對於其他國人在陸個案情形，仍會盡力透過各種管道掌握情況與提供必要協處，同時也呼籲大陸，重視國人在陸相關權益的保障，才有利於兩岸往來交流。

4月18日：「同根同源兩岸共賞桃花」活動暨臺京基層交流基地兩岸桃花園揭牌儀式，在高雄市及北京市平谷區同步以線上線下方式舉行，計有百餘人參加。北京市臺辦主任霍光峰表示，近年來，平谷區圍繞農業發展、農民致富，開展一系列兩岸交流活動，成為臺京兩地交流的重要地址。北京市平谷區臺辦主任王金明表示，透過多年基層交流活動，兩岸民眾感情不斷累積加深，即使受疫情影響，兩岸同胞仍透過視訊等方式交流。未來還將在精品民宿、現代農業、醫養結合等多個領域與臺灣進行合作交流。

4月20日：大陸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魏鳳和與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通電話時表示，美方要落實「四不一無意」承諾，大陸希望與美國建立健康穩定發展的關係，也必將捍衛利益和尊嚴，美國不應低估大陸的決心和能力。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是誰也無法改變的事實和現狀，臺灣問題如果處理不好，就會對雙方關係造成顛覆性影響，大陸將堅決維護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奧斯汀表示，美國堅持「一個中國」政策，雙方應以負責任方式管控競爭、風險，妥善處理雙方軍事面臨的難題。

4月22日：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委員會主辦第9屆「大江論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精英論壇」，以視訊連線方式在北京舉行，與會人士以「增進兩岸同胞福祉、推進祖國和平統一」主題交流探討。大陸全國政協副主席、臺盟中央主席蘇輝表示，臺盟願意與臺灣鄉親一起，在新時代黨解決臺灣問題的總體方略引領下，團結更多臺灣同胞，推動兩岸關係走向統一的未來。

第14屆「兩湖論壇」在南投日月潭與杭州西湖透過視訊連線方式舉行，杭州市市長劉忻表示，「兩湖論壇」自2009年創辦以來，在堅持「九二共識」基礎上已舉辦13屆，不僅成為兩岸城市交流典範，更是兩岸同胞交流交往交心交融的重要平臺。今年9月杭州將舉辦亞運會和亞殘運會，希望透過雙方理念交換、經驗啟發，助力兩地同胞強健體魄，共用亞運之美。

4月25日：大陸江蘇省臺辦舉行臺商協會會長專題視訊交流會，江蘇省臺辦主任練月琴表示，疫情帶給臺資企業生產經營及臺胞正常生活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特別是中小臺企受到的衝擊較為明顯。省臺辦將和各市臺辦一起，全力幫助臺企臺胞解決困難。隨著復工復產的推進，各地還要持續關注臺企復工復產中的安全生產問題，宣傳引導企業樹牢安全理念、落實主體責任，過程中，希望各地臺協會要進一步發揮好政府與企業之間的橋樑紐帶作用，做好溝通工作，形成合力共同幫助臺企臺胞降低疫情不利影響、儘快恢復正常生產生活。

4月27日：大陸國臺辦舉行新聞發布會，由發言人馬曉光主持，要點如次：

- （一）臺灣是「中國」的寶島，不是其他任何人妄想用來「以臺制華」的所謂「島鏈」。臺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來干涉。臺灣的前途、臺灣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國家統一，藉由外力無法維持臺海的安全與穩定。
- （二）奉勸美國政府有關官員務必瞭解臺灣問題，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本事實，恪守對「中國」做出的政治承諾，停止虛化掏空「一個中國」原則，停止縱容支持「臺獨」行徑，停止任何干涉「中國」內政的言行，維護臺海和平穩定，維護美「中」關係大局。正告民進黨政府，「臺獨」是絕路。企圖「倚美謀獨」、勾連外部勢力分裂國家是癡心妄想，絕不會得逞。
- （三）包括太平島在內的南沙群島是「中國」固有領土，「中國」對南沙群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應共同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中華民族的整體和根本利益。任何企圖勾結外部勢力、出賣中華民族利益的行徑都是在玩火，必將遭到兩岸人民的唾棄和歷史的懲罰。
- （四）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包括《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在內的一系列國際法文件，都明確無誤確認「中國」對臺灣的主權。民進黨政府將海峽兩岸由於內戰延續的政治對立特殊狀態，歪曲為「兩國論」和「一邊一國」，企圖挑戰國際社會公認的「一個中國」原則，終究徒勞。
- （五）臺灣居民在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地區申請設立個體工商戶的政策，實施一個多月以來，各地臺辦、市場監管部門積極開展政策宣介，抓好政策執行，為臺胞申設個體工商戶提供服務和便利。

(六) 上海、蘇州、昆山等地黨委、政府，包括各級臺辦，在符合疫情防控要求前提下，採取一系列舉措積極協助臺商臺企紓困穩產。一是加強助企紓困政策宣介，推動落實相關政策措施。二是及時瞭解回應臺商訴求，幫助解決臺企實際困難。將持續會同有關部門和地方積極協助臺商臺企克服疫情影響，儘快恢復正常生產經營，齊心協力，實現更好發展。

5月5日：大陸國臺辦發言人朱鳳蓮應詢時表示，美國《外交家》雜誌刊文稱大陸關鍵草創時期的立場，把臺灣人視為獨特的民族，並支持臺灣爭取「獨立」的說法，係企圖誤導臺灣民眾和國際輿論。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改變不了的事實。大陸將堅定不移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堅決粉碎任何「臺獨」圖謀。正告民進黨政府和「臺獨」勢力，企圖分裂是走不通的路。

5月6日：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例行記者會，回應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以俄烏戰爭形容臺海局勢時表示，日方炒作所謂「中國威脅」是為自身擴武強軍尋找藉口，損害地區國家互信與合作，「中」方對日方有關言行表示堅決反對。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臺灣問題完全是「中國」內政，與烏克蘭局勢完全不能相提並論。日本在臺灣問題上負有歷史罪責，更應該謹言慎行。在涉海問題上，「中」方堅定維護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同時願與有關國家透過談判協商妥善處理分歧，維護地區和平與安寧。

5月10日：大陸國臺辦發布《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措施》，重點如下：

- (一) 支持浙江打造吸引臺資新高地，推動臺商臺企參與浙江高質量發展，包括：1.構建產業合作新平臺，促進臺浙產業融合發展；2.深化臺浙經貿交流，支持臺商臺企融入新發展格局。
- (二) 支持浙江引導臺商臺企參與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推動臺商臺企參與共同富裕示範區建設，包括1.引導臺商臺企參與山海協作工程，服務先富帶動後富幫扶機制；2支持臺商臺企參與鄉村振興，助力強村惠民行動。
- (三) 支持浙江深化對臺交流，幫助臺胞融入共同富裕示範區，包括：1.加強兩岸交流平臺建設，支持臺胞走進共同富裕示範區；2.加強臺浙青年交流，幫助臺灣青年分享共同富裕示範區發展機遇；3.深化臺浙體

育交流，支持臺胞參與現代化體育強省建設；4.多管道宣傳共同富裕示範區建設成果，增進臺胞對共同富裕示範區瞭解；5.支援浙江強化工作保障，在對臺工作領域服務共同富裕示範區建設；6.加強黨對對臺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7.支持開展涉臺法治工作；8.支持開展對臺工作數字化改革；9.支持打造高素質對臺幹部隊伍。

5月11日：大陸國臺辦舉行新聞發布會，由發言人朱鳳蓮主持，要點如次：

- （一）臺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必須按照「一個中國」原則處理。民進黨政府自2016年5月以來，堅持「臺獨」分裂立場，歪曲否定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破壞兩岸協商政治基礎，導致臺灣地區參與世界衛生大會政治基礎不復存在。
- （二）臺灣炒作美國務院網站修改涉臺內容，企圖「倚美謀獨」，但改變不了臺灣是「中國」一部分事實。敦促美國政府停止任何虛化掏空「一個中國」原則行徑，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
- （三）日本在臺灣問題上負有歷史罪責，更應該謹言慎行，尤其應當深刻反省歷史，切實遵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精神，不為「臺獨」分子撐腰打氣，停止挑釁滋事。民進黨政府勾連外部勢力，背叛民族利益，必將受到歷史嚴懲。
- （四）兩岸同胞是血脈相連的一家人，大陸始終關心臺灣同胞生命健康安全，願為臺灣民眾提供防疫急需物資和疫苗試劑，民進黨政府從來都在阻擋拒絕，「逢陸必反」只會進一步危害臺灣民眾生命安全，造成嚴重後果。
- （五）中國共產黨始終關心青年成長、支持青年發展，願意為兩岸青年相識相知、成長成才創造更好條件，搭建更多平臺，期待更多臺灣青年勇敢擔負起這一代人的責任，與大陸青年一起，匯入時代洪流，參與偉大事業，成為新時代偉大征程的積極參與者和有為建設者。

第5屆「海峽兩岸青年發展論壇」在浙江杭州舉行，中國國民黨前主席洪秀柱應邀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代表中共中央和習近平致賀詞指出，論壇以「攜手共創美好生活」為主題，契合兩岸同胞共同願望和中華民族根本利益。當前臺海形勢不確定不穩定性增多，「臺獨」分裂是兩岸同胞攜手共創美好生活最大現實威脅，希望廣大臺灣青年觀大局、察

大勢、守大義，堅定不移反對「臺獨」分裂和外部勢力干涉，挺身維護自身利益福祉、勇於追求美好生活，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統一大業和民族復興偉業做出貢獻。

5月16日：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應詢關於美國總統拜登簽署《要求美國國務卿制定戰略使臺灣重獲世界衛生組織觀察員地位法案》時表示，根據聯合國大會和世界衛生大會相關決議，臺灣參與世衛組織活動，必須按照「一個中國」原則處理。大陸高度重視臺灣同胞健康福祉，在符合「一個中國」原則前提下，已對臺灣地區參與全球衛生事務做出妥善安排。敦促美方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遵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慎重妥善處理涉臺問題，不得利用該法案幫助臺灣拓展所謂國際空間，否則將進一步損害美「中」關係與臺海和平穩定。

5月17日：中國國民黨前主席洪秀柱與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馬興瑞在烏魯木齊會面時表示，新疆地大物博、景色優美、風情獨特，留下深刻印象。希望有更多機會認識新疆，增強和新疆的交流與合作。

5月23日：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針對記者提問有關大陸對臺灣發起行動，美國將進行軍事干預時表示，敦促美方切實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恪守有關不支持「臺獨」的重要承諾，在臺灣問題上謹言慎行，不向「臺獨」分裂勢力發出任何錯誤信號，以免對臺海局勢和美「中」關係造成嚴重損害。大陸必將採取堅定行動，維護自身主權和安全利益。

5月24日：大陸國臺辦發言人朱鳳蓮應詢指出，美國務卿布林肯演講涉臺言論充滿不實之詞，美方頻頻與民進黨政府進行勾聯，向臺出售武器，助臺拓展國際空間，並攻擊聯大2758號決議、炒作「臺灣地位未定論」，企圖打「臺灣牌」，大陸對此堅決反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臺獨」勢力不斷謀獨挑釁、美國為其打氣撐腰，這是臺海地區緊張動盪的根源。「臺獨」分裂分子和外部反「華」勢力必須立即停止挑釁。

5月31日：大陸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應邀在「季辛吉與中美關係」研討會，以視訊致詞時表示，美「中」關係正在遭遇越來越多的挑戰，美「中」關係的歷史敘事被人為歪曲，發展方向面臨被進一步引向歧途的危險。美「中」關係不能再惡化下去，必須做出正確抉擇：要端正戰略認知，摒棄冷戰思維；要鞏固政治基礎，妥善管控分歧；要跳出競爭邏輯，增進交流合作。

6月2日：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針對臺灣和美國啟動深化貿易關係會談，共同發起

「臺美21世紀貿易倡議」應詢時表示，「中」方一貫堅決反對邦交國與臺灣進行任何形式官方往來。美方應該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停止任何形式臺美官方往來，停止與臺商簽具有主權意涵和官方性質協定。國臺辦發言人馬曉光表示，大陸堅決反對美國與臺灣商簽任何具有主權意涵或官方性質協議。敦促美方以實際行動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

- 6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蔡奇在北京與中國國民黨前主席洪秀柱會面，國臺辦主任劉結一陪同。蔡奇表示，洪秀柱長期維護「九二共識」、堅決反對「臺獨」，致力推動兩岸各領域交流，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做出貢獻。今年是中共20大召開之年，也是「九二共識」30週年。希望共同努力，持續推動兩岸同胞交流交往，深化臺京各領域交流合作，攜手推進「祖國」統一、民族復興偉大事業。
- 6月6日：由大陸河南省臺辦、省青聯、省臺聯共同主辦的「2022河南省兩岸青年交流月活動」啟動儀式在河南鄭州舉行。河南省臺辦主任崔興莉表示，近年來，臺豫兩地交流交往日益密切，到河南就讀臺灣學生逐年增多，兩岸青年學生在共同學習生活中結下深厚情誼。希望兩岸青年能夠透過交流活動增進瞭解、互學互鑑，攜手追夢、創贏未來，成為兩岸交流合作推動者、兩岸融合發展踐行者、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傳播者、新時代偉大征程積極參與者和有為建設者。
- 6月7日：由大陸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和我統派團體共同主辦，北京海峽兩岸民間交流促進會承辦的第2屆「攜手圓夢—兩岸同胞交流研討活動」在北京舉行，以「歷史新方位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主題，針對「新時代與國家統一」、「新征程與兩岸融合」、「新願景與青春逐夢」3項議題進行交流研討，共有兩岸專家學者、青年代表一百二十多人參加，會後並形成8項共識，分別為：攜手實現民族復興偉大夢想、珍視捍衛「九二共識」、堅決反對「臺獨」分裂行徑、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涉、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實踐、強化兩岸共同歷史記憶、探索統一後臺灣治理方式、擔當民族復興的青年責任。
- 6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與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在盧森堡舉行會晤時指出，美方執意加大對「華」全方位遏制打壓，使美「中」關係陷入困境，在捍衛主權和領土完整問題上，「中」方立場堅定不移。臺灣問題事關美「中」關係政治基礎，但美方卻大搞「以臺制華」、臺灣大搞「倚美謀獨」。美方不要有任何誤判和幻想，必

須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必須慎重妥善處理涉臺問題。

6月14日：以「弘揚鄭成功愛國主義精神，維護國家統一，捍衛民族尊嚴」為主題的「紀念鄭成功收復臺灣360週年大會」在福建省南安市舉行。國臺辦主任劉結一表示，兩岸同胞共同紀念鄭成功收復臺灣360週年，最重要是弘揚偉大愛國主義精神，共擔民族大義、順應歷史大勢，共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

6月15日：大陸國臺辦舉行新聞發布會，由發言人馬曉光主持，要點如次：

- (一) 堅持「九二共識」、反對「臺獨」共同政治基礎，臺灣任何政黨、團體與大陸交往都不存在障礙。當前臺海形勢複雜嚴峻，民進黨政府加緊謀「獨」挑釁，外部勢力加大力度打「臺灣牌」，嚴重威脅臺海和平穩定，嚴重損害中華民族整體利益和兩岸同胞切身利益。希望臺灣民眾與大陸一起堅決反對「臺獨」分裂和外部勢力干涉，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維護臺海和平穩定，造福兩岸同胞，捍衛民族利益。
- (二) 大陸為保護消費者健康安全，不得不暫停臺灣石斑魚輸入。民進黨政府不考慮臺灣漁民切身利益，不切實履行監管責任，把單純技術性問題複雜化，惡意抹黑大陸，製造兩岸對立，民進黨政府作為，說明根本不想解決問題，再次將一己政治私利凌駕臺灣漁民利益之上，絲毫沒有為臺灣漁民著想意願。
- (三) 為臺商臺企辦實事、做好事、解難事，是大陸一貫方針政策。將深入貫徹落實國務院有關決策部署，指導各地臺辦會同有關方面為臺商臺企提供更大支援和更好服務，助力臺商臺企克服困難，紮實發展，行穩致遠。
- (四) 「祖國」統一是歷史大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鏗鏘步伐沒有任何勢力能夠阻擋，希望廣大臺灣同胞始終站在歷史正確一邊，旗幟鮮明反對「臺獨」和外部勢力干涉，共同致力推進「祖國」統一、實現民族復興歷史偉業。

6月19日：大陸外交部發布《美國對華認知中的謬誤和事實真相》一文，指出美國國務卿布林肯5月26日在亞洲協會發表對「華」政策演講內容謬誤，包括美方仍奉行基於與《臺灣關係法》、「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對臺6項保證」的「一個中國」政策，美對臺政策沒變。大陸外交部指出，「一個中國」原則

不可撼動，「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侵犯，不得搞「兩個中國」和「一中一臺」紅線不容踐踏。

6月23日：由中國歷史研究院指導，廈門大學主辦的「紀念鄭成功收復臺灣360週年學術研討會」在福建廈門舉行，兩岸學者二百餘人透過線上線下方式與會。國臺辦副主任劉軍川表示，鄭成功收復臺灣，是維護「祖國」統一光輝篇章，書寫抗擊外國殖民侵略光輝一頁。鄭成功收復臺灣後的治理實踐，給兩岸同胞留下攜手共建家園的豐厚遺產。鄭成功歷史功績至今仍然是連結兩岸同胞精神紐帶和文化橋樑。

6月29日：大陸國臺辦舉行新聞發布會，由發言人馬曉光主持，要點如次：

- （一）金門、廈門通橋是順應兩岸民眾民生訴求好事，有利金廈兩地共同發展、造福兩岸同胞。民進黨政府「逢陸必反」，藉機煽動兩岸對立，破壞兩岸關係，相信包括金門鄉親在內廣大臺灣同胞都希望金門成為兩岸交流合作前沿，反對變成民進黨政府煽動兩岸對抗工具。
- （二）民進黨政府不斷加強與外部勢力軍事、準軍事勾連，造成臺海緊張動盪，不惜把臺灣民眾推向戰火，「倚美謀獨」、「以武謀獨」必遭失敗。敦促美國政府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停止與臺灣進行軍事、準軍事勾連，停止向臺灣出售武器。
- （三）民進黨政府對石斑魚監管漏洞百出，沒有禁用藥物檢驗結果無法令人信服，臺灣石斑魚養殖及安全衛生管理體系存在的問題沒有根本解決，民進黨政府如果不正視自身存在問題，就無法保障臺灣漁民切身利益。
- （四）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取代中華民國政府，成為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國際上唯一合法代表。在同一國際法主體沒有發生變化情況下，新政權取代舊政權，「中國」主權和固有領土疆域並未由此而改變，「中華人民共和國」理所當然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國」主權，包括對臺灣的主權。
- （五）堅持「九二共識」、反對「臺獨」是大陸與中國國民黨互動交往共同政治基礎，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定海神針，也是維護臺海和平穩定關鍵。當前臺海形勢陷入緊張動盪，根源是民進黨政府拒不承認「九二共識」，勾連外部勢力不斷進行謀「獨」挑釁，結果不僅保不了臺灣，還會把臺灣一步步推向險境，嚴重損害廣大臺灣民眾安全福祉。

7月1日：我大陸委員會針對香港移交大陸25週年指出，1997年7月1日，香港移交大陸，號稱實施「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一國兩制」。然而，大陸通過「港版國安法」，以高壓方式治理香港，悖離普選目標與港人期待。臺灣人民透過民主選舉，向全世界及大陸表達臺灣拒絕「一國兩制」堅定立場。臺灣堅持自由民主憲政、堅持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堅持主權不容侵犯併吞、堅持中華民國臺灣前途須由臺灣人民決定。

7月3日：由大陸國臺辦和中國記者協會共同舉辦的「魅力新疆—兩岸媒體聯合採訪活動」在新疆各地舉行，邀請兩岸30家媒體、40位記者、臺青等人參加，行程包括烏魯木齊、伊犁、喀什等地，參觀內容包括紡織產業園、反恐和去極端化鬥爭主題展、白沙湖等。國臺辦發言人馬曉光表示，新疆在經濟發展、居民生活水平、對文化和生態保護上，均取得一定成就，相信大家不虛此行，希望透過採訪活動，使兩岸臺灣同胞了解新疆。

7月7日：大陸舉辦「海峽論壇」並邀請臺灣方面人員出席，我大陸委員會表示，「海峽論壇」為大陸主辦之大型對臺統戰平臺，歷年藉由活動宣傳對臺「反獨促統」政策及統戰成果。政府政策立場如下：

（一）禁止在臺辦理相關活動；我方不得與陸方合作辦理。

（二）禁止中央機關人員參與，不樂見我地方政府與會；呼籲我民眾團體勿輕易參加。

（三）禁止參加消滅中華民國的「民主協商」、推動「一國兩制臺灣方案」。

（四）提醒國人遵守兩岸條例及相關規範，避免觸法。

由臺灣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紀念協會、大陸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共同主辦的「第4屆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史與抗戰精神傳承研討會」，以視訊方式，在臺北、北京同步舉行，旨在紀念對日抗戰爆發85週年，促進兩岸同胞銘記抗戰歷史、弘揚抗戰精神，兩岸退役將領、專家學者等百餘人與會。

7月8日：第14屆海峽百姓論壇以「線下+雲端」方式在福建省福州市舉行。福建省海外聯誼會副會長李文慎表示，當前福建正積極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著力打造臺胞臺企登陸第一家園，臺閩各領域融合穩中有進，深入挖掘整理兩岸姓氏資源，展示兩岸同根同源中華文化，對促進兩岸同胞心靈契合，增進國家認同感，增強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意義。

7月9日：以「臺閩兩地建設共同家園、兩岸人民留存共同記憶」為主題的臺閩關係檔

案文獻展在福建廈門舉行，大陸全國臺聯會長黃志賢表示，臺灣與福建隔海相望、同根同源，是2,300萬臺胞主要祖籍地，展覽是「遷臺記憶」檔案文獻工作成果集中展現，全國臺聯將支持福建推進兩岸融合發展，支持加大兩岸有關資源搶救保護和開發研究等工作。

7月11日：第20屆海峽青年論壇在福建廈門舉行，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回函參與論壇之臺灣青年並表示，希望與會臺灣青年向臺灣青年分享自己在大陸經歷和感悟，讓更多臺灣青年瞭解大陸，與大陸青年同心同行、攜手打拼，讓青春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夢進程中綻放異彩。

7月12日：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針對賴副總統赴日弔唁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應詢時表示，臺灣屬「中國」一部分、沒有所謂副總統的職稱，此次賴副總統訪日並不妥當，是民進黨政府政治操弄，為此已要求大陸駐日大使館向日本外務省提交抗議。國臺辦發言人朱鳳蓮表示，關於安倍晉三突遭不幸辭世，大陸領導人已向日方致唁電表示深切哀悼，民進黨政府藉弔唁之名，行謀「獨」之實是徒勞的。希望日本政府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精神，妥善處理涉臺問題。

第14屆「海峽論壇」在福建廈門舉行，以「擴大民間交流、深化融合發展」為主題，採取線上與線下相結合方式舉行，除安排論壇大會外，計有青年、基層、文化、經濟交流4大版塊、43場活動。

7月13日：大陸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出席「海峽論壇」大會時表示，兩岸同胞是血濃於水的一家人。中共18大以來，大陸貫徹「新時代黨解決臺灣問題的總體方略，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不斷完善保障臺灣同胞福祉和在大陸享受同等待遇的制度和政策，努力為臺灣同胞，特別是臺灣青年來大陸學習、就業、創業、生活創造良好條件。廣大臺胞要看清兩岸關係發展大勢，堅定站在歷史正確一邊，堅決反對各種「臺獨」分裂行徑。

7月18日：大陸國臺辦18日至25日在官方微博發布8集《「九二共識」系列微講座》影片，分別由國臺辦發言人馬曉光及朱鳳蓮講述「九二共識」議題。主題分別為「九二共識是如何達成的」、「九二共識的核心要義是什麼」、「九二共識白紙黑字不容否認」、「為什麼說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的定海神針」、「2008年之後兩岸雙方在堅持九二共識基礎上取得哪些重要成果」、「民進黨當局所謂兩岸對話不設政治前提有什麼企圖」、「九二共識是否會限縮臺灣人民選擇權限縮臺灣自主空間」、「九二共識與一國兩制是一回事嗎」。

7月19日：「2022臺北-上海雙城論壇」在臺北、上海兩地以視訊方式同步舉行，論壇以「韌性 永續 人文」為主題，臺北市長柯文哲表示，大陸是臺灣第一大出口市場，但近年臺海局勢緊張，兩岸對立加劇。透過溝通協商、尋求互相諒解，才能讓臺灣人民關心的民生問題得到解決，也是舉辦雙城論壇的初衷。衷心期盼疫情早日結束，誠摯歡迎上海朋友再來臺北交流。上海市長龔正表示，兩岸同胞心之相繫，情之相融，任何力量都切割不斷，將秉持「兩岸一家親」理念，為臺資來上海投資興業創造良好環境。為臺胞在上海學習、就業、創業、生活提供更多便利。

7月26日：「九二共識」30週年座談會在北京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出席時表示，30年前，兩岸選擇以對話代替對抗、以溝通化解分歧、以協商促進合作，達成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核心要義是「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九二共識」明確兩岸關係根本性質，奠定兩岸關係發展政治基礎。堅持「九二共識」，贊成「一個中國」原則，兩岸關係就能改善發展，臺灣同胞就能受益；否認「九二共識」，背離「一個中國」原則，兩岸關係就會緊張動盪，損害臺灣同胞切身利益。

8月2日：針對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臺，大陸全國人大等評論如次：

- （一）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言人聲明表示，裴洛西不顧大陸嚴正交涉和堅決反對，執意訪問臺灣，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嚴重損害大陸主權和領土完整，嚴重衝擊美「中」關係的政治基礎，向「臺獨」分裂勢力發出嚴重錯誤信號，全國人大對此堅決反對。
- （二）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表示，裴洛西不顧大陸反對訪問臺灣，此舉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嚴重違反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嚴重破壞美「中」關係政治基礎，是對大陸的重大政治挑釁，全國政協對此堅決反對。
- （三）外交部指出，裴洛西訪臺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嚴重衝擊美「中」關係政治基礎，嚴重侵犯大陸主權和領土完整，嚴重破壞臺海和平穩定，向「臺獨」分裂勢力發出嚴重錯誤信號。「中」方對此堅決反對，嚴厲譴責，並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和強烈抗議。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心願和神聖職責。「中」方必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四）中臺辦表示，敦促美方看清臺灣問題歷史經緯，認清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和現狀，以實際行動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履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正告民進黨政府，徹底放棄「臺獨」圖謀，不要在「臺獨」死路上一條道走到黑。任何謀「獨」行徑都將在大陸反「獨」促統的強大力量下粉身碎骨。

8月3日：大陸海關總署動植物檢疫司、進出口食品安全局發布《關於暫停臺灣地區柑橘類水果和冰鮮白帶魚、凍竹筴魚輸入大陸的通知》指出，決定自2022年8月3日起，暫停臺灣柑橘類水果和冰鮮白帶魚、凍竹筴魚輸入大陸。各海關自2022年8月3日起，暫停受理臺灣地區柑橘類水果和冰鮮白帶魚、凍竹筴魚報關，並及時將上述情況通知轄區內相關企業。

中臺辦發言人馬曉光受權針對依法懲治「臺獨」頑固分子發表談話表示，追究「臺獨」頑固分子刑事責任具有明確的法律依據，凡是以身試法的「臺獨」頑固分子，將採取刑事懲處措施，依法嚴懲不貸，依法終身追責。任何人、任何勢力都不要低估大陸捍衛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心。

我大陸委員會對大陸藉美國眾議院議長訪臺，對臺文攻武嚇，表達強烈抗議及譴責，聲明如下：

（一）中華民國政府對支持臺灣民主自由價值之國際友人到訪均表歡迎，裴洛西議長訪臺充分展現臺美長期堅定友誼及安全利益夥伴關係。臺灣與2,300萬人民之堅強民主韌性及國際社會對臺愈形強大的支持，必將遏止專制政體對我國家主權侵犯，共同維護印太區域和平穩定。

（二）呼籲民主國家團結一致、嚴正立場予以制裁遏阻，也嚴肅正告大陸立即停止威脅挑釁行徑，切勿誤判情勢，釀成無法承擔嚴重後果。

（三）兩岸互不隸屬是客觀現狀，大陸任何極限施壓，都無法改變此一事實。政府維護臺海和平之政策一貫、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安全不容武力侵犯。

8月10日：大陸國臺辦、國新辦聯合發表《臺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全文約一萬三千字，除前言與結束語外，內容包括（一）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不容置疑也不容改變；（二）中國共產黨堅定不疑推進「祖國」完全統一；（三）「祖國」完全統一進程不可阻擋；（四）新時代新征程上推進「祖國」統一；（五）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光明前景。

我大陸委員會針對大陸發布《臺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發表聲明強調，中華民國是主權國家，大陸政權從未一日治理過臺澎金馬，其以扭曲事實的「一個中國」原則，錯誤引用聯合國憲章，妄稱對臺主權、挑戰國際秩序，已遭到國際社會及眾多民主國家嚴厲譴責與堅決反對。臺灣主流民意早已堅定拒絕「一國兩制」，臺灣前途只有臺灣2,300萬人有權決定，絕不接受專制政權所設定的兩岸終局。

8月12日：「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智庫論壇在北京舉行，三十多位臺灣問題專家學者與會，針對《臺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展開研討。認為白皮書全面總結中國共產黨堅定不移推進「祖國」完全統一的奮鬥歷程、重大成就和寶貴經驗，深刻揭批民進黨政府加緊謀「獨」挑釁與美國加大力度打「臺灣牌」的風險，系統闡述大陸推進實現統一立場和政策。

8月16日：中臺辦發言人受權宣布，為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兩岸同胞切身利益、堅決打擊「臺獨」頑固分子，決定公布蕭美琴、顧立雄、蔡其昌、柯建銘、林飛帆、陳椒華、王定宇等列入清單的「臺獨」頑固分子，與前已公布的蘇貞昌、游錫堃、吳釗燮採取以下懲戒措施：禁止其本人及家屬進入大陸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限制其關聯機構與大陸有關組織、個人進行合作，絕不允許其關聯企業和金主在大陸謀利，以及採取其它必要懲戒措施，依法終身追責。決定對游錫堃擔任董事長的「臺灣民主基金會」、吳釗燮擔任董事長的「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實施制裁，禁止其進入大陸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

8月17日：由大陸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辦的「2022年兩岸關係研討會」以線上線下方式在河南鄭州舉行，以「把握歷史大勢，共謀民族復興」為主題，兩岸專家學者一百三十餘人參與，針對「堅持九二共識、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攜手反獨促統、共謀民族復興願景」進行研討。

8月19日：由大陸國臺辦指導，江蘇省臺辦、蘇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辦的第2屆海峽兩岸青年文化月在江蘇蘇州舉行，活動以「同心同行、青春力量」為主題，國臺辦副主任龍明彪表示，活動安排豐富多彩的活動，正是以實際行動積極響應習近平發出的號召，相信一定能夠喚起新時代兩岸青年的使命擔當，展現新時代兩岸青年的精神風采。

8月22日：第12屆海峽兩岸法學院校長論壇在浙江杭州以線上線下方式舉行，圍繞「新時代兩岸法學教育的融合模式」主題進行研討，浙江工商大學副校長趙英軍指出，希望海峽兩岸法學界共同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大局，更加踴躍地

投身到兩岸交流合作，攜手共創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美好未來。

- 8月23日：江蘇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和澳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協會聯合主辦《臺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研討會在江蘇、澳門以線上線下形式舉行，江蘇省委統戰部副部長李衛華表示，要完整、準確、全面地學習領會，把握歷史大勢，堅定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信心和決心，增進兩岸同胞心靈契合，不斷凝聚促進「祖國」統一、民族復興的團結奮鬥之力。
- 8月24日：中國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在江蘇昆山與海協會會長張志軍會面，張志軍表示，當前臺海形勢陷入緊張動盪，大陸捍衛主權和領土完整、遏制打擊「臺獨」分裂和外來干涉的正義之舉。面對複雜形勢，要堅定堅持「九二共識」、反對「臺獨」的共同政治基礎，加強交流溝通，共同維護臺海和平穩定，造福兩岸同胞。
- 8月27日：「2022年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在四川成都以線上線下方式舉行，主題為「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共創國家統一和民族復興偉業」。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副會長鄭建邦透過視訊表示，反對「臺獨」分裂、促進和平統一，是海內外中華兒女的共同心聲和光榮事業。要繼續高舉愛國主義旗幟，為推進和平統一進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做出貢獻。
- 8月30日：由大陸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辦、北京市臺辦承辦的「九二共識」30週年學術研討會，以線上線下方式在北京舉行。以「重溫歷史、鞏固基礎、開創未來」為主題，大陸海協會副會長孫亞夫、周寧等六十多名專家學者與會，會議認為「九二共識」，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兩岸關係就能和平發展，臺灣同胞就能受惠得益；否認「九二共識」，兩岸關係就會動盪，損害臺灣同胞利益。
- 9月2日：由大陸湖北省臺辦主辦、宜昌市臺辦承辦的第16屆「海峽兩岸媒體荊楚行」2日至7日在湖北宜昌等地舉行，兩岸十餘家新聞單位、二十餘名媒體人參與。海峽兩岸媒體人透過對宜昌深入採訪交流，用文字和鏡頭全面展現湖北西部地區發展變化，聚焦宜昌全面開展長江大保護有力舉措，講述臺資企業與宜昌經濟社會融合發展故事，展示巴楚文化的獨特魅力。
- 9月5日：第15屆黃埔論壇在江蘇南京舉行，論壇由黃埔軍校同學會主辦，江蘇省海外聯誼會、江蘇省黃埔軍校同學會協辦，以「緬懷抗戰英烈，發揚黃埔精神，奮進促統征程」為主題。全國政協副主席蘇輝表示，今年是全民族抗戰爆發

85週年，舉辦第15屆黃埔論壇，共同緬懷抗日先輩們歷史功績，弘揚偉大抗戰精神和黃埔精神，進一步激勵廣大黃埔同學及其親屬致力於「祖國」和平統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重要意義。

由大陸全國臺灣同胞投資企業聯誼會主辦的「大陸臺企這十年」座談會在北京舉行。中臺辦（國臺辦）主任劉結一表示，新時代非凡歷程中，廣大臺胞在大陸追夢、築夢、圓夢，收穫新成果、做出新貢獻。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進程將為臺胞提供更大機遇。廣大臺商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推動者、受益者，希望大家秉持民族大義，堅定站在歷史正確一邊，堅決反對「臺獨」分裂和外部勢力干涉，積極投身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祖國」和平統一正義事業。

9月6日：我大陸委員會針對大陸四川甘孜瀘定縣發生芮氏規模 6.8 地震，造成人員傷亡，後續餘震不斷。除向不幸罹難的人員及家屬致上哀悼之意，也期盼搜救和災後復原工作能夠順利進行，儘早恢復正常生活。

9月16日：「第11次兩岸人文對話」透過視訊方式在臺北和北京同步舉行，兩岸學者以「《史記》的古注與今注」為主題進行交流。中華文化促進會主席王石、臺灣太平洋文化基金會董事長錢復等出席。活動係由中華文化促進會與臺灣太平洋文化基金會共同發起，以弘揚中華文化、促進兩岸文化交流為宗旨。

國臺辦和江西省人民政府共同主辦第18屆「臺贛經貿文化合作交流大會」在江西上饒舉行，主題為「共享新機遇攜手新發展」。江西省省長葉建春表示，目前臺灣穩居江西境外引資的第二大來源地，江西發展前景廣闊，熱切期盼更多臺商臺企發揮技術、資本、管理、渠道等優勢，在數位經濟、智能製造、新能源新材料、現代農業、中醫藥等產業賽道方面加強對接合作，實現互利共贏。

9月19日：第25屆臺京科技論壇透過視訊方式在臺北及北京兩地舉行，以「探索新路徑、融入新發展、共用新成果」為主題，兩岸企業家峰會大陸方面理事長郭金龍，中共北京市委副書記、市長陳吉寧出席。中臺辦（國臺辦）主任劉結一表示，廣大臺灣同胞是中華民族的成員，民族復興、國家強盛，與臺灣同胞前途命運息息相關。兩岸同胞要攜手同心，共擔民族復興的責任，共用民族復興的榮耀。

「2022臺京金融合作論壇」透過視訊方式在臺北及北京同步舉行，以「新形勢下兩岸金融合作新空間」為主題，來自銀行、證券、保險、基金、金融科

技等領域，兩岸企業家峰會大陸方面副理事長張平、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李穎津出席。

9月21日：中共中央宣傳部舉行「中國這十年」系列主題新聞發布會，中臺辦（國臺辦）副主任陳元豐表示，習近平就對臺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和政策主張，形成「新時代黨解決臺灣問題的總體方略」，提供新時代做好對臺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動綱領。大陸堅決粉碎「臺獨」分裂和外來干涉圖謀，紮實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展，團結廣大臺灣同胞共創「祖國」統一、民族復興的光榮偉業。

9月28日：大陸國臺辦舉行新聞發布會，由發言人朱鳳蓮主持，要點如次：

- （一）敬宗睦族是中華民族優良傳統，大陸各地臺辦和相關部門多年來為臺胞回鄉尋根尋親積極創造條件，提供各種協助。兩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種，是血脈相連一家人，共同的民族和文化認同是與生俱來基因，經得住歲月風霜，任何人任何力量都無法改變。
- （二）北京市臺辦推出《臺胞百問》手冊，廣東省臺辦發布《2022年廣東省惠臺政策措施辦事指南》，對於完善保障臺灣同胞福祉和在大陸享受同等待遇的制度和政策，支持臺胞臺企融入大陸新發展格局，實現高質量發展具有積極作用。大陸將一如既往支持大陸各省市開展各項對臺經濟文化交流工作，持續為臺胞辦實事、做好事、解難事。
- （三）兩岸同胞是血濃於水的骨肉兄弟，是命運共同體。在重大自然災害和突發事故面前，兩岸同胞都患難與共，守望相助，互施援手。新冠疫情以來，大陸踐行「兩岸一家親」理念，切實維護臺灣同胞健康福祉，盡最大努力做好涉臺疫情防控工作。事實證明，越是在困難時刻，兩岸一家親的深厚情誼，越能夠給兩岸同胞帶來希望和慰藉，帶來攜手克難的勇氣和力量。
- （四）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中國共產黨矢志不渝的歷史任務，2016年以來，民進黨政府加緊進行「臺獨」分裂活動，一些外部勢力企圖阻擋「中國」實現完全統一和中華民族邁向偉大復興。為捍衛主權和領土完整，大陸採取堅決有力措施，反對和遏制「臺獨」分裂行徑與外部勢力干涉，完全是正義之舉、正當之舉。民進黨政府歪曲事實、混淆視聽，抹黑污蔑大陸對臺方針政策，掩蓋不了謀「獨」挑釁分裂國家的用心。

(五) 中臺辦編寫《中國共產黨與祖國統一》一書，展示百年來中共為解決臺灣問題，在各個時期為追求「祖國」統一發揮核心引領作用，彰顯中共全心全意為兩岸同胞謀福祉真摯情懷，昭示「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的歷史規律和光明前景。

10月7日：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國家圖書館、「中共研究雜誌社」及「展望與探索雜誌社」共同主辦的「中共20大與區域安全」學術研討會在臺北舉行，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分別就中國大陸情勢、區域安全與兩岸關係面向，探討當前國際格局變化及兩岸內外部情勢發展。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名譽教授邱坤玄教授進行專題演講，題目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國特色大國外交」。

10月10日：蔡總統出席在總統府前廣場舉行的「中華民國中樞暨各界慶祝111年國慶大會」，以「守土衛國，你我同行」為題發表演說。蔡總統指出，臺海的和平穩定是兩岸關係發展的基礎。近年來，大陸日益升高的軍事恫嚇、外交打壓、貿易阻撓，以及試圖消滅中華民國臺灣主權的作為，已經威脅到臺海及區域和平穩定的現狀。臺灣人民和朝野政黨的最大共識，就是捍衛主權以及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兩岸立場的分歧，不僅是歷史因素，更在於民主發展上的背道而馳。兵戎相見絕對不是兩岸的選項，唯有尊重臺灣人民對主權和民主自由的堅持，才是重啟兩岸良性互動的根本，在理性、平等及相互尊重下，願意和大陸尋找雙方可接受的維持臺海和平穩定的方法這是共同責任。

大陸國臺辦發言人馬曉光針對蔡總統國慶演說涉及兩岸關係內容，以書面表示，蔡總統的演說係繼續堅持「兩國論」立場，歪曲兩岸關係性質，渲染大陸威脅，推卸破壞兩岸關係危害臺海和平穩定的責任，極力貼靠外部勢力壯膽，強化「以武謀獨」，繼續誤導臺灣民意。大陸一貫主張透過平等協商改善與發展兩岸關係。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就是兩岸相互尊重、平等協商、維護臺海和平的政治基礎。民進黨政府否定「九二共識」，一手關閉兩岸平等協商的大門，又企圖將「兩國論」立場強加於兩岸協商，說明民進黨政府本就沒有緩和當前臺海緊張局勢，以對話化解分歧的誠意。只有回到「九二共識」基礎，兩岸雙方才能對話溝通，兩岸關係才能和平穩定發展。

10月16日：中共20大16日至22日在北京舉行，會議前後相關涉臺言論如下：

(一) 15日，中共20大新聞中心舉行第1場記者會，發言人孫業禮應詢表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大陸解決臺灣問題的基本方針，大陸願繼

續以最大誠意為和平統一創造空間」，但大陸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兩岸同胞要攜起手來，堅決反對「臺獨」分裂和外來干涉，共同開創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光明未來。

- （二）16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共20大開幕進行政治報告時強調，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中共矢志不渝的歷史任務，堅持貫徹「新時代黨解決臺灣問題的總體方略」，堅定不移推進「祖國」統一大業。大陸堅持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但絕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這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臺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絕非針對廣大臺灣同胞。「祖國」完全統一一定要實現，也一定能夠實現。
- （三）18日，中共20大新聞中心舉行第2場記者會，福建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張彥表示，將把朱子文化、閩南文化、媽祖文化這些特色文化做為載體，推動海峽兩岸共同弘揚中華文化。與此同時，大陸發揮「海絲」核心區和海外華僑的優勢，共同把中華文化推向世界。
- （四）20日，中共20大新聞中心舉行第4場記者會，外交部黨委委員、副部長馬朝旭表示，大陸堅定捍衛中共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回擊裴洛西訪臺，堅決反對「臺獨」行徑及外部勢力干涉，進一步鞏固「一個中國」的國際共識。
- （五）22日，中共20大舉行閉幕式，大會強調，要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堅持貫徹新時代黨解決臺灣問題的總體方略，堅定反「獨」促統堅定不移推進「祖國」統一大業。修正通過之《中國共產黨章程》內容強調，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方針，堅決反對和遏制「臺獨」，完成「祖國」統一大業。

我大陸委員會針對習近平在中共20大政治報告重申貫徹「對臺總體方略」及不放棄對臺使用武力等一貫主張表示，臺灣從來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臺灣人民絕不接受中共設定「一中」原則的九二共識及「一國兩制」等任何終局，也唯有臺灣2,300萬人有決定未來的權利。正告大陸放棄強加的政治框架及武力脅迫侵犯作為，尊重臺灣人民對主權和民主自由生活方式的堅持，以理性平等及相互尊重的態度，和平務實處理分歧，才是重啟兩岸良性互動的根本。

- 10月17日：由政治大學國關中心、臺灣大學政治系主辦，政大東亞所、臺大社科院協辦的「解讀『20大』政治報告」座談會17日在臺北舉行。專家學者針對中共20大政治報告涉臺、經濟、外交與軍事等方面進行解讀。
- 10月23日：為紀念臺灣光復77週年，由臺灣作家藍博州策展的「反殖民與臺灣光復-日據時期臺灣歷史圖文展」巡迴第41站在臺中霧峰林家宮保第舉行。呈現1895年至1945年臺灣民眾在各個階段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犧牲與歷程。
- 10月24日：大陸全國臺灣研究會在北京舉行中共20大報告學習研討會，由會長汪毅夫主持，副會長孫亞夫、李亞飛等人與會。會議認為，中共20大政治報告涉臺論述總結過去10年對臺工作的經驗，準確把握國際變局、臺灣內部變局和國家發展戰略全局，立足於中華民族根本利益，體現在嚴峻複雜的形勢下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戰略魄力和歷史信心。
- 10月25日：由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和臺灣抗日志士親屬協進會主辦的「紀念臺灣光復77週年學術座談會」在北京以線上線下方式舉行。以「堅持『九二共識』、推進和平發展」為主題展開討論。全國臺聯副會長楊毅周表示，紀念臺灣光復的真正意義，就是要向世人證明，臺灣人就是中國人，臺灣回歸「祖國」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結果，更是兩岸同胞共同抗日的結果，臺灣同胞具有光榮的愛國主義傳統，臺灣前途在於國家統一，臺灣同胞福祉繫於民族復興。
- 10月26日：大陸國臺辦舉行新聞發布會，由發言人馬曉光主持，要點如次：
- （一）中共20大政治報告涉臺內容，充分肯定過去5年和新時代10年對臺工作取得重大成就，系統闡述中共解決臺灣問題政策主張，闡明對臺工作基本方針、原則立場、重要舉措，劃出紅線底線，展現反對外來干涉和反對「臺獨」分裂的堅定決心。
 - （二）「新時代黨解決臺灣問題的總體方略」回答新時代新征程推進「祖國」統一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共18大以來對臺工作最重要的理論成果，是新時代新征程推進「祖國」統一大業的科學指南和行動綱領。
 - （三）深化兩岸融合發展是習近平提出的重大政策主張，大陸將突出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研究更多臺胞臺企同等待遇政策，不斷擴大和深化兩岸民間各領域交流合作，為「祖國」統一和民族復興凝心聚力。

（四）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中共的歷史任務，「臺獨」分裂是「祖國」統一的最大障礙，是民族復興的嚴重隱患。中共二十大對黨章修改增加堅決反對和遏制「臺獨」等內容，是對臺工作形勢和任務的必然要求。民進黨政府為謀取一黨之私，在事關臺胞權益問題上進行政治操弄，肆意損害臺胞利益，其險惡用心路人皆知，必將遭到民意懲罰。

10月27日：兩岸經貿合作視訊座談會以視訊連線方式在臺北與北京同步舉行，臺灣海峽兩岸經貿文化交流協會會長高孔廉及海峽兩岸經貿交流協會會長高燕分別發表主題演講。與會兩岸專家學者圍繞「兩岸產業鏈轉型現狀與趨勢」、「兩岸經貿交流合作中的投資者權益保護」、「新經濟新產業與兩岸合作新機遇」3項議題進行交流研討。

10月28日：我大陸委員會委託中華民國高等政策研究協會在臺北舉辦「中共權力變遷及治理趨勢」國際研討會，陸委會主委邱太三表示，近年來大陸面對區域情勢變化及其所謂「歷史任務」，持續加大對臺武力恫嚇及政經施壓，2,300萬臺灣人民早已堅拒「一中」原則與「一國兩制」；我方長期呼籲，政治分歧的處理關鍵，從來不是單方設定政治終局框架或武力侵犯可以強行解決，中華民國政府致力維護臺海和平現狀，並與國際社會合作，穩健應對情勢發展。維持兩岸和平穩定，是雙方共同的責任，期待對岸跳脫過去陳舊的政治框架，展現改善兩岸關係的開放態度。

「中共 20 大與區域安全」

學術研討會議程表

Agenda of the Symposium on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Regional Security"

時 間	內 容		
09：00) 10：10	開幕式暨專題演講 專題演講：邱坤玄 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名譽教授)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國特色大國外交」		
10：10) 10：30	休 息		
10：30) 12：00	第一場次：大陸情勢 主持人：陳文政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發表人	論文題目	與談人
	邵軒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副教授)	中共20大前黨政情勢與官媒主題分析	張登及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蔡文軒 (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所研究員)	中共20大的預演：習近平的造神運動與集權化	林瑞華 (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劉文斌 (展望與探索雜誌社社長) 鄭惠應 (天主教輔仁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從訊息傳遞節點探究認知作戰防制	傅文成 (國防大學新聞學系教授)
12：00) 13：30	午 餐		

時 間	內 容		
13：30) 15：00	第二場次：區域安全 主持人：林賢參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發表人	論文題目	與談人
	徐筱琦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東亞學系副教授)	印太戰略發展與美 「中」競爭關係分析	王尊彥 (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 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員)
	郭偉山 (臺灣印度研究協會 學術長兼研究員)	「中」印在尼泊爾競逐 下的美國因素	方天賜 國立清華大學通識中心 副教授兼印度中心副主任
	黃秋龍 (展望與探索雜誌社 研究員)	解構中國大陸「次國家 級外交」與亞太非傳統 安全利益關係	連弘宜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 教授兼國際事務學院院長)
15：00) 15：20	休 息		
15：20) 16：50	第三場次：兩岸關係 主持人：王冠雄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發表人	論文題目	與談人
	關弘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東亞學系副教授)	從臺灣民意檢視中共對 臺「一代一線」政策之 成效	薛健吾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 研究所副教授)
	Bruno Magno (Ph. D. Candidate, Federal University of Rio Grande do Sul, Brazil)	China-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20th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Guermantes Lailari (Strategic and Innovative Group, USA)
	Buwule, Robert (Kyambogo University, Uganda)	Investment in R&D by Taiwan SMEs as a Covid-19 business survival strategy: Initial Results	Rup Das Narayan (Indian Counci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dia)
16：50) 17：00	閉 幕 式 主持人：江柏煒 院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中共20大與區域安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on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Regional Security"/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國家圖書館，中共研究雜誌社，展望與探索雜誌社編。-- 新北市：法務部調查局出版：中共研究雜誌社，展望與探索雜誌社發行，民111.12

面；公分

部分內容為英文

ISBN 978-626-7220-08-5(平裝)

1. CST：中國大陸研究 2. CST：兩岸關係 3. CST：文集

574.107

111019760

「中共 20 大與區域安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on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Regional Security"**

中華民國111年12月出版

發行人：王俊力

出版機關：法務部調查局 (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 (02)2911-2241

發行所：中共研究雜誌社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307巷7號 (02)2913-9099

展望與探索雜誌社

新北市新店區中生路40號 (02)2217-3485

編者：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國家圖書館

中共研究雜誌社、展望與探索雜誌社

設計印刷：關於設計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浦城街6巷24號2樓 (02)2369-6850

展售處：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臺北市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02)2518-0207

五南文化廣場

臺中市中山路6號 電話：(04)2226-0330

GPN: 1011101994

ISBN: 978-626-7220-08-5 (平裝)

每本定價：300元